《真相》系列(四十九)

共用的墓碑

一個中國人的家庭纪事

李世華 著

明鏡出版社
www.mirrorbooks.com

THE COMMUNAL TOMBSTONE
——THE FAMILY STORY OF A CHINESE
by
Li, Shihua

Publisher: Ho Pin
Cover by Yi Hua

International Standard Book No 1-932138-77-3

P. O. Box 366, Carle Place, NY11514-0366, U .S. A.
TEL:(516)338-6976

Web: **http://www.mirrorbooks.com/**
E-mail: mirrorpublishing@yahoo.com

謹以此書

獻給：

我的祖父李樂章、我的父親李傳先、我的叔父李傳啓、我的嬸母李劉氏、我沒有名字的小侄女和數千萬死於大饑荒的人們；

獻給：

我的母親李陳氏、我的大哥李世隆、我的同學劉法強、程適凱和數百萬死於文化大革命的人們。



目　錄


UnRegistered

序一　苛政猛於虎

二十世紀中葉，中國大陸的“三年自然災害”並非天災，而純粹是人禍造成的一場千古浩劫。可是，由於一手遮天、掩耳盜鈴的愚民政策，歷史真相長期被秘而不宣。直到一九九三年，才由丁抒在香港出版的《人禍》專著首次予以揭露。兩年後英國作家 Jasper Becker 在倫敦出版了 *Hungry Ghosts*，*China's Secret Famine*（《餓鬼》）。作者根據對數以百計的相關人士的採訪和大量尚未出版的文字資料，揭露了罪魁禍首如何製造了這場史無前例的、致數千萬人死於非命的大饑荒。

《人禍》和《餓鬼》是宏觀的歷史鉅著，李世華的新著、《共用的墓碑》，則是作者以本人的親身經歷爲這個時代作見證。

李世華出身於一個世代貧農人家，“解放”那年他才六歲，在皖北農村成長，從小學到大學受的都是“馬、恩、列、斯、毛”，“偉、光、大”，“階級鬥爭爲綱”的說教。然而，無止無休的“政治運動”和農村生活的現實卻不斷加深他年輕心靈的受難，擦亮他的眼睛。

一九五 0 年，七歲的小世華就親眼看見一群五花大綁著的地主被幾個帶槍的“拉到西門外槍斃。”那年的五一節，“在唐寨西門外槍斃了十七個惡霸地主。”這是他經歷的第一場“政治運動”。

在這場“土改運動”中，作爲一個“翻身”的老貧農，他父親以爲“從此有了自己的土地”。但他高興得太早了。一九五四年，開始號召在農村走“合作化道路”，同時實行“統購統銷”，“結果農民的口糧、種子糧甚至飼料也被強迫購了去。爲了防止農民瞞報、藏匿糧食，幹部們就到各家去翻。”一天中午，小世華從小學回家吃午飯，親眼看

到村幹部手裏提著一把刺刀，領著一群人在他家“各間屋子裏翻來翻去，無論廚子、櫃子概莫能免，犄角旮旯都看個遍。”最後，這名村幹部帶人到堆牛草的堂屋裏間，“拿起刺刀奮力對麥草堆戳去。他用刺刀上下左右對草堆一刀接一刀地刺，同時還用刺刀上下翻、左右攪。”這是這個老貧農家，在“偉、光、正”和”四個偉大”統治下，第一次嚐到被抄家的苦果。

一九五六年，“合作化運動”席捲全國農村，農民統統“自願”參加合作社。他父親不但從此失去了“自己種熟了的地”，連養肥的牛、齊全的農具也都充公了。一九五七年夏，世華小學畢業，考進了縣城的最高學府—碭山中學。入學不久，他上的第一堂政治課就是“反右運動”，眼睜睜看著一個接一個好老師被打成“右派”，有的鋃鐺入獄，有的留校接受勞改。“這些事對我們震動很大，在我們幼小的心靈裏播灑下了陰影……我們怎麼也不敢相信像這些老師這樣的好人能與‘歷史反革命’、‘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極右分子’和‘妖魔鬼怪’這些罪惡的稱呼聯繫起來。”

“反右運動”取得了“萬馬齊喑”的“偉大勝利”，一九五八年開始，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大煉鋼鐵、公共食堂等等一系列“新生事物”就瘋狂地橫行無忌了。好景不長，一年之後，一無所有的農民就走向餓莩載道的深淵了：

> 公共食堂已經沒有糧食，開始吃草根、樹皮。儘管如此，上邊還在逐級下壓催著要糧，不僅口糧沒有了，連種子糧、飼料也全部上交了。幹部爲了完成任務，必須把社員家裏的糧食搜光。於是，大抄檢開始了。由生產隊長和積極分子組成的抄檢隊手持鋼釺挨家挨戶搜查，床底下、草堆裏、甚至櫥櫃、雞窩都要翻遍。可疑的地方就用鋼釺捅一捅，犄角旮

見也不能倖免。最荒唐可笑的是他們連廁所都不放過：他們要看看你解的大便裏有沒有沒有消化的糧食粒。

大抄檢的最後一道工序是挖地三尺。抄檢隊對屋裏屋外所有地面仔細觀察，只要見到凸起的部分或是新鮮鬆動的地塊，他們就用鋼釺把地面掘開，仔細扒拉土粒。抄檢完畢，他們揚長而去。

這是我家第三次被抄家，而且這一次比以前兩次都來得徹底、無情、更讓父親傷心。當我那年冬天回家的時候，父親曾經有過的笑容徹底消失了，他臉上流露出的是無奈、絕望、淒苦的複雜表情。他不理解：這就是幹部們天天還在宣傳的無比美好的共產主義?

一九六 0 年元旦，《人民日報》的社論回答了這個老貧農的問題："我們不僅對於一九六 0 年的繼續躍進和更好的躍進，充滿了信心，而且對整個六十年代的繼續躍進，也充滿了信心。"當時世華讀初中三年級，在一間陰冷的教室裏，和同學們一起饑腸轆轆地學習著這些社論，"幼稚地憧憬著無比美好的共產主義明天。"

緊接著就是春節，大年三十世華在冰天雪地中徒步幾十里，回家過年，"腦子裏想著兒時過年時的歡樂，不由得加快了步伐。"走進家門，他一眼看見的卻是滿案板的紅芋葉子，全家人木然的表情。大年三十的午飯是一大鍋紅芋葉子，全家每人一大碗。"下午是在饑餓、寒冷和沈默中度過的。晚上—大年除夕—沒有飯。……天還沒黑，爲了減少能量的消耗，人們便早早地上床，在床上饑腸轆轆地熬過漫長的寒夜。"

後來他聽母親說，"家家戶戶的糧食都早被搜乾了，鍋也早在大煉鋼鐵時給搜走了。……連幹部帶著幾個積分子天天晚上開會鬥人要糧食。"就在這個大年三十的暗夜裏，他的父親還得去參加鬥爭會。

這些爲虎作倀的幹部用種種新奇的酷刑折磨自己的父老鄉親，甚至不放過“一個七十多歲的小腳老媽媽，叫人家站到桌子上，每只手托著一塊磚頭，還要雙胳膊架平，叫‘架飛機’。老人家哪能撐得住?‘撲騰’一聲從桌子上摔下來。那些幹部和積極分子不但不拉，還用腳踢她，說她是裝的。”

世華的叔父正是這個鬧劇的犧牲者。

他父親眼睜睜地看著鄰居一個接一個地死去，一家接一家地死光，他不忍心眼看著八十多歲的老父親和不滿周歲的小孫女都活活餓死，而如狼似虎的村幹部還在繼續用酷刑鬥群眾逼糧食，他感到徹底地絕望，終於在春節後不久就懸樑自盡了。第二天，他遍體鱗傷的叔父也死去了。六天之後，不堪喪子之痛的爺爺也自縊身死。“當年輕氣盛的爺爺當年帶著兩個兒子從山東鄆城來到這兒定居的時候，他是萬萬沒有想到他們爺兒三個會在一個星期內死於非命，然後一起被葬到這片荒灘上。”爺爺死後第十天，嬸母病餓而死；嬸母去世後第十一天，不滿周岁的小侄女被活活地餓死了。從他父親三月七日自盡，短短的二十八日內，這個十二口人的貧農之家竟有五口人死於非命!勉強倖存的親人中，“母親仍在鬼門關前徘徊著，二哥被折磨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

面對三代親人無辜的慘死，世華的悲憤痛徹心肺，痛定思痛，他也清醒地認識到“我的家庭遭遇不過是社會大悲劇的一個縮影而已。”

> 那年的春天特別寒冷而漫長，數以千萬計的人沒有等到夏天，沒有等到麥子成熟，便在饑餓的煎熬中倒下去了。
>
> ……
>
> 午收季節，學校帶我們到城北的一個生產隊“支農”。在緊靠村邊的地裏割麥的時候，我們時不時會被眼前發臭的

> 半腐爛的屍體嚇得尖叫起來。開飯的時候，一群長脖子挑著瘦腦袋、挺著大肚子、皮包骨頭的孩子圍在我們四周，一邊用貪婪的目光盯著我們手裏的饅頭，一邊吮吸著手指吞咽口水。用餓莩遍野和毛澤東自己寫的“千村薜荔人遺矢，萬戶蕭疏鬼唱歌”來說明當時農村的情況是非常恰當的。

“反右”之後，“四個偉大”曾得意忘形地自詡：秦始皇“焚書坑儒”不過殺了幾百個儒生，他殺的超過一百倍。如今，在一個和平時期，發揚光大“苛政猛於虎”，不用一兵一卒，又殲滅了幾千萬無辜的平民百姓，創造了中外古今前無古人的“奇跡”，他更可以引吭高歌“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

一旦篡奪了“絕對權威”，“四個偉大”更一意孤行了。短短的四年之後，他又策劃了後來被他的黨定性爲“十年浩劫”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作爲一個大學生，世華親身經歷了這場荒誕不經的、紅色恐怖的血腥浩劫。他在農村的親人竟然也成了“文革”的犧牲品。他的長兄被誣陷入獄達六年之久，出獄後病體支離而死。寡母痛不欲生，在長兄被捕五天後死去。一生坎坷的二哥，久經牢獄之苦，終於服毒自盡。

李世華一生飽經親人變故，終於化悲痛爲力量，劫後餘生，以親身經歷爲“一個古今中外絕無僅有的荒唐時代”作椎心泣血的見證。“我終於可以告慰我的死於非命的親人及數以千萬計的同胞了，終於可以告慰我們多災多難的民族了。”

《共用的墓碑》不是嚴謹的學術論文，不是客觀的歷史著作，衹是一個農民的兒子親身經歷的故事。正因爲它是一個貧農小子弟的聲音，這部用樸實的語言、無比真實的細節和催人淚下的情節寫成的回憶錄，才具有它無可比擬的、獨特的價值和感人肺腑的力量。

這個小人物的聲音，不是他一個人的聲音，而是數以千萬計的冤魂的哭泣和控訴，是千千萬萬無言的廣大中國農民的聲音。正因爲如此，這個小人物的聲音才能驚天地，泣鬼神，爲近代中國史鑄成一座豐碑。

巫寧坤
2008 年 7 月 30 日於美國維州客中

(巫寧坤，著名作家、學者、翻譯家)



序二　爲死於人禍者立碑

李世華是我大學的同學，我們兩人分別擔任同一年級甲、乙兩班的班長。我們兩個個頭都不高，別人說我們長得也相似，所以常有人問我們是否弟兄倆。他人極聰明，學業成績很棒，年紀輕輕卻一副抑鬱寡歡的樣子。大二的時候，我們時不時地見他端著小藥罐到衛生科煎湯藥，便問他，他只說睡不著覺。我們都很納悶：我們天天睡不醒，他何以睡不著呢？二十年後的一九八四年，我在採訪途中去他任教的懷遠一中拜訪他，問及他的睡眠情況，他說：“我這個失眠的毛病只怕是好不了了。”我仍不解：這又不是什麼大病、重病，怎麼就治不好呢？四十多年後的今天，讀了他的書稿，我才恍然大悟：在大饑荒的一九六Ｏ年，他的五位親人——祖父、父親、叔父、嬸母和一個小侄女——于二十八天內先後辭世；“文革”中，他的母親——他唯一倖存的長輩——又因他的大哥蒙冤入獄而悲憤氣絕。他心理上正承載著這接二連三的打擊所造成的巨大傷痛。

李世華寫的這本《共用的墓碑》，是他對他一家從大躍進、大饑荒到“文革”苦難生活的回憶。“右派”平反後，有不少人著書再現了他們的遭遇，“文革”後有更多的書記錄了知識份子等的悲慘命運，然而大饑荒時代被餓死的數千萬農民卻沒有一個代言人。他們屈辱地、痛苦地死去了，死後就被人遺忘了，甚至連名字也沒有留下。作爲一個農民的兒子，李世華的家庭災難極具那個荒唐時代的典型性。他的書寫的不是個人的恩怨，而是數千萬死於大饑荒的無名農民的家庭縮影。這正是本書的獨特視角和價值所在。這本書一直寫到瘋狂的“文化大革命”的年代。作爲億萬紅衛兵的一員，李世華是“文化大革命”的參與者，又是“文革”的受害者，

親身經歷了紅衛兵被推上政治舞臺又被趕下歷史舞臺的過程，並失去了兩位親人。這是本書的另一獨特視角所在。

這本書是一個小人物的回憶錄，沒有什麼政治內幕的揭露。但，如作者自序中所說，他經歷了一個大時代，一個古今中外絕無僅有的噩夢般的時代，見證了今天人們無法相信的事情的發生。他的家人、親戚、鄰居和同學裏，或迫於饑餓，或蒙受冤屈，一顆顆鮮活的生命走向了死亡。在令人畏懼的威權和狂潮般的錯誤路線面前，各級領導直至村幹部都扭曲了靈魂，變成催糧逼債的打手，製造了一幕幕的悲劇。這些不可思議的事情，恐怕連那些研究政治學、社會學的學者們也許都是意想不到的。在神州大地上，專制而野蠻的事情大面積地發生，難道不值得記錄下來以警示後人嗎？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李世華先生做了一件功德無量的事情。

在將近半個世紀後的今天，即使像我們這些經歷過那些歲月的人，也覺得那個時代是那樣難以置信地荒謬。一邊是無人敢於戳穿的彌天大謊，一邊是大量說真話的人被打成“右派”；一邊是餓殍遍野，一邊是對“三面紅旗”（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鋪天蓋地的歌頌；一邊是生靈塗炭，一邊是對製造這些悲劇、鬧劇的“偉大領袖”無限崇拜、無限狂熱……

嘴巴有兩種功能，一是吃飯，二是說話。這兩個功能緊密相連。在那荒唐歲月裏，人們得不到足夠的食物，嘴巴的第一功能無法滿足，其根本原因是第二功能，即說話功能被禁止，人民不能說真話，不能議政，不能對政府和領袖的決策有任何異議。所以再荒謬、再殘酷的事情都可以朝著一個方向狂奔不止。

我自小愛動腦筋，遇事要問爲什麼。上初中時，報紙報導說水稻畝產幾萬斤、十幾萬斤（人民日報）、二十萬斤（江西日報）。我當時推算過，即使是純稻穀平鋪在一畝田裏，也有幾寸到一尺多厚。憑我這個農家孩子的生活經驗，怎麼也無法相信這是真的。但

是看到一個個說真話的人都被打成“壞人”，弄得妻離子散、家破人亡，而且報紙上還正在批判“算帳派”（今天看來是科學分析派）、“觀潮派”，我也不敢把我算出來的結果告訴別人。令我尷尬的是，我大學畢業後不久卻幹上了新聞工作。這時我才知道，在那個年代裏，新聞真假要服從路線鬥爭的需要。所謂“宣傳”，就是說一面話，就是削弱和扼殺人民的知情權。我力圖在完成工作和維護起碼的良知之間找平衡，可那談何容易。粉碎“四人幫”後，我考上了新聞研究生，我不怕風險，以“論社會主義新聞自由”爲題作畢業論文，從此走上了艱辛的新聞自由、新聞改革的研究之路。我要研究這個問題的直接動因就是，在那和平年代裏，爲什麼會連續造成幾千萬人的非正常死亡？而這正是與媒體不斷說假大空話直接相關。

更深刻一點看，還不止於此。一個能夠帶領人民戰勝強大敵人的政黨，卻不能戰勝自己無法無天的領袖。這正是制度設計上存在的嚴重弊端造成的。特別是高度集權的新聞制度把一切媒介都壟斷在國家及其領袖手裏，結果是領袖走火入魔，全國跟著走火入魔。面對著畝產二十萬斤的奇聞，竟沒有任何媒介發出哪怕是一聲童真的呼喊：那個皇帝是沒穿衣服的，畝產萬斤完全是欺人之談！一個本來早就可以阻止的皇帝新衣的大遊行，一直鬧到幾千萬餓殍橫屍神州。正如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阿瑪蒂亞·森所說的，“在任何一個獨立、民主、擁有相對的新聞自由的國家裏，從來沒有發生過重大的饑荒。因爲在沒有新聞自由的國家，媒體常常把饑荒說成是自然災害，從而掩蓋了真相使災害得以發生。”在中國，當時的媒體一直在報導大好形勢，後來又說是“三年自然災害”。

行文到此，我不禁想問一問：那些主張對反右、大饑荒、“文革”不要寫文章、不要出書，實行民族集體遺忘的人，你們良心何在？對全民族付出無比巨大代價的往事，不去回顧，不去反省，你

們的理性何在？不抓住國家經濟高速增長、政治社會穩定的好時機，向人民交代和處理歷史上的錯誤，以顯示一個偉大的政黨清算和告別錯誤的負責任的態度，與此同時，人民從無可阻擋的網路傳播中讀到海內外大量的相關著作和文章後，在懷疑黨和政府實事求是的勇氣，你們的智慧何在？一個開明、進步的政黨曾把“批評和自我批評”視爲走向成功的“法寶”，現在，卻有人公然違背優良傳統，總是對出這方面的書下禁令，你們居心何在？

在這裏有必要提到，李世華先生寫書期間，曾訪問過幾個當年的村幹部。在問及他們當年爲什麼會那樣做時，他們並沒有深刻的懺悔，更沒有能夠正確總結慘痛的教訓。這種狀況恰恰說明，我們整個民族從上到下，都應該正視歷史，深刻反思懺悔，否則我們付出的巨大代價就有可能是白白付出，悲劇也可能會再度上演。

爲了有利於我們民族不忘記過去經歷的苦難和教訓，著名作家巴金先生曾主張建立一座文革博物館。爲了同樣的目的，我主張建立一座大饑荒博物館，目的是爲那些死於人禍者立碑。所有出於公心的政黨、組織和一切有良知的人士都會認爲這是合理合法的主張。

李世華的這本書稿，在他的腦子裏醞釀了四十年，寫了一年。寫作期間，他走訪了鄉親、老師、同學和其他知情者，閱讀了大量有關資料，使他的回憶錄有了立體感、宏觀感。我看這本書，不時難過得流下熱淚，以致不忍卒讀。寫這篇序言也勾起我對往事的回憶，令我傷神不已。王國維曾引用過尼采的名言：一切文學餘愛以血書者。這本書字字血、聲聲淚，正是李世華心力交瘁寫成的，沒有一點修飾或藝術加工。

我在這裏寄語世華兄，你已經爲死去的親人砌了一座石碑，寫出這本書又爲他們築了一座無形的墓碑，也爲數千萬死於大饑荒的無名農民和幾百萬文革的受難者樹立了一座共用大墓碑。希望你從此得到解脫，不再失眠。

我更期待著大饑荒博物館早日出現，那將是悼念幾千萬餓殍的宏偉的紀念碑，將使千千萬萬的死者得到安息，生者得到慰藉。

孫旭培
2007 年 11 月於北京天通苑

（孫旭培，中國社會科學院原副所長，華中科技大學特聘教授）



從背後看三座祖墳位置，從左向右依次爲：祖父的墳、父母親的墳、叔父母的墳。攝影時間：2003 年 10 月 20 日

墓碑碑文。攝影時間：2006 年 10 月

引 子

二OO三年十月二十五日，農曆十月一日，落木蕭蕭，衰草遍地。

立碑儀式在村口舊日的荒灘高坡上進行。我們全家老小遵照司儀的安排，按輩份依序在爺爺、父母親、叔父母的三座墓前跪定。碑幕被輕輕揭下，司儀開始宣讀我撰寫的碑文：

> “公元一九五八年始，九州大地變怪雜出，人禍天災，民不聊生。至五九年底家家已無粒粟，仍被嚴逼官糧。其時，家中上有八旬祖父奄奄一息，下有周歲侄女嗷嗷待哺。父不忍，于一九六零年三月七日淩晨懸樑自盡，時年僅六十一。叔父此前已被推打吐血，聞耗於翌日悲憤而死。祖父親睹骨肉雙雙死於非命，不堪其痛，嗚咽失聲，此後每日拄杖至此，繞墳探子，泣曰：“過去都是兒埋爹，不想今日爹埋兒……”六日後自縊身亡。越十日，嬸母病餓而逝，再十一日小侄女夭亡。
>
> 嗚呼，二十八日內全家竟有五口相繼辭世！
>
> 時值凶年，無奈就近草葬此荒坡。為存原貌，三座墳塋仍錯位於此。
>
> 文化大革命中長兄世隆蒙冤，於一九七一年八月二十日入獄，母大慟，五日後氣絕。
>
> 嗟夫！人生之悲，孰過此焉？數十年來，每念及幾位先輩死於不當死，痛徹心脾。家悲國哀，凝成此碑，以祭先祖並昭示後人……”

“大大……，娘……”不等司儀念完，嫂子撲倒在碑前，拖著長音首先哭了起來。

像是一聲命令，全家老小一起倒地失聲慟哭，被壓抑了幾十年的痛失親人的痛苦瞬間迸發出來，高坡荒灘上升騰起一片感天動地的哭聲。

“我的爺爺呀……我的奶奶……”

“我可憐的老爺爺……”

“我屈死的大大……”

“沒人疼的二爺爺……沒人疼的二奶奶……”

…………

燒紙在墳前枯草上噴吐著熊熊的火苗。分不出每個人的哭聲，圍觀的鄉親無不爲之落淚。

墓邊的楊樹紛紛揚揚落下一陣陣黃葉，紙灰像一群群黑色的蝴蝶在墓間盤旋。

我長跪不起。幾位撫養我長大的親人的面容一個個清晰地出現在我的面前，幾十年來定格在我腦子裏的刻骨銘心的記憶一幕幕地閃現……

第一章　我的童年

（記事時——1957 年夏）

1．我的家史

我祖籍在山東鄆城縣一個叫於廟的村子。聽姑媽說過，祖父弟兄多個，爺爺排行老二。由於弟兄之間不和，爺爺奶奶便帶著父親、叔父及兩個姑媽來到了現在位於安徽省碭山縣最東南角的的唐寨小套子築房定居下來。祖父兩兒兩女，父親是老大，大姑媽是老二，二姑媽是老三，叔叔是老小。鄉裡人都說，像爺爺這樣，兩個兒子兩個女兒的是好命的，將來有福享。之後奶奶病故在這裏，大姑媽嫁至江蘇豐縣，二姑媽嫁至相鄰的安徽蕭縣，父親娶了母親陳氏生了大哥、二哥和我，叔父娶了嬸母劉氏，嬸嬸終生未育。以後的我們家的悲歡離合生離死別的故事也都發生在這裏。

我家所在的唐寨的寨主是全縣有名的大地主唐樹堂，其祖父爲清朝後期顯武將軍，其父爲威武將軍。唐樹堂排行老八，人稱唐老八。我和妻子讀高小和我大哥任教的唐寨小學就是當年唐老八的兩處宅院的其中一處。從那四進的院子、渾磚到頂的房子和帶獸頭的飛簷便可想見這位寨主當年的威風。

唐寨包括有十幾個村莊，我家所在的村子叫小套子。這個村子坐落在唐寨最東邊，東西短而南北長，像個狹長的套子，不知是否因此而得名。因爲小套子太大，解放時把它分成三個村：套北村、套中村和套南村。據老年人說，光緒年間黃河就從碭山縣流過，唐

寨東南十八裏的蕭縣大鎮黃口就是“黃河之口”的意思。過去黃水時常氾濫，像屋頂高的黃水咆哮而來，不知毀了多少莊稼，不知淹死了多少人畜。後來，身爲顯武將軍的唐老八的祖父動員全寨修堤防洪，全寨人一起出動。顯武將軍策馬馳騁，馬跑到哪裏，堤壩便築到哪裏。這道長十八裏的堤壩，把唐寨圍住，並在寨的東、西、南、北方向各築了城牆垜口，安了寨門，設有吊橋。我家在套南村，因爲靠近南門，又被人習慣稱作大南門。唐老八有槍支彈藥，夜裏有更夫打更，保護全寨人的平安。爲了安全，很多人家逃荒要飯來到這裏落戶。大南門多是像我家這樣的外姓住戶。

但這些大門和堤壩並沒有擋住日本人的鐵蹄。一九三八年舊曆四月十八，唐老八一家在跑反路上遭遇日本兵，於蕭縣新莊鎮的岳李莊被日本人殺害了包括唐老八本人在內的四十八口，這就是李宗仁回憶錄中提到的“徐西慘案”。

一九四一年農曆十一月的一天拂曉，“嗖嗖”的照明彈把唐寨照得通亮，緊接著迫擊炮聲和機關槍聲響成一片，把老百姓從睡夢中驚醒。當睡眼惺忪的人們意識到所發生的事而挈婦將雛外逃時，整個唐寨早已被包括裝甲兵、騎兵的日軍團團圍住。端著槍的日本兵把大南門村的男女老少圈到打麥場上，挑出青壯年，用悶罐車押送到徐州，後又被轉運到東北的錦州阜新縣太平煤礦。我的父親、叔父、李愛芝和他的外甥王欽若（我後來的岳父）、歐教連父子三人、歐儒才、李守棒、李愛堂、李守文等都在其中。他們在煤礦裏過了幾個月非人的生活，受盡了人間的累、吃盡了人間的苦。不久，同時被抓去的大南門的鄉親唐騷和王文慶就死在了煤窯裏，還有的生病的礦友不等咽氣就被日本人擡出去推下山坡喂了野鷹。店裏二叔下礦不久頭被砸傷，生怕也被丟到野山裏去，便帶著他的外甥趁日本人放假的大年三十逃了出去。這時父親和叔父商量，要設法跑出去，不然早晚也要死在那裏。父親和叔父在一個暗夜裏幸運地從

日本人的鐵絲網中爬了出來，然後兄弟二人相互攙扶，對著家鄉的方向，晝伏夜行，翻山越嶺，不敢走大路，專鑽莊稼地，一路上吃尙未成熟的莊稼，喝河溝裏的水，磨穿了鞋，又磨破了腳上的血泡，用了四十多天的時間，輾轉兩千五百多裏，最後居然幸運地活著回到了家。

爺爺見店裏二叔和他的外甥先回來了，又聽說有的死在了礦裏，差點把眼睛急瞎了，生怕見不到自己的兒子了。後來看到父親和叔父回來，父子相擁大哭了一場。但畢竟是回來了，沒有死在日本人的煤礦裏。

我記事的時候，寨門已被拆下來做唱戲搭臺子的木板，大堤也被雨水沖成高坡荒灘，老百姓稱之爲“高頭”。大南門口矗立著三座碑，小的一座是爲殉節的烈女李唐氏建的節烈碑，最大的一座是方圓百里之內有名的鄉紳祁老化的碑，下面有高高的底座，碑上方刻有雙龍戲珠圖案。

2．兒時雜憶

我出生在一九四三年，屬羊。但究竟生日是哪天，母親給我講過，但我沒有往心裏記，因爲鄉下人不興過生日，只記得我生在一個夏日的暴風雨之夜。我結婚生子不久，母親就去世了，妻子很爲我沒有記住生日遺憾，因爲妻子和兒子都有自己的生日過，唯獨我沒有生日。我並不感到遺憾，父輩們終生辛勤勞作，飽飯難得吃上幾頓，老少多少輩子從來沒過過生日。後來填寫檔案材料時，我給自己編了一個大約的日期：七月十五日。

我出生的時候父親已經四十四歲，母親也已經四十二歲，母親怕養不活我，對二姑說：“我年齡大了，又沒本事，家裏還沒啥吃，怕不能把三孩拉扯大，送給你養吧。”聽了母親的話，二姑說：“嫂

子，好好拉扯著吧，你老的時候准能得三孩的濟。有難處俺們幫著點。”二姑比父親小十多歲，二姑夫在黃口車站做事，家裏地多，還養著馬。虧得二姑的幫助，大哥才上了學，後來才參加了工作，吃上了“皇糧”。

在我的記憶裏，父母從來未打過我。這並非因爲我是老小而偏愛我，我也未見他們打過兩個哥哥，即使在以後二哥很惹他們生氣的時候，他們也從未動過他一指頭。我所能記得的他們對我的懲罰只有一次：我那時應該有五歲左右，爲了莫名其妙的原因，我一個勁地哭鬧，父母親給吃的也不吃，給玩的也不玩，只是一味地折騰，誰也哄不好。最後沒有辦法了，父親把我抱到水塘邊上，嚇唬說再哭把我扔到水裏去。這一招還真靈，我立時止住了哭。

因爲嫂子打孩子，母親不知跟她吵過多少次架。在我的記憶裏，只要是母親跟嫂子吵架，都是因爲嫂子打了我的侄兒侄女。

母親是別人說的那種“沒有本事”的人，我記事的時候她已經是五十左右的人了，而那時的五十多歲已經算是老人了。母親給我做的衣服常常不合身，她的手沒勁，鞋底納得不結實，穿不多久鞋子就歪了。母親的兩個最好的朋友，店裏大嬸和我稱之爲三嬸的王作軍的母親常常沒有惡意地笑話母親說：“你看你給三兒做的鞋，歪得像個菜角子。”母親聽了也只笑：“我的手用不上勁咋辦？”

平日，父親從早到晚忙著地裏的事，沒有時間跟我交流，我的事也都是母親管。也許是因爲我是母親最小的兒子的緣故，母親格外疼我。冬天，我貪戀溫暖的被窩，早晨不肯起床。母親做好了早飯，用浸透了水的紙裹上一個雞蛋埋在火灰裏，不大會兒雞蛋便熟了。母親就把這個燒熟的雞蛋送到我的被窩裏。那燒得微微發黃的雞蛋有著特殊的香味，後來吃過的雞蛋再沒有那種味道。過年蒸的白麵饅頭除了年初一中午吃的和招待客人的，餘下的全給我留著。

母親常常把一個冷饅頭放在燒飯的熱灰裏烤熱，然後塞進我的被窩。我也不洗手，就在被窩裏啃那個帶著黃疙瘩的熱饅頭，把撒在被窩裏饅頭渣也一粒一粒撿到嘴裏。有時候，家裏既沒有雞蛋，也沒有白饅頭，母親就把一塊在柴灰裏剛燒熟的紅芋填到我的被窩裏。

母親一生很節儉。她穿的上衣，無論是夏天的褂子還是冬天穿的棉襖，袖子都又肥又長。長過手腕的部分被挽起來，就成了兩個口袋。幹活的時候，走路的時候，無論母親碰到一棵野菜，一朵棉花，一捋頭髮，一塊舊布，一片碎紙，總之只要她認爲有用的東西，她都會彎腰拾起來，塞進衣袖裏。回到家以後，她的兩個衣袖口袋就裝滿了各種雜物。她把這些東西分門別類收起來：野菜丟在舊饃盤裏，棉花放在紡車前邊的筐裏，頭髮和碎紙塞進牆縫裏，舊布放在針線筐裏。日後，這些東西都被母親派上用場：去掉棉花上面的草屑，可以用來紡棉，舊布可以補衣服，頭髮和碎紙可以到貨郎那裏換針線和哄孩子的糖公雞……

沖著屋門擺著一架紡車，這是母親終生爲伴的勞動工具。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除去大年初一和下地幹活的日子，母親一天到晚坐在麥草編的墩子上搖動著她的那架小紡車。母親夜裏紡棉從不點燈，所以常常紡得粗細不勻，遇到斷頭，就結成一個大疙瘩。我那時小，貪睡，一覺醒來，耳邊還響著“嗡嗡”的紡車聲。一家人的穿衣就是靠著母親一圈一圈搖出來的。

除了紡棉織布外，母親還養蠶。春夏交接的時候，我經常幹的活就是幫助母親採桑葉。樹下層的葉子採完了，就要爬到樹上去採上一層的。

應該是在一九四八年的初秋，嫂子帶著我在地裏收花生。我們突然看見一列扛著槍穿著軍裝的隊伍朝我們村子開過來。我們趕緊收拾起抓鉤糞箕回家。到家時，院子裏已住滿了兵。他們待我們並

不壞，叫大人們“老鄉”，喊我“小兄弟”，幾個當兵的還輪流抱我舉過頭頂。當他們抱著把我放進汽車時，我給嚇哭了。他們並不住進我們屋裏，只借用我們的鍋做飯。他們煮熟幾大鍋大米飯，盛進麵缸裏，又燒了一鍋黃豆芽，然後一大群士兵就蹲在院子裏的大口大口地吃起來。吃完了飯，他們就到各家借木棍、門板去西菜園蓋碉堡、挖戰壕。那些伙夫把剩下的半缸大米飯給我們吃。好香啊！那是我有生第一次吃大米。

天黑的時候，除了幾個伙夫外，都埋伏到戰壕裏。趁著夜色，我能看見整個西菜園裏都趴滿了當兵的。那夜我睡得很香，發生的什麼事我都不知道。第二天早上一起來，菜園裏的兵全部開走，一個也不見了。全村老少都忙著到菜園裏找各家門板之類的東西。大人們說，隊伍都去打仗了，還要我們幫他們做飯。

第二天中午，母親和嬸母等正在做飯，突然聽見飛機“嗡嗡”的聲音，我們還沒反應過來，就聽見“嗒嗒嗒”的槍聲，接著一顆子彈從屋草裏鑽出來落在嬸母面前。等飛機的聲音遠了，我們一起躲到藏紅芋的地窖裏。我們眼看著又一架飛機過來，對著西菜園俯衝下來掃射了一陣飛走了。

此後好幾天，我沒有看見父親和叔父。聽母親說，他們都推著紅車子（獨輪車）去給隊伍送飯和糧食去了。我當時不知道這是什麼隊伍。後來長大了，大人們說，住在我們家的是共產黨的解放軍，飛機是國民黨的，在追打解放軍。夜裏遠遠地能聽得見南邊傳來的槍炮聲。母親說，那一夜她都沒合眼，擔心著父親和叔父。

但，不幾天，他們都平安回來了。

那就是淮海戰役，響槍炮的地方是蕭縣的李石林，是淮海戰役的一個大戰場，國民黨將領杜聿銘就是在這裏被活捉的。

3．父親、叔叔和爺爺

我記事時，我們家和叔叔家住著兩個並列向南的院子。但這之前還有一個小插曲：成立初級社劃分生產隊的時候，父親和叔叔被分在兩個隊，我家分在村西南角的第四隊，叔叔則分在村北頭的第二隊。當時叔叔的房子已舊，爲了生產上的方便，叔父便在村北頭第二隊的範圍內置地蓋房。我清楚地記得叔叔剛垛起的寬敞的院子和高高的土牆。但就在房子快要加蓋封頂的時候，叔父毅然打倒了他辛辛苦苦快要築起的新屋，理由是這樣離他的哥哥（我的父親）遠了，弟兄兩個商量事情不方便。然後重新買地造房，形成了上述的格局。

叔父有點口吃，講話困難，平時不多說話，以老實聞名全村。叔叔對父親很尊重，有時甚至有點依賴。每天吃過晚飯後叔叔便到我們家來，自己找個小板凳往父親對面一坐，弟兄兩個便開始商量事情，沒有任何客套，連茶也沒有，只有父親“叭嗒叭嗒”抽著煙袋。他們談話的時候，父親講的多，叔父很少說話，只是時不時地“哼”一聲。商量完了，仍然沒有任何客套，叔叔起身就走，父親也不送。有時候，我一覺醒來，他們還坐在那兒說著，有時商量的時間很短，只有十來分鐘。但他們的例行見面是從不曾間斷的。

有一段時間，不知爲了什麼事，父親不在家，每天一大早，叔叔便從水井裏挑兩擔水來，把我家的水缸裝滿。他挑水進門倒了水轉身就走，既沒有人招呼他，也沒有人送他，他也不和任何人說話。偶爾碰到我在旁邊，便說一句：“三兒回來了。”或是：“放假了？”我也便極簡單地應一聲：“嗯。”他出門後母親總會說一句：“再找不到比您叔更好的人了。”

當時奶奶已經去世，爺爺單住在兩個院子中間面西的一間小屋，由我們兩家輪流送飯。爺爺的小屋收拾得很乾淨，一張八仙桌子和一張單人床是屋裏僅有的傢俱。八仙桌子上居中放著一個小櫃

子，裏邊裝的是祖父洗乾淨的衣服和愛看的書。小櫃旁邊擺著一個二十四位的長算盤，插著幾隻毛筆的一個筆筒，還有幾本線裝的顏色發黃的戲書，如《包公案》之類。祖父算是一個文化人，尤其精於珠算，不僅一般的加減乘除，就是開平方、立方等複雜的問題祖父都能用珠算解決。後來擔任生產隊會計的店裏二叔的珠算就是跟我爺爺學的，我的岳父及大哥也都先後跟爺爺學過珠算。小時候，爺爺也教過我。他一邊念口訣“七七一五八九五，隔位六二五”，一邊快速地撥拉著珠子，很快算盤上出現一對燕子，爺爺說：“這叫燕子雙飛”。後來，他又打出“雙龍戲珠”、“二郎擔山攆太陽”等圖形，可惜我沒有學會。十裏八鄉買賣土地和兄弟分家都請祖父去算地畝。父親曾驕傲地告訴我，無論梯形、扇形、刀把形及其他各種形狀的土地，祖父都能給算得清清楚楚，幾畝幾分，一厘不差。地裏的事祖父一概不問。

祖父有兩件愛好：讀戲書，看黃曆。小的時候我常見爺爺靠在躺椅上，手裏捧著發黃的線裝書，看得很投入。倘我在旁邊，爺爺便津津有味地給我講精彩的戲文和唱段，還加上自己的評論。可惜因爲我當時太小，對爺爺講的東西全然不懂，所以今天一句也記不起來。

爺爺對戲劇的愛好非同一般。唐寨街上有一個戲園子，祖父是那裏的常客。每有一個新戲班子來，祖父都要去看。到他七十多歲的高齡，只要聽說哪裏有唱戲的，他是一定要去聽的，有時要跑十幾裏而且到深夜才回。有一年冬天，離我家好幾裏的荒莊唱大戲，一連數日，祖父每天晚上吃了晚飯早早地去，要到半夜才得回來。第二天父親便告訴我：“你爺爺昨晚又到荒莊去聽戲了！”言詞裏是對祖父的一種褒獎：戲癮大，身體好。祖父回來還對我說起過某一個黑頭唱得好，十幾裏外都能聽見，等等。

祖父每天必看的書是黃曆，每年臘月爺爺便早早地買一本曆書，天天見他靠在躺椅上仔仔細細地端詳。哪一年是什麼年，哪一天是什麼日，天干如何配地支，六十年一個大循環，等等，都是爺爺教我的。爺爺告訴我說，六十年一個甲子年，每逢甲子年是要出大事的。爺爺還說，天上一顆星，地上一個人；天上的亮星是大人物，小星星是老百姓。他年輕時候的一年秋天，從地裏收花生回來時天色已晚，正忙著卸車，只聽見一陣隆隆的鼓聲由遠及近，隨即像火把似的一道火光自東北向西南從天上劃過，火光越來越亮，鼓聲也越來越響，火把滑到頭上的時候，鼓聲震耳欲聾。漸漸地火光消失在西南天邊上，鼓聲也隨之息了。後來，他聽說那年李鴻章死了。

4・左鄰右舍

剛落戶到唐寨小套子大南門的時候，我們家就和李愛升、李愛芝叔家成了至交。實際上，我們兩家姓的並不是一個李，愛升叔家是從蕭縣的朱樓搬來的。因爲我爺爺和愛升叔的父親年齡相仿，我父親、叔父又和愛升叔、愛芝叔年齡差不多，一筆寫不出兩個“李”字來，幾代人相處得好，所以兩家人就像一家人。爺爺利用愛升叔家的西屋開了個小店，賣煙酒百貨。後來那兩間西屋成了個私塾班，從朱樓請了個私塾先生，我爺爺教他們珠算。當時，愛芝叔、後來成了我的岳父的王欽若和我的大哥都先後是這班裏的學生。解放前夕，私塾班變成了洋學堂，教的是“天亮了，弟弟妹妹快起來，快來看太陽”的新課文。再後來，我差不多記事的時候，愛升叔家開了個過客店（鄉村旅社）。人們提到愛升叔家都說“店裏”。

大南門是唐寨的一個重要門戶，是從蕭縣、黃口進唐寨的必經之地，過往的生意人很多。那時的經商工具都是馬車，到了晚上，

人要住店，騾馬要喂草，他們就住到愛升叔家的店裏。愛升叔把騾馬給他們喂上，大嬸、二嬸便給客人準備酒飯和下榻的床鋪。那時候，我常聽父親說："店裏來人了，我得過去。"這時我們就知道店裏客人多，父親要去幫忙。

我們兩家的地都是父親和愛升叔兩人種著，愛芝叔不大管地裏的事，一天到晚帶著眼鏡捧著書本看，人稱"二先生"。愛升叔和大嬸共生了九個孩子，但沒有一個長大成人。愛芝叔和二嬸生了一男兩女，成了他們兩家的根。愛升叔和大嬸視他們爲己出，疼愛有加。他們弟兄妯娌和睦相處，男耕女織，是大南門的一戶有名的人家。我記事的時候，他們的獨生子守成在徐州一中讀書；等我考上中學時，守成哥已經上了天津大學。他們的大女兒已經出嫁，小女兒李素貞比我小兩歲，是我兒時低一個年級的同學。

守成哥讀書的時候，有一次開學了家裏沒錢。大哥那時已經參加工作，有了工資，給了守成哥盤纏和學費。我上大學時，很需要一本英文釋義的 *ADVANCED LEARNER'S DICTIONARY*（《高級英語詞典》），守成哥知道了，很快從他微薄的工資裏買了一本帶給我。

愛芝叔喜歡給孩子們講他從古書上看來的故事，時間長了，聽的人越來越少，但我始終是他最忠實的聽眾。只要不幹活，我就到愛芝叔那裏聽故事。薑子牙的故事，晉公子重耳和介子推的故事，伯牙叔齊的故事，等等，等等，我都是最先從愛芝叔那裏聽來的。我高一那年暑假，可能愛芝叔看出我是顆苗子，把他看了一輩子、守成哥用了七、八年的三本發黃的《古文觀止》給了我。那時，我已經不需要他講了。晚上、下雨天、幹活休息的時候，總之只要有空，我就捧出來讀。後來，我竟然把大部分名篇都背下來了。應該說，愛芝叔是我最早的古文發蒙老師。

我家東邊有一個坑（小水塘），夏天常有滿滿的一坑水，爲我們小孩子洗澡和家裏洗衣服、餵牲口用水提供了方便。坑東邊是王作軍家。王作軍的小名叫“存糧”，寄託著種莊稼的長輩們最樸素的願望。王作軍的父親是老三，我們都喊他“三叔”，叫王作軍的母親“三嬸子”。王作軍長我一歲，從小我們一塊下地割草拾柴禾。他初小畢業後沒有考上高小，就在家務了農。

王作軍是鐵匠出身，白天幹一天活，晚上就支起爐來打鐵。小到鐮子菜刀，大到犁耙，農村裏的一應農具和家庭用具他都會打，就是沒說上媳婦。現在六十多歲了，一個人鰥居，享受著“五保戶”待遇，一年五百元的補貼。現在打不動鐵了，把自己的屋門改成面對大路，修理自行車，掙幾個零花錢。

我母親和店裏大嬸、三嬸（王作軍的母親）是最好的朋友。她們常端著針線筐湊到一起做活，一邊做針線，一邊拉家常。

我家前邊有一座瓦屋大院，住著歐四奶奶和她的四個兒子。渾磚到頂的牆和瓦鋪的屋頂，是我們四隊裏最好的房子。土改的時候，四個兒子分家不久，每家的土地並不多，被劃成“上中農”，是我們隊裏最高的成份。一九六〇年“擠”糧食的時候，年事已高的歐四奶奶首當其衝挨鬥，不久死去了。

5．解放前後

解放前我們家沒有屬於自己的土地。好在我們小套子北村有好幾家地主，父親和叔父便一年到頭給地主唐朝榮家當長工。快解放的時候，父親是唐家的大領。父親說，唐家對他們長工並不薄，逢農忙季節，尤其是割麥的時候，地主給他們長工淨吃好麵（麥麵），天天早上給長工送到地裏的都是好麵單餅（烙饃）卷鹹魚、鹹鴨蛋。過年的時候，唐家另外給過年的糧食和菜。

父親對唐家的感念一直影響著他。解放初期鬥地主的時候，工作隊發動貧下中農揭發地主殘酷剝削的罪行，父親怎麼也恨不起來，甚至不忍心到會場看鬥地主的場面。

地主被打倒之後，地主家的土地、房屋先被“共”了，然後，工作隊又發動群眾“鬥財寶”，即“挖浮財”。店裏二叔去了，面對著滿院子的好東西，別人盡著値錢的拿，二叔瞅了半天，只撿了幾本別人都不要的發黃的書回來，這就是前面提到的那一套《古文觀止》。許是因爲他是個識字的人，懂得“書中自有黃金屋”的道理。

“鬥財寶”的時候，父親和叔父都沒有進地主的家門。“這都是人家（地主家）老輩裏會過省吃儉用攢的……”父親說。

我依稀記得土地改革時的情景。我親眼看見有的地主被“拉滑子”：在樹上拴一個滑輪，把被鬥的地主捆起來吊在滑輪上往樹上拉，拉到半空中猛一松繩子，地主被重重地摔到地上。如是連續幾次，被鬥的地主已被摔得半死。不久，地主的土地和房屋都被分了，唐朝敬叔家和後來當了大隊治安委員的吳中新就住進了地主的磚瓦房，我家和許多沒地少地的農民都分了土地。記得當父親領到了分給他的土地時，父親還內疚地重複那句話：“這……這都是人家老輩裏會過省吃儉用攢的……”

大南門的人家多是從外地遷來的窮人，土改時只有祁老化家被劃成了地主、歐四奶奶家被劃成上中農，其餘的都是貧農、下中農，我家被劃成貧農，店裏大叔家被劃成下中農。吳中新小名吳二孩，他的親生父親死了，母親帶著他改嫁到大南門，屬於“上無片瓦、下無立錐之地”的無產階級，娘兒倆個靠他辦婚喪事時給人吹喇叭艱難度日。土改的時候，吳中新分了地主祁老化的瓦房，成了土改積極分子，領著年輕人唱“索拉索拉都拉鬥，索都拉索米來米”，扭秧歌慶祝解放，以後又入了黨當上了村幹部，也娶了媳婦。許是

吹喇叭的口藝啓發了他當官的靈性並給了他權術，雖然他識不了幾個字，但卻能跟上翻雲覆雨的政治形勢，居然像不倒翁似的當了幾十年村官，一直到他咽氣的上世紀七十年代。但他的口碑並不好，人們說：“吳中新不叫吳中新，叫‘無好心’”。鄉下人相信因果報應，四十年後的二〇〇七年談到吳中新和被他提拔起來的崔玉德和魏玉幫時，他們說：“作惡不得好。這三個人都是五十來歲就死了，被他們整過的人倒都還活著。”

土改的時候二姑父家被劃成富農，姑父、姑母都成了“戴帽的”富農分子，生活一落千丈不說，政治上要受管制。大哥一直感念著二姑的恩情，在姑父、姑母雙雙爲無產階級專政對象的時候，千方百計地幫助他們。大哥去世後，我又接過了這個接力棒，繼續幫助兩位老人。我心裏明白：沒有二姑、二姑父，便沒有大哥的前途；而沒有大哥的幫助，我不能脫離小套子。所以，可以說，沒有二姑、二姑父，便沒有我的今天。

魏化洲騎著高頭大馬來唐寨赴任，當了土改和鎮反時的唐寨區第一任區長。魏化洲是個老革命，他的前任妻子被國民黨活埋了，續娶的妻子徐鋒老師是我大哥在唐寨小學教書時的同事。我一九六八年至一九八七年在懷遠縣教書，魏化洲任懷遠縣交通局局長，徐鋒老師是懷遠一中職工，我們又成了同事。我們關係很好，過從甚密。在回憶那段輝煌的歷史時，魏局長不無自豪地說：“那時，惡霸地主被集中到區公所裏。只要群眾反映哪個地主欺壓百姓，區裏就可以決定槍斃，拉到西門外就打（槍斃）了，連縣裏都不用報。”

一九五〇年，在正式上小學之前，我跟著大哥在區中心小學唐寨小學試讀了一段時間。一天，課間休息時，學生們一齊往大門口湧，我不知道怎麼回事，也跟著往大門口跑，但大門已被高個子學生堵得嚴嚴實實，我從他們的腿縫裏看出去，正見到幾個帶槍的押

著一群五花大綁著的人往外走。後來別人告訴我，他們是被拉到西門外槍斃的地主。

那年的五一節，全區的人大遊行，農民們扛著木鍁、抓鉤、大掃帚等農具，高呼著“堅決鎮壓反革命”的口號。據說，那天在唐寨西門外槍斃了十七個惡霸地主，裏面有我們小套子北村兩個姓唐的地主，舅舅所在的李寨村被槍斃了六個。他們村拉了一個牛車去收屍，屍體裝了一大車，車幫都被血染紅了。

父親對解放、對毛主席共產黨還是十分感謝的，因爲畢竟他從此有了自己的土地。一天，父親領到了土改工作隊發的印有“山東省省主席康生”（土改時徐州及其周圍的幾個縣包括現在安徽的蕭縣、碭山歸屬於山東）大名的土地證和毛主席像，回到家裏拿給全家人看。父親把毛主席像捧在手裏端詳著，臉上洋溢著笑容，這笑容流露出的是自然而由衷的感激。六十年後的今天，父親的笑容仍歷歷在目。之後，雖然經過了互助組、初級社、高級社、人民公社的變遷，我們早已沒有了自己的土地，但父親一直把這份土地證珍藏到他離開這個世界的那一天，甚至在他臨終的遺言裏也沒有忘記對二哥交待土地證存放的地點。這大概反映了中國農民對擁有自己土地的執著的追求與嚮往。

隨後的幾年是父親最開心的日子。父親是位勤勞精明的農民，過日子很有心勁，地裏的事一應農活，無所不會，無所不精。他當時年富力強，憑著自己的勤快和優秀的耕作技術，我們家的日子過得井井有條，很快成了村裏日子過得較好的人家。農忙時吃什麼，農閒時吃什麼，父親會把一年的生活安排得很好，雖然遠遠談不上殷實，但一年四季都有飯吃。村裏的人都很尊敬父親，“傳先大爺”是大家對父親的官稱。逢到青黃不接的時候，一些親戚鄰居還到我們家借糧。

從臘月中旬，忙了一整年的莊稼人就要操辦著過年了：買菜、蒸饃、過油、炸丸子、包餃子，等等，一直要忙到大年三十。父親對家裏的事也樣樣精通，這些事一概都是父親包了的。小孩子景年。年初一一大早，外邊剛一放亮，我便穿上母親給我準備好的過年的衣服，起來給父母親拜年。有時候，母親還沒起來，我便到娘床前邊下跪便說：“娘，我給你磕頭了。”娘照例說：“不磕了。”再跑到父親跟前也是邊下跪邊說：“大大（爸爸），我給你磕頭了。”父親便說：“起來給您爺爺拜年去吧。”然後我就到爺爺的小屋裏，一般情況下，爺爺早已穿戴整齊洗漱完畢等著我們了。待我恭恭敬敬磕完頭，爺爺總是笑眯眯地看著我說：“三兒又長大了！”然後給我幾張一百元的新票子。我再到叔叔嬸嬸那裏，給他們各磕一個頭，他們也會給我幾張新票子。那時，幣制還沒改革，一百元就是後來的一分錢。不久，幣制改革了，一千元變成了一角錢，一萬元變成了一元。我把這些壓歲錢一百錢兩百錢地攢著，後來都換成了一分錢、兩分錢、五分錢的新票。

莊稼人穿的衣服都是家織粗布做成的。社會前進了上千年，生產技術並沒有大改進，男耕女織的生產模式也沒有變。“唧唧復唧唧，木蘭當戶織”，我們初中學《木蘭詞》的時候，課本上畫的插圖與當年農村織布的情況一模一樣。不知要熬多少個夜晚，不知要來來回回幾千次、幾萬次穿梭，才能把全家一年要用的布織出來。這些活大部分由母親和嫂子去完成，有時還要請人幫忙，或者幾家合作。

鄉下人對穿不講究，只要一年四季有的穿就行。但一般人家都是冬天過後，把棉衣去了棉絮變成夾衣，到了夏天，再去一層就成

了夏衣。有的境況更差的，冬天連棉襖也穿不上，或者只穿個撒筒襖子，連個襯裏的小褂也沒有。

合作化之後，家裏沒有了種棉花的地，穿衣全靠每年十來尺布票。但上邊只發布票並不發錢，社員們哪裏弄錢去？所以即使有了布票還是沒有衣服穿。母親把她一朵一朵撿來藏在袖頭上的棉花撕開，去掉棉籽，扯成棉絨，堅持夜裏摸黑紡棉。

我問過母親：“你這一點棉花還能織成布嗎？”

母親說：“莊稼人不織布指望啥？還能光指望那幾尺布票？”在她心裏，她還擔待著全家穿戴的重責。

家裏的布票母親都省給了大哥和我用。她自己呢？用鄉下人的話說就是：新三年，舊三年，縫縫補補又三年。

到了大躍進的年代，織布機也給收走了，即使有了棉花也織不成布，但母親還是不停地紡——紡棉織布是她不懈的追求，是她對生活的嚮往，是她昔日生活的慣性延伸。

一九五四年開始統購統銷。統購統銷的場面是很熱鬧的，各村賣糧食的大車（牛拉四輪木車）排成隊，牛頭上掛著紅布，敲鑼打鼓往糧站送糧食。凡是賣糧多的村都受到區裏的表彰，於是村與村之間形成了攀比。賣糧多的村自然受到鄉裏的表彰，如此上推，自然鄉與鄉、縣與縣也攀比上了。這一攀比，用農民的俗話說，上面的好經被下面的歪嘴和尚念歪了：政策上講統購的是餘糧，結果農民的口糧、種子糧甚至飼料糧也被強迫購了去。爲了防止農民瞞報、藏匿糧食，幹部們就到各家去翻。

一天中午，放學的時候，見院子裏站了好多人，領頭的吳中新手裏提著一把不知哪裏弄來的刺刀。平時，他對父親很尊重，張口閉口“傳先大爺”，村裏的事他經常到我家來請教他的“傳先大爺”。

但這次吳中新不認識他的“傳先大爺”了。他領著這群人在各間屋子裏翻來翻去，無論廚子、櫃子概莫能免，四角旮旯都搜遍，對糧囤檢查得尤其仔細。最後吳中新帶人到堂屋裏間。這間屋是用來堆放牛草的，麥草一直堆到了房頂。吳中新掃視了一下全屋以後，拿起刺刀奮力對麥草堆戳去。為防遺漏，他用刺刀上下左右對草堆一刀接一刀地刺，同時還用刺刀上下翻、左右攪。那情景使我聯想起後來看的電影裏日本鬼子搜索八路軍的鏡頭。

翻檢完了，這群人走了，並沒有給他的“傳先大爺”打聲招呼，吳中新手裏仍然提著那把象徵著他的權利與威嚴的刺刀。

在這整個的過程中，父親漠然地站著，滿臉悲哀，彷彿那一刀一刀都紮在他的心上。等他們都走完了，父親幾乎掉了淚，說：“過去犯了事（犯法）才抄家，這……這興的是啥規矩？”

其實，“沒規矩”的事還在後頭。這只是我家第一次被抄。後來的兩次抄家更殘酷、更徹底，更使父親絕望。

農民的生活又回到了初解放乃至解放前時的狀態。

我家院子的東南角有一棵大槐樹，坑邊上有一棵大柳樹。這兩棵樹成了我家春天重要的食品補給。樹一發芽，我們就開始採摘。少用一點面，拌上一大鍋柳葉槐芽，撒上一點鹽，蒸熟了全家人每人一大碗，這就是午飯。晚上，一鍋水，放一把柳葉，再澆一點麵糊，燒開了每人喝一兩碗，有饃沒饃就算晚飯了。樹葉被我們采了一茬又一茬，直到樹葉實在老得不能吃了。

別看這是樹葉，照樣有人偷。記得有一次我們家的柳枝夜裏就被人偷了。偷的人不愛惜樹，把大樹枝扳斷了，使母親心疼了好幾天。還有一年春天，家住蕭縣歐套村的一個表姐來我們家要“借點槐芽”，雖然父母親忍痛割愛，但嫂子說了些不樂意的話，弄得兩家幾年不來往。

舅舅家所在的李寨有很多榆樹。母親每年春天都帶著我到舅舅家去摘榆樹葉。榆樹一身都是寶，榆葉、榆錢子（榆樹的花）、甚至榆樹皮都可以吃。但一般年成是沒有人吃樹皮的，到了一九五九年那幾年，餓瘋了的人們把樹皮、樹根都吃了，幾乎把榆樹、柳樹吃絕了種。

不上學的時候，我經常和王作軍一起出去挖野菜、拾柴禾。這兩種活我們是同時兼幹的。我們挎著糞箕，帶著鏟子和钁頭，碰到野菜挖野菜，碰到柴禾砍柴禾。哪些野菜可吃，哪些不可吃，我們都認識。薺菜、富富苗（牽牛花）、苦苦菜（苦菜花）、雞蛋球、茅草根、刺刺芽（薊）、鵝腸子棵、麵條子棵等等都是我們獵取的對象。

“吃燒是一樣的事”是母親常用來說明燒柴重要的話。農村裏常常一天吃兩頓飯，多半是沒糧吃，也有時是因爲沒燒的。一下霜，樹葉就嘩嘩地往下落。母親天不亮就挎著糞箕拾樹葉去了，我放了學或是星期天就拿著幾根削尖了的細棍去穿散落在地上的一片片的楊樹葉。

槐樹葉和柳樹葉可就不那麼容易收集了。我稍大些的時候，天不亮就起來，跟著大人扛著大竹掃帚掃。爲了先把地盤占下，先到的就用一個棍棍在地上畫個大圈圈。到了冬天和春天，樹葉早已撿不到了，我和王作軍常挎個糞箕子帶上一個洗衣用的棒槌去砸幹棒——扔棒槌砸樹上的枯枝。同時帶上一把钁頭，刨高頭上裸露出來的樹根。

隊伍撤走的時候，丟在我們家一隻行軍壺。爲了充分利用燒柴的熱，父親用一根細鐵絲把這只軍壺吊在鍋門口，燒飯好了，壺裏的水也開了。

父親原來是抽煙的，但從未抽過“洋煙”。他用的是煙袋，買點煙葉，曬乾了搓碎，裝入煙杆上吊的布袋裏，要抽時從布袋裏捏出點裝進煙鍋，用火枚子（卷緊的草紙）點著吸。就這樣的煙，父親“吧噠吧噠”抽得很過癮，我在旁邊聞著也很香。要是在搓碎的煙葉里加上點香油和白糖，那味道就更美了。後來，家裏沒有了買煙葉的錢，父親就用曬乾的桑葉、豆葉代替，照樣抽得“吧噠吧噠”響，但肯定沒有煙葉的味，聞起來有點嗆人。有一天午飯後，父親抽了兩袋豆葉，突然說：“打後戒了。”說著，把煙袋往母親的針線筐裏一扔。此後，直到他辭世，我再沒見父親抽過煙。

那年過完年，父親問我：“三兒，攢了多少壓歲錢了？”

“五角。”我回答道。

“家裏沒錢買豬料了，先借給大大用好不？大大以後還你。”父親笑著說。

我什麼也沒說，把夾在一個小本本裏的一分、兩分、五分的新票子全部拿出來，交給了父親。

以後父親手裏更拮据了，沒有還給我這五角錢。這成了我一生向父親盡的唯一一次孝。“子欲養而親不待”，他過早地走了，沒有等到我用自己掙的錢給他買一塊糖、買一件衣服……

6．走合作化道路

一九五四年，上級提出走互助合作道路，要求自願組織互助組。對這個號召，父親是擁護的：這個號召說的是“自願”的，不是強迫命令，而且我們家、叔叔家本來就和店裏愛升叔家在一起互助合作的，不過沒說這個“互助組”的名罷了。我們三家互助合作得很融洽，很和諧。我們三家有一流的耕作技術，一流的牲畜，一流的農具，當然，每年我們都有一流的收成。我們的生活水平有了提高。

那一年，我們翻蓋了三間房屋。蓋房的時候，父親往後退了半間屋的空，他計畫著留足地方將來給下邊的兩個小兒子蓋房子娶媳婦。過年的時候還殺了一頭自養的豬。雖然好豬肉都賣了，自己只留了豬頭和下水（內臟），但年過得總算有了油水。父親與叔父開始構想未來。我聽見過一天晚上他們說，晚兩年再要（買）上幾畝地，添幾口牲畜，再……但父親和叔父新生活的夢想沒有實現，他們不僅沒有購進新的土地，自己經營了幾年的土地反而入了公。

一九五六年，村長劉廣成和吳中新在劉廣成的房屋後邊的場地上召開了全村村民大會，動員加入合作社。一開始，說的是“自願”報名。

父親這次犯了愁：加入合作社意味著自己種熟了的地、養肥的牛、齊全的農具——他這幾年辛辛苦苦置辦的所有家業——統統要充公，更不要說自己構想的未來了。他與叔父商量，與愛升叔合計，商量來商量去，合計來合計去，這條路還是非走不可。父親還是不死心，跟大哥商量——大哥雖說只是個小學教師，但也是個領官餉的“工作人員”，對國家的政策看得透。大哥說：“說是‘自願’好聽，實際上早晚也得入。咱不如自己報名入，不比人家強迫著入好嗎？”

那一天，還是在劉廣成的房屋後邊的場地上召開了“自願報名入社大會”。這一次，父親和叔父牽著牛來到了會場。村長劉廣成講過話後，父親帶頭說了話：“我家裏有工作人員，我聽上級的，自願報名參加合作社。我把牛也牽來了，交給合作社。”父親一邊說，一邊用手來回撫摸著那頭跟了他幾年的牛。接著，另外一些“自願”入社的農戶也舉手報名，並當場牽來了牲口。

隨後，全村都“自願”入了社，合併了牲口農具，取消了地界。俗話說：官屋漏，官馬瘦。那幾天，父親天天都去牛屋裏看他的牛，回來就說：“咱家的牛眼看著掉膘了。唉，誰能像咱們那麼有功

夫？”他說這話的時候，眼裏含著淚——在他看來，那不是一頭牛，那簡直是家裏的一個成員！他能看著自己的家人受罪而心裏不難過嗎？

入社後，鄰村朱劉莊和套南村合併，分成了四個生產隊。因爲父親種地有經驗，在村裏威信高，就當上了合作化後第四生產隊的第一任隊長。雖說是個生產隊長，村裏的、大隊裏的幹部都敬重他。父親對這個生產隊像對自己的家一樣操心，一心想著怎樣種好地多打糧食。父親看到有的人出工不出力，就發急，生氣地說：“這樣大呼隆咋能幹出活來？”

那段日子裏，我一天到晚見不著父親的面。倘父親回到家見我在看書，他會瞪我一眼，也像說二哥那樣說我：“在學校看（書），回家來還看？”他的腦子裏才真正是“以糧爲綱”的，他最相信“民以食爲天”，認爲只有種地才是“正門”，全家人能吃飽飯是天底下最最重要的，才是“硬道理”。應該說，我在家看書是避著父親的，只要一聽見父親的腳步聲，我趕緊把手裏的書藏到身後。

初級社不久就合併成了高級社，一兩年後又一起入了人民公社。這後兩次，沒有人問你自願不自願，也沒有人動員你報名了。

7·我的小學

大哥比我大十四歲，一九四八年蕭縣梅村師範畢業。梅村離我家九十華裏。大哥讀書的時候，錢糧都是父親步行送去。半夜裏，母親起來把飯做熟，把要給大哥帶的東西包好，天不明父親就上了路，連夜趕回來。大哥上了兩年師範，父親也跑了兩年。

我記事的時候，大哥已經結過婚並在區中心小學唐寨小學教書。一九五〇年，我七周歲了，大哥給我買了個帶沿的兵帽，爲我起了大號，把我帶到唐寨小學。二哥當時正在那裏讀高小。

父親一輩子不識字，說：“還能都念書嗎？”父親把“都”字說得很重，意思是應該留一個在家幫他的忙，將來繼承他的農耕事業。

大哥說：“讓他念念看吧。”

父親說：“要念就好好念，叫‘世華’，念書不能滑。”

試讀了一年後，他們看我還是那塊料，第二年把我轉到了村裏的套中小學，從此開始了我正式的的讀書生涯。

從二年級起，大哥就給我訂了一報一刊：《新少年報》和《兒童時代》。這是大哥給我的額外智力投資——其他的同學都沒有享受過這份精神食糧。我竟然對這兩份報刊表現出特殊的興趣，每篇必看，而且有的故事至今記得，如《伏牛山的故事》、《小燕子萬裏飛行記》等等。到了我上高小的時候，大哥把《新少年報》換成了《中國少年報》。我記住了它們出版的日期，到時候，一看見區郵遞員唐成良，我就上去問：“有我的報紙嗎？”

唐成良是我們區的老郵遞員。我的一生中與家庭來往的所有郵件，我中學和大學時寫給大哥的信，我的情書，文革中大哥落難時我給侄女寫的信，我工作後每月寄給母親的錢，母親去世後我按月寄給二哥的錢，等等，都是他送的。後來二哥、大哥都去世了，我給家裏的書信來往幾乎沒有了，唐成良也退休了。

我沒有辜負大哥的希望。很快，我的作文就寫得很出色了，成爲老師表揚的對象和學校的尖子。一九五五年的六月一日，全區的小學集中到唐寨中心小學舉行六一兒童節慶祝大會，每所小學安排一個少先隊員發言。我是我們套中小學的發言代表。會後，各小學校長進行了評比，我居然是公認的全區第一名。我們的唐高堂校長很高興，對我更加另眼相看了：我給學校掙了個大面子！

套中小學只有初小，高小我是在唐寨中心小學讀的。教我五年級語文的是一位帶眼鏡的王老師。我對語文特感興趣，新語文課本

一發到手，我就迫不及待地把所有的課文都讀了。那天，王老師開始教《罌粟爲什麼開紅花？》，講課前他叫起我，讓我把課文讀一讀。那篇故事寫得很動人，我斷句正確，並不由自主地灌輸了豐富的感情。長的課文以往老師都是讓幾個同學分段讀，那天王老師沒有打斷我，破例讓我把整篇課文一氣讀完。當我抑揚頓挫地把課文讀完的時候，王老師從厚厚的眼鏡片後面端詳著我，忘記了讓我坐下：我的朗誦使他感到驚訝。

這位王欽若老師後來成了我的岳父。王老師的母親是店裏大叔、二叔的親姐姐；換言之，王欽若老師是店裏大叔、二叔的親外甥。他的女兒王彩霞隨他在唐寨小學讀書，也念五年級。那時，王家經濟情況不好，王彩霞吃住在店裏舅老爺和舅奶奶家，和她的表姑李素貞一起。當時我的一部分初小同學如王作軍等沒考上高小被淘汰了，大南門與我同時考上唐寨小學讀書的只有五六個人。與我一起一天兩個來回上學的只有三、四個同學，這其中固定少不了的是店裏的李素貞和王彩霞。有時候，我們作業多，必須晚上做。爲了省燈油，我便到店裏大叔家，我、李素貞、王彩霞我們三個用一盞燈頭如豆的煤油燈或棉油燈，趴在磨盤上寫各自的作業。她們兩個女孩子肯說話，有時候我就像大人似地制止她們："快點寫，別說話。"

一九五六年的冬天下了大雪，早上起來一看，地上積雪有膝蓋深。怎麼辦呢？我們上午要期末考試呢！店裏大叔說："別急，我送你們去。"說著，他牽出一頭牛，套上一輛拖車（一種像雪橇的運輸工具），上面鋪上一張箔，墊一床被子，讓我們三個坐上，又用一床被蓋在我們腿上，他坐在拖車頭上趕著牛拉著拖車把我們送到了學校。傍晚，他又趕著牛拉著拖車把我們接回來。

這樣的生活持續了兩年，直到一九五七年夏我們高小畢業。這段青梅竹馬的經歷成就了我和王彩霞的姻緣。

王老師沒有教我們到高小畢業。一九五六年暑假他和我大哥等所有的小學教師到宿縣地區參加政治學習，學習結束他沒有按時回來，此後被打成“歷史反革命”和“右派”。直到一九六七年我與王彩霞談戀愛之後我才又見到他。此時，他早已被開除回家當了社員——不，是“帶帽子的”受管制的“四類分子”。他剛回到家的時候，隊裏讓他當了個記分員；後來有人提意見，說讓這個“戴帽子”的人幹這工作不合適，就把記分員也給他撤了。

8．二哥其人

二哥屬牛，大我七歲。我記事時，二哥是唐寨小學的高才生，與他同學的魏玉邦、李福安等都不如他成績好。他還是少先隊的大隊幹部，胳膊上戴著個有三道紅杠的白布塊。他常從學校裏借畫書給我看，有時講故事給我聽。他很用功，放學回到家裏還看書。父親見了，就會白他一眼。在父親看來，放了學就應該幫他幹農活。

一九五四年，二哥考上了碭山縣的最高學府碭山中學，他的那些同學都落選了。當時有個說法：沒有百畝田，不能跟中學纏。意思是說一般的莊稼的人是上不起中學的。但那時大哥已在唐寨小學教書，他想讓二哥有點出息，堅決支援二哥上中學。

見二哥到縣城裏上了學，很多人都來給他說媒。最後，父親作主答應了歐套村姓劉的一家。當二哥寒假回家的時候，家裏已給他操辦了婚事，婚禮就定在大年三十。二哥沒表示反對。家裏經濟拮据，沒有給他們蓋新房，更沒有置辦傢俱，連喇叭也請不起，但女方不在乎。於是，在大雪初霽的舊曆年除夕，一頂轎子就把二嫂子擡了進來。二嫂娘家也是窮苦人家，陪嫁的東西只有一個櫃子。兩串鞭炮和爲數不多的賀喜的至親顯出一點熱鬧。

那晚，堂屋讓給二哥作了新房，父親和我睡在鍋屋裏搭的地鋪上。父親顯得很高興，跟我說了很多話。做父母的把孩子結親看作大事，二哥的成親等於是他們又卸掉一樁大心事，又完成一項大任務。

第二天一大早，我被劈裏啪啦的鞭炮聲驚醒。我揉揉眼，見父親早醒了，披衣在鋪上坐著。起身往外看看，天色已有些發亮。我正要穿衣起床，天又黑了下來。父親告訴我，這叫“黎明黑陣”。朱元璋當皇帝之前，家裏窮得很，有時候不得不去偷別人的東西。這一天天快亮的時候，他偷了一隻鍋，頂在頭上往家走。路上，朱元璋突然心裏想：我偷了別人的鍋，天明了人家怎麼做飯呢？於是良心發現，又想給人家送回去。這時天已亮了，萬一叫別人看見了多丟人呢！他就對著天說：“老天爺，你再黑一會吧，讓我把鍋給人家送去。”皇帝金口玉言，天當時就黑了下來，朱元璋這才把鍋給人家送去。這是我一生中父親給我講的唯一的故事。

寒假結束，二哥照舊去上學。二哥的同學說，二哥的成績很好，尤其字寫得漂亮，文章寫得好，老師常把他的作文當範文念給學生聽。村裏人也知道這些，說我們家裏有個“好學生”。那時，識字人不多，談到“學生”的時候，人們是帶著幾分尊敬的。

二嫂賢慧，對父母很孝順，疼我這個弟弟。我沒有姐姐，從二嫂身上享受到了姐姐的愛。一次，母親有事去了姨母家，晚上沒有回來。我沒有離開過母親，夜裏哭了起來。二嫂馬上摟著我說：“乖兄弟，不哭，咱娘明天就回來了。二嫂帶你睡。”那晚我跟二嫂睡得很香。父母親對這位兒媳很喜歡，有時偷偷地給她做件新衣服。大嫂知道後，常常引發一次吵架，說母親偏心。

但不久，二哥背著行李從學校回來了。他說，他頭疼，睡不著覺，聽不進課看不下書，已經辦了休學手續。從此以後，二哥再沒進過學校門，他的悲劇命運也從此開始。

休學回家後，二哥並沒有像父親希望的那樣安心在家過日子，幫他做農活，而是經常出去買藥治病。那時，飯還吃不飽，哪裏有買藥治病的錢？時間長了，父親便有時不高興。

一年過去了，二哥的病沒有好，他自己又去學校辦了續休手續。這以後，二哥更經常地四處求醫問藥，在家裏幹農活的時間更少，父母親也愈加地對他不高興。

一九五五年的冬天，二哥和二嫂吵了嘴，二嫂一氣回娘家去了，而且一去沒有再回來。雖經媒人從中調解，二嫂只是不願回來，無奈，後來娘家來人把嫁妝擡了回去。我從此再沒見過這位待我甚好的二嫂，二哥的婚姻便到此結束。

二嫂走了之後，二哥心情更加不好，有時不聽父母的話，父母親對二哥的態度也由不高興變爲生氣，經常嘟囔他。他在家裏不得好氣，心裏覺得鬱悶，跟我這個弟弟也很少說什麼，吃過晚飯和沒事的時候都不在家裏呆，出去跟同齡和不同齡的鄰居“拉呱”。他們聊些什麼，我們家裏人不太清楚。後來，從別人那裏得知，二哥常跟他們講書上看來的故事，也跟他們講在鄉下人看來很新鮮的學校裏的事。這時，就有人問：“世儉，你睡不著覺是想媳婦了吧？”二哥不語。有人進一步地說：“你夜裏跑馬（遺精）了吧？你的臉發黃。”二哥仍然不語，但顯得惶恐頹唐了。村裏人起先聽著新鮮，漸漸地覺得他迂磨，喊他“磨叨”（神經病），給他說話的口氣很像鹹亨酒店裏的人對孔乙己。他在村裏人心目中的威信降低了。

二哥不甘心就此墮落，想與命運抗爭。他每天早晨起來圍著我們的房子跑步、做操。這給村裏的人帶來了更多的議論和笑料。吃飯的時候，他想撿好的吃，以補一補身體的虛弱。只要打聽到哪裏有治他的病的偏方，他就千方百計要去買。父親沒錢給他，他就找大哥。有時，他給《碭山報》寫稿，想掙點稿費。那時，給報社寄稿件不要貼郵票，只要剪掉信封的右上角並注明“稿件”就行了。

那時，我已在唐寨中心小學讀五年級。他每次寫了稿，封進信封剪了角，便交給我，我幫他帶到街上的郵局，投入郵箱。但這些最終都沒有能改變他的命運，他的頭疼、失眠愈來愈嚴重。

統購統銷之後，家裏生活每況愈下。一到青黃不接的時候，家裏就要吃很多樹葉、野菜。飽飯尚不可得，哪裏談得上補虛？二哥的身體愈來愈差，正在如日中天的二十來歲，卻整日萎靡不振。按當時的規定，休學加續休最多兩年，倘兩年仍不能復學，便要退學。不得已，二哥去學校辦了退學手續，把他的商品糧戶口也遷回了農村。從此，直到他一九九三年去世，雖然他無數次地掙紮，卻再沒能走出小套子。

一九五七年的春天，剛過了年不久，村裏有玩雜耍的，二哥也出去看，但一直到吃晚飯時都不見人回來。全家人都很著急，父親四處打聽。天黑的時候，村小學的郭述勤老師捎過話來：世儉被公安局逮起來了，關在區公所，明天要送縣裏了。除了吃食，有要送的東西今晚可以送過去。

這對全家是晴天霹靂。我們李家世世代代奉公守法，從來沒幹過不該做的事。二哥雖然迂磨，但不至於作做出犯法的事。母親當下就哭了："我的兒啊，你是惹了啥亂子了？"

家裏趕緊找了幾件二哥的衣服，卷在鋪蓋裏托郭老師帶去。那一夜對父母親一定是個不眠之夜。

第二天是個豔陽天，院子裏的桃花正開得很豔。我正在樹下拿著自製的彈弓打鳥，突然我的一個玩伴喊我："三，你二哥給綁起來了，在集上開會鬥呢！"

我拔腿就往集上跑。半道上碰見父親從集上回來，肩上扛著一口袋作豬飼料的紅芋葉子。父親顯然看到了現場，滿臉悲哀。他遞給我五毛錢，說："去看看能不能見到你二哥，見到他把這五毛錢

給他……”父親好像還有話要安排，但嘴部的肌肉有點抽動，沒有說出。我拿了錢就跑。

會場已經散了，我沒見到二哥。據說二哥被銬著帶走了。

下午，村裏的大人都過來勸慰父母親。這時我才知道，上午在集上開的是“公開逮捕現行反革命分子李世儉大會”，二哥被五花大綁著跪在臺子上。公安局的人在大會上宣佈說：“李世儉寫信給報社，要搶糧站，割電線，扒鐵路。是現行反革命，現宣佈予以逮捕法辦。”老木匠李守文大爺在會場上說了句：“一個磨叨，磨叨人說的話能算數嗎？他要是真想幹壞事，他就不說了。”不料被一個拿槍的公安局的人聽見了，大聲喝斥道：“他幹的事你知道嗎？再亂說，把你一起帶走！”嚇得李守文大爺不敢吭氣了。另一個縣裏的幹部又借題發揮，說：凡是反革命，一定要堅決鎮壓，等等。

我突然意識到是我把二哥送到監獄去的。

大概一周前的樣子，二哥交給我一個剪了右上角的信封，信封上寫的是：《碭山報》社編輯部收，右下角署了詳細地址。這一次的信封經過了二哥精心製作，用厚白紙疊得方方正正，信封上還用蠟筆畫了些綠色的圖案。我常幫二哥寄稿件，所以沒有猶豫，接過信封，裝入書包，到街上丟入郵局門口的郵筒。這場禍正是這封信惹出來的。

第二天，公安局的人來抄家。這是我們家第二次被抄，而且是帶槍的官家的人來抄的。家裏人從未見過這陣式，母親嚇得在一邊哭，父親雙手捧著頭蹲在院子裏歎氣，我和侄兒侄女們躲在草垛旁偷偷觀望。他們把二哥睡的床、用的桌子和家裏其他地方都翻了遍，沒有找到任何反革命證據和作案工具，最後把二哥看過的幾本書帶走了。

在那些日子裏，思想受創最嚴重的應該是父親。他雖然是個農民，但從先輩們那裏知道抄家意味著什麼，他認爲家裏有人“犯了

官司”是最丟人的事，是自己管教不嚴給家族帶來了恥辱。他甚至想把這件事瞞住爺爺，但怎麼能瞞得住呢？全村、全唐寨的人都知道了。叔叔不時過來，與父親在一起，默默地對面坐著，與父親分擔著家庭的不幸。

家裏人不解的是：他爲什麼要胡編亂造這些從未有的事而自投羅網呢？漸漸地我們打聽到，在二哥經常接觸的人群中有一個是刑滿釋放的。他常說，勞改隊裏生活好，能吃飽，還經常吃丸子。有病給看病，幹活也不累，勞改犯經常在一起瞎侃……等等。這樣的生活對二哥是有吸引力的。他在家裏既吃不飽更吃不好，精神苦悶，有病沒錢治。於是，他想出了這個出格離譜的怪招。

兩個月後的一個傍晚，二哥背著鋪蓋回來了。經調查、審訊，公安局確認二哥是個神經不正常的人，他的所謂“搶糧站，割電線，扒鐵路”的“反革命罪行”純屬無稽之談，所以予以“教育釋放”了。

二哥與命運的第一次搏鬥徹底失敗了。他的夢想沒有實現。他被關了兩個月，而看守所的日子是不堪忍受的，一天三頓稀飯，連一天勞改隊的“幸福生活”也沒過上，身子不僅沒得到“滋補”，反而更虧了，臉變得蠟黃，身子也微微彎曲了，衣服上散發出酸臭味。這時的二哥不僅沒有了再與命運抗爭的身體資本，好像連那股年輕人的銳氣也沒有了。

從此，他“磨叨”的外號便人人皆知了。

六十六歲的王作軍成了村裏的“五保戶”，一個人過著淒苦的生活。攝於 2006 年 10 月



一九六〇年我家的院子舊址。右邊的東屋是大哥嫂子的住房，小侄女就死在這間房子裏。後來，王念昌一家住在這裏。左邊的窗戶處原來是一個門，住著李樂斌一家。攝影時間：2006 年 10 月

原來叔叔、嬸母住的院子舊址。爺爺和叔父母去世後，母親和二哥便住在這裏。右邊的一間小屋便是二哥藏匿小侄女屍體的地方。院子最前邊本來還有一間半小屋，那是爺爺住的地方。右邊是我們的院子舊址。父親去世後，嫂子帶著侄兒、侄女住在那邊。攝影時間：2006 年 10 月

我班全體女同學初中畢業時合影。右後站立的是班主任趙耀久老師，第二排右起第一人爲翟素霞，第四人爲王秀真，第五人爲唐愛華。攝影時間：1960 年夏





劉以臣嬸子在訴說大饑荒時所受的苦。攝影時間：2006 年 10 月

彭捷老師在回憶當年的“激情歲月”。攝影時間：2006 年 12 月 20 日



第二章：我的初中

（1957 年秋——1960 年夏）

1．萬裏長征

一九五七年我考進了二哥曾經就讀過的碭山縣的最高學府——碭山中學。王彩霞雖然學習成績很好，也未被錄取，原因是她的父親有歷史問題。後來知道，他是國民黨的三青團區分隊副，是夠了杠的“歷史反革命”。

碭山據說是秦始皇時所設的的六十個郡縣之一，我親眼見過縣城廣場圍牆下邊一塊大青石上刻著的很大的“古碭郡”三個隸體字。我小時候就聽店裏二叔說過碭山就是歷史上的芒碭山，是傳說中漢高祖斬白蛇起義的地方。《水經注》說：“獲水又東逕碭縣故城北，秦立碭郡，蓋取山之名。”《明史・地理誌》也說：碭山縣“東南有碭山，其北有芒山。”儘管古書言之鑿鑿，我在碭山生活了二十年，卻從未見到過山，所以人們又說：碭山無山。

碭山中學是一九四八年建立的，我一九五七年入學的時候它是全縣唯一的一所完全中學。它坐落在縣城東關外約兩公里的地方，長約一公里、寬半公里的圍牆裏邊是一排排青磚青瓦的平房，那是學生的教室和老師的辦公室。學校大門面朝西，沖著大門是一條很寬的筆直的大道，大道兩旁挺立著兩排高大的楊樹。楊樹的南面是我們的操場，操場靠近圍牆的地方豎立著單杠、雙杠等各種各樣的體育器材。大道北邊是分隔成一畦一畦的菜園，菜園中間建有一間園屋，那是種菜師傅的住所和工具的存放處。園屋旁邊挖了一口澆

菜的水井。校園的東圍牆外還有一塊相當於西邊操場加菜園面積的大菜園。這兩片菜園便是後來我們勞動課的基地、改造“右派”老師的地方，也爲我們的食堂提供了很多副食品和自我“加餐”的機會。

我們來自唐寨的同學都被編進同一個班，所以我們唐寨小學不同班的同學到了中學變成了同班同學，因此，雖然是新的學校、新的班級，卻是舊時的玩伴，彼此並無半點生分。這是我們感到很開心的事情。最讓我感到開心的是我與翟素霞同桌。小學五年級時，翟素霞是我的同班同學。她有一個幸福的家，上有一個哥哥、兩個姐姐，排行老四，因爲皮膚白皙，小名“四白”，是母親的嬌閨女。她脾氣好，聰明，又長得漂亮，我們男孩子都喜歡跟她玩，我們官稱她的小名“四白”，並沒有人叫她的的學名，她非但不生氣，反而答應得很爽快。六年級的時候，她被調進鄰班，但見了面我仍喊她一聲“四白”，她笑著沖我打一個響指，算是回答。現在我們坐到一個座位上來了，當然感到特別開心，而且想不到我們一坐就是三年！

時間長了，“四白”對我更放肆了，她給我起了外號叫“大頭”，還編出一個順口溜來損我：大頭大頭，下雨不愁；人家有傘，我有大頭。這時，我就攥緊拳頭叫她的大腿吃“疙瘩梨”，逗得她咯咯地笑。

翟素霞是我們學校體操隊的成員，整天穿著白力士鞋和白色的運動短褲，給“四白”又增加了一分亮色。上體育課時，看到她像輕捷的燕子一樣在平衡木上和高低杠中間翻飛，常常體育不及格的我，內心就油然而生一種朦朧的仰羨、愛慕、敬重的複雜情感。我也能感覺得到，她也喜歡我這個同桌，畢竟我學習成績好，還擔任著班裏的學習委員，更重要的是我們是多年要好的玩伴，彼此瞭解，共同語言多。做功課時我們不論誰碰到了難題，就推到對方面前，

而不管對方在幹什麼。好在我們都不是笨孩子，一點便通。自習課上，我們做完了作業，常常趴在桌上講悄悄話。講到高興處，我們全然忘記了我們是在課堂上，彼此都放肆地笑起來，直到我們後排的同學用指頭搗我們的後背，我們的笑聲才嘎然而止，於是不約而同地趕緊用手捂住自己的嘴。

每學期開學的時候，照例都要根據個頭高矮重新排座位。排位的時候，班長讓男女生各站一隊，然後讓男生隊最前面的和女生隊最前面的坐一桌，男生隊第二名和女生隊的第二名坐一桌，依此類推。每次排座位的時候，我們都要會心地悄悄數一數對方在各自行列中所處的位置，如果她和我在各自的行列中排序相同，我們就放心了：這樣我們就可以同桌了。因爲我們兩個個頭相當，整個初中階段排了六次座位，一般的時候我們都順利地坐到了一塊。但也有一次，我發現我們所處位置不同，趁班長不注意，我悄悄地與別人調換了一下，我們又如願了。

離開家到了縣城，一切都感到新鮮。最讓我們感到滿足的是一天三頓都吃白麵！我們在家的時候，只有收麥那幾天農忙的時候吃白麵，收完了麥子，家家都要摻雜糧了，俗稱“換糧食”。即使過年的時候，也只有大年初一這一天的早上吃一頓白麵餃子，中午吃一頓白麵饅頭，一年裏其餘的時間是都吃粗糧的，到了青黃不接的時候，連粗糧也不夠吃，要吃很多粗糠、野菜和樹葉。

學校每月月初訂夥。當時學生的定量標準是每月三十六斤，但是很多同學沒有錢，捨不得花這麼多的伙食費，訂不滿標準。那時伙食費極低，每月全夥（每頓兩個大饅頭、吃食堂的熟菜）也只要六元錢。但農村孩子缺的就是錢。像我這樣家裏有吃皇糧的“工作人員”的並不多，所以我之外的大部分同學享有助學金，可以省去他們的全部或大部分伙食費。那時，我和大部分同學一樣訂“半

夥”，即吃食堂的饃並不吃食堂的菜。我們都到東關的一家鹹菜店裏買諸如蘿蔔條、辣椒醬、臘菜疙瘩等鹹菜吃。

即便如此，比起家裏糠菜半年糧的生活，我也覺得自己過於奢侈，所以每逢快回家的時候，我就開始省饃：每頓飯吃飯的時候，就從我發給我的饅頭上掰下三分之一，到第三頓的時候，我就吃前兩頓留下的饃頭而省下一個整的饅頭。這樣，每次回家我就可以帶三四個白饅頭給父母親吃。我省饃的“習慣”就是這時養成的。

那時並沒有雙休日，每週六的下午不上課，要回家的同學便可以回家。記得我第一次回家是開學兩個禮拜之後的一個星期六。匆匆地吃完午飯，約上同路的同學，背上裝著幾個白饅頭的小包，就跟著我們的師兄師姐們興高采烈地上路了。

碭山中學離唐寨四十五裏，我家所在的大南門又在唐寨的最東邊，所以從我家到學校應該有五十裏。我們本可以從學校坐火車到李莊，而李莊離我們家只有十八裏了，車票也只要兩毛錢。但是，我們星期六回家幾乎從來沒有人花這兩毛錢坐火車，來回一律是步行。唐寨的學生多，加上我們高年級的同學有幾十個學生，男男女女，浩浩蕩蕩，一路東行，甚爲壯觀。在這群學生裏面，我是年齡最小、個頭最矮的。走不了多遠，我就要掉隊，然後不得不快跑一陣趕上大隊。走不了一半，兩條腿早已變得像兩根木棍，沒有了知覺，腳上也早已磨出幾個紫泡。眼見得家近的同學紛紛下路，我們的隊伍也變得越來越小，最後只剩下我一個人，我還得咬著牙堅持，每次我都是最後一個到家。

到了家，已是天黑。父母親見了我自是分外地高興。我坐下來，脫了鞋襪，現出幾個磨破的血泡，襪子早被染紅。母親很心疼，找出棉花來給我擦腳上的血，再用乾淨的布給我包上。我拿出自己省下來的白饅頭交給母親，母親非但不高興，反而責怪我：“你可不能緊著自己的肚子，你正在長身子，家裏孬好有吃的。你可千萬記

住了，乖乖！”我點頭。但是以後每次回家來的時候我還還照樣往家裏帶吃的，一直堅持了五年，直到一九六二年我讀高二的時候，那時家裏已能基本吃飽，而我在學校反而不夠吃了。

可能是一路奔波的勞累，也可能是又回到家人的身邊，回到家的當天的晚飯我吃得特別香，睡得也特別甜。第二天上午再偎著母親和家人過半天，中午早早地吃了午飯，下午便又得往學校裏趕。

返校的時候我們照例也是步行。記得每次出家門的時候，母親必送我到西地裏，嘴裏心疼地說著：“來趟家像掏把火似的……”她站在地裏，眼巴巴地望著我一步步地遠去，我也三步一回頭地看著母親，直到我們彼此都看不清了……

我初中階段回校時的伴兒是鄰村的李樂銀。返校比來家的路程更難走。兩條腿還沒有歇過來，仍然像兩條沒有知覺的木棍；雙腳上的血泡過了一夜剛剛結了疤，走不了幾步就又被磨破了。我們一邊說著話，一邊艱難地往前走，到得學校時已是一步也動不得了。一般要三四天後我們才能恢復過來。

我計算了一下，從初中到高中一共六年，每年五十二個星期，共計三百一十二周，平均每三周回家一趟，我總共回家一百〇四次。每次回家來回一百里，總行程超過了一萬裏。所以，可以說，我讀了六年中學，是進行了一次萬裏長征。

2．初見世面

進入初中後，我們小學時學的語文課變成了文學和漢語兩門課，還增加了植物學。教我們文學課的段華庭老師是剛走出校門的年輕人，他帶著眼鏡，身材挺拔，上課的時候，雙腿站得筆直。他講的是我們感到新鮮的標準的普通話，板書雋永秀美。他講課娓娓動聽，看來一般的話，經段老師一講，就變得很美，這給我這個喜

歡文學的孩子增添了濃重的興趣。段老師給我們講過的牛郎織女、柳毅傳書的神話，魯迅先生的《社戲》，“敕勒川，陰山下，天似穹廬，籠蓋四野。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的古代民歌，使我至今不忘。那時，中華書局出了一套《唐詩一百首》、《宋詞一百首》系列，一兩毛錢一本。後來，又編輯出版了《中華活頁文選》，一篇文章兩頁三十二開的紙，兩分錢。大哥知道我喜歡文學，新書一出，他就從新華書店買來送給我。這些讀物很便宜，但卻激發了我對文學極大的興趣。

植物學也是我們感興趣的學科。代我們植物學的劉道宸老師五十來歲，個頭不高，長著一副慈祥的面孔，課講得很生動。他是外地人，把“雙子葉植物”讀作“方子葉植物”，所以我們都喊他“方子葉”劉老師。他聽見了慈眉善目地笑一笑，並不生氣。

有一天，上植物學的時候，劉老師正指著黑板上的標本津津有味地給我們講“方子葉植物”，我們的校長李明月來到教室門口，對劉老師說了聲：“你出來一下。”

劉老師出去了，教室走廊外邊站著兩個穿著公安制服的人，我們學生一起擠到窗戶跟前看，校長也沒有制止。那兩個公安局的人什麼也沒說，把一付錚亮的手銬銬到劉老師手上，我們眼睜睜地看著他們把劉老師帶走了。此後我們再也沒有見過這位劉老師。

劉老師被帶走後，李校長不慌不忙地走到講臺上，說：“今天的植物課不上了，改上自習，大家自己看書吧。”然後他拿上劉老師的課本、備課筆記和標本走了。

因爲沒有老師，我們的植物學從此就被停掉了。

後來，像這樣對我們這些未諳世事的學生來說匪夷所思的事接二連三地發生了。

在我們在操場上上體育課的時候，我們親眼看到在兩排楊樹中間的大道上，體育教研組的組長董大一老師雙手戴著銬子，正被兩

個公安局的人押著帶走。董老師身材魁梧，穿著長大衣，昂著頭，一付無所畏懼的樣子，倒反襯出那兩個公安人員的矮小、齷齪。若干年後得知，這位董老師被判了重刑，最後死在勞改農場。我至今不知道他犯的什麼十惡不赦之罪，也不敢想像，他那高大偉岸的身軀何以竟然會死於牢獄之苦。

事後得知，公安局抓走這些“歷史反革命”、“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極右分子”的時候，故意當著學生和其他老師的面，有示眾之意。有一位老師被逮捕後，並不立刻帶走，而被銬在一棵路邊大樹上。當時正是開飯時間，有意讓全校所有的師生看見。

老師們星期天全天集中開會，天天晚上和下午兩節課後的課外活動時間都要參加“學習”，晚自習不再有老師來巡視。我們當時不知道他們開什麼會、學什麼習，後來才知道，他們正在開展“反右派運動”。實際上反右派運動早在暑假前就開始了。暑假裏，老師們沒有休息，他們被集中起來開展運動。第一階段學習中央文件，其中有毛澤東親筆起草的《組織力量反擊右派分子的猖狂進攻》的文章，還有《人民日報》社論《這是爲什麼？》、《工人說話了》、《請聽聽農民的話》等等，後來上了我們語文教材的《文匯報的資產階級方向應當批判》也是他們當時學習的內容。學習過後進入第二階段：組織大鳴大放。老師們從學習中知道中央的態度已經明顯，這時的反右確已成爲“陽謀”，沒有人鳴放出什麼“反動”言論，只說了些雞毛蒜皮的東西。第三階段：互相檢舉揭發。校領導做了一番動員之後，號召大家互相檢舉揭發。在那個時候，人心惟危，多採取以攻爲守的策略，互相“揭發”出一些平時閒聊中說的牢騷怪話甚至俏皮腔。然後，校領導根據大家的檢舉、大鳴大放的言論，再結合家庭出身和平時表現，確定右派。

根據毛澤東《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論述，百分之九十五的人是好的，壞人占百分之五，所以上級就依據這個比

例給每單位定指標：“右派”人數必須占到百分之五。碭山中學的教職工最初打成的“右派”人數沒有達到這個指標，校長對上也交不了差，就開會鬥那些有過不滿言論的老師，直到該老師承認自己是“右派”爲止。教物理的陳滌新老師出身不好，校長跟他談話，想把他定爲“右派”。陳老師不同意，說：“我……我又沒有任何言……言論，爲……爲什麼是右派？”陳老師急的時候，說話有點口吃，眼皮上下眨巴。校長說：“那麼咱們鬥你一場吧，看你有沒有言論？”陳老師趕緊自認：“好……好了，別……別鬥了，我認了。”

碭山中學當年被打成的右派的老師有劉道宸、董大一、張寶權、趙半農、王文煥、文成賢、張杳、李光昭、李昆玉、王贊臣、陳從善、王幼岩、段華庭、陳滌新，還有教務處刻講義的耿老師等等。生物教研組的組長金鑫老師和他的妻子、我們的校醫馬秀英雙雙被打成右派，別人給他們的孩子起外號爲“雙右”。越來越多的老師被停課了。

李光昭是當時最高年級高二的語文老師。他因對當時糧食供應說了句俏皮話：“過去糧店是買啥賣啥，現在是賣啥買啥。”被認爲是攻擊黨的統購統銷政策，結合他出身於剝削階級家庭、又是國民黨員，所以被定爲“歷史反革命”而遭逮捕。入獄後，他拒不認罪，最後絕食而死。用當時的話說是“自絕於人民，自絕於黨”，“帶著花崗岩的腦袋去見了上帝”。

王文煥老師看到毛澤東在密雲水庫勞動而被大肆宣傳說了句：“他幹了十來分鐘就這樣上報紙，農民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幹活，也沒有人宣傳報導。”被批判爲“惡毒攻擊偉大領袖毛主席”而被劃爲右派，和張步閣老師、金鑫老師一起給發配到碭山最邊遠的飛機場農場勞動改造。飛機場農場坐落在碭山最西邊的官莊附近，當年

曾做過日本人的飛機場，所以得名。那裏地勢偏遠，條件極其艱苦，且勞動強度大。王文煥老師、張步閣老師後來都死在了那裏。

李昆玉老師把挖地挖出來的一支生銹的手槍主動上交，反而獲罪，被開除公職。另外被開除回家的右派老師還有王贊臣老師。

教務處的耿老師回了趟家，返校後跟別人說起家鄉的地裏長滿了野草、莊稼荒了的情況，後被領導知道，說這是“攻擊大好形勢”，也被打成“右派”。

段華庭老師性格耿直，嘴無遮攔。他上學的時候談戀愛，挨了校長朱玉林的批評。有一天，他正在磨小刀，同學問他磨刀幹什麼，他張嘴就說：“殺朱玉林！”實際上他磨的是削鉛筆刀。後來這件事被揭發了出來。按照安徽在中央劃右派的標準之外另加的一條“反領導就是反黨”，這是夠杠的“右派”。

“右派”因罪行大小分成等級，處理各異。凡是被逮捕的如劉道宸、董大一、李光昭幾位老師，要麼是“極右分子”，要麼是‘右派加歷史問題”，或曰“歷史反革命”，用毛澤東的話來說就是“‘言者無罪’對他們不適用”，他們是被當作敵我矛盾處理的；那些沒有被逮捕的是“敵我矛盾按照人民內部矛盾處理”，視其情節有的被送到農場勞教，如王文煥老師、張步閣老師和金鑫老師；有的被開除回家，如李昆玉老師、王贊臣老師。陳滌新和王幼岩兩位老師因爲書教得特別好，所以網開一面，留校一邊上課，一邊接受勞動改造。另一些老師有言論，但不太“惡毒”，被定爲“中右”，如段華庭老師，繼續留校上課，同時接受勞動改造。

陳滌新老師視教書爲命，用現在的話說就是十分敬業。雖然那時餓著肚子，陳老師講課聲音洪亮。遇到需要強調的地方，他快速地眨巴著眼，用粉筆使勁地敲打黑板。陳老師代我們的課時已經是“右派”，批評學生當然不敢過於尖銳。看到哪個同學不認真聽課，他會氣得渾身發抖，脖子上青筋直暴，說話也不連貫了，大概是欲

言又止、有話不能講之故。一次物理課上，我的同學趙繼勤做小動作。陳老師看見了，氣得面部肌肉抽搐，跺著腳結巴著嘴說：“趙……趙繼勤，你能……能不能好……好好聽課？”

下午的自習陳老師經常來給我們加課，有時課上到半截無奈地說：“課只能上到這裏了，我……我得去勞……勞動改造，你……你們上……自習吧。”我們目送著陳老師的背影，心裏有說不出的酸酸的滋味。可是說不定什麼時候，當日的“勞動改造”結束了，他又會回到教室裏繼續給我們上課。

下午課外活動的時候，我們常看到一隊“右派”老師在接受勞動改造。他們的主要任務是幹各種髒活，比如打掃廁所、處理糞便。那時學校的公用廁所不僅沒有抽水馬桶，連沖水的龍頭也沒有。他們要冒著惡臭把大便用糞舀子裝到糞桶裏，再擡到菜園的某個作糞場的地方。按照我們當地種地的習慣，從不使用“生糞”，大糞要先晾曬，曬乾了堆成堆，而後用泥巴封起來，過一段時間之後，待大糞生了熱、發了酵，變成了“熟糞”，再把大糞扒開、過篩，然後才能用到地裏。這樣，就可以把大糞裏的蟲卵燒死，減少病蟲害。我校的幾個學生廁所、老師廁所都是這些右派老師打掃的，我們的菜園、果樹所用的肥料也都是經過這些“右派”老師按這樣的程式處理過的。

在這個“右派”群體裏，陳滌新老師是年齡最大的，也是身體最瘦弱的。他擡糞筐的時候，不得不雙手抱著杠子，一步一個趔趄。這時候，我們真恨不得上去把他肩上的糞筐接過來。但，這是不被允許的。“你們能替他幹活，但是不能代替他改造思想！”這是一位校領導警告過我們的。

這些事對我們震動很大，在我們幼小的心靈裏播灑下了陰影。據說這些右派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而且當時還有“右派右派，妖魔鬼怪”的說法。我們怎麼也不敢相信像段華庭、陳滌新、

劉道宸這樣的好人能與“歷史反革命”、“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極右分子”和“妖魔鬼怪”這些罪惡的名稱聯繫起來。

後來在語文課本上學了毛澤東禦筆親寫的《文匯報的資產階級方向應當批判》，知道國家出了一個“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章羅聯盟”，說他們“呼風喚雨，推濤作浪，或策劃於密室，或點火於基層，上下串聯，八方呼應”，“唯恐天下不亂”，斷然肯定“整個春季，中國天空上黑雲亂翻，其源蓋出於章羅同盟。”當時還真以爲他們是十惡不赦的。但是，後來讀了章伯鈞之女章怡和女士寫的《往事未必如煙》之後知道，章伯鈞和羅隆基從來就沒有“聯盟”過，有的文章甚至說他們有時還互相攻訐！

紅旗出版社一九九九年九月出版的中共中央黨校、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纂、肖冬連等執筆寫的《求索中國——文革前十年史》公佈的統計數字說，當年“全國共定了五十五萬兩千八百七十七個‘右派分子’，他們中半數以上失去了公職，相當多數被送去勞動教養或監督勞動，有些人流離失所，家破人亡。”

關於這些右派分子的悲慘遭遇每每見於報端。

《新週報》刊發的題爲《巫峽之巔驚世大標語》的文章說，當時的四川省巫山縣委強迫右派分子在巫峽之巔製作十五個籃球場大、橫跨三十華裏的驚世大標語“毛主席萬歲！”，七十多名右派分子在每天兩百克口糧加牛皮菜的惡劣條件下進行極其艱苦的勞動，在很短的時間內，就有七人悲慘死去，其中六人是用帆布口袋裝著就地挖坑掩埋的。

楊顯惠的《夾邊溝紀事》告訴我們：一九五七年年十月至一九六〇年底，甘肅酒泉附近的夾邊溝農場關押了甘肅省近三千名右派。在天寒地凍的沙漠中，他們與世隔絕，終日勞作，並且經歷了罕見的大饑荒，幾乎吃盡了荒漠上能吃的和不能吃的所有東西，最後，當初的三千多人，不到十個月的時間，就有兩千五百左右的“右

派”死在了這裏。這也就是說：平均一天就有一個半人死亡。更慘不忍聞的是的死者身上已皮包骨頭，他們的胸腔還經常爲同伴們劃開，取出內臟吃掉！

再看看和鳳鳴《經歷：我的一九五七年》所記載的發生在夾邊溝附近的一個勞改農場更加慘不忍睹的一幕吧：一天，右派分子朱××端著一盆像似心肝血淋淋的一堆肉走進地窩子。隊上領導得知後進行追問，朱××立即承認是從新近死了的勞教分子的胸腔裏掏出的心肝，自己準備煮熟了吃，並帶著隊上領導去看了現場：已被草草掩埋了的新近餓死者的墳塚被扒開了，胸腔被切得一塌糊塗，血肉模糊，沒有了心肝。兩天後，這個原來熱愛文學的青年，在生命垂危的日子裏，爲嚴酷的饑餓所逼迫，企圖吃死人心肝的人，最終還是撒手人寰，跟著許許多多在黃泉路上先行的幽靈們，匆匆趕路去了。

書裏還記錄了發生的更多死人的大腿、屁股被人煮食的事。接著作者感歎說：“士人”相食，就這樣留在了歷史中，留在了倖存者的記憶深處，永不泯滅。

岳父是個受儒家影響甚深的人，循規蹈矩，奉公守法，但仍未逃厄運。一九五六年前他擔任小學校長，歷經了肅反和反右派、反右傾運動，被打成“歷史反革命”，但陰差陽錯，材料卻被塞進了右派分子的檔案，所以又成了“右派”。在教育系統“拔白旗插紅旗”時，被開除回家。但他對這一切無怨無艾，從不怨天尤人，好像他自認爲自己確實就是“歷史反革命”和“右派分子”是的。這大概就像劇作家曹禺對文革中的心理迷亂的自述：“他們整天逼你念叨著：我是‘反動文人、反動學術權威’，……一直搞得你神志不清，……不但別人相信，甚至你自己也相信，覺得自己就是個大壞蛋，……”屢次的政治運動已將苦難神聖化，對自我道德完善的

追求，使岳父在苦難中純淨了靈魂，成爲了“新人”。岳父在一九八〇年得到改正複職後逢人便說：“感謝黨，黨英明偉大！”此後說話做事更加謹小慎微，走路怕踩死螞蟻，樹上掉下樹葉怕砸了頭，生怕再惹出是非來。他只要聽到我們講話“出格”，馬上厲聲制止：“不能這樣說！上面咋說咱咋說，聽黨的話嘛。”妻弟當了官之後，常有人誇他：“你兒子當了大官，你家教有方，家庭培養得好。”他會馬上糾正：“不，不能這樣說，是黨教育得好。”從兒子當上科級幹部開始，他每年過年時都給兒子寫一封很長的“家訓”，諄諄教導兒子聽黨的話，按黨的政策辦事，爲官清明廉政，……現在兒子當上了廳級幹部，他仍然堅持這種家庭教育。我們背後時常調侃地說：“這個三青團老爺子比共產黨員還進步呢，可以當中央委員。”

3．激情歲月

一九五八年秋天我進入了初中二年級。

這是一個熱浪襲人的年代。“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是當年的時髦口號。早在午收時節《人民日報》就登出了小麥高產的衛星：河南省遂平縣衛星農業社畝產 3,530 斤；河北省安國縣南婁底鄉畝產 5,103 斤；八月份《人民日報》報導說湖北麻城縣麻溪河鄉早稻畝產達到 36,900 斤；九月九日，廣西環江縣放出了全國最大的水稻高產衛星：畝產 130,434.14 斤！報紙上、牆壁上畫滿了一列火車只拉一根玉米棒、一顆棉花上坐著幾個孩子等等極富想像力的漫畫。一些浪漫的詩歌遍佈各種報紙、雜誌，有的甚至上了語文課本。這些詩歌後來被收集出版，名爲《紅旗歌謠》，郭沫若還爲之題寫了書名。我們來欣賞欣賞其中的幾首吧：

其一：社員堆稻堆上天，稻垜堆到白雲邊。

撕塊雲彩擦把汗，湊著太陽抽袋煙。
其二：一個穀穗不算長，黃河上面架橋梁。
十輛汽車並排走，火車馳過不晃蕩。
其三：歌成海洋詩成山，躍進歌聲飛滿天。
太白鬥酒詩百篇，農民只須半杆煙。
其四：大紅旗下逞英豪，端起巢湖當水瓢；
不怕老天不下雨，哪方乾旱哪方澆。
其五：大躍進，舉雙拳，恨天無把地無環。
只要糧棉超英美，哪怕汗水漂起船。
其六：稻粒趕黃豆，黃豆像地瓜，芝麻賽玉米，玉米有人大，
花生像紅芋，紅芋趕冬瓜。一幅豐收圖，躍進農民畫。

大躍進、人民公社、大煉鋼鐵、公共食堂……一個接著一個的聞所未聞的新生事物使我們應接不暇。我們沒有時間坐在課堂裏讀書了。

暑假開學不久，熱火朝天的大煉鋼鐵開始了。學校的大喇叭滾動播送著“趕英超美”的口號、完成一千零七十萬噸鋼產量任務的號召、《社會主義好》等大躍進的歌曲和學校領導的鼓動信、各班的決心書等，整個學校沸騰起來了。全校停課，全體師生員工都投入大煉鋼鐵。我們的操場裏支起了一個高大的屬於全校的煉鋼高爐，另外，全校二十三個班每一個班還有屬於自己班的高八十公分、一米多寬、兩米長的小地爐，這樣，整個操場豎起了大大小小高高低低的煉鋼爐群。大、小高爐旁邊堆滿了礦石、焦炭、坩堝。

個頭高的、年齡大的同學都被選去燒爐子了，壓礦石便是我們小同學的任務。課桌和講臺都被碼放到教室的後邊，騰出來地方壓礦石。我們的教室被分成四塊場地，每塊長四五米，場地兩端各擺放一條條凳，每條條凳上坐兩個同學，來回蹬一個農村打麥場上用

的大石滾，讓石滾在灑滿礦石的地面上滾動壓碎礦石。四個石滾在磚鋪的地面上滾動的聲音、抄翻礦石的聲音和礦石塊被壓碎的聲音震得頭昏耳聾。礦石粉和著灰塵在整個教室飛揚，我們的頭髮上、衣服上和眼睛、眉毛上都蒙上了一層厚厚的礦石粉，我們雖然帶著口罩也嗆得透不過氣來。

在大煉鋼鐵的熱潮裏，全國上下，人山人海，不分晝夜，火光映天。煉鋼爐白天黑夜二十四小時不能停火，因此我們壓礦石的也不能休息。整個教室裏彌漫著濃重的礦石灰，嗆得人睜不開眼、透不過氣。學校沒有給我們配備手套、口罩等任何勞保用品，我們只好用小手帕蒙住嘴和鼻子。儘管如此，礦石灰還是從臉與手帕的縫隙裏往鼻子裏鑽，結果連我們的手帕也變成了礦石色，貼近鼻孔的地方變成兩個褐色的圓點。不要半小時，我們的頭髮和全身衣服都罩上一層厚厚的礦石灰，周身上下只有兩隻眼睛是白的。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我們相對而笑：我們都變成小鬼了！

我們分成若干班，輪流休息吃飯。我們好像一夜之間進入了吃飯不要錢的共產主義社會，我們再不要花錢訂夥，只要不是幹活的時候，肚子餓了，可以隨時去大伙房吃飯，而且可以任著肚皮塡，能吃多少就吃多少，只不過大都是紅芋罷了。那年頭正是大躍進、一天等於二十年的歲月，當時的口號是：“把黑夜當白天，把月亮當太陽，白天紅旗招展，夜間遍地明燈”，我們每天只能睡上三四個小時的覺。輪到休息的時候，我們常常臉也不洗帶著滿身的礦石灰和衣躺下。等下一班來叫我們的時候，我們睡得正香，揉揉眼皮，便去上班。連著幾天熬下來，人就有點受不了了。常常把石滾蹬過去就睡著了，當對方把石滾蹬過來的時候，自己渾然不知，結果被石滾壓著了腳面，甚至被壓傷了腳脖子。

搬運礦石的時候，我們看見大操場上的大大小的煉鋼爐都噴吐著熊熊的火苗，照紅了天空，加上照明的電燈，整個學校變成了一

座不夜城。一位同學家長說，從他們遠在十幾裏之外的老家都能看見我們學校的煉鋼爐的火光。在學校的大高爐的一邊，老師們和高年級的學生在踩著梯子往爐子裏倒焦炭；另一邊，兩個體育老師在拉一個碩大的風箱，旁邊還站著幾個準備接班的大個子學生。他們個個揮汗如雨。

當年彭捷老師擔任初二（2）班的班主任，他們還有自己的小地爐。爲了早出鋼鐵，彭老師已經三天三夜沒睡覺了。他要組織學生，親臨指揮，有時要親自拉風箱、倒焦炭。快到該出鐵的日子了，彭老師站在爐口，俯身望著爐火，手裏拿著鋼釺子，不斷翻動焦炭，觀察坩堝裏的動靜。突然，頭發昏，腿發軟，身子往前倒去。虧得旁邊的同學及時拉住了他的衣服，否則其後果是不堪設想的。“直到將近半個世紀後的今天想起這件事我還感到後怕。”二〇〇六年的十二月二十日彭老師在給我回憶起這段往事時如是說。

“你們到底煉出鋼了沒有？”我問彭老師。

彭老師以一個繞口令回答了我：“說沒煉出來就是煉出來了，說煉出來了就是沒煉出來。”

我大惑不解。

彭老給我解釋道：“如果說沒煉出來吧，燒煉後從坩堝裏倒出來的東西跟原來的鐵礦石確實不一樣了，所以說‘說沒煉出來就是煉出來了’；要是說煉出來了吧，煉出來的鐵疙瘩裏面到處是窟窿，有點像蜂窩了，那能算是鐵麼？更不能說是鋼了。所以說‘說煉出來了就是沒煉出來’。煉出的是這樣的東西，能不能報喜呢？我也猶豫。後來同學們說‘就算是鐵，報吧！’我們就向學校報了，學校的廣播表揚我們初二（2）班煉出了第一爐鐵。”

還有一個有趣的插曲：爲了使我們做出的坩堝結實，泥中間要摻入細麻絲一樣的纖維。但需要量這麼大，哪裏去搞麻絲？不知誰提出一個倡議，用頭髮代之豈不更好？頭髮可是人人都有的！於

是，在老師中首先掀起了獻頭髮的高潮，很多老師剃了光頭，接著學生也有很多回應的。看到我們神聖莊嚴的老師變成了禿和尚，讓人忍俊不禁。

像夏收季節一樣，在大煉鋼鐵運動中，各地竟放“衛星”。九月十四日，貴州省首先宣佈生產生鐵 14,000 噸，吳芝圃的河南省不甘示弱，立刻宣佈該省出了八個日產千噸以上的縣，接著全國衛星紛紛上天，一顆比一顆高，一顆比一顆大，連毫無鋼鐵基礎的廣西壯族自治區也後來居上，連放幾顆特大衛星：環江縣日產生鐵 6,300 多噸，鹿寨縣竟然日產生鐵高達二十萬噸！

這些從中央喉舌傳來的消息，鼓舞著我們，使我們亢奮。大家感覺自己好像在從事著一個無比光榮而神聖的事業，雖然苦，雖然累，雖然學不到科學文化知識，非但全然沒有怨言，而且充滿激情。

終於有一天，校長通過大喇叭用激動的聲音向全校宣佈：“老師們，同學們，報告大家一個好消息：我們成功了，我們的鋼水流出來了，我們煉出了第一爐鋼！我們全體集合去縣委報喜！”

全校歡呼起來了，我們停下手裏的活，跑到操場排隊。學校早已寫好了大紅的喜報，四個大個子學生擡著一個盛著“鋼鐵”的坩堝，然後浩浩蕩蕩向縣委所在地縣城東關走去，一路上唱著大躍進的歌曲。

這消息還被登在了《碭山報》的顯著位置，我們煉出的“鐵”也被放進了展覽館。

各行各業都在大躍進，科學技術當然也要大躍進。縣科學技術委員會給我們這個碭山縣的最高學府提出了要求。

老師們一商量，決定放衛星。“人家各條戰線都在放衛星，咱們就放一個真衛星！”不知哪位老師提出的這個動議立刻得到了其他老師的支援。校長把這個任務交給了物理實驗室的張鴻月老師。

張老師帶著攻關組的其他幾位老師開始研製。作爲第一步，他們想先放一架飛機。他們用鐵皮焊制了機身、翅膀，把機身填滿火藥，用紅漆寫上“躍進一號”的字樣，想接著能有“二號、三號”等更多的衛星火箭上天。

一切準備妥當以後，老師們把“躍進一號”綁到縣城東關外的護城河橋欄杆上。校長和老師都到了現場，等著慶祝這個偉大的勝利，喜報也寫好了，準備一旦成功，立刻就近向縣委報喜。

張鴻月老師去點火了，大家屏住氣等待這個偉大時刻的到來。火點著了，機尾向後噴射出火光，但大家還沒來得及歡呼，“嘭”的一聲，“飛機”已經爆炸解體，機身、機翼都不知飛向何處。

老師們不甘失敗，眾多老師獻計獻策，他們總結上次失敗的原因在於材料不過硬，不該使用鐵皮；另外機身和機翼焊接不牢，造成解體。爲了減少焊點，最後決定使用無縫鋼管做成火箭。但爲謹慎起見，老師們先在實驗室裏進行了內部試驗。點火之後，“嗵！”火箭穿過天花板、又刺破實驗室屋頂飛出去了！天花板、屋頂雖然留了兩個窟窿，但說明這次試驗確實成功了，於是決定當眾正式發射。

火箭被固定在大禮堂旁邊的物理實驗室門口的支架上，斜向藍天蒼穹。激動人心的時刻即將到來，張鴻月老師前去點火。師生們拉開一段距離呈弧形站在禮堂門口，等待著歡呼勝利。

“嗖！”火箭騰空而起，但瞬間便消失在天空。全校師生仰望尋找，卻全然不見蹤影。大家都茫然不知所措：到底成功了沒有？沈默了片刻後，有人帶頭歡呼起來，其他人也莫名其妙跟著歡呼起來，我們的火箭發射成功了：射到天上看不見的地方去了，豈不就是成功了？雖然如此，科研組的老師心裏感到不踏實，他們到四周尋找。兩天後，他們在校東邊的毛李莊的莊稼地裏找到了這枚火箭，火箭頭深深地插入泥土中。火箭沒有上天，卻入了地。

另外一個科研組的老師發明瞭一輛水陸兩用自行車：一個較寬的船體中間固定一輛自行車的傳動裝置，鏈條連接上水車的撥水板。理論上講，這個裝置是可行的。當水陸兩用自行車安裝完畢以後，被放入校內的人工湖，它在湖上輕輕地蕩漾起來。誰來操縱它試航呢？教導處邵主任自告奮勇上了船，坐上坐架，把穩船舵，把腳放在踏板上。一切準備就緒，邵主任踩動踏板，不料船體突然傾斜，水陸兩用自行車歪倒入水中，邵主任也翻身落水。

生物組的老師確實研製出了成果。他們用一頭豬熬製出了一瓶膠狀的據說是科技含量很高的生物製劑，放在展覽室裏供人觀看。若干年後，有人問及參加研製的一位老師：“你們的那瓶製劑到底是什麼東西？”

“我們自己也不知道是什麼東西，”那位老師說。

“那頭豬呢？”

“我們用一口大鍋熬了半天，看看也熬不出什麼名堂，就把豬肉送到大食堂裏給大家吃了，然後從大鍋裏隨便倒出點液體的東西放在瓶子裏交上去了。”

在那個熱火朝天的年代裏，各行各業都要大躍進，體育當然也不能例外。國家要求學校、機關以及部隊實行勞衛制。“勞衛制”標準分一、二、三級，一級最低，三級最高。國家體委對各項田徑、體操等項目都制定了必須通過的標準，比如，百米跑必須達到 XX 秒，三級跳必須達到 X 米，參加測驗達標者，才能得到一張證書和一枚證章。一級證書爲黃色，二級紅色，三級紫紅色，各級證章主色與證書一致。

對我來說，這比什麼考試都難。平時的體育成績，我都很少及格，爲此沒少挨“四白”笑話。勞衛制標準又比體育考試標準高得多，我和許多同學都達不到。見到“四白”和別的一些同學拿到了

證書、帶上了證章，我心裏很痛苦。我一個人通不過，就要拖累全班——全校各班要進行評比的！

下過夜自習後，體育委員李樂銀組織我們這些“老大難”到操場練，還要求已經通過了的來幫助我們這些困難戶。操場上，燈火通明，人聲鼎沸，鑼鼓齊鳴：全校各班都在加班，力爭在最短時間裏滿堂紅。另一邊，體育老師在組織測試，凡是自認爲已經練好了、可以達標了的就到體育老師那裏申請測驗。那時還沒有電燈，一切都打著手電筒進行。這邊最熱鬧，只要有一個同學接受測驗，他所在班的全體同學都來敲鑼打鼓加油助威。

經過十來天的苦練，我勉強通過了一些項目，就是一千米、一百米兩項差距太大，而且越練成績越差。最後李樂銀急了，動員全班同學一起來“幫助”我測驗。跑一千米時，跑道兩旁站滿了爲我保駕護航的同學，“四白”當然也在裏邊。可是我不爭氣，才跑了一圈，就氣喘吁吁，兩腿發軟。這時李樂銀一招手，幾個大個子同學架起我就跑，我與其說是跑不如說是飛。到了終點線跟前，他們把我放下，然後前邊有人拉著、後邊有人推著沖了線，裁判老師把雙手一舉：“通過了！”幾乎我們全班同學都歡呼起來了，可是我卻癱倒在地，大口大口地喘氣。我的一百米也這樣被架著連跑帶飛通過了。實際上，很多同學的困難項目都是這樣通過的。

大煉鋼鐵剛剛告一段落，我們又投入了聲勢浩大的除四害運動。毛澤東講過：“有人說麻雀可以吃蟲子，我看把它消滅，它與人爭食。”主席一言九鼎，把麻雀欽定爲“害鳥”，當在必殺之列。於是，一場驅趕麻雀的人民戰爭開始了。

一九五九年的春天，圍剿麻雀的運動在我們縣裏轟轟烈烈地展開了。縣裏對這次運動作了部署，統一行動，以便一舉全殲不留餘孽。初春的一天，天剛濛濛亮，我們全校師生員工按部署進入陣地：

學校北邊大約十幾裏見方的一片莊稼地。我們每隔幾十米站一個人，手裏拿著最原始的武器如掃帚、土簸箕、臉盆等。突然，幾顆照明彈騰空而起，宣佈戰鬥開始。我們和四面八方的人一起吼叫起來並同時敲打鑼鼓、臉盆等發聲的東西，好像全縣瞬間沸騰起來了，山呼海嘯，喊聲震天。狗、牛、馬、驢、騾各種家畜和雞、鴨、鵝各種家禽一起被從睡夢中驚醒，加入了這個大合唱，雞鳴狗叫，牛嘶馬嘯，還有人爬到樹上去撵打，麻雀和各種飛鳥一起被驚飛了起來，它們倉皇飛奔，四處逃命。但到處是人山人海，哪裏有落腳的地方？有的麻雀不堪勞累，紛紛鎩羽就斃，墜地而亡，變成了我們的戰利品。爲了鞏固戰果，不給麻雀有喘息時間，我們都堅守崗位，一天三頓炊事班把飯送到地頭。戰鬥如是堅持了三天，整個碭山縣的麻雀差不多絕種了。

著名作家沙葉新在他的雜文《1958 年的中國麻雀》大發感慨說：“每種生靈都難免有災有難，但不論是過街之鼠、碰壁之蠅、喪家之犬、毀窟之兔、熱鍋之蟻、涸轍之魚、甕中之鼈、虎口之羊，都不如 1958 年的中國之雀那樣的遭罪；那是一場浩劫，那是滅頂之災。”

這場消滅麻雀的運動一直持續了很長時間。一九五九年中國科學院的一些科學家作了一些研究，解剖了麻雀的嗉囊，發現四分之三是害蟲，只有四分之一是糧食，認爲麻雀基本上算是益鳥。中科院的領導把這一意見反映到中央，毛澤東又親自爲麻雀“平了反”，這場曠日持久的運動才得以終止。但是那些一九五七年被打成的“右派”並沒有麻雀幸運，他們直到二十三年後的一九八〇年才得以改正，其中許多人沒有活到那一天。

除了打麻雀以外，我們還有消滅蒼蠅、老鼠的任務。一到下課或開飯時間，我們便揮動自製的蠅拍，到處尋找蒼蠅，打死後裝進用紙疊的蠅壺裏，交給生活委員統計數字。生活委員製成表格，把

每個人每天捕蠅的數字填入表格貼到牆上，張榜公佈。有一次，學校專門放了假讓我們回家捉老鼠。可是，家裏同樣在除四害，每家每戶也一樣有任務，我們只好作弊：把一隻老鼠尾巴剪成兩三段，家裏交一截，我再帶一截到學校去交。爲了完成任務，老師們逢星期天便帶上鐮子、鐝頭去農村，到廁所裏、糞坑邊挖蛆蟲，一個蛆也算一個蒼蠅。

4．家鄉巨變

兩個星期後回家發現，家鄉也在短短的兩周內熱起來了。我們大隊的名字由“套中大隊”改爲“順利大隊”，翟素霞、王彩霞所在的翟莊大隊更名爲“光明大隊”，她們大隊的小學也改成“光明小學”。到家後母親直接把我帶到村裏辦的公共食堂吃飯。

“世華回來了，”店裏二嬸現在是食堂的炊事員，見我回來了，熱情地招呼我，“快自己拿著吃吧！”

我是個中學生了，二嬸不再叫我的乳名而開始喊我的學名了。

我一邊答應著，一邊環顧周圍。店裏大叔家的四間西屋變成了第四生產隊的食堂，門口擺了幾張大桌子，每張桌子旁邊擺著幾條長凳子，全隊的男女老少都來這裏吃飯，很是熱鬧。炊事班的叔叔嬸嬸們把一大蒸籠熱騰騰的紅芋架在兩條長板凳上，村民們便圍過來自己動手拿著吃，有點像是現在的自助餐，不過品種單一罷了。鄰居們熱情地跟我打著招呼，大口大口地吃著。由於各個作業組下班時間不一致，大食堂不分晝夜地供應飯食，隨到隨吃。祖祖輩輩爲吃飯發愁的農民們現在可以放開肚皮吃飯，雖然食堂供應的都是紅芋、粗糧和紅芋製品，但他們自己在家裏吃的不也就是這些東西嗎？村裏的幹部都說，吃飯不要錢，這就是共產主義了。社員們對這種共產主義生活也很滿意。

自人民公社化後，按上面“組織軍事化、行動戰鬥化、生活集體化”的要求，原來的自然村便被叫做“連”，算是“組織軍事化”；公共食堂則是生活集體化的體現。村裏的勞動力被分成了煉鋼隊、稻改隊（我們縣的土地不能栽種水稻，歷史上也從來沒種過水稻，省委書記曾希聖要“淮北變江南，旱地變水田”，強迫改種水稻，當時被稱爲“稻改”）、拖拉機隊、縫紉組、炊事班等等，爲了便於“行動戰鬥化”，這些隊的成員集體居住。所以一家人可能分住在幾個地方，一天到晚見不著面。稻改隊集體住在鄰村朱劉莊，朱劉莊的村民則被搬遷到我們村，所以李樂斌、李樂銀就住進我家的房子裏來了。既然進入共產主義了，一切都“共產”了，房子當然也一樣。

當時幹部們正向社員宣傳著共產主義的宏偉藍圖。他們借用河北省徐水縣縣委書記張國忠的話來闡釋共產主義的要義：“什麼叫共產？共產就是大車、牲口全部歸公……共產共產，越共越好，一共就富了。……到那時吃什麼有什麼，穿什麼有什麼，要什麼有什麼。”九月一日的《人民日報》向全國人民宣佈：“徐水人民公社將會在不遠的期間，把社員們帶入人類歷史的最高仙境，這就是那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自由王國的時光。”湖北省跑馬鄉的黨委書記說得更加具體而明確：十一月七日是社會主義結束之日，十一月八日是共產主義開始之日。會一開完，大家就上街拿商店的東西。商店的東西拿完後，就去拿別人家的：你的雞，我可以抓來吃；這個隊種的菜，別個隊可以隨便跑來挖。小孩子也不分你的我的了。只保留一條：老婆還是自己的。不過這一條，還得請示上級。（見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第 754 頁，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出版）

父親自高級社以後不再擔任隊長，連長委派他擔任最重要的角色：糧食保管員。在幾千年來一直以農爲主的國家來說，糧食保管

員確實是一個重要的、被信任的職務，無異於現在的銀行庫官員。父親一直恪盡職守，除了吃飯以外，其餘的時間都在管著生產隊的糧食。現在正是秋收的時候，白天父親要到場上去曬糧、打糧，晚上就睡在麥場旁邊的地窖裏，因爲很多糧食還沒有曬乾歸倉，還堆在場上，況且地窖裏還藏著剛曬乾的上百斤花生。這次回家，我只到地窖裏跟父親見了一面，說了一會話。和大家一樣，雖然不能與家人在一起，父親對這種有活幹、有飯吃的“共產主義”生活也是滿意的。

二哥的才華那時候得到了最充分的發揮。村裏識字的人不多，二哥的字又寫得好，刷標語的任務便自然地落到他身上了。這個活雖然不出大力，但一天到晚仰著頭、架著胳膊，也是夠難爲他的了。二哥也做得特別認真。多大的牆面，寫幾個字，二哥要在刷白的牆上先規劃好，再用鉛筆劃好格子打出草稿，最後才能用紅顏料刷字。我回家的時候，已見到家家戶戶的外牆都被用石灰刷白，上面通紅的口號都是二哥的墨寶：“大躍進萬歲！”、“人民公社萬歲！”、“總路線萬歲！”、“公共食堂好！”、“全民動員，大煉鋼鐵！”、“十五年趕上英國、超過美國！”、“共產主義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橋樑。”等等，都是當年的時髦口號。歐四奶奶家有一個大院子，長長的院牆後面寫著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鼓足幹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別人指著牆上的字誇二哥：“世儉，你這字寫得真有勁！”二哥並不辯駁，他望著滿村牆上自己的傑作，顯出很得意的樣子。應該說，這恐怕是二哥一生最懷才知遇的時候了。

母親告訴我，家裏沒有做飯的東西了，各家各戶的鍋碗瓢勺等凡是帶鐵的東西都交上去煉鋼鐵了，還有鍋鏟、洗臉用的鐵盆、甚至門上的鐵釘、鐵環也被拔掉上交，最後，連婦女頭上的簪子、髮夾都被搜走了。我原來還以爲只有城裏才煉鋼呢，想不到世世代代

種莊稼的農民也煉起鋼鐵來了！公社在文莊車站附近建了煉鋼爐，隊上年輕力壯的小夥子都被調到煉鋼隊去了。

我沒有見過我們公社的煉鋼爐，也沒有見到他們煉出的鐵，但後來看到了煉鋼爐被扒倒後殘留在鐵道旁的高土堆。聽說也弄出了幾個鐵疙瘩，交到公社去了。然而那些鐵疙瘩幾年後仍然堆放在公社附近的場地上，並未被送去製造槍炮炮擊金門，打擊國民黨反動派，也沒有被用來製造火箭、衛星。

父親最感到心疼的是房子後面被“共產”掉的十幾棵大槐樹。爲了防止屋草被大風掀掉，父親在房屋後邊栽了一排槐樹。七八年的功夫，眼見得這些挺拔的槐樹長過了房子，剛能起防風作用，趕上過“電燈電話，樓上樓下”的共產主義了。我們家的槐樹樹身筆直，顯然是作電線杆的最好的材料了。人家也不打招呼，幾個人帶著大鋸，“刺刺”一上午十幾棵大樹便被放倒擡走了。父親後來知道了，面對著十幾個樹墩，臉上流露出因心疼而痛苦無奈的表情。“要砍也該說一聲嘛……”這是父親表示的反抗或不滿。

文革結束後，“右傾”、“右派”都已得到平反，併發還了他們文革中被查抄的尚存財物。然而，人民公社社員們被“共產”的所有東西，沒有一件被返還或得到任何賠償。

5．深秋寒雪

初二暑假後回校開學報到的時候，我們就發現長達兩裏路的圍牆自南至北刷上的一幅碩大紅色標語：教育爲無產階級政治服務，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這是新頒佈的教育方針。

我們的所學的科目裏增加了農業常識課，每週安排一天勞動課。逢上勞動課，有的在學校菜園裏跟著尉師傅整地、澆水、施肥

等，有的跟陳文傳老師整理校內的樹木，有的跟黃師傅放羊，大個子男生跟著馬車到火車站給廚房拉煤，還有的學生到炊事班幫廚。

當時我們的教導主任邵則峰兼任我們的農業常識課。他一邊給我們上課，一邊帶領我們種試驗田，實施課本裏講的“水、肥、土、種、密、保、工、管”的農業八字憲法。

河南省當年出盡了風頭。據他們發現，土地翻得越深，莊稼長得越好。此法得到了毛澤東的肯定，於是推而廣之。按照河南經驗，我們開始深翻土地，邊挖邊量，一直挖到一米。我們挖一層土，鋪一層肥，決心讓學校的試驗田放一顆高產衛星。

報紙上介紹的密植經驗是種子下得越多越好。有些人的想法似乎有根據：比如說，如果每畝用種子五百斤，即使一粒種子長出兩粒來，畝產就是一千斤；如果長出三粒，畝產就是一千五百斤……而當時一般的小麥實際畝產不到二百斤。邵老師還有些“保守”，只種了二百斤種子（當時每畝下種十五斤左右）。不久，麥子出土了。看著綠油油的密密麻麻的麥苗，人人都感到高興，保不准我們真要放一顆大衛星！第二年春天，麥苗越長越高了，但卻變得越來越瘦了、越來越細了，每棵麥苗像一根頭髮絲，一場雨過後，一壟壟的麥苗倒伏了。大家討論後認爲，這是缺乏日照和通風不夠造成的。爲了確保試驗成功，試驗田兩頭各支起了幾個大風箱，老師們輪流拉風箱往田裏鼓風；另外，試驗田上空架設了大功率的燈泡，通宵亮著，以增加日照。但這些措施都沒奏效，麥苗仍以不可抗拒之勢繼續倒伏。最後，陳文傳老師找來了一個割草機，給這片麥苗“理髮”。“理過發”新長出來的麥苗似乎壯了些，但稍微長高一點後，又倒了。不得已，我們只好間苗，每隔兩行拔去一行。折騰來折騰去，最後這片試驗田也只收了二百斤，剛好湊夠種子數，數不清的勞動力是白費了——那時的勞動力本來就不値錢。像我們這種情況算好的，很多試驗田根本就沒有收夠種子，或者顆粒無收。

爲了落實黨的教育方針，我們最經常的活動就是支援農業，幾乎一到農忙我們就要下去。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大學畢業。

那一個秋天，我們去城西北的一個農村呆了很長時間，任務就是幫助秋收。我們每天天不亮就要起床，白天幹一天活，晚上還要加班，夜裏就和衣睡在倉庫裏的棉花堆上。棉花蟲直往我們的臉上、脖子上、衣服上爬，鑽進我們的褲腿裏、衣袖裏，我們酣然入睡，全然不知。一天晚上，恍恍惚惚覺得自己在拾棉花的時候被尿憋極了，環顧四周，都有女生，無法方便。正在無奈之際，忽然發現不遠處有一顆枝葉茂盛的大麻籽，那裏很隱蔽，我趕緊跑過去蹲下來，往周圍看看，完全躲開了周圍同學的視線，於是解開褲子放心大尿，眼見得尿流在沙土地上刺出一個小窩窩，然後沖成個小溝溝。尿完了，我一摸屁股，完了：我剛才是在做夢，褲子、褂子的下半截和身子底下的棉花都被我尿濕透了。摸著濕漉漉的衣服我發愁了：這怎麼辦？我們都沒帶替換的衣服，天不亮就要去幹活，我如何見那些同學？他們知道了，豈不要笑死我？還有那個可惡的“四白”！我悄悄地起來，爬出倉庫。隔壁的牛屋裏亮著燈，我從外邊看進去，見兩個飼養員在烤火。我推門進去，對他們撒謊道：“大爺，我剛才不小心掉到水溝裏去了，衣服都濕了，想在這裏烤烤。”

我的謊撒得實在不高明，那股刺鼻的尿騷味會說明一切的。不過兩位大爺沒有戳破我的謊言，也沒有笑話我，熱情地說：“快進來烤吧，這樣穿著濕衣服明天咋幹活？”他們讓我脫掉褂子，幫我拿著烤；我自己一會撅屁股一會挺肚皮，前前後後烤褲子。牛屋裏彌漫著尿的蒸汽。兩位大爺一邊幫我烤衣服，一邊跟我拉家常。不大會，衣服幹了。我謝了兩位大爺，回到倉庫的棉花堆，另找一片乾地方，又睡著了。

第二天早晨我們排著隊下地，迎面碰見那兩位飼養員大爺。他們沖著我說："以後小心點，不要再掉到水溝裏！"我的臉"刷"地紅了，好在當時天還沒亮，別的同學沒有看見我的臉色，也不明白這裏面的意思，"四白"當然也沒有聽懂。

這是我一生最後一次尿"床"。

還有一次支農的經歷使我至今難忘。

深秋的一天下午，我們正在上課，突然接到緊急任務：幫助城西公社搶收紅芋。透過窗戶望出去，冷雨裹著碎雪下得正緊。如果紅芋不趕在上凍以前收進來，就會凍壞。通知就是命令。不由分說，我們立刻到教室門口站好隊，不帶任何防雨工具就跑步前往。

進入"陣地"以後，我們立刻投入戰鬥。我們把地裏刨出的紅芋裝進籃子、糞箕、水桶，或者乾脆就用一塊包袱皮包上，挎起來用小跑的速度運到倉庫。對於我們這些十幾歲的孩子來說，十來裏路的行軍已經使我們氣喘吁吁，衣服也已被淋透，雨水、汗水摻著融化的雪水順著身子往下流，濕透了的衣服緊緊地貼在身上，裹住我們的腿。雪落在地上很快變成了冰碴，我們的鞋子早已灌滿了水，一步一打滑，一步一趔趄。鞋子不時被泥水沾掉，有的同學乾脆把鞋子脫了，雙腳早就被凍麻，冰碴戳著也感覺不到疼痛。一趟一趟又一趟，我們就這樣頂著風冒著雪，不知道用了多少個來回，當我們終於把地裏的紅芋全部運到倉庫時，已經夜色朦朧，我們也早已人困馬乏，又冷又餓，疲憊不堪。

完成任務後，我們又馬不停蹄地跑回學校。此時，我們個個成了落湯雞。學校通知當天晚上不上晚自習。伙房裏給我們準備了薑湯，我們每人喝了幾碗薑湯，脫下身上的濕衣，鑽進被窩。被窩從來沒有像那天晚上那麼暖和，那晚的覺也睡得特別香甜。

頻繁的支農間斷地進行著。我們的初二年級過去了，轟轟烈烈、熱火朝天地過去了。但事後我們都悵然若有所失：我們那一整年好像沒上多少課，沒學到什麼東西。

6・好景不長

爲了響應“以鋼爲綱，大辦工業”的號召，一九五八年的冬天，二哥和村裏另外一些年輕人被抽到蚌埠煉焦廠去了，後來又轉到淮南煤礦。二哥變成工人了，我很高興，心裏想他能年輕而有所爲，離開農村開始一種新的生活了。但時間不長，到了一九五九年的春天，他們都紛紛回來了，或是因爲這些大躍進時代匆匆上馬的廠子不久就垮了，或是因爲挨不了那個饑餓。“一開始在煉焦廠的時候，米飯饅頭盡吃，就是太苦，天天晚上加班，累得受不了。後來……後來就光……光喝稀的了，還要加夜班，誰……誰能受得了？”二哥在回憶這段生活時說。但不知是後悔還是別的什麼原因，講到後一段就顯得有點底氣不足，因爲他這一回，直到他五十七歲時去世，雖然他作過無數次掙紮，雖然他無數次試圖離開這片土地從而改變自己的命運，都失敗了，他以後再也沒有機會離開這個小套子，而且等待他的是更加嚴重的勞累、饑餓和疾病。一九五九年的冬天，在興修農田水利的熱潮中，他不得不隨著村裏其他的年輕人一起上了工地，餓著肚子去幹那些對他來說力不勝任的諸如挖土、推車、挑泥等極其繁重的勞動，而且在勞動中傷了腳踝，並一直把這個殘疾帶入墳墓。但所幸的是他倖免於後來的那場使五十七人喪生的大事故。

那些年頭，每年冬天社員們都要被集中起來興修水利。在水利工地上，按公社、連隊、生產隊劃分地段確定任務，民工自帶被褥，生產隊集體帶口糧，帶著大鍋蒸籠和一應炊事用具，在河邊選點安

營紮寨。搭好庵篷支起大鍋，鋪上麥草，就成了民工的家，他們在這裏吃飯也在這裏睡覺。工地上放眼望去，紅旗招展，人頭攢動，蔚爲壯觀。那年冬天，興修水利的大軍集中到安徽宿縣城北開挖新汴河。爲了減少熱量消耗，民工們常常躺到河邊曬太陽。

好容易熬到了回家過年的時候，碭山縣曹莊公社黃莊寨大隊的民工們高高興興地卷起鋪蓋、收拾好行李準備回家過年。爲了歡送這些水利大軍，上面還專門安排了“專列”，不過是悶罐車而已——那年頭鐵道上跑的很多客車都是這種悶罐車，何況民工用車！民工們已經感到很滿足了。爲了劃清階級界限，他們沒有讓一個“地主羔子”享受這種待遇，叫他自己想辦法回家。他們在車廂裏鋪上麥草，扯開被褥，放開勞累了一個冬天的身子，隨著火車“咣咣蕩蕩”的有節奏的聲音，在溫和的煤油吊燈的昏黃燈光下，美美地進入了夢鄉。爲了安全，也爲了保暖，鐵門被從外邊用鐵絲擰死。

突然，掛煤油吊燈的鐵絲斷了，吊燈“砰”的一聲摔掉在鐵皮車底上，濺灑的煤油立刻引燃了大火。酣睡的人們仍然在甜美的夢鄉裏，醒來的時候，他們已被大火吞噬，不辨方向。司機全然不知後面車廂裏發生的事，繼續拉著車向前飛奔。拉動的風助長了火勢，瞬間事態不可收拾。被鐵絲擰死的門把他們緊緊困在那十幾平方米的車廂裏，他們的被褥被燒著了，衣服被燒著了，皮肉被燒著了……燃燒不知進行了多長時間，司機才發現情況，但中途沒有消防條件，只好風馳電掣加快速度趕往大站。風勢又加大了火威，待到火車到蕭縣車站停住時，厚厚的車廂鐵皮已被燒紅。他們擰開了鐵門，裏邊橫七豎八地躺著五十七個小炭棍，無法分清張三李四。

這是整個一個生產大隊的壯勞力。事後，這個大隊幾乎成了寡婦大隊，有的一家燒死爺兩個、爺三個或弟兄兩個弟兄三個。全大隊沈浸在無可名狀的的悲哀中，父母失去了兒子，妻子失去了丈夫，孩子失去了父親……相信自己的孩子也在那一堆炭棍裏，那家地主

也和全村人一樣在哭天喊地，這時他們的兒子卻背著小鋪蓋卷回來了！

“你怎麼又活了？”“地主羔子”的娘不相信站在自己面前的兒子。

“娘，你想叫我死？！”“地主羔子”愣頭愣腦地說。他被眼前的景象和村裏籠罩的哀哭聲弄迷糊了——他根本不知道車上發生的一切。

禍兮福所倚。他哪裏想到他的“黑五類”成分使他躲過一大劫難！

四十年過去，這起塵封的鐵路特大事故已經漸漸淡出人們的記憶，只有《碭山縣誌》的“大事記”裏保留著如下四十五個字的記錄：（1968 年）11 月本縣挖新汴河民工回歸途中，在符夾鐵路蕭縣段因火車失火，曹莊公社黃莊寨大隊民工被燒死 57 人。

到了一九五八年的年底，學校裏也不能“放開肚皮吃飯”了，我們開始定量，而且伙食標準降低了，由原來的每月三十六斤變成了二十八斤，而且供應的品種所含熱量越來越低，原來的白麵饅頭早逐漸演變成黃面（玉米麵）、黑面（紅芋片面）窩窩頭，我們的饃饃越來越小了，糧食更少了，多是紅芋和紅芋製品，有時乾脆就是蒸熟的紅芋片。至於蔬菜，白菜水、蘿蔔湯而已。開飯的時候，由值日生把這一個班的飯食用大籠擡到班裏去，值日生再分到每一個人的碗裏去。

農村情況更糟。由於高指標導致的高徵購，農村的公共食堂開始斷糧。進入一九五九年，情況每況愈下。食堂裏供應的儘是爛紅芋頭、紅芋尾巴，甚至紅芋滕子、紅芋葉子。有歌謠說：紅芋菜，紅芋饃，離了紅芋不能活。加之社員家裏的炊具被收光，無法另外

開小竈貼補，年老體弱者開始出現浮腫，而後慢慢死去。不正常死亡像瘟疫一樣從一九五九年的春天就開始蔓延了。

那年四五月份，我們在城南的一個“稻改”試點公社幫助插秧，白天在泥裏水裏泡一天，晚上男女生分別睡在兩個破磚窯洞裏。那正是青黃不接的時候，一天三餐都是菜窩窩頭加野菜稀飯。一天中午，我們剛吃過午飯，學校裏來了兩個大個子男同學，他們跟帶隊的老師說了些什麼之後，就把翟素霞帶走了。後來我們被告知，翟素霞的母親剛剛死了，學校通知她回家奔喪。望著她夾在兩個高個頭男同學之間漸漸遠去的矮小背影，我心裏十分難過，十分擔心：這只小燕子能夠經得起這猛烈的暴風雨嗎？畢竟，我對她一直懷著朦朧的愛意。

我們支農返校後翟素霞也奔喪回來了。當我們又重新坐到一個桌子上的時候，我悄悄地問她家裏發生的事，她以淚洗面，哽咽著說：“你……你別……別問了……”至今我都不忍心向她進一步打聽有沒有給母親弄一副棺材？她的哥哥是否回來了？誰給他們操辦的喪葬？……

我們的“四白”開始變得沈默了，我們聽不到她的笑聲了。

看見我的好友翟素霞失魂落魄的樣子，我傻傻地想：她沒有了爹，又死了娘，沒爹沒娘的孩子心裏是啥味？往後怎麼活呀？……

想不到一年後這樣的厄運就降臨到我的頭上。

7．挖地三尺

一九五九年的秋天，我的初三開始了。

將近兩個月的暑假後，我和翟素霞又坐到一塊來了。當我帶著憐憫的心情問及翟素霞假期裏生活的時候，她告訴我，她的母親去世後，爲了照顧她這個小妹妹，爲了讓她還有一個家，大姐便和姐

夫住進了她家。這樣，雖然清苦，雖然淒涼，翟素霞和姐姐、姐夫相偎相依，她的思想上還有一個寄託，精神上還有一個支柱。從那時起，我對這個失去雙親的小妹妹多了一份憐惜和關愛。

一九五九年的十月一日是國慶十周年紀念日。我們學校舉行了慶祝活動。入團儀式是多項慶祝活動的一項。我在這次全校性的入團儀式上和爲數不多的其他同學一起，站在舞臺上舉起了雙手，虔誠地宣誓表示“自願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作中國共產黨的助手和後備軍，爲共產主義奮鬥終生”。後來，我又動員並介紹翟素霞入了團。她雖然已遭受了喪母的不幸，但幼稚的心靈裏仍然對共產主義充滿著幻想。至今，她的檔案裏還保存著我這位“入團介紹人”的名字。

大躍進時，河南省放了一顆接一顆的高產衛星。但是，這並沒有給河南人民帶來福音，河南的大饑荒反而提前到來了。

一九五九年的秋天，學校要給我們初三的學生進行一次 X 光胸透檢查，而當時的碭山縣沒有一台 X 光機，我們坐火車去了河南的商丘。中午，我們到飯店吃飯。當時的飯店只供應紅芋片面做成的饃饃和白菜湯，我們都沒有買菜湯，也沒有坐座位，只用全國通用糧票買了兩個黑饃饃站在飯店門口吃。我剛吃了兩口，冷不防從旁邊竄過一個男子來，奪了我手中的饃就跑。我趕緊隨後去追，那男子見我追，對著饃饃“噗噗”吐了兩口唾沫。我只好作罷——即使奪回來，饃已經沒法吃了。後來得知，許多同學的饃饃都被搶了。

我們的口糧標準又開始下降了，降到只有二十三斤半。我們開始餓肚子，女同學也沒有餘額讓給大個子男同學了。早些時候有些同學還可以從家裏背來點吃的貼補貼補，到了下半年家家戶戶都開始鬧饑荒。有的同學耐不了饑餓，想退學，但退了學就連管飯的地

方也沒有了，在學校裏雖然吃不飽，畢竟還有供應，而農村的公共食堂裏快要斷頓了。

我們食堂裏偶爾有一種加餐：飥 湯。那是一種用少許豬肉放在大鍋裏長時間大火煮，煮到肉塊化成肉絲，再添上一滿鍋水、加上少許菜葉、胡椒粉燒制而成的。我們班的生活委員潘振海是炊事班長的弟弟，因此我們總能在第一時間得到加餐的消息。每逢此時，一個上午我們都盼著下課，值日生也早早地準備好擡飯桶的杠子。第四節課下課鈴一響，幾個值日生便飛也似的奔向大伙房。

我們眼巴巴地看著值日生分湯，舀到自己碗裏一根較粗的肉絲會給自己帶來一陣欣喜。吃飯的時候，我們反復貪婪地咀嚼喝到嘴裏的肉絲，久久不願下嚥。每逢此時，我們便想起了伏契克在《二六七號牢房》裏所描述的星期肉菜湯……

逢到節日的時候，我們也吃丸子。炊事員先把麵粉和著剁碎的蘿蔔、青菜等拌成粘稠的糊狀物，用手抓起一把攥緊從拇指和食指握成的小圈裏擠出圓圓的杏核大小一團，丟進沸騰的油裏，炸熟了用鐵笊籬撈出來便成了丸子。那時，肚裏油水太少，油特別能刺激我們的嗅覺、提升我們的胃口並增加我們的熱量。值日生按個分給我們，比如，先每人分六個，分過後如果桶裏還有多餘的，數一數還有多少，假如下餘的還夠每人一個，再給每人多加一個；要是沒有分夠，那麼，對不起，還得從大家的碗裏往外勻。那時心裏的滋味遠遠不如第一種情況。我們的丸子往往捨不得一頓吃完，常留下幾個用紙包好放在書桌裏，這樣自己便可以時常聞到丸子的香味，有時忍不住咬下幾個尖尖，過過饞癮。

我們菜園裏的菜常常遭到周邊餓極了的社員偷竊。爲了保護我們自己的勞動成果和補充食品，學校讓我們晚上輪流值班看護菜園。但這卻給了我們一次監守自盜塞飽肚皮的好機會。當上一班的同學把下一班的同學從睡夢中叫醒的時候，我們便揉揉眼皮，很快

跑到菜園鑽進菜行裏，獵取可口的東西。夏天的時候，番茄、黃瓜當然是我們的首選。但要是輪到值第二班、第三班，成熟的番茄、黃瓜已經被第一班的同學吃光，剩下的只有嫩番茄和茄妞子（未長成形的茄子）。但它們也可以塡飽肚皮，我們照吃不誤。這些東西酸得倒牙，夜裏只顧往肚子裏塞，到了第二天早上吃飯的時候，牙齒痛得連饃也不能嚼了。到了秋天，番茄園裏就沒有這些可口的菜了，我們只有吃辣蘿蔔、胡蘿蔔和經了霜的茄子、冬瓜。那時也講不得衛生，拔起一棵蘿蔔，稍微用草葉擦一擦，就大口大口地吃起來了。茄子和冬瓜本來是不可以生吃的東西，但總沒有毒，而且比農村裏吃的草根、樹皮要強得多。對這一切，人人心照不宣，而且一切按序就班地進行，無論班長、團支部書記，無論男生女生，個個如此——饑餓的感覺和饑餓使人產生的欲望是共同的。

農村裏情況更慘，公共食堂已經沒有糧食，開始吃草根、樹皮。儘管如此，上邊還在逐級下壓催著要糧，不僅口糧沒有了，連種子糧、飼料也全部上交了。幹部爲了完成任務，必須把社員家裏的糧食搜光。於是，大抄檢開始了。由生產隊長和積極分子組成的抄檢隊手持鋼釺挨家挨戶搜查，床底下、草堆裏，甚至櫥櫃、雞窩都要翻遍，可疑的地方就用鋼釺通一通，犄角旮旯也不能倖免，最荒唐可笑的是他們連廁所都不放過：他們要看看你解的大便裏有沒有沒有消化的糧食粒。

有一次家裏搬地鋪的時候，從麥草裏抖出一小把麥粒來。母親毫不猶豫地抓起撒給雞吃。我很感奇怪：那時大家都在挨餓，人人視糧如命，怎麼還捨得拿著麥粒喂雞呢？母親見我疑惑，告訴我說：“家裏有糧食也沒法吃，沒有磨，只有整煮麥粒吃，這樣屙出來還是整麥粒。隊裏天天派人到各家茅廁裏收糞，要是起糞的看見誰家茅廁裏的大便裏頭有整糧食粒，他們就要報告隊長，這樣你就得挨鬥。爲一把糧食遭罪不値，還不如喂雞了。”

大抄檢的最後一道工序是挖地三尺。抄檢隊對屋裏屋外所有地面仔細觀察，只要見到凸起的部分或是新鮮鬆動的地塊，就用鋼釺把地面掘開，仔細扒拉土粒。抄檢完畢，他們揚長而去，全然不顧被翻得狼藉滿地的器物、亂草。

這是我家第三次被抄家，而且這一次比前兩次都來得徹底、無情，更讓父親傷心。當我那年冬天回家的時候，父親曾經有過的笑容徹底消失了，他臉上流露出的是無奈、絕望、淒苦的複雜表情。他不理解：這就是幹部們天天還在宣傳的無比美好的共產主義？

那一年春天，我的第三個小侄女出生了。這個孩子的出生沒有給父親和全家帶來添丁加口的歡樂，反而增加了父親的憂愁。嫂子一天三頓吃的紅芋藤、紅芋葉，哪裏會有奶水？所以這個孩子從一下生就因爲缺奶而白天黑夜不停地哭。有時候，偶爾弄一塊好紅芋，便用牙齒紮碎抹進她嘴裏，這能使她稍微止住一會哭。但不久，她的哭聲又起來了，這哭聲常攪得父親徹夜不眠。

晁錯《論積貯疏》雲：饑不得食，寒不得衣，雖慈母亦難保其子。彭捷老師給我講了發生在他的老家安徽宿縣欄杆的一個真實故事：

一個生不逢時的孩子在那個年頭出生了，動物的本能使他一天到晚吮吸母親的乳頭。但母親早已沒有奶水，孩子便拼命咬嚼母親的乳頭，儘管母親疼得咬牙，儘管乳頭周圍被嚼出了血、留下一圈傷疤，孩子還是因爲吸不到奶而大聲啼哭，而且愈是吸不到奶，孩子愈是拼命咬嚼母親的乳頭。日復一日，母親疼痛難忍。她知道自己實在無法養活這個孩子，也不忍心眼睜睜地看著自己生出來的孩子在自己面前生生餓死，於是在一個嚴寒的冬天，她把孩子抱到河邊，砸開冰凌，咬咬牙眼睛一閉把孩子送進冰窟窿，狠狠心揚長離開。走了一段路之後，母親又回頭了：她不能把孩子丟在這裏，那畢竟是她身上掉下來的肉。孩子已被凍死，她把孩子撈出來，抱到

村邊的一塊麥地裏，一把鼻涕一把淚邊哭邊用手扒出一個土坑，再一把土一把土把孩子的小屍體掩埋好。

8．“左”“右”爲難

1959 年的廬山會議，由於彭大將軍的萬言書觸怒了龍顏，引發了一場大規模的至上而下的全國範圍的“反右傾運動”。因爲毛澤東斷言：“右傾機會主義分子中央有，地方也有。”

當時我們唐寨公社的書記是梁學孔。在大躍進的熱浪中，各公社爭放衛星。碭山縣的六個大公社中，兩個公社報小麥畝產指標一千斤，一個公社報八百斤，另兩個公社報五百斤，而梁學孔報了三百斤。按照這個指標計算，整個碭山縣的“餘糧”徵收任務是一億斤。唐寨公社不僅沒有“餘糧”可交，還需要供應五百萬斤口糧！回憶到這一段時，梁學孔說：“報三百斤，我已經心虛了，因爲當時的實際小麥最高畝產量不到二百斤。將來餓死了人、餓死了牲畜，我負不了這個責任。看見面黃肌瘦的孩子向娘要饃吃，當娘的又拿不出饃來給孩子吃，我這個當書記的心裏就感到難過。”

一九五八年大煉鋼鐵的時候，上級號召收繳社員的鐵鍋。身爲公社書記，梁學孔十分矛盾，既不敢對抗上級，又不忍讓社員受苦，於是委婉地對正在砸鍋的幹部說：“那種四張子鍋（最小號的鍋），砸不了幾兩鐵，給社員一家留一口吧。這樣從食堂領來的飯涼了，能在家熱熱，有人害了病，也能燒口開水喝。”此後推而廣之，全公社每戶給留一口小鍋。

到了一九五九年，公共食堂的各種弊病都表現出來了：管理無計畫、浪費糧食、幹部多吃多占。於是，梁學孔向縣委書記劉欽鑒報告了公共食堂的問題，提出解散食堂的五大好處，建議把社員的

口糧分到戶，由社員自己安排生活，這樣既有利於社員自救，也避免了幹部多吃多占導致的幹群關係惡化。

十月份，中共中央關於處理彭德懷的文件傳達到縣裏。梁學孔在思想上與彭德懷對了對號，預感到自己這次運動在劫難逃。當通知他到縣裏開會時，梁學孔料到自己有去無回，便把手槍交給秘書，心情沈重地說：“我這次去，恐怕難能回來。如果組織上來人要槍，你就交給他們。”然後又把身上的一件軍大衣交給同事陳洪真，說：“咱們同事一場，沒別的送你，這件大衣留給你，天冷了白天可以穿，晚上蓋在被子上壓風擋寒。”

到了縣上，果不出其所料，領導要他交出武器，緊接著要他做檢查，接受批判。梁學孔在唐寨的一些舉措，條條上綱上線：低報產量是反對大躍進，給社員留小鍋是反對大煉鋼鐵，解散公共食堂就是反對人民公社，其錯誤性質與彭德懷一樣，於是，梁學孔被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他當時是縣委委員，兼任團縣委書記），不大不小的一頂帽子扣到了他的頭上：“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然後把他發配到黃樓農場去勞動。

一位老師對一九五九年的糧票和布票供應標準說了句俏皮話：大肚彌勒只吃二十三斤半，丈二金身僅穿一尺三。被別人反映給領導。領導結合該老師大煉鋼鐵時不積極，曾偷著回宿舍睡覺，組織批判了他，最後也給他定爲“右傾機會主義分子”。

我妻子的本家爺爺王恩行一九五九年在唐寨公社擔任分管水利的委員。曾希聖下令進行“稻改”時，王恩行說：“種水稻要有水，咱們這裏沒有水稻子怎麼長呢？”被認爲是典型的“右傾”。安徽在中央劃右派、右傾的標準之外，另有一條：反對省裏強制推行的農業“三改”（其一就是稻改）。批判他的人說：“能收稻子收稻

子，不能收稻子收稻桔，收不到稻桔收思想。”。結果，王恩行也被發配到本縣的黃樓農場勞改。

在農業常識課上，我們的邵主任給我們算過一筆賬：報紙上說廣西環江縣全國最大的水稻高產衛星是畝產十三萬零四百三十四斤，如果用當時糧站通用的洋面口袋裝，每袋裝四十五斤，可以裝兩千八百九十八袋半，即使把這兩千八百九十八口袋稻子平放到一畝地裏都鋪不下，那麼水稻是怎麼長的？後來就因爲這幾句大實話，被打成了“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成了我們學校的“小彭德懷”，教務主任也給撤了。

四十年後，我讀到了當年環江縣縣委副書記、縣長王定發表在《南方週末》的文章《廣西環江曾放最大衛星水稻畝產竟達十三萬斤》。文章披露了當時新任縣委書記洪華採用並蔸、團團轉重複過秤等手段精心策劃放出天下最大水稻高產衛星的全過程。大衛星帶來高徵購。上級給環江下達了七千一百萬斤徵購糧任務，是上年實際完成任務的四點八倍。洪華得到了提拔升遷，然而，環江縣在那一場災難中卻死去五萬多農民。

據一九六二年甄別平反時的統計，被重點批判和劃爲“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幹部和黨員有三百幾十萬人之多，還有很多人被定爲“階級異己分子”。《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一書記載，全國被定爲“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和“階級異己分子”的幹部共有六百多萬人，他們都受到了撤銷職務、留黨察看、開除黨籍等各種黨紀、政紀處分，被列爲重點批判對象的群眾也受到了圍攻批判和其他形式的打擊。

經過了反右派和反右傾運動，上千萬說了些真話的幹部、知識份子被打倒，被戴上了“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右派分子”的帽子，堅持原則、敢講真話的人越來越少，人心惟危，於是萬馬齊喑

輿論一律，“逢人只說三分話，不可全拋一片心”、見人三緘其口成了人人心照不宣的做人原則。這爲後來把“大躍進”推向高潮掃清了障礙，更爲後來慘絕人寰的大災難的發生打開了“潘多拉盒子”。

9・過年

一九六〇年，我們的人民共和國進入了共產黨領導的第十一個年頭。

這年的一月一日，《人民日報》發表了題爲《展望 60 年代》的元旦社論，用激昂慷慨的言詞向人民陳述了在過去的一年裏所取得的輝煌成就，宣佈已經實現了提前三年完成第二個五年計劃的號召，繼續向人民描繪著共產主義的無比光輝燦爛的前景，重複著“感英超美”的口號和“東風一定壓倒西風”、“敵人一天天爛下去，我們一天天好起來”的理論，最後說：“我們不僅對於 1960 年的繼續躍進和更好的躍進，充滿了信心，而且對整個 60 年代的繼續躍進，也充滿了信心。”第二天，即一月二日《人民日報》再發題爲《開門紅、滿堂紅、紅到底》的社論。“大躍進”的熱浪仍然在膨脹著。

我那時在碭山中學面北的一個陰冷的教室裏讀初中三年級。我們饑腸轆轆地學習著這些社論，幼稚地憧憬著美好的共產主義明天。

不知是爲了給我們初三畢業年級加班加點，還是別的什麼原因，只給我們三天寒假。放假的時候，已到了年三十。天剛剛下過一場大雪。吃過早飯，我們一群十幾歲的學生高高興興地踏上回家的路。初升的太陽照在地面的殘雪上發出刺眼的光，冰茬在腳下發出“喀嚓喀嚓”聲。我們一路上說著笑著——對我們來說，能回家見到父母，能和家人一起過年總是高興的。我是那一群中年齡最小

的，最耽於幻想，腦子裏想著兒時過年時的歡樂，不由得加快了步伐。

到家門口的時候，聽見刀剁在案板上發出的“啪啪”的聲音，我心裏一陣驚喜：這不是我所熟悉的剁餃子餡的聲音嗎？今年還照樣能吃上餃子！

進到門裏我一眼看見滿案板的紅芋葉子。父親、母親看見了我，說了聲：“三兒回來了。”全然沒有以往見到兒子從外地回家過年的高興，家裏的其他人見到我也是一種木然的表情。

中飯——大年三十的午飯是一大鍋紅芋葉子，夾雜著星星點點的幾個黃豆粒。全家每人一大碗，個個默默地津津有味地吃著，偶爾吃到一顆黃豆粒，像是吃到一塊肥肉，在嘴裏貪戀地反復地咀嚼，久久不捨得下嚥。

後來母親告訴我，家家戶戶的糧食都早被搜乾了，鍋也早在大煉鋼鐵時給收走了，村幹部只要看到誰家冒煙，就跑到你家裏來搜糧食，家家戶戶只有偷偷地煮紅芋葉子和野菜。自家紅芋葉子裏的那幾粒黃豆是從豆稭裏抖出來的。

下午是在饑餓、寒冷和沈默中度過的。整個村子籠罩在令人壓抑的死寂裏，完全沒有任何節日的氣氛，沒有孩子們的嬉戲，沒有大人們張羅過年時臉上流露的歡樂，有的只是淒涼和寂靜，好像大家都在默默地等待著一場大災難的降臨，在饑餓與不安中聽天由命坐以待斃。

晚上——大年除夕——沒有飯。這些日子人們早已習慣了一天兩頓飯。我們這裏流行著一句話：人是一盤磨，睡倒就不餓。所以，天還沒黑，爲了減少能量的消耗，人們便早早地上床，在床上饑腸轆轆地熬過漫長的寒夜，心裏盤算著明天哪裏能夠弄到點什麼吃的。但是，明天，明天會給他們帶來什麼呢？人們便這樣一天天地熬著，挨著，默默地等待著。幾千萬人便是在這樣的等待中死去的，

他們始終沒有等到進入共產主義的天堂，反而先作了餓死鬼，下了地獄。

外面，沒有月亮，沒有燈光，沒有過年的喧囂，只有無邊的黑暗裹著的死一般的寂靜。

“開會了！”突然暗夜裏傳來一聲厲叫。因爲靜，這聲音顯得格外刺耳，乃至令人爲之震顫。“開會了！開會了！”又是接連兩聲劃破夜空的厲叫。

父親即刻起身下床，說聲：“我去。”

嫂子央求地說：“我去吧？”

“不，我去。”父親堅決地說，一邊用布帶子紮緊舊長袍，一邊一瘸一拐地踏出了屋門。父親有裂腳的毛病，一到冷天，雙腳縱横開裂出條條口子，鮮血從裂口裏流出，粘住襪子，常痛得他不能走路。

地主祁老化的房子分給了窮人，祁家大院成了套南村四個隊鬥爭社員追逼糧食的大會場。

母親告訴我，連幹部帶著幾個積極分子天天晚上開會鬥人要糧食。這幾天正鬥前院的歐四奶奶，七十多歲的小腳老媽媽，叫人家站到桌子上，每只手托著一塊磚頭，還要雙胳膊架平，叫“架飛機”。老人家哪能撐得住？“撲騰”一聲從桌子上摔下來。那些村幹部和積極分子不但不拉，還用腳踢她，說她是裝的。

幹部們和積極分子先排好鬥爭的對象，開會的時候，幹部把事先安排好的對象喊出來，叫他（她）站在兩排人中間，讓兩排人互相推來搡去，擠壓被鬥者。面前的一排人先把被鬥者推過去，背後的一排人馬上反推過來，並抱怨說：“你們擠我幹啥？”面前的一排人再推過來，反問：“誰推你啦？”背後的一排人又推過去，又說：“就是你們推的！”面前的一排人第三次推過去，說：“就是你們推的！”背後的一排人第三次反推回來……如是反復推來搡去

擠來壓去，被鬥者早已不堪忍受，然後胡亂供出一個所謂藏糧的地方。村幹部於是帶人到被鬥者說出的地方搜糧，當他們無功而返時，被鬥者又會因爲“撒謊、不老實”再遭受一場鬥爭。至於結果，除了更多的人死於非命之外，是弄不到一粒糧食的——那時，地皮已早被刮了三尺了。

參加這樣的會議，無異於接受一次酷刑，此舉也是連幹部“殺雞給猴看”，讓其餘的與會者看一看，想一想，趕緊“供出”“藏糧地點”，否則，不知道哪一天你也會成爲被鬥者。所以一聽見喊開會，社員們就嚇得發抖。父親怕嚇著嫂子和家裏其他人，逢有人喊開會，誰也不讓去，都是拖著佈滿裂口的雙腳自己去。每天會上鬥了誰，怎麼鬥的，父親對家裏人也絕口不談。

我的叔叔就是這個鬧劇的犧牲者。

整個的過程中，連長——鬧劇的導演——在旁觀著、欣賞著。後來聽說各地的幹部都使用著相同的方法在不同的地方導演著同樣的鬧劇。

賈斯柏.貝克（Jasper Becker）在《餓鬼》一書中說：“曾希聖迫使各級都創造他提出的目標。爲了層層落實高指標，地方各級黨的領導在省裏開會時，被關在會議室裏長達數星期，直到哪位領導點頭應允了當地的高目標，才獲准放行走人。”

上有好者，下必甚焉。

肖冬連等寫的《求索中國——文革前十年史》說，“一時間，全（河南）省上下都籠罩在陰霾的恐怖氣氛之中”。從1959年11月至1960年7月，信陽地區爲追逼糧食，正式由公安機關逮捕的人數就達1774人，其中36人死於獄中；短期拘留的達10720人，死在拘留所的667人。中共中央在信陽地委的報告《整風運動，重建公社，組織生產和救災工作》所加導言中稱：信陽事件已經不能用集體殘殺來形容，而是不折不扣的“大屠殺”。

由此可見，為追逼糧食鬥爭、打罵社員和“右傾”的幹部已經不是某一個地區的事，只不過有輕重的程度的差別而已。

王惠行是王恩行的弟弟，當時擔任大隊幹部。他告訴我：一九五九年的春天，全唐寨公社生產隊以上的幹部集中在文莊開了二十天的會議，叫幹部報產量。上面的要求是畝產兩千斤。那個時候，一年麥豆兩茬的產量只有三百來斤。幹部們知道達不到，最後以紅芋的產量一斤抵一斤算，還是達不到。凡是在會上報得低的，就遭到批鬥。所採用的方法除了上面所描述的擠、推、壓外，還有一種叫做“火車壓油”的酷刑：把會場搬到火車站鐵路旁，命令被鬥者趴在鐵軌上，讓別人層層往他身上壓。這種辦法足以把人的腸子擠出來，直到被鬥者叫饒，產量加碼為止。散了會，幹部就用這些方法整社員。不過村裏沒有鐵軌，沒法使用“火車壓油”。

彭捷老師告訴我一件實例。為追逼糧食，很多地方吊打社員。一位婦女在被吊打的時候，突然褲子滑落，當時一般的農民沒有內褲，露出赤裸裸的身子。與會的群眾目不忍視，趕緊低下頭閉上眼，但幹部仍然不讓放下來，繼續吊打……

在層層逼迫下，從生產隊長到大隊長、到公社黨委、縣委、地委、然後到省委書記曾希聖，經過多次重複加碼上報，最後編織成一個彌天大謊，謊言的金字塔就這樣被造了起來。安徽的穀物產量從最好年成的畝產六百六十斤被誇大成兩萬九千四百斤。（見《餓鬼》201頁）

那時的幹部擁有絕對的生殺大權。如果有人得罪了他們，或者並不因為什麼就是連長、隊長對你看不慣了，他們張口便罵，擡手就打，隨便決定開會鬥你，最厲害的一招是命令食堂不給你飯吃，他們慣用的語言是“停你的夥”或“不給你吃了”，而那時的“停夥”無異於今天的“判處死刑，立即執行”。雖然每人的食堂的供

應定量只有一兩八錢，但這一兩八錢的供應可以使他們維持著生命而暫時不死，只是“判處死刑，緩期執行”；一旦被停夥，就等於生命線被切斷，就等於“立即執行”。所以村裏或生產隊裏的大小幹部就可以耀武揚威，吆三喝四，而一些人也就願意跟在他們屁股後面團團轉，成爲其“積極分子”，幹部要說鬥誰自然更容易了。爲了防止本村人鬥本村人“打不開情面”，對幹部實行互換。比如，我們的大隊長張善合就是油坊村的，我們四隊的隊長趙子科則是從光明大隊調來的。

這些“積極分子”事後能得到什麼呢？一碗麵糊或一個穇子窩頭，如此而已。事情發展到極端，便會扭曲乃至異化人性。極度的饑餓是一個控制不住的魔鬼，它使得無數的人喪失了人性，滋生了獸性。所以，那時父子不相顧乃至易子而食是不足爲怪的了。

“那時村裏的的幹部沒有一點良心，”劉以臣嬸子在二〇〇六年秋天給我敍述當年的情況時說，“我看見他們天天在會上鬥人要糧食，害怕鬥到自己身上。當時我在磨盤地下藏了七八斤豆子，琢磨著交給他們一點吧，免得挨鬥。我就給杜XX說了，哪知道姓杜的來到我們家，連口袋一起提走了，一粒都不給我留下！……什麼時候想起這件事來，我什麼時候惱得慌。他們的良心都叫狗吃了！”

像劉以臣嬸子一樣，當時千千萬萬善良純樸的農民並沒有怪罪黨和國家的最高領導，他們仍然說：毛主席是英明的，上邊的政策是正確的，好經都被下邊這些歪嘴和尙念歪了。他們見到的只是本生產隊、本連隊、本大隊的幹部，因此把所有的不幸統統歸咎於村幹部，矛盾焦點也集中於幹部最原始、最低級的、但在當時最奢侈的貪污腐敗：多吃多占。

聽聽老百姓的民謠吧：

其一：社員見社員，兩眼淚漣漣，

你家斷了油，我家斷了鹽，

上大隊去借錢，叫隊長熊一盤。

其二：清早吃的加工面，中午吃的棉種蛋。

晚上喝的紅芋葉子水，都是幹部搗的鬼。

其三：八月十五炸丸子，大人仨小孩倆，幹部家屬用碗挖。

快點吃，快點搗，社員見了不得了。

其四：大幹部小幹部，穿的都是呢子褲。

呢子褲是藍的，都是坑的社員的。

社員穿的是黑的，都是勞動所得（方言讀dei，上聲）的。

其五：隊長見隊長，票子嘩嘩響，

你要買大衣，他要買大氅。

會計見會計，洋煙手裏遞。

光說不貪汙，東西哪來的？

說起當年的村幹部和積極分子，在半個世紀後的今天村民們仍恨得咬牙切齒，他們用樸素的因果報應的道理評論道：“咱們算算，那時候橫行霸道的人哪個得好了？唐XX去送朋友，路上船翻了，就淹死他一個，剩下的全沒事。還有杜XX，到年老了得了個偏癱症，在床上屙床上尿，沒有一個伺候她。她還信教呢，主也不來救她。她自己也說：‘這都是我自己作的。’那年夏天，老天爺打雷劈她，沒想到天黑打錯了門，把她鄰居家屋簷上的獸頭劈掉了。”

公元一九六〇年的春節是西曆的元月二十八日。清早我早早地醒了，肚子在嘰裏咕嚕地叫。東屋裏傳來嬰兒無力的哭聲。母親便歎氣說：“唉，這孩子是活不成了，餓得從早哭到晚。”我感覺到父親早醒了，只是躺著不動而已，默默地忍受著痛苦的煎熬。這嬰兒便是我的小侄女。她出生在一九五九年春天，直到她一年後夭亡

我也不曾見過她一面，也不知道她的名字，只聽母親喊她“小閨女”。

家裏人添丁加口都是母親起名字。大哥上面我還有兩個姐姐，都沒活到成年，所以母親直到晚年都爲自己沒有一個閨女感到遺憾。等到大哥出生了，母親出於擔心，起名“保住”。二哥生於立秋那天，母親就給他起名叫“秋”。鄉下人相信一種說法，人一生下來，他的生辰八字就決定了他的壽限和死法。不知是大限如此還是巧合，五十七年後的一九九三年的八月八日立秋，二哥也在那天走了。我的名字是順著排行叫“三兒”，不過母親一直都是叫我“三孩兒”或“孩兒”。 大侄女出生在土改不久，家裏剛分了地，母親給她起名叫“小紅”，這名字既是小姑娘的俗名，也是盼著以後的日子紅紅火火的意思。侄子出生那年是閏年，在我們當地方言裏，“閏”與“運”同音，母親就給他起名叫“運”，望著他一輩子走好運。二侄女生在一九五五年的一個大雪天，記得那天母親很高興，順口就說：“咱們就給這個小閨女起名叫‘小雪’吧！”這名字像是一個讖語，伴隨她童年的是無情的冰刀雪劍，差點死於這個凶年。對於這個生不逢時的小侄女，母親也許料定她不能長大成人，也沒有心思給她起名了。

我們都起得很晚，完全沒有過年的心境，我沒有像往年一樣給爹娘磕頭，大哥也沒有回家。聽到食堂喊“開飯了”，二哥便拎著個罐子端著個小饃筐去領飯。

這是大饑荒的第二年，上面提出的口號是“低標準，瓜菜代”。當時食堂的供應定量是每人每天一兩八錢。那時的順口溜說：一兩八錢，餓不死炊事員。除掉村幹部、積極分子和炊事員多吃多占的外，社員吃到嘴裏的恐怕不足五錢。但這個一兩八錢的定量決不是我們想像的一兩八錢的米和麵，而是芋頭幹子面或是用芋頭秧梗子、幹茅草根、幹樹葉磨成的粉。炊事員用這些東西摻和上野菜做

成窩窩頭，再用白水煮點野菜，撒上些鹽，算是湯。每天兩頓飯，一人一個小窩窩頭，另加一家一舀子湯。社員說食堂的窩窩頭“像牛眼一樣大”，把菜湯叫做“四個眼的湯”（稀的可以照見人影）。一天，生產隊派劉以臣去李莊拉磚，來回要一天的時間，臨行時他向隊長要午飯，隊長叫炊事員抓給他一把桑樹葉——那就是他的午飯。

母親歎口氣告訴我說：“您二哥叫人傷心，每次領飯回來的路上，他都在每一個饃上咬一口，罐子裏的菜湯也被他喝掉半碗。”

二哥當年二十四歲，正是最需要熱量的年齡。

母親又用紅芋葉子拌著一點什麼麵做了一鍋丸子，總算是全家過了一個年。

早飯後，我去看爺爺。爺爺已經起來了，拄著根棍子獨自站在他的小屋裏。我到他面前恭恭敬敬地給他磕了個頭——這是我給他磕的最後一個頭。

爺爺說：“起來吧，三兒。吃過飯了？”

我說：“吃過了。”

爺爺又問：“吃的什麼？”

“丸子，”我不假思索地回答。

“丸子？什麼丸子？”爺爺對在這個年頭還有丸子吃感到不解。

“紅芋葉子丸子，”我補充說。

我擡起頭來看爺爺。爺爺的臉瘦得像刀刻一樣，兩個眼角裏窩著眼屎，表明早晨起來還沒洗過臉。

“放幾天假？”爺爺問。

“三天，”我說。

然後我們好像就沒有什麼可說的的了，我便回家來了，並沒有就勢看望看望叔叔和嬸子。

我總歸是個孩子，沒有看到事情的嚴重，內心還對未來充滿希望，相信雪萊的名言：冬天來了，春天還會遠嗎？相信“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沒有熬不過的黑夜，沒有等不來的黎明。”初一的晚上，一家人在暗夜裏默默地圍坐著，沒有人說話。我打破沈默說，我們學校的教室裏安上了電棒，不再用汽燈了。我還興奮地向家裏人描述這種日光燈怎麼亮如白晝。

我的描述並沒有引起家裏人的好奇和激動。但父親卻把我的話與幹部們在會上描述的“樓上樓下電燈電話”和“耕地不用牛，點燈不用油”的共產主義聯繫了起來。他突然問我：“古時候六十歲就該活埋了。現在是不是要把老人都餓死，讓年輕人和小孩過共產主義？”

我沒有料到父親會提出這樣一個嚴肅的問題，不知如何作答。今天看起來，父親當時腦子裏已經在醞釀著死的問題了。

我在內心裏默默地企盼著春天的到來，然而春天給我們家帶來的卻是天塌地陷的災難。

10．天塌地陷

年初三吃過早飯，我便要啓程返校。由於大哥過年沒有回來，父親便出去給我借學費，我跟父親出門，母親也隨著送我到了村子中間。父親不知從誰家借來了錢，交給我，我正要動身，母親卻突然放聲哭了起來：“乖兒來，你下次回來不知還能見到你大大你娘不……”

幾天來我積壓在心裏的痛苦一下子迸發了出來，我“哇”的一聲大哭了起來。

父親一邊催我走，一邊責怪母親說：“孩子該走了，你又說這些，叫孩子難過……”

我邊哭邊用袖子擦著眼淚，一步一回頭看著爹娘，父親母親也站在村口望著我，直到我再也看不到他們、他們也不再能看見我。

然而母親的話一語成讖，一切正不幸被母親言中：這一別正是我與父親的訣別。

回到學校我們便投入了緊張的初三總復習。我們餓著肚子背有關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的政治教義，背人民公社的十大優越性……我們的早餐是用籠蒸熟的紅芋片外加一碗紅芋片麵糊，中午和晚上是一個紅芋粉面做的窩窩頭和煮的爛白菜之類。每到吃飯的時候，我就想起父母親和爺爺刀削一般的面孔，耳邊就響起小侄女的哭聲，我就無法下嚥我的那一份窩窩頭，便悄悄地掰下一塊放在我的書桌裏。三兩天後，我便吃每頓掰下來的有點發黴變質的窩窩頭塊塊而省下一個整窩窩頭。吃飯時，我都是把窩窩頭捧在手心裏吃——可能掉下來的每一小塊饃渣對我都是十分重要的。這樣，一個星期下來我就能省出三個窩窩頭來，於是兩個星期回家的時候我就可以帶六個窩窩頭回去。

那年的春天特別寒冷而漫長。數以千萬計的人沒有等到夏天，沒有等到麥子成熟，便在饑餓的煎熬中倒下去了。

我們的教室搬到了校門裏邊第一排教室的最西面的一口，緊挨著校門和傳達室。同學中不斷家裏有兇信傳來，時常聽見傳達室的王煥章喊同學接電話，不時看到哭著回家奔喪的同學從我們教室門口經過。我們每天都在惴惴不安中度過，生怕家裏來人送信或傳達室裏叫接電話。在那個時候，真的如一句英語諺語所說：No news is good news（沒有消息便是好消息）。

然而消息還是來了。一九六〇年三月七日的傍晚，我們剛剛吃過晚飯，我正蹲在教室外的走廊上刷牙，聽見王煥章的聲音："李世華，電話……"一種不祥的預兆像過電一樣傳遍全身，我的全身發顫，頭髮梢好像都豎了起來。我三步並作兩步跑進傳達室，用哆嗦的手拿起話筒，電話裏傳來大哥低沈而緩慢的聲音："咱大大沒有了，你回來一趟吧。夜裏十點鐘有一班車，我叫岳習武去李莊車站接你。"像是早有了思想準備，我沒有多問，只是邊哽咽邊"嗯、嗯"地答應著。

接完電話我已是一個淚人。同桌翟素霞得知此事，她瞪著兩隻眼呆呆地看著我，雖然已遭到喪母的打擊，一向樂觀的她好像不相信她所聽到的事，不相信同樣的不幸也會降臨到我的頭上，更不會料到更大的災難正在向她一步步走來。我趕緊找班主任趙耀久老師請了假，背上盛著我省下來的窩窩頭的小書包，借了一把油布雨傘，準備啓程回家奔喪。李樂銀、唐恩成、王明義、李恥門等幾個好友一起陪護我上了路，翟素霞沒有和他們一起，而是站在走廊下目送著我。我邊走邊哭，他們幾個同學便一路勸慰著我。走到縣城東關一家飯店門口時，他們擔心我耐不住一路的饑寒，請我吃了一頓飯——兩個紅芋麵窩窩頭和一碗稀飯。我至今不知他們中的那一位掏的錢、出的糧票。他們看著我狼吞虎嚥吃了下去，說了一串寬心的話，便與我告辭了。

到李莊車站下車的時候，已近夜裏十一點鐘，天正刮著風下著雨，雨點在站臺上的燈光中飛速地劃出一條條寒光。我一下車就四處尋找來接我的岳習武，可是這冷清清的月臺上哪裏有人影？我頂風冒雨沿著月臺邊走邊喊"岳習武"的名字，可是來來回回跑了四五趟，直到火車消失在夜空裏、提著信號燈的工人也進了站臺，月臺上只剩下我一個孤零零的孩子，我才失望地出了站。當時我還天真地想：爲什麼我沒見到岳習武？後來我逐漸悟出岳習武那天晚上

壓根兒就沒有來——雖然岳習武與我們是近鄰，但在那個年代，他哪裏有力氣跑這二十裏的夜路？

從候車室望出去，但見無邊的黑暗，不見一點亮光，雨打在地上發出“嘩嘩”的聲音。李莊車站離家還有十八裏路，在這漆黑的雨夜裏我一個人是絕對找不到回家的路的，猶豫了片刻，只好決定躲進候車室暫過一夜。我打量了一下這個候車室：屋頂上吊著一個電燈泡，在昏黃的燈光照耀下可以看見這個空蕩蕩的被稱作候車室的大屋子裏擺著七八條長座椅，牆角裏蜷縮著幾個外出逃命卻又買不到車票的農民（那時候，爲了防止“流竄”，買火車票一律憑證明），兩扇門被寒風刮得來回擺動，咣當咣當作響。

我在一條長座椅頭上坐了下來，懷裏抱著我那盛著窩窩頭的小書包，把雨傘放在一邊，開始了我一生最寒冷最漫長的一夜。我上身穿著一件夾衣，下身穿著一條單褲，光腳著一雙舊布鞋。一九六〇年三月七日按節氣剛剛過驚蟄，正是春寒濃重的時候，又遇上這個雨天，我那麼一身穿著怎麼能抵禦住寒冷？從門縫裏吹過來的冷風裏挾著刺骨的寒氣直往我褲腳裏鑽，然後順著褲筒涼徹全身，使我渾身發抖。我站起來走到門跟前想去把它關住，可是那是多年失修的破舊的門，門縫有三四指寬，怎麼也關不嚴。我轉了一圈，想找件什麼東西抵住門，但是我找遍了整個房子，也沒有找到一塊磚頭或一根棍子。我換一個遠離屋門的地方。但冷風已經把寒氣灌滿全屋，整個候車室變成了一座冰窖，躲在任何一個地方都不能避開寒冷。無奈，我隨便揀了個座位坐下，把雙膝緊緊地摟在懷裏，後背緊貼在長椅的靠背上，全身在瑟瑟發抖。

正在這時，一個人對我走過來。

“你是世華嗎？”那人問。

“是，”我說。我辨認出站在我面前的是後村的一個初小同學。

“你往哪去？”他又問。

“回家，”我答道。

“回家幹啥？”

“我大大死了，”我平靜地說。

“…………”他沒有說任何表示同情或安慰的話，可能他已目睹了村裏人的太多的死亡而變得麻木了。

“能把你的學生證借給我買張票嗎？”他突然換了個話題問。

“不能，”我很果斷地拒絕，“我剛才在碭山買票回來時已經蓋了章，我明天回去還要用。”

他什麼也沒說就回到他的牆角了。我知道他正是想外出逃命而又買不到車票的。

就在去年的春天，本村的兒時同學李忠良找我借學生證買火車票，我借給他了，但他不知在什麼地方被火車站發現了破綻，人被當作“流竄”遣送回了原籍，我的學生證被火車站扣住交給了學校，我被因“幫助流竄犯”給予記過處分。那是我一生唯一的一次不良記錄。處分的通告就貼在佈告欄裏，每經過那裏都給我一個刺激，恨無地縫可鑽。後來我申請取消，經受了幾個月的考驗，學校又在那個佈告欄裏張貼了給我取消處分的通告。

我要記住這次教訓。

我無法睡著，內心的痛苦已經被寒冷掩蓋，腦子裏空空的，只想找一塊相對暖和的地方。牆角應該好一些，我想，於是我往牆角掃視一下，但四個牆角已全部被人占滿了。如果我吃點包裏的窩窩頭肯定會給我點熱量，但我不捨得——那是我帶給母親的救命糧。我已經失去了父親，我不能再失去母親。我就那樣雙手摟住雙膝一秒鐘一秒鐘一分鐘一分鐘地挨，可是那一夜竟是那樣的漫長，那樣的寒冷，似乎黎明和太陽永遠不會來到……

窗玻璃上終於露出一點亮色。我走到門邊往外看，在暗夜裏已經可以依稀辨認出一條發白的線。我不能再在這裏等了，我要趕緊上路。我挎起書包，撐開布傘，迎著風頂著雨上了路。

自我考上中學，三年來我從這條路走過許多次，然而不知是因爲天黑還是別的什麼原因，出了火車站我竟找不到回家的路。眼前是一條未挖好的河，橫在我面前的都是挖出來一灘灘的爛泥，這顯然是去年冬天興修農田水利留下來的。眼前哪裏有路？只有深深淺淺的腳印若隱若現，我只有循著腳坑深一腳淺一腳地掙紮著往家的方向走，每一腳踩下去都濺起一股泥水。褲子早被泥水打濕，腳在灌滿了泥和水的鞋裏打滑，手裏的雨傘也隨著東倒西歪。這時我已不覺得冷，背上反被扭出些汗來。

約莫過了二十分鐘我才走出爛泥灘，這時天色也亮些了，在我面前延伸的便是我過去走熟了的路。只是全身早被雨水和汗水浸透，濕衣服緊緊地裹在身上，纏住兩腿，使我難以邁開雙腳。

姨媽家和舅舅家都在我回家的路上。我到姨媽家所在的村子的時候，她正在院子裏用簸箕簸楊樹花，顯然是想用來作食用的。看見我，姨媽放下手裏的活，放聲哭了起來，斷斷續續語無倫次地說："乖兒來，你再也見不到你大大了……你大大咋想起來走這條路？咋想起來上吊死啊？害一天的病死了，咱們也不虧……你娘糊塗，明知道他不想活了，還不看住他……好人哪，沒有比您大大再好的人了……正領家過日子，他走了，你娘咋領著你們過呀？……"

我這時才確切知道父親是上吊死的。我什麼都說不出，雙手抱著頭蹲在她老人家旁邊嗚嗚地哭。

姨媽有兩個兒子，孫兒孫女有好幾個，但空落落的院子裏我只見到姨媽一個人，可能其餘的人都外出逃命去了。

姨媽一把鼻子一把淚地哭了好一陣，然後說："走吧，孩子，他們都在等你，這家裏也沒有啥給你吃。"

我擦著淚上路繼續往家趕。再走三四裏地便到了舅舅家。

舅舅是個老繩匠，紡製犁耙、車馬、牛驢所用的粗細不等各種各類的繩子和趕牲畜的鞭子。舅舅終生未娶，終生伴著一架紡繩的車，單身一人守著一間堆滿各種繩子的小屋。逢集的時候，舅舅便雙肩搭滿繩子趕集擺攤賣繩子。入了人民公社，他就專門給大隊裏打繩子，曾經被集中到唐集大隊部旁邊的作業組居住，大隊食堂裏管他吃。現在，大隊的食堂散了，沒有人管他吃了，他只好仍舊回到自己的那間小屋。屋門後邊的角落裏支著一隻小鍋，鍋門口便是一張用繩子攀的小軟床。床的上方斜跨屋角扯著一條繩子，搭著舅舅一年四季的衣服，上面落滿了厚厚的灰塵。此時舅舅正蹲在鍋門口燒鍋，鍋裏不知煮的什麼野菜。外面下著雨，鍋門口淨是濕柴火，燃不著，舅舅正躬著腰低著頭吹火，滿屋子灌滿了嗆人的煙。那時農村裏還管火柴叫“洋火”，兩分錢一盒；也可用雞蛋換，一個雞蛋換一盒。舅舅爲了省那兩分錢或一個雞蛋，一直沿用著幾千年前我們的祖先發明的取火方式。他使勁反復地打著火石，火石發出“嚓嚓”的聲音，迸出的火花引著細竹筒裏的火枚子，再鼓起腮幫使勁吹火枚子，點燃柴火。舅舅一邊吹火，一邊“吭吭”地咳嗽。

我喊了聲：“舅。”

舅舅擡頭看見了我，說：“三兒回來了。唉，你大大沒了，唉……你娘這幾天帶著小運（我的侄子）在這裏撿爛紅芋，哪裏想到……唉，你先回去吧，我孬好吃點啥就去。唉……”

我什麼也沒有說，流著淚聽著舅舅一聲接一聲地歎氣，然後繼續往家趕。

入了村子，我的眼淚就刷刷地往下淌——這是我的父親活動了一輩子的地方，這裏的每一塊地方都留著父親的足跡，都浸著父親的汗水。

一進家門，我便放聲哭了起來：“大大，娘……”

母親從屋裏迎出來，一把鼻子一把淚地說：“我的兒啊，天塌了啊……你再也不能看見你大大了……”哥哥嫂子聞聲帶著侄兒侄女從東廂房裏哭著出來，他們都穿著孝服。全家人都在等我了。這時我看見滿屋子地上鋪滿了麥草，沖著房門放著一口“棺材”。我認出那是母親陪嫁的嫁妝，歲月的剝蝕已變得油漆斑駁的櫃櫥。父親的臉上蓋著黃表紙，身上仍然穿著那件破舊的棉長袍，因為櫃櫥太短，父親的兩隻腳露在外邊。

母親拿出早已準備好的一雙用大針腳縫了白布的孝鞋讓我穿上，又給我披上一件白孝袍，我跪倒在父親的“棺材”前的麥草地上，以頭撞地大放悲聲。全家人也隨我齊聲哭了起來。我有生以來第一次見過這樣的場面，有生以來第一次這麼悲哀。我的快樂的童年不存在了，我的曾經被人羨慕的家破碎了，我的希望徹底破滅了。先前看見那些失去父母的同學我曾經無限悲憫地想過：人沒了爹娘怎麼活呢？他們心裏該多難過呀？……現在輪到我了，我和他們一樣了，我已經像翟素霞一樣成了他們中間的一員了。但此時我只是感到失去親人的悲哀和痛苦，真正理解母親說的“天塌了”的意思還是以後的事情。

不大會兒，連長歐儒存來了。父親生前與他都是村裏的幹部，因為父親年齡比他大，凡村裏的事他都來我家與父親商量，每次進門便喊“傳先哥”，因此我們都叫他“儒存叔”。今天顯然他是來幫助辦喪事的。我趕緊跪地給他磕了個頭。

儒存叔說：“三兒回來了，你過來再見你大大一面吧。”說著，他一手拉著我從地上站起來，另一隻手掀開父親臉上的黃表紙。

我向前靠了靠，弓下身子，伸頭往“棺材”裏看。父親的臉比我一個月前上次分手的時候又瘦了很多，凸現出顴骨，嘴微微張開，兩隻眼睛緊閉著。

我知道這是我與父親的最後一面，從此以後我再也見不著我的大大了，他沒給我留下一句話，甚至連能給我們以回憶的一張照片也沒留下。我“嗚嗚”地哭著，大聲地喊著：“大大，我是三兒，您睜開眼看看我呀……”父親靜靜地躺著，一動也不動，一任我哭天喊地。我的眼淚刷刷地往下掉，白色的孝袍上濕了一大片。

儒存叔一把攔住我的頭：“往後靠靠，不能把眼淚滴到你大大臉上。”

與此同時，大哥、二哥、嫂子和侄兒侄女也一起起身與父親告別，歐儒存也一一拉他們往後靠，不叫他們把淚水滴到父親身上。當地人相信，晚輩的眼淚滴到死者身上對死者的來世不吉利。

母親用手撫摸著父親的臉，對著父親問：“我的爹啊我的娘，你睜開眼看看，看看你的兒，看看你的孫，這麼一大家子人，你就忍心這麼走了？你怎麼能合眼的？……”

這時我的舅舅來了，手裏拿著一把燒紙。

“我的兄弟，你還來幹啥？”母親哭著說。

“我來送送大哥，”說著，舅舅把手裏的燒紙放在地上點著，而後蹲在地上雙手捧著頭哭道：“我的大哥喲，我的哥……”

舅舅的哭聲又帶起了我們一片哭聲。

除我們全家外，舅舅是唯一來向父親告別的人，我的爺爺和叔叔、嬸嬸都沒有來，更不用說其他的親友鄰居，包括店裏的叔叔嬸子。他們當然都知道我們家發生的一切，但他們本人都在死亡的邊緣上掙紮著，全然顧不得別家的事了。

當時村裏已沒有年輕人，多數“流竄”到外地逃命去了，下剩的爲數不多的幾個人都被編進了“稻改隊”、“拖拉機隊”等軍事化組織而集體住在外村。也就是說，村裏連能幫助安葬父親的人都找不到了。在我們跪在麥草地上哭天喊地的時候，儒存叔就近從油坊找來了幾個年輕人，其中有岳習武、王作軍。我們當地的規矩，

自己的長輩去世了，凡是來幫忙的，不論大小長幼，孝子們都要給他們磕頭，所以人們說“孝子的頭不值錢”。我們一邊對著父親哭，一邊不時地回頭給來幫忙的人一一磕頭。

等我們都與父親告了別，儒存叔招呼我們後退，他們要封“棺”了。

此時是真正與父親永別的時刻，從今以後連面也見不著了，我們又爆發出一陣捶胸頓足的哭聲。

年輕人乒乒乓乓把承載著父親屍體的櫃櫥的門釘上，用繩子把“棺材”兩頭栓起來，再在繩子中間穿上杠子。

儒存叔招呼一聲：“發喪吧。”四個年輕人便架起“棺材”兩頭的杠子，擡了起來。一個櫥櫃加上父親幾十斤乾瘦的身軀不會很重的，四個年輕人雖然已飽受饑寒、當時可能還空著肚子也並不顯得太吃力。儒存叔招呼我們弟兄幾個和我的侄兒侄女依次排好。他走在最前面，四個年輕人擡著父親的“棺木”跟在後面，我們一行披麻戴孝、手拄裹了白紙條的柳樹棍子哭著隨在棺材後面，一邊走一邊不時地跪地磕頭。這是一隻孤立的送葬隊伍，沒有任何儀式，沒有親戚，沒有人圍觀，只有我們的哭聲和幾個年輕人踩在泥濘的路上發出的“啪噠啪噠”的腳步聲。我隨送葬的隊伍走著，心裏感到從未有過的悲哀。當我偶爾擡起頭的時候，我還看見父親露在外面的兩隻腳在“棺材”的後頭擺動。我知道，我們正在把父親送到墓穴裏去，他將永遠離我們而去，離開他終生勞作、流遍了他的汗水、佈滿了他的腳印的這片土地，離開他苦心營造的家，離開他的父親、他的兄弟，離開與他相伴了一輩子的老伴和他心疼的兒孫，他再不能在這片土地上勞作，再不能爲全家操心……

母親沒有隨我們一起給父親送葬。我們出門的時候，她獨自一個人坐在大門外臥在地上的一顆樹幹上，雙手拧著雙腿放著長聲哭：“我的爹啊……我的娘，你怎麼捨得我們的……我的爹啊，我

的娘啊，你要是生一天的病，我們也不挖屈（感到遺憾）啊……真是天塌了，我的爹啊……我的娘……”

古人說，人生有三大痛：少年喪父，中年喪妻，晚年喪子。是年，我十七周歲，正讀著初中，正需要父親的關愛，父親離我們而去，我感到痛徹心脾，而且經年曆月，這種痛苦與日俱增。但是，當時最感到傷心痛苦的應是母親。因爲母親一輩子靠父親支撐著這個家，父親是全家的棟樑，她知道，沒有了父親，她無力帶領全家度過那個凶年，她已經先我們意識到父親的死會帶來更大的災難，父親的死意味著天塌地陷，所以她反復地說“天塌了”；再者，父親在正領家過日子的年齡，沒有生一天的病而自己投繯自殺對她來說是最使她遺憾的事，一輩子令她虧心的事。

入了人民公社之後，我們再沒有屬於自己的土地，擡“棺材”的年輕人也沒有力氣把父親送到更遠的地方，所以事先他們已決定了墳地的位置：村口的高頭，昔日的防洪壩、今日的荒灘高坡上。我們一行隨著“棺材”來到這裏的時候，已有人挖好了墓穴。我們依次在墓穴前跪下後，儒存叔就吩咐下葬。我們全家一起跪在地上，拄著柳棍頭貼在地上哀哭，他們把一鍬一鍬的泥土砸在父親的“棺木”上，發出“啪嗒啪嗒”的聲音。他們是在把父親埋入地下、送到另一個世界裏去，與我們陰陽兩隔的世界。今後，我們連不能說話、閉著雙眼的父親也見不到了。

不大會兒，他們就把“棺材”埋上了。當時並沒有築起一個墳頂，不知是等三天後圓墳，還是他們沒有力氣了。按當地的規矩，死人下葬當天只是把棺材埋下地，入土爲安；三天後再築起墳頭，叫“園墳”，送親人上天。我們把柳棍插在父親墳前，一行人低著頭躬著腰緩緩地往回走，把父親一個人孤零零地留在那荒灘上……

我們回到家門口的時候，母親仍孤零零地一個人坐在門口的那根樹幹上一把鼻子一把淚地哭：“我的爹啊……我的娘，俺們以後

到……到哪裏找你去？……我的爹啊，我的娘啊，你怎麼能……能捨得這麼一大家子人的？……我的爹啊，我的娘……”村裏連個來勸慰的人也沒有。我走到母親跟前，坐在她旁邊，用兩隻手抱住她的胳膊，好像怕再失去母親似的，哭著喊道：“娘，娘啊……”

母親許是哭累了，也許是心疼我，收起哭聲止住了眼淚。她拉著我回到空蕩蕩的家，張羅著做點吃的。這時我才意識到，從昨晚七點鐘左右在縣城東關飯店那幾位同學請我吃的那頓飯後，一個漫長的寒夜加上一個上午，我已有十七、八個小時沒吃過任何東西了，其間我還走了二十裏的泥路。後來想起來我真感到奇怪：我那時對饑餓的耐受力怎麼會那麼強？生命力有時表現得那樣頑強，有時又是那樣脆弱。

午飯仍然是一大鍋紅芋葉子，裏邊已經沒有了過年時夾雜的黃豆粒。這是沒有父親的全家人吃的第一頓飯。大家都在大口地默默往嘴裏扒著碗裏的紅芋葉子，沒有人說話。沒有父親的生活就這樣開始了。

避開家裏其他人，我把從學校帶回的省下來的紅芋麵窩窩頭偷偷交給母親。家裏還有弱小的侄兒、侄女，他們都是我不願意失去的；但是在這時候，我必須盡全力保住母親——我不能再失去母親，她是我生命的依靠和支柱。

11．雪上加霜

天黑了，我們全家老小默默地圍坐在鋪滿麥草的地上，沒有點燈，也沒有人說話，等待著未知的命運。

突然，傳來一個女人的哭聲。我們又仔細聽了聽，是的，是一個女人的哭聲。

“是咱嬸子，八成咱叔不行了。聽說早幾天叫人家鬥得很厲害，還吐了血，”嫂子說。

像是一聲命令，母親立刻起身，順手拿起一把燒紙，領著大哥、嫂子、二哥和我一起去了叔叔家。果然不出嫂子所料，嬸子正在叔叔床前“我的爹啊我的娘”地哭，看見這個情況，母親也坐到在叔叔床前跟著哭了起來：“我的兄弟啊，我的好兄弟……你咋該走的？……親弟兄兩個一個頭(一)天(走)，一個第(二)天(走)……”邊哭便點燃手裏的燒紙。

我和大哥、二哥、嫂子一起跪倒在叔叔床前，抱頭痛哭：“叔啊，我的叔啊……苦命的叔……”

我們一起哭了好一陣，嬸子說：“家裏……啥也沒有，怎麼下地啊？你爺爺的棺材誰也不能用，他自己不知道哪一天……”然後，她對著大哥說：“您叔有合作社的股票，拿到大隊裏換幾個錢，看能給您叔弄個板（棺材）不……”說著，她又哭了起來。

母親勸住嬸母：“別光哭了，妹子，把東西拿出來，叫他們去大隊看看。”

嬸子拿出一個小布包，一層一層地取開，拿出幾張帶有印章的紙交給大哥。

大哥把那幾張入股的票據交給我，說：“你去一趟吧，家裏的事我來操辦。”

我不知道我要去的大隊部所在地油坊村在哪裏，我從來沒去過那裏，尤其在這個暗夜裏我更不知道往哪裏走。但在這個時候，哥哥吩咐我，我只能從命。

一出門，我便被無邊的黑暗包圍起來，天上沒有星光，家家黑燈瞎火，原來的路變成了眼前若隱若現的一條白線。我便順著這條白線，朝著大概的方向走去。我記得出村往西北方向的路邊是一條

溝，溝邊上長著一排柳樹。大躍進的時候，柳樹全被砍了，所以我稍微偏離這條白線就會掉到深溝裏去。

突然，我聽到背後“啪嗒啪嗒”的腳步聲，似乎有人不遠不近地跟著我，我快他也快，我慢他也慢。我回頭往後望，只有無邊的黑暗，哪裏有人？我再往前走，還是有“啪嗒啪嗒”的腳步聲。我小時候聽過太多的關於鬼的故事，是不是鬼呢？我的頭髮和汗毛立時都豎了起來，渾身往外冒汗。事後讀了郭沫若的《少年時代》，書裏寫道他父親月夜裏走在大山之間聽到過鬼的聲音，實際上是他自己的腳步聲在大山裏的回聲，我意識到我那晚聽到的腳步聲也一定是我自己的腳步聲。實際上，我更應該害怕的不是鬼而應該是人——倘若有人在那暗夜裏一悶棍把我打死，然後煮著吃了，怕是連兇手也找不著。

我還硬著頭皮往前走。那條白線引著我走進更加濃重的黑暗，周圍有房子和樹木的輪廓。我意識到我走進了另一個村子，那應該是魏莊。進了村子，膽子似乎大些了，但是我卻不知道該怎麼走了：面前是好幾條縱橫交錯的白線，我該順著哪條走呢？村子裏是死一般的黑暗和寂靜，既不見燈光，也不見人影，連狗叫也沒有——在那人吃人的年代，哪裏還會有狗能倖存下來呢？我無處問路，只好跟著一條較粗的白線往大約東北的方向走。穿過魏莊，眼前突然出現了一處燈光。我猜那就是油坊了。我一步一步地靠近燈光，見發出燈光的房子前面是面積很大的一個高土臺，上面蹲著一片人，個個端著碗往肚裏扒著東西，發出一片“呼嚕呼嚕”的聲音。我猜想他們是大隊和小隊的各級幹部，他們在進行著最原始的、最低級的集體貪汙腐敗：多吃多占。從那響亮的“呼嚕呼嚕”聲裏，我斷定他們也是很餓的，不然他們也不至於偷偷摸摸地在暗夜裏集中到這個地方集體進行。他們吃的什麼東西，我無從得知，只聽到他們僅吃了稀的，並未見人手裏拿饃。

我大著膽子走上臺子，問了幾個人才找到了我要找的大隊長張善合，向他說明瞭來意，把手裏的叔叔入股的票據拿給他看。張善合簡單地說了句：“你先回去吧。”

我回來了，並不知道這位大隊長給沒給兌成錢，因爲我未等到叔父下葬就回校了，只知道母親後來多次哽咽著重複那句話：“親弟兄兩個一個頭（一）天（走），一個第（二）天（走），一個睡櫥櫃，一個睡門板，我一輩子的挖屈啊……”四十三年後的二〇〇三年清明節，我回家重築祖墳準備立碑時，王作軍告訴我，叔父下葬使用的確實是一塊門板，屍體上蓋了一張蘆席。叔父的合作社股票後來落入何人之手，不得而知。

我回到家的時候，全家人都還在等著我。我把事情的經過說了一遍，母親又安慰了嬸母一番，我們便回到自己家裏來了。這一夜，母親肯定是沒合眼的，我不時地聽到她嗚咽著重複那句話：“親弟兄兩個呀，一個頭天，一個第天，一個睡櫥櫃，一個睡門板，我一輩子的挖屈啊……”家裏的其他人都不說話，都在心裏默默地咀嚼著家庭連續的災難帶來的苦痛。夜裏我並沒有聽到小侄女的哭聲。此時，她應該還活著，一定是連哭的力氣也沒有了。

叔父那年五十二歲，在第二生產隊的飼養組裏養牛。那時候，牛是最重要的生產工具，養牛這個活也不是一般人能幹得好的。首先，因爲牛草裏要摻糧食做的料，所以飼養組的人一定要老實可靠，不至於偷牛料。牛下地了，飼養員要出牛糞，打掃牛圈，把牛草用鍘刀鍘碎並淘洗乾淨，以便牛幹完活回來就能吃上草。“牛不吃夜草不肥，馬不吃夜草不跑”，夜裏還要給牛加餐喂草，所以飼養組的人一定要勤快。晚上飼養員必須與牛爲伴，睡在充滿牛糞味的牛屋裏。叔父是村裏有名的老實人，平素寡言少語，幹活又不惜力氣，沒有比叔父更令人放心、更適合當飼養員的了。我感到不解的是：爲何像叔父這樣讓人放心的人還會遭到不幸的呢？村幹部把村裏的

人都鬥遍了，也沒搜出糧食來，忽然想到叔父：在喂牛前淘洗麥草、豆稭的時候，偶爾會淘出麥粒、黃豆來，因而他們斷定這麼多年來一直擔任飼養員的叔父家裏一定有糧食，要逼他交出糧食來。叔父哪裏交得出？所以就免不了遭批鬥。在批鬥過程中，被推拉扭打。據嫂子說，叔父被人推搡倒地，立時就吐了血。像叔父這樣的老實人，尤其受不了這樣的氣。父親的自縊身死對叔父自然是雪上加霜，促使了他的辭世。

第二天早上一起來，嫂子說："咱爺爺眼看著不行了，你能到大伙房裏給他要點吃的不？"我什麼也沒說，拿起一個盛麵的葫蘆瓢，走到生產隊的伙房裏。幾個炊事員正忙著準備全隊的早飯，這裏有和我家關係最好的店裏二嬸。我像一個乞討的孩子似的伸出手裏的瓢對二嬸說："俺叔昨晚上死了，我爺爺也快不行了，能不能給我爺爺點糁子，叫我嬸子給爺爺燒碗糊塗（稀飯）喝？"

二嬸看了看我，又回頭用徵求意見的眼光看了看食堂會計王念昌。王念昌說了聲："給他稱點兒吧。"

二嬸挖了一滿碗糁子，放在秤盤上稱了稱，然後倒在我的瓢裏。我仿佛領到了可以救爺爺生命的東西，很快地走到爺爺住的小屋裏。

爺爺和衣躺在床上，身子倚靠著牆。他的眼睛全被眼屎糊住，隨著喘氣喉嚨裏發出"呼嚕呼嚕"的聲音。爺爺雖年事已高，卻沒有任何疾病，前幾年還在晚上跑到十幾裏外的地方看戲，過年我給他拜年的時候，他也還能拄著棍在屋裏走動，五個星期的饑餓已經使得他臥床不起了。

我走到他面前，喊了聲："爺爺……"

爺爺沒有聽出我的聲音。我猜，他的身邊已經很久沒有人了，他從山東老家帶來的兩個兒子已經分別於前天和昨天先他而去，他的心裏該是怎樣的痛苦！他哪裏會想到還會有人來看他？聽到有人

叫他，不知是誰，他努力想看看我，卻沒有睜開眼，只好用顫巍巍的喉音問到：“你……是誰？”

“是我，三兒。”我趕緊說，“我從食堂要來點糝子，交給嬸子去，叫嬸子給你燒點兒糊塗喝。”

他似乎想說什麼，卻沒有說出，只從嘶啞的喉嚨裏擠出“噢”的一聲。

嬸母還一個人呆坐在停放著叔父屍體的床旁。她這一夜也一定是不眠之夜。我把那一瓢糝子交給嬸子，交待了幾句就離開了。

這是我給爺爺盡的最後一次孝、也是我對他老人家盡的唯一一次孝。我當時還未成人，不僅不能用自己力氣掙的錢給他買點吃的，就是自己一口一口省下來的窩窩頭，我也只能留給母親一個人。

這一天是唐寨街逢集的日子。早飯後母親挎起篼子，說：“咱們趕個集吧，看能買點吃的不……沒有了你大大，我……還得帶著你們往前活……”話未說完，母親先掉了眼淚。

我抱住母親的一隻胳膊，跟著母親上集了。

一路上，母親一直邊走邊不停地一把眼淚一把鼻涕地哭，反復地重複著那句話：“親弟兄兩個一個頭天，一個第天，一個睡櫥櫃，一個睡門板，我一輩子的挖屈啊……”聽見母親哭，我就把母親的胳膊抱得更緊，想止住母親的哭，便哭著搖晃著母親的胳膊喊：“娘，娘……”哪知母親聽見我哭，反而哭得更厲害了：“我的兒啊，天塌了啊……沒有了您大大，往後的日子……咱，咱娘兒們怎麼過啊……我的嬌兒啊……”

路上有不少來來往往趕集的人，聽到我們母子的哭聲，他們也只匆匆看一眼，然後匆匆而過，沒有一個停下腳步詢問一聲的。在那個年代裏，人們經歷了太多的痛苦，目睹了太多的死亡、太多的

家破人亡，早已經變得麻木了。再說，他們自己也在鬼門關前徘徊著，哪裏有閒心過問身外的事？

路邊楊樹下躺著一個老頭，上身穿著露出舊棉絮的破襖，下身只穿著一條單褲，一隻腳掛著鞋子，另一隻光腳拖在地上，鞋子在一尺多遠的地方，身邊是一隻歪倒的破籃子，籃子邊上露出幾根乾蔥。那人是死了還是活著？沒有人知道，也沒有人停下腳步過問。

集上倒是有不少人。趕集的人都是為了尋吃的。街西頭有一家飯店，飯店門口排了很長的隊。我們湊到跟前一問，說是飯店裏賣糊塗。母親應該是很長時間沒喝過麵糊塗了，便拉著我排在隊伍的末尾。我們正隨著隊伍緩慢地前移，近鄰的一位姐姐擠進來說：“我替你們排吧，你們在旁邊等著。”我們蹲在外邊等了半天，那位姐姐過來告訴我們，一個人只准買一碗，她買的那一碗給她孩子喝了。我們還說什麼呢？只好餓著肚子往回走。走到街東頭，母親買了幾條桑枝——她還養著一簸箕蠶呢。這是我們趕這一趟集所購買的唯一的東西。我們家東北角本來有一棵大桑樹，過去母親年年養蠶都靠它。到了一九五九年，餓瘋了的人們不僅把桑葉吃盡了，把樹枝削禿了，後來樹皮也被扒光了，硬是把一顆大桑樹活活地吃死了。然而，母親仍然買桑葉養蠶。母親在這朝不保夕的時候，自己餓著肚子，卻沒忘記給她的蠶買吃的。回憶起這件事，我隱約地感到即使在那個時候，母親還是熱愛生活的，還有活下去的信心。

楊樹下的那位老人還在那裏躺著，還保持著原來的姿勢，旁邊依然是那隻歪倒的破籃子、一隻舊鞋子和幾棵幹蔥。我斷定他是死了。

過了中午，扒了一碗紅芋葉子，大哥就打發我回校——畢竟學校裏每天還有三頓飯吃，而且我還能從學校省點窩窩頭救母親。臨走我和母親少不了又相擁哭了一場。

出門時，我忽然想到風燭殘年的爺爺。我得給他老人家告個別——我心裏知道，我下次回來肯定見不到我的爺爺了。

我竭力忍住眼淚，走進爺爺的小屋。爺爺的眼睛依舊被厚厚的眼屎糊著，喉嚨裏發出“呴呴”的聲音。

我喊了聲：“爺爺……”

“是三兒嗎？”爺爺想坐起來，卻沒有擡動他那瘦弱的身軀。

我趕忙扶住他：“爺爺，您別起來了。爺爺……”我突然哽住了。我頓了頓，抹了抹眼裏的淚，努力把我要說的話說完：“我，我得走了……俺叔的事我也不能問了……”淚水又奪眶而出。

“走……走吧，”爺爺的聲音像是從喉嚨裏呴出來的，“走吧，你，你在家也……也不能幹啥……”

我趕緊走出來，一出門淚水就像泉水一樣湧出來。剛葬了父親還沒有圓墳，叔父死了尚未入土，爺爺奄奄一息……還有命運未蔔的母親，在這個時候我怎麼能離開？而我又不得不離開，這是人世間真正的生離死別！我的心疼如刀絞。

那天是陽曆的三月九日，陰曆的二月十二。天已經晴了，趕到學校時，大半圓的月亮掛在天上。李樂銀把我帶到大伙房後邊的熱水爐跟前，給我倒了一大碗開水，然後把能給我留住的這兩天的伙食——兩個黑面饃饃和三八節節日午餐的半碗丸子交給我（我的稀飯和菜自然被其他同學吃了）。我已經兩天沒吃一粒糧食，早已餓得前肚皮貼著後脊樑了，但面對著這麼多好吃的東西，面前現出的是母親和爺爺的面容，竟一口也吃不下去。我只吃了一個饃饃，把其餘的都省了下來。

當我回到教室裏時，翟素霞悄悄地問我家裏發生的事，我已沒有眼淚，只簡簡單單斷斷續續地說：“我大大上吊死了……昨天我叔叔又死了……我爺爺已不能下床，也撐不了幾天……”不知是不

相信她聽到的事，還是預感到什麼不幸，她默默地愣愣地聽我說著，淚水從她發直的眼裏一滴一滴地往外流。翟素霞因爲是校體操隊的運動員，每月額外享受著六斤的糧食補貼。後來我不時地發現我的書桌裏她偷偷放進去的窩窩頭。我感覺到我們都在這一年裏變成熟了，我們已不是昔日的玩伴，我們現在已是同病相憐的兄妹。

我當時的學習成績在班裏是好的，老師們都偏愛我。班主任趙耀久老師知道了我的不幸，馬上主動提出要給我一點助學金，但我沒有要。我的同學裏多數享受著助學金，可以使他們吃飯不交錢或只交少部分錢。我的大哥當時是中心小學校長，每月有五十多元的工資（母親一直把稱之爲“餉”，把領工資叫做“領餉”），算是“家裏有人在外面工作”的一類，經濟狀況被認爲是較好的，所以一入初中時，大哥就不叫我申請助學金。但到了這個時候，家裏出了這麼大的事，用母親的話說就是“天塌了”，仍然堅持不要助學金，不知是出於思想進步呢？還是愚昧？

回到學校，我開始了初三最後幾個月的緊張復習，天天懷著更加忐忑不安的心情。

大約兩三個星期後的一天下午，上課的時間到了，我發現翟素霞還沒來。我很奇怪，因爲她不會缺課的。我去問團支部書記唐素雲，唐告訴我：翟素霞的大姐死了，她中午就回去了。

我心頭爲之一震：命運何以如此殘酷，這樣接連地打擊我們這隻可憐的小燕子？我知道，她母親去年春天死後，大姐就帶著姐夫住進了她的家。大姐是一個能幹的婦女，“四白”在蕓蕓女生中之所以這麼出眾，多虧了大姐的巧手。長兄如父，大姐如母，雖然失去了母親，翟素霞還有一個家，還有一位疼她的親人，還有大姐給她以母愛。她怎麼可以再失去大姐呢？

當翟素霞奔喪歸來，我們又重新坐到一個桌子上的時候，我看著她，她看著我，但“相顧無言，唯有淚千行”。然後，我把她的

手抓在手裏，緊緊地握了一下，她會心地用一個緊握回應了我。我們就用這樣的方式溝通了心靈——我們要堅強地活下去！相同的命運使得我們同病相憐、心照不宣。這之後，我們都變得沈默了。除了有時互相問問題外，我們再也沒有要講給對方聽的故事，別人也再也沒有聽見我們偷偷說悄悄話時發出的笑聲。

此後不久的一個晚上，我做了一個夢：父親穿著那件破舊的棉長袍站在院子裏，瘦削的臉表情嚴肅——他要離開我們出遠門，到遠處，到一個我們不知道的、永遠找不到的地方去。我心裏似乎知道，父親走了再也不能回來，此一別將是我與父親的永別，我今後將再也見不到我的父親，所以我跪在地上用全力抱住父親的袍子底角，仰著臉哭喊著懇求父親不要走。父親並不說話，低頭看了看我，臉上沒有任何表情，顯得有點近乎冷酷。他猶豫了片刻，然後趁我不注意輕捷地從我手裏掙脫了衣服，一縱身翻過院牆，走了，不見了……我哭啊喊啊，哭醒後發現枕頭已經被淚水濕透了。我撫摸著濕漉漉的枕頭，心裏充滿了悲痛和悵惘，雖然我明知道父親已走過多日了，遠遠地離我們而去了。我呆呆地想：父親瘦弱的身子怎麼能那麼輕捷地翻過院牆呢？他的心怎麼不為我的哭聲所動呢？

兩個多星期之後的一個午後，我到郵電局寄信。把信投進郵筒，一轉身看見大哥進來了。大哥說，他是來縣城開會的。他告訴我：爺爺不在了，嬸嬸也不在了。他說得很平靜，像是在敘述著一件極普通的事情；我聽得也很平靜，似乎哥哥告訴我的是一件家常瑣事——對這兩個消息我早有了充足的思想準備，或者說，這都是意料中的事。我們都沒有哭，連眼淚也沒掉。其他的細節，比如，叔叔用的什麼作棺材？葬在什麼地方？爺爺是哪天死的？嬸嬸呢？我都沒有問。大哥沒有提小侄女的事，我也沒有問。好像這些都是無

所謂的不值得問的“小事”。臨分手時，大哥囑咐我：“你以後也不要再省饃了，我給咱娘省點帶回去就行了。”

我畢竟放心不下母親。不久的一個星期六的下午，我回家看母親，肩上背著那個小書包，書包裏仍然滿裝著我一口一口省下來的窩窩頭。當時，天已經很暖和，母親坐在一個用繩子攀的軟床上，嫂子坐在一個矮凳上，兩個人好像在做著什麼針線活。侄兒坐在旁邊不知玩著什麼東西，沒有看見二哥和倆個侄女。以往，嫂子和母親的關係是不融洽的，家庭接連突遭的不幸使得她們互相偎依。

一進院子，淚水就止不住地往外流。母親一看見我，就放開嗓子哭了起來：“我的兒啊，你再也見不到你大大了……我可憐的兒啊……”

我坐在母親旁邊，陪著母親哭。過了好大一會兒，母親才止住眼淚，告訴我說：“您爺爺也死了，您嬸子也死了，”說著她用手指了指叔叔家的院子，“那門裏（指叔叔家）算……算是沒人了……”說著，母親又傷心地哭了起來。

我轉頭望望叔叔家的院子，再回頭看看我們家的院子，落日的餘暉照著空落落的兩個大院子，一片死寂，沒有了一點人氣。

侄兒呆呆地看了我一會兒，把小手裏抓著的一把黑色的東西遞給我：“叔，你吃吧，香，好吃。”

我接在手裏，仔細看看，那是一把炒熟的蕛蔴種子。我仰頭倒進嘴裏，嚼嚼，確實很香，勝過現在的芝麻。

後來得知，我離家的第二天，叔父也被安葬在高坡荒灘上，與父親的墳並排。此後，一連六天，爺爺每天上午拄著一根拐杖，一步三晃地走到父親和叔父的墳地上，繞墳數圈，一邊走一邊泣不成聲地說：“兒啊……我的兒啊，往年只有兒埋爹，想不到今天爹葬兒……我的兒啊……”凡當時目睹爺爺哭悼父親、叔父的人，沒有

不落淚的。我至今不明白：我離開爺爺的時候，他分明已經臥床不起，眼也睜不開，人也不認，只是一息尚存等待著死亡，他哪裏來的力氣使他站立起來並來回走一兩裏路去哭他的兩個兒子？而且一連六天天天如此！到了第七天，他自知他這一盞燈的油已經熬乾了，他再沒有力氣去哭自己的兒子了，他也要隨兒子到另一個世界去了。但是他沒有自殺的力氣，於是，爺爺用北方農民紮腰的大帶子套在自己的脖子上，另一頭掛在床幫上，就這樣死去了。第七天的早晨，他被發現的時候，已經僵在床前地面上，脖子上套著那隻大帶子。那一天是西曆三月十五日，農曆的二月十八日。

生前父親和叔父已爲爺爺備好了棺材，用的是較好的木料。爺爺死的時候雖然只剩下一把骨頭了，但棺材很重；再說那時候人們已餓得打晃，一陣風都經不住，哪裏有擡棺材的力氣？臨時找來的幾個人東倒西歪，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爺爺的棺材擡到埋葬著父親和叔父的那片荒灘上。當然，他們顧不上排列的順序了，只是就方便挖個坑把棺材放進去，然後用土埋上而已。

當年輕氣盛的爺爺當年帶著兩個兒子從山東鄆城來到這兒定居的時候，他是萬萬沒有想到他們爺兒三個會在一個星期內死於非命，然後一起被葬到這片荒灘上。時也？命也？三座墳沿著高頭一字兒排列，自東而西分別爲爺爺、父親、叔父。它們座落在唐寨的大南門邊上，蕭縣人趕唐寨集必經的大路邊，向路人訴說著這段悲慘的家史。

二〇〇三年我決定立碑的時候，村裏人告訴我，按照當地風俗，三座墳的排列當呈"懷中抱子"之勢，即爺爺的墳應居中，左右兩邊則分別應是父親、叔父的墳。像現在這樣，爺爺、父親、叔父三座墳自東而西一字兒地排列顯然與當地風俗不合。但爲了保存當時的原貌，我沒有遷墳重葬。

母親告訴我，爺爺死後第十天，西曆三月二十五日，農曆的二月二十八日嬸母病餓而死。嬸母雖然較母親小，但她患著嚴重的“心口痛”的慢性病（我後來猜想一定是胃潰瘍），失去了叔叔，身邊又沒有子女，終於沒有熬過來，孤苦伶仃地死去了。

二〇〇六年十月，八十九歲的劉以臣叔告訴我：在嬸母去世的前一天，他遇見嬸母趕集回來，挎著的籃子裏裝著一杆盤子秤和一支簪子。家裏早已沒有錢，也再沒有可賣的東西，嬸母想把它們賣了換點吃的。但那個年成，誰會去買這個？嬸母在街上呆了半天，無人問津，只好仍舊挎回來，當然什麼吃的東西也沒買到。劉以臣叔買了四個蘿蔔，拿了一個給嬸母，說：“你回家煮點蘿蔔水喝吧。”嬸母千恩萬謝感激不盡。當天晚上，嬸母搖搖晃晃地到了劉以臣叔家，把手裏捧著的一個雞蛋遞給劉以臣叔，說：“你……你上午給了我一個蘿蔔，我……我不能白……白吃你的，還給你這個……這個雞蛋吧。”劉以臣叔不肯要，嬸母又說：“你家有……有小孩子，你給孩子煮……煮著吃吧。我一個大人不……不要緊。”然後，嬸母又搖搖晃晃地回去了，但想不到第二天嬸母就斷了氣！

當嫂子發現嬸母的時候，她已經不知斷氣多長時間了。嫂子趕緊四處尋人把嬸母擡下地，但當時留在村裏的非老即小，哪裏見得到能擡動嬸子屍體的人？不得已，嫂子最後找到連長歐儒存，跪在他面前磕頭哀求道：“儒存叔，我求您了，您行行好吧，您千萬行行好，俺嬸子死了幾天了，不能讓她臭在家裏，求求您找幾個人把她擡到地裏去吧……”嫂子邊說邊磕頭。這樣，歐儒存從稻改隊裏叫來了幾個年輕人，把嬸母的屍體原身放進她自己陪嫁的衣櫃裏，仍舊擡到那個高頭荒灘上，埋在叔叔身邊，算是入土爲安了。

嬸母去世後的第十一天，西曆四月五日，農曆的三月初十日，小侄女終於停止了哭叫——她被活活地餓死了。這一天是清明節，是萬物復萌草木芃芃的日子，然而，我的小侄女，這個在錯誤的時

間出生的孩子卻在這一天終結了她的小生命。她在世上僅存活了不到一年。

自父親西曆三月七日、農曆二月初十懸樑自盡至今，短短的二十八日內全家竟有五口人相繼辭世！他們走了，悄無聲息地走了，他們的死如同地球上少了幾隻螻蟻，橫亙無垠的天體裏少了五顆無名的小星星，在這個世界上沒有留下任何痕跡，連一張照片也沒留下，只是在我心裏烙上了刻骨銘心的痛苦。如同我在碑文中所說：嗟夫！人生之悲，孰過此焉?

但，悲劇並未就此結束。

12・悲劇的繼續

一天下午，傳達室的王煥章喊我，告訴我有人找我。我到了傳達室，見地上蹲著我的二哥，旁邊放著一根棍子和一個小鋪蓋卷。他一臉黑灰，頭髮間都是土，身上散發著腥臭味。看樣子他一定在外邊流浪了很長時間了。他准是在家裏餓得實在撐不住了，出來到處找點吃的，用當時的話說就是“流竄”。那時，很多的年輕人就這樣餓死在了外邊。最後，他想到我這裏還有吃的——我畢竟一個月還有二十多斤的供應糧、一天還能吃上三頓飯，就找到了我這裏來。

當時學校有嚴格規定：一般情況不准客人留宿。我按規定到傳達室登了記，向王煥章說明瞭情況，申請留二哥住宿兩夜。王煥章還是答應了。每頓飯開飯的時候，我便把我分得的那份飯端到寢室裏與他分吃。看到他狼吞虎嚥的樣子，我便儘量克制自己，讓他多吃。二哥並不客氣，或者說根本就不顧我，常常連湯加菜一掃而光，我只好忍饑挨餓，等著下一頓。但下一頓依然如此。最後，我實在沒辦法，求助於語文老師彭捷。我是彭老師喜歡的學生，又時常幫

助他抄寫書稿，所以，雖然他自己也在忍饑挨餓，還是借給我一斤半糧票。我每頓飯從食堂裏多買一個饃，幫助我熬過了這兩天。

不知二哥在外邊漂流了多長時間，也不知他這些日子每天是怎麼過的夜，他的被子糊上了一層硬圪巴，發出很難聞的味道。當天晚上我與別的同學擠睡在一起，讓二哥睡在我的床上。第二天早飯後，我把他背來的被子拿出來晾曬。當我把他的被子展開搭在繩子上的時候，成團的蝨子從被子上滑落下來，讓我渾身起了一層雞皮疙瘩。我便用腳在地上輾，腳底下發出劈裏啪啦的聲音，並留下一片片的血印。二哥餓得皮包骨頭，這些蝨子倒是吃得圓滾滾的。

第三天吃過早飯，我打發他回家，並把前幾天省下來的窩窩頭都給了他，讓他路上吃，並囑咐了他好多話：沒有了父親，要多照應母親，到地裏挖點野菜，在家裏陪母親慢慢地往前熬；我還說，再過兩三個月就該割麥了，那時就能吃飽了。

傍晚，我剛要吃晚飯，傳達室的王煥章又來喊我——二哥又來了，仍然用那根棍子背著那個小鋪蓋卷，仍然滿臉的黑灰。我給他的窩窩頭已被他中午吃光。我只好再次登記留宿客人，傳達室的王煥章雖然答應了，已經顯得爲難，因爲學校規定如此。我像頭一天一樣，把自己的飯菜讓給他吃，再次留他過了夜。第二天早飯時，我忍著餓肚子讓他把我的全部早飯吃掉，然後打發他回家，把昨天囑咐他的話又叮囑了一遍。

我本以爲他這次一定回家了，哪裏料到吃晚飯的時候他又如期而至。我知道他戀著我這裏的一天三頓飯，而且害怕回家後會被餓死。我已經兩天幾乎沒有吃飯了。對於當時的我來說，我沒有能力養活他，而且學校當時又有規定，我怎麼再去登記？我感到十分無助、萬分爲難，我把他領到寢室，把我的一份飯給了他之後，我傷心地放聲哭了起來。看到我哭，二哥心動了，說：“我走，這次……

這次一定走，一定走就是了，你哭、哭什麼呢？你……你別哭了……”

二哥這次真的走了。我多麼希望他能在家裏與母親相依爲命，度過荒年，萬萬沒有想到他又製造出新的悲劇來。

四月中旬的一天，我收到一張明信片，展開一看，是二哥寫來的，地址是“碭山縣看守所”。信上說：“三弟，我因事被拘留了，現關在縣看守所。星期天准許探視，你來的時候，給我帶點鹹菜……”

對著這張明信片，我目瞪口呆：他剛剛從這兒回家，短短的十來天，他能出什麼事呢？以他的無能，他又會犯什麼罪以至於“二進宮”呢？

但不管出了什麼事，我必須去看他。星期天的上午，我帶了兩個省下來的窩窩頭，又去鹹菜店買了點臘菜疙瘩，趕到東關的看守所。看守所的看門人無論如何不讓我們見面，無奈，我把那兩個窩窩頭和一小包鹹菜請他們轉交給二哥，望著關著我二哥的鐵門高牆，含著眼淚離開了。

下一個星期六的下午，我回家打聽二哥的事。母親告訴我：你二哥沒本事，不敢像別人一樣到地裏偷點麥苗、豌豆角吃，天天在家裏餓得亂轉。那幾天，小閨女餓死了，埋到高頭壩子底下。你知道，您二哥害了一輩子的頭疼病，前幾年到處買藥，就是治不好，害得他學也沒上成。他聽人說，小孩的腦子能治頭疼，他就偷偷地到高頭底下把小閨女扒出來，拿回家藏到小屋的一個爛缸裏，用麥稭蓋上。我平時不到小屋去，也不知道這件事。小閨女死了幾天了，天氣又熱，引得蠅子嗡嗡地圍著那隻破缸亂飛。有一天，你嫂子到這屋裏找東西。一進屋，就聞到一股臭味，又見蠅子圍著爛缸嗡嗡叫，她掀開麥稭，一眼看見才埋了沒兩天的小閨女，大哭大鬧，大

喊大叫，鬧得鄰居都知道了，後來村幹部也知道了。您二哥嚇得趕緊把小閨女埋了。沒過幾天，他就被人帶走了。

一九九二年的夏天，也就是二哥去世的前一年，我在老家過暑假的時候，二哥突然對我提到這個問題。像是臨死前的懺悔，他囁嚅著說："唉，那個時候咱……咱娘餓得要死，我……我……我想給咱娘燒碗湯喝……唉……"

我問他："你怎麼會想到這個法子？"

他不語，只捧著頭連說了幾個"唉"，不知道他是悔恨自己做的錯事，還是企圖爲自己的蒙冤辯白。

二〇〇六年的秋天，在開始寫這本書的時候，我企圖把這件事弄個清楚，就問了王作軍。王作軍是我最近的鄰居，他見證了我家發生的一切，當年他親手一個接一個地埋葬了我家故去的四位老人。

"什麼燒碗湯？他把小閨女劈開了！"王作軍一句話說清了我一直不敢打聽的問題，給我展示了一個最最慘不忍睹的血淋淋的場面。

我不敢再問了。

"他不還是神經不正常嗎？一般的人再也不會這樣做。"王作軍似乎看出了我內心的震驚，用這樣的話安慰我。

對這件事最直接的知情者是我的嫂子，因爲她目睹了一切。但是我不敢問她，因爲我害怕聽到更加耳不忍聞的細節，雖然我很想知道。

我不知道法院以什麼罪名給他立的案，但後來探監的時候獄警告訴過我，他當時是被判了十年徒刑。這應該算是長刑了。後來，大哥做了工作，一九六二年冬天把他保釋了出來。這一次，他過了大約兩年半的勞改生活。

那時候，除了擔心母親以外，我又多了一件事：探監。星期天是探監的日子。每隔兩個星期的星期六晚上，我就先寫好一封信，囑咐二哥老實交待自己的問題，好好改造自己，遵守看守所的規章制度等，再說些諸如母親身體很好、家裏的伙食供應增加了等用來安慰他的美麗的謊言。星期天上午帶上兩個窩窩頭，到縣城中心玉石口東邊的鹹菜店，用從大哥給我的不多的零用錢裏擠出的錢給他買些鹹菜，再回到東關的看守所，把窩窩頭、鹹菜和信一齊交給獄警，由他們轉交給二哥。按照規定，判刑以前是不准見面的。明知高牆裏邊關著自己的親人，他在那裏挨餓受罪，我們一牆相隔如同陰陽兩界，竟不能見面說一句話，我該是多麼痛苦！所以每次探監回來，我都要難過很長時間。

不久，他被判了刑，被弄到城西關外的葡萄酒廠勞改，後來又被轉到縣城西北的果園場，開始了他過去夢寐以求的勞改生活。但這種勞改生活非但沒有給他帶來幸福，還差點要了他的命。他不論轉到什麼地方，都沒有忘記給我寫信——我是他物質上和精神上的寄託。像是命中註定，又像是上帝冥冥中作的安排，一直到他一九九三年去世，幾十年來，我這個做弟弟的一直負擔著他這個哥哥，我一直是他物質上和精神上的依賴。他去世時，雖然大哥還在，我完全負擔了他的喪葬費用。

13·劫後餘生

從 1959 年春天起，大食堂已遠遠不能滿足需要，人們便開始到處找可吃的東西。雞鴨鵝和貓狗這些家養的動物成爲首先被消滅的對象，然後，從樹上的、到地上的再到水裏的，無論可吃的還是不可吃的都被人們吃了個遍。柳芽、槐葉、榆錢子（榆樹花）是上等的菜，到了一九六〇年，很多柳樹、槐樹、榆樹都被人們吃死了，

人們只能吃這些樹的樹皮了。那時的人們發揮了最高的聰明才智，把這些樹的皮揭下來，摻上紅芋藤、茅草根一起曬乾，磨成粉。人們還給這種混合物起了個名：澱粉。公共食堂裏供應的就是這種澱粉做的饃。這種廚藝就是現在的高級廚師恐怕也是不具備的。苦苦菜、富富苗、刺刺芽算是高級野菜，凡是地裏長的都有人吃，不知有多少人因爲誤食了有毒的植物而中毒致病乃至死亡。水裏的魚蝦、泥鰍、蝸牛、蒲根、水草早已被人們吃絕了，人們開始捉青蛙。有的人連癩蛤蟆也捉著吃，吃過後便上吐下瀉。聽說某人看見白色的石灰，突發奇想，心想這石灰和麥麵一樣都是白色的，麥麵是好吃的，石灰也應該可以吃，於是拌了一大碗石灰吞下去，結果被活活燒死了。更多的人把棉籽弄碎了做成饃吃，吃過後人會嚴重的便秘，拉不下屎，只好請家裏的人用棍子往外扒。最慘不忍聞的是有人看見別人的大便裏有未消化光的糧食粒，便把大便捧回家，用水沖過以後食用……

那時候，天天在死人，有的人家死了人不哭也不叫，偷偷埋了，繼續從食堂裏領著死者的那份口糧。後來幹部發現了，要求食堂開飯時全家都要到場，同時派人挨家挨戶“巡視”，看看有沒有“秘不發喪”的情況。

彭捷老師給我講了一件事：孫子一口便把從食堂領來的屬於他自己的那一個“洋火盒一樣大”的饃吃完了，然後流著口水眼巴巴地看著奶奶在沒牙的嘴裏咯嘣著她的那份饃，說：“奶奶，你還不如死了呢。”

奶奶不明白孫子的意思：“乖乖，你叫奶奶死幹啥？”

“你死了我不就能吃你的那個饃了嗎？”孫子說。

“乖乖，你看不見幹部天天各家轉悠嗎？奶奶死了，幹部馬上就知道了，就把我的那一份停掉了，你也吃不上，憨孩子。”

經過幾年來大躍進、人民公社、大煉鋼鐵、公共食堂等一系列運動的折騰，人已經不像人，城市不像城市、農村不像農村了。據《求索中國》說，一九六〇年四月中共中央批轉的上海市奉賢縣事件的報告說："站在高處看奉賢，就像鬼子大掃蕩後的情景一模一樣"，"斷瓦殘壁，歷歷皆是，觸目驚心，一片淒涼。"

我家所在的大南門，原有人口不過二百七十多人，在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〇年春一年多的時間內非正常死亡的人數竟達七十多人。村子裏到處是斷井頹垣，殘磚亂瓦。四新公社（原黃樓公社）餓死了一半多，我們村裏有一些年輕人被派去幫助搞"稻改"，到了那裏發現無處安身睡覺：幾乎每家、每座房子都停放著沒有掩埋的屍體。他們只好自己動手把屍體集中到一個屋子裏堆放。當他們終於騰出一處可以安身的地方開始生火做飯時，炊事員突然"呀！"地驚叫起來。眾人圍過去，原來炊事員在鍋門口的柴草堆裏發現一具死屍，死者的眼睛、鼻子、耳朵都被老鼠啃掉了，慘不忍睹。午收季節，學校帶我們學生到城北的一個生產隊"支農"。在緊靠村邊的地裏割麥的時候，我們時不時會被眼前發臭的半腐爛的屍體嚇得尖叫起來。開飯的時候，一群長脖子挑著瘦腦袋、挺著大肚子、翻著肚臍眼、皮包骨頭的孩子圍在我們四周，一邊用貪婪的目光盯著我們手裏的饅頭，一邊吮吸著手指吞咽口水。用餓殍遍野和毛澤東自己寫的"千村薜荔人遺矢，萬戶蕭疏鬼唱歌"來說明當時農村的情況是非常恰當的。

叔父、爺爺和嬸母相繼去世後，偌大的兩個院子只剩下母親、嫂子和侄兒侄女。因爲叔叔家無後，按農村的風俗，二哥應該過繼給叔叔並繼承叔叔的遺產。母親就帶著二哥住進西邊叔叔的院子，在李樂銀搬回他的村子以後，母親把爺爺住的一間半小屋以六十塊錢賣給了一家馬姓的外來戶。然後，母親用這賣屋得來的六十塊錢

買了一隻老母雞。爲此，嫂子常常埋怨母親，說母親是“敗壞頭”（敗家子），拿一間半房子換一隻老母雞。但我理解母親：那年頭，最要緊的是活命。那只老母雞在二哥被抓走以後也成了母親的伴，而且老母雞生的蛋也就成了當時母親最好的營養品。

進了夏天，政策上有所放寬。晚上不再開會要糧食了，也允許各家各戶自己燒小竈了，還鼓勵社員在家前院後種蔬菜莊稼。

一九六〇年七月，我初中畢業了。

在中考前填寫報考志願時，我本來想報考中專、技校、師範之類，以減輕家庭經濟負擔，但大哥執意要我上高中。趙耀久老師也對我和翟素霞說過：“你們這些成績好的同學，學校不會放你們走的，不要報中專、技校了，不管你們升學考試考得怎樣，高中部都會留住你們的。”幸虧聽了大哥和趙老師的話，我的那些被錄取到中專、技校的同學，一九六一年到一九六二年間統統因爲這些大躍進時期辦起來的學校紛紛下馬而被迫失學回家當了農民。

參加過學校的高中入學考試後，帶著學校發的糧票，我回家一邊幹活，一邊等待錄取通知。那時，二哥已被抓去坐牢，家裏只有我和母親兩人相依相伴。我用糧票從糧站買回糧食，粗粗地磨成糝子，摻上野菜做饃或者煮菜稀飯。母親依舊吃著大食堂。食堂裏早飯爲一碗野菜湯，中午供應一個菜卷子，晚上沒有飯。因爲上午要幹活，不能不多吃點。母親便用糝子摻野菜再燒點稀糊塗，有時也貼點餅子。中午，我從食堂領來母親的一個菜卷子，一掰兩半，我們娘兒兩個每人一半，母親另外煮半鍋野菜，一人扒上一兩碗，也算基本把肚子填滿了。傍晚，雖然白天勞累了一天，我們常常因爲家裏沒有可吃的，或是爲了省一把乾柴禾，或是吃個菜瓜就不做晚飯了。

晚上，我們娘兒兩個抱著餓肚子睡在院子裏杏樹下的兩張小軟床上。因爲攀軟床的繩子斷了很多，床面變成了漁網似的兜子，鋪在床上的爛席片露出的蘆葦茬子紮得後背發疼。我們望著滿天的星星，彼此什麼也不說。我們都在心裏默默地咀嚼著這半年來所經歷的一切痛苦，品嘗著那份酸澀。我們娘兒兩個就這樣艱難度日，一天天地往前過，連明天要做什麼、要吃什麼都不想，因爲我們每天都重複著同樣的事情、同樣的飯食，不敢有任何奢望。

一天晚上，我正這麼躺著的時候，母親突然說了一句：“你也不能出去弄點吃的東西，在家乾餓著。人家存糧（王作軍）天天晚上出去扒紅芋、掰棒子、摘毛豆。”

聽了母親的話，我滿腹委屈，哭了起來：“我是個學生，我能出去偷嗎？要是大大活著，他再不會叫我出去偷。”說著說著，我懷念起父親，想起父親在世時的那些日子，哭得更傷心了。是的，父親活著的時候，父親和母親都從來沒強迫我去幹什麼，更沒有埋怨過我。

見我哭了，母親心裏也難過了，說：“我不就是說說嗎？咱不去不去就是了。”

實際上，母親說的是實話。在那個年頭，沒有哪家不出去偷。那個季節，地裏的莊稼都成熟了，只要家裏有人敢出去偷，家裏生活就好得多，更不會有人餓死。父親死後，我們一家孤兒寡母沒有人有力氣在家前院後開荒種地，更重要的是我們家的人都太老實了，或者說太無能了，沒有一個人能出去弄點吃的，老實得只有在家挨餓等死的份兒。

有一天中午，母親挖野菜回來，我發現母親的野菜裏多了幾個玉米棒，便問母親：“這是哪裏來的？”

母親吞吞吐吐地說：“在、在……路上拾……拾的。”

我不相信，還要問：“哪裏路上能拾到棒子？”

正在這時，響起了一個婦女的叫罵聲：“誰偷了棒子？偷吃了我的棒子叫你長噎食（食道癌）……”

我意識到母親是掰了生產隊包給這個女人看的玉米，便追問母親：“你是偷的她看的棒子吧？你聽，人家在罵呢。”

那個女人的聲音變得更響亮了，罵的內容也更惡毒了：“誰吃了我看的棒子，死你最親的，死你最心疼的……”

我開始動員母親：“把棒子還給人家吧，扔到她地裏就行。”

母親不語。

我進一步動員，但使用的語言含著威脅：“你聽聽他罵的，你不怕她罵的話應到你兒子身上嗎？”

母親仍然不語，看來思想上在激烈地鬥爭著。

我接著說：“趕緊把那些棒子扔回去吧，反正你煮了我也不吃。”

吃午飯的時候，我沒有看見那些棒子，後來也沒有看見，我不知道母親是怎樣處理掉這幾個棒子的。

今天想起來，我很難過，我不該這樣折磨母親。在那個歲月，自己是個男子漢，不能撐門立戶養活母親已經夠窩囊的了；母親這麼大年齡，該下了怎樣的狠心、擔著怎樣的驚嚇掰來這幾個棒子，回來又遭我數落，後來還得經歷怎樣的思想鬥爭，冒著風險處理這幾個棒子？電影演員李誠儒做客中央電視臺《藝術人生》，講了他母親在一個電閃雷鳴之夜，偷了一口袋“人民公社的玉米”的故事。李誠儒給億萬觀眾講這個故事時，是以一種自詡的口氣讚揚他的母親“能幹、有本事”，使他們全家得以順利度過困難時期。我何以竟這麼迂腐糊塗呢？

自人民公社以來，親戚們都斷了來往。有一天，二姑父突然來了。雖然二姑媽是我爺爺最嬌愛的閨女，雖然我們這裏有二姑媽的

高齡父親，還有他的一個哥哥、一個弟弟，她最近兩三年一直沒有來過。當然，姑父母是受著管制的“四類分子”，外出自然更加不便。當二姑父得知爺爺和父親、叔父、嬸母都已故去的時候，唏噓不止。二姑父也告訴我們一個兇信：他唯一的兒子鋼蛋外出逃荒幾個月了，至今未回，八成是餓死在外邊了。我們相對無言，也沒有人掉眼淚：在我們看來，在那個年月，無論發生什麼事情都是正常的。鋼蛋小我兩三歲，但個頭跟我差不多，長得富富態態，小時候常跟著二姑媽來看外爺和兩個舅舅、舅媽，我也很喜歡這位小表弟。一九六〇年春天，鋼蛋隨村裏的幾個年輕人爬火車出去要飯，誰知一去不回。二姑媽、姑父天天哭，盼著兒子回來，四處打聽兒子的消息，聽說哪裏有無名的屍體，他們都派人去認，但到底音訊全無。我的二姑媽直到四十一年後的二〇〇一年去世也沒有見到她的兒子，我也再沒有見到這位小表弟。究竟是自己餓死了還是被外鄉人殘殺後吞吃了，都不得而知。

到了中午，我和母親實在沒有東西招待這位多年不來的親戚。但我又不能看著二姑父餓著肚子回去——二姑媽家離我家有二十五裏路呢。怎麼辦呢？我大著膽子跑到食堂，向管食堂的會計王念昌說明瞭情況，他給了我一個菜卷子。二姑父大口大口地吃了那個菜卷，又扒了半碗野菜，才回去了。

在那饑餓、勞累、單調的日子裏，我們應該說也有期盼。母親天天在心裏計算著大哥領工資的日子，偶爾會問上一句：“您哥快該領餉了吧？”

大哥“領了餉”就會回家來：家裏有他的三個孩子和老母親，他得把除去自己的伙食費之外的絕大部分錢送回家來，說不定還要給正在接受勞改的二哥留一點。大哥回來的日子，是母親盼望的日子，也是全家的節日。只要看到大哥進到東邊嫂子住的院子，我便

馬上告訴母親，於是我們便懷著期待的心情等著大哥到我們這個院子來。大哥回到家，先到嫂子那邊，然後很快就到我們這邊來。大哥除了給母親幾塊錢外，還常常給我們帶點吃的，或是兩隻燒餅，或是一小包餅乾，有時就是一個白麵饅頭。這幾塊錢是母親一個月的零用錢，買油鹽火柴的錢都要從這裏出。那點吃的東西，母親捨不得吃，讓給我吃；我當然也捨不得吃，又留給母親。這樣推來推去，留來留去，常常要擱到燒餅長毛，餅乾變軟，白饅頭上爬滿黑黴。大哥每次來家，都是匆匆而來，匆匆而回，從未在家吃過飯。他知道，他的使命就是給他的母親和妻兒送錢和吃的東西，家裏也沒有給他吃的東西。有時不到“發餉”的日子，大哥中間也會回家來。這樣的時候，往往更匆忙。只是到嫂子和母親兩邊問問情況，看看有沒有事，便匆匆而去。但即便如此，他有時也會給我們帶點好吃的。如果母親告訴大哥因特殊情況開銷過大零用錢已經花完了，大哥會另外再給一點。沒有了父親，大哥自然而然地擔起了全家生活的重擔，成了全家的依靠和頂樑柱。

我們娘兒兩個和嫂子及侄兒侄女雖然是一家，也都由大哥負擔著，但過的是兩家的日子：我們分住在兩個院子，各自吃各自從食堂裏領的那一份飯，各自幹各自的那一份活，分開過與合起來過沒什麼兩樣。

那個沒有名字的小侄女餓死以後，小雪成了我最小的侄女。小雪生在一九五五年，當時只有五歲。生產隊辦了幼兒園，凡是進幼兒園的孩子都有飯吃，但小雪去了幾天以後死活再不願意去了。不去怎麼辦呢？家裏沒有她的一份飯。負責幼兒園的店裏二嬸告訴我，小雪在幼兒園是最小的，每逢開飯的時候，那些大孩子就搶小雪的饃吃，小雪不給，他們就打她，結果她非但吃不上饃還要挨打，所以她寧願挨餓也不願意去幼兒園。她餓得受不了，就跑進豆地裏捉蚰子（蟈蟈）生吃，常常嘴唇反被蚰子咬得血淋淋的。眼見得小

雪被餓得皮包骨頭，細脖子挑著瘦腦袋，挺著帶有腹水的大肚子，胸部的肋骨一根根地凸現出來，我便自覺地承擔起了照顧她的任務。我天天把她送進幼兒園，吃飯的時候站在旁邊保護著她，眼看著她把她的那一份饃吃下去，然後再把她帶出來玩。應該說，如果不是我，她可能也要被餓死的。由於過度地缺乏基本的生活所需，她是大哥三個孩子中個頭最矮的一個，只有一米四多一點，不過好歹是把命保住了。

那個暑假裏，我天天割草，曬乾了賣錢，準備開學交學費。我的夥伴是李樂銀和歐林海。我們三個天天一塊割草，在地裏邊幹活邊聊天，過幾天草曬乾了再一起背到大隊部賣。有一天，隊長趙子科對我們三個突然不高興了：其他的社員都老老實實地聽他指揮幹活，我們三個憑什麼獨來獨往？因此要我們也隨社員去地裏幹農活。我們據理力爭：我們吃的是用學校發的糧票買的糧食，隊裏食堂又不管我們吃；而且我們開學後要學費，隊裏能替我們交嗎？那時的生產隊長掌握著老百姓的生殺大權，他當然不聽我們三個毛孩子的理論，勒令組長把我們帶下地。胳膊拗不過大腿，我們只好從命，隨大夥去鋤地、捉蟲、翻紅芋秧等。

有一天，我因有事沒有下地。半下午，還遠未到下班的時候，李樂銀和歐林海跑回來，極興奮地告訴我：“咱們今後再不用聽這個龜孫生產隊長的了，省裏來人辦他們了。”然後他們告訴了我下午發生的事：

剛吃過送來的午飯，他們正和社員們在地裏歇著，忽然看見幾輛小汽車從路上開過來。當時送飯的會計和隊長斷定是上面來人檢查了，帶領社員高聲喊起口號來：“大躍進萬歲！”“人民公社萬歲！”這一喊倒把車上的人給喊下來了。

一群當官的直沖他們走來，領頭的大官對帶著喊口號的隊長發了脾氣：“還‘大躍進萬歲’呢，這地裏的野草長得比莊稼還高！”

隊長不吭聲，社員們更感到茫然。

那位大官轉臉問社員：“你們一天多少口糧？”

“一兩八錢，”社員一起回答。

他看見一個瘦骨嶙峋挺著大肚子的小孩，感到不解：“這小孩怎麼這麼瘦？”

“餓的，”孩子的媽媽說。

“挨餓肚子怎麼還這麼大？”

“吃野菜撐的。”

這位大官顯然生氣了，一把扭住食堂會計的胖肥幫子：“你也是吃的一兩八錢嗎？一兩八錢能把你養這麼肥嗎？”

那位食堂會計低頭不語。

這位大官轉臉對著社員大聲說：“不幹了，今天放假了。晚上開大會，鬥這些龜孫子！”

社員們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不相信眼前發生的事。

“還愣著幹嗎？回家吧，快回家吧，準備晚上開大會。”另一個當官的催促道。

社員們如夢初醒，一哄而散回家來了。

此後發生了什麼事，我們不得而知。我和歐林海、李樂銀帶著興奮的心情等待著，等待著晚上要發生的事。

剛過了晚飯時候，大喇叭就通知全村開大會。我沒有吃東西就去了村中間的打麥場。這時，麥場中央搭起了臺子，台前的柱子上掛著一排汽燈，會場上早已經擠滿了黑壓壓的人。

一個官員手裏握著揚聲器簡單地宣佈了大會開始：“今天晚上開個全大隊社員大會，請劉書記給大家講話。”

一位個頭魁梧的大官模樣的人接過揚聲器，站到臺子中央開始講話：“父老鄉親們，你們好！”

聽慣了隊長吆三喝四的社員們對這種稱呼不習慣，他們感到奇怪，感到納悶：這天真是要變了？會場頓時靜了下來。

“我是劉欽鑒，是咱們縣的縣委書記。”劉書記接著往下說，“年紀大的人可能還認識我，打遊擊的時候我到咱們小套子來過，住在鄉親們的家裏，吃的是鄉親們的飯，睡的是鄉親們的鋪，鄉親們保護過我。後來，我們勝利了，我也當了官，可是，我犯了官僚主義，我把鄉親們忘了，沒有再來過小套子，不知道一些村幹部在下面作惡，叫鄉親們受了這麼多的罪，吃了這麼多的苦。我心裏很難過，我在這裏向父老鄉親道歉！”劉書記深深地對著台下鞠了一個躬，“今天晚上，我們就開個鬥爭大會，像當年鬥地主一樣，來鬥這些作威作福欺壓老百姓的狗官。父老鄉親們，你們不要怕他們，我給你們撐腰！大家有冤的伸冤，有苦的訴苦，有仇的報仇！把那些欺負父老鄉親的壞蛋帶上來！”

劉書記一揮手，民兵從後臺牽過來一大群被用繩子反綁的人，一字兒跪到了臺子前邊，幾個公安人員持槍站在他們後邊。我個子矮，看不清跪著的是哪些人，往上跳了幾跳，看清了我們南村的連長歐儒存、我們生產隊的隊長趙子科、會計李愛芝（店裏二叔）、食堂會計王念昌，其餘的人我不認識。後來得知，還有大隊長張善合和中村、北村的幾個生產隊幹部，共計九個人。

會場一下子亂了起來，有人舉手，有的人不等舉手就往臺上爬，上去後不由分說就劈頭劈臉打那些跪著的人。民兵和公安人員並不阻攔。我看到一個婦女很快地爬上臺，邊打、邊哭、邊罵、邊訴。聽不清她說些什麼，大意是她的丈夫得罪了某個幹部，被打傷，停了她家的夥，使她的一個孩子餓死。不等她說完，王福雨嬸子沖上臺子，還沒有說話先脫了鞋，拿著鞋底對著張善合、歐儒存、趙子

科劈頭蓋臉打下去，她打累了，坐到臺子上雙手捋著腿哭起來了：“我的兒啊……我的嬌，我的親兒啊……我的乖……誰還我的兒子，誰還我的乖乖？……”哭聲感天地而泣鬼神。

聽著臺上人的哭訴，我突然覺得有很多話要說，有很多冤要申，有很多苦要訴，我要告他們！對，回家寫狀子告他們！我離開了沸騰的會場回家了，我拿起了筆，點上煤油燈，鋪開了紙，但我突然猶豫了：我要告誰呢？是啊，臺上跪著的那些幹部中的具體的哪一個害死了我的親人？我卻說不清楚。我又慢慢地合起了筆，收起了紙。

第二天早晨，我和母親正在院前自己的開荒地裏摘南瓜花，一個穿著中山裝的大個子官員在另一個官員的陪同下對著我們走過來。我一下子認出來那正是昨晚在臺子上講話的劉欽鑒書記。

“老人家，你還好吧？”劉書記非常和藹地問母親。

“好什麼呀，俺一家二十八天裏死了五口……”這一句問話引發了母親的傷痛，淚水像決了堤的河水一樣刷刷地湧出，放聲哭起來。

“老人家，說說都是誰害的你們？”劉書記更加謙和地問。

“我的爹啊我的娘，五口人呀，一家親爺五個呀……”母親哭得更傷心了。

“告訴我們到底是誰害死的他們？”劉書記確實想知道事情的詳細情況。

“親弟兄倆個，一個頭天，一個第天……一個睡櫥櫃，一個睡門板……不出一個月俺家餓死了親爺五個呀……死得虧啊，死得苦……俺找誰申冤去，誰能給俺報仇？”母親一把鼻涕一把眼淚地哭著，話說得語無倫次。

這本來是申冤訴苦的好機會，但我站在旁邊只陪著母親流眼淚，卻沒有說一句話，因爲我實在說不出究竟是誰害得我們家破人亡。

是啊，一九五九至一九六二年間數以千萬計的中國人被餓死，誰能說得清，究竟是誰害死了他們？他們該向誰伸冤？他們該找誰訴苦？誰該對他們的冤魂負責？誰該爲他們的死亡買單？

後來得知，那天下午來的那個大官是當時的省委副書記曾慶梅。

一九六〇年的夏天，蕭縣馬井鄉文化館一位叫楊文浩的館員寫了一封信給省委書記曾希聖，反映農村幹部胡作非爲、打罵群眾及村裏餓死人的情況。不過，他不敢署上自己的名字，而是匿名寄出——地方幹部要是知道有人寫信告他們，不把寫信的人整死才怪呢。不料，這封匿名信卻擺到了省委書記曾希聖的桌子上。此前省委對餓死人的事早有耳聞，這一次曾希聖決定查個清楚。於是，省委派副書記曾慶梅帶人扮成要飯的到蕭縣馬井村微服私訪，結果被該村的村長以流竄犯扣住，強迫他們抱磨棍推磨，幹完活還不給他們飯吃。曾慶梅表示不滿，遭到村長打罵。後經瞭解，該村長作惡多端。據說，他曾經把一個偷吃毛豆角的小孩一擗兩半，丟進井裏。曾慶梅回去向省委彙報後，立刻把這個村長抓起來槍斃了。這便是當時轟動全省、並被以多種版本傳播的“馬井事件”。此事引起了省委對下面幹部作風的重視，開始了進一步的調查。曾慶梅的碭山之行是繼馬井事件之後的又一次行動。

我們村的那這九個幹部當場就被戴上手銬，第二天，他們被用一根繩子鏈起來，由端著長步槍的公安局人員牽著，步行四十五裏押到了碭山縣看守所。王念昌和店裏二叔以多吃多占的罪名被判十五天勞教，其他幹部都被判了刑，歐儒存、趙子科、張善合因直接與王福雨家孩子的人命官司有關，被判了十五年徒刑。但他們實際

上只被勞改了三年，便被減刑釋放回家。李葆華上任後，他認爲安徽的災難是當時的政策使然，是上層領導（曾希聖）的錯誤所致，便給這些人減刑釋放甚至平反，所以當年有“曾打李保”之說。

一個民謠概括說明瞭這幾年的大事：

一九五八年，吃飯不要錢；

一九五九年，幹部打社員；

一九六零年，幹部都逮完。

二〇〇六年，當我開始寫這本書的時候，我試圖弄清楚：當時的村幹部明明知道家家戶戶沒有糧食，爲什麼還要打罵社員追逼，以致造成家破人亡的慘劇，自己也獲刑坐牢？我找了歐儒存。

“以前的事我都忘了，一點也不記得了。”對我的提問他好像早有思想準備似的，我的採訪還沒切入正題，他就用這樣的話堵了我的嘴。

“我大大上吊前，你知道趙子科給他說了啥嗎？”我想先撇開他，慢慢往正題上引。

“你大大是上吊死的嗎？”他反問我。

“是的，是你找人幫助埋的。我記得很清楚。”我言之鑿鑿。

“不對吧。我怎麼不記得呢？”他反駁我。

“我嬸子死後，我嫂子跪著求你，也是你找人埋的，”我進一步地提醒他。

“你別問我了，我年紀大了，一點不記事，啥都不知道了。”他的話封了死口，我的採訪只好中斷。

一九六〇年的下半年開始，工作隊被派到農村糾正“五風（共產風，浮誇風，瞎指揮，強迫命令違法亂紀風，多吃多占幹部特殊化作風）三害（貪汙、盜竊、投機倒把）”。社員們說，這次運動

像當年鬥地主的場面一樣。被“五風三害”害得家破人亡的社員們把仇恨統統集中到那些打罵過他們、停過他們夥的村幹部身上。

一個村子正在舉行控訴大會，被鬥的原村幹部蹲在會場中間。“你當年寒冬臘月叫我們脫了衣服跪著交待家裏的存糧，你現在也給我們跪下！”一個當年受過苦的社員手裏拿著一根荊條走到會場中央，對那幹部呵斥著。那個原村幹部乖乖地跪倒。“把衣服扒掉！”這位社員不依不饒。那位當年耀武揚威的村官又乖乖地脫掉棉襖。“唰，唰”這位社員用荊條朝那幹部的光背上抽了起來，一條子下去一道紅印，幾條子下去，鮮血就一滴一滴地往下掉。

是的，在那個特定的年代裏，政策的執行者，大大小小的地方官，因其執行政策的手段不同，所造成的災難程度也有別。我們的鄰省江蘇就很少“非正常死亡”。彭捷老師的家鄉安徽宿縣欄杆，有的人眼看著自己的孩子要餓死，不得已想出了個求生之道：他們把只有十四、五歲的女兒嫁到鄰近的江蘇去。雖然她們遠未到嫁人的年齡，但凡嫁出去的都幸運地活了下來，而仍苦守本村的女孩子大都被餓死了。

羅集人在“對《曾希聖傳》序言的幾點質疑”一文中說：“曾希聖在安徽大搞浮誇風是全國有名的，創造性地發展了左的錯誤，其直接後果就是安徽在 1959-1961 年餓死人的絕對總數（439 萬）列全國第二（僅次於人口總數多一倍以上的四川省），而餓死人的比例列全國第一。”曾在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擔任要職的陳一諮說，安徽省餓死的人數為 800 萬，即全省人口（3300 萬）的四分之一。（見《餓鬼》第 396 頁）

我們唐寨公社原書記梁學孔《我的回憶錄》說，碭山縣歸屬的蚌埠地區十六個縣死亡一百五十萬人，碭山死亡六萬人。

作為省委書記的曾希聖難辭其咎，對這一切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中央一九六二年的七千人大會上，毛澤東曾義正詞嚴地不指名

地批評曾希聖，把他比作那位“力拔山兮氣蓋世”的霸王，並說他早晚一天也要“別姬”的。但滑稽的是，曾希聖晚年政治上的落魄，卻不是因爲成千上萬死於饑餓的生命，而是由於他爲拯救瀕於死亡的農民推行的“責任田”和“三自一包”！

行兇作惡的村幹部都爲他們的罪行付出了代價。《求索中國》中說，一九五八年以來，整人最多的有兩次：一是廬山會議後反右傾運動被劃爲“右傾機會主義分子”，一次是一九六〇年底整風整社運動被劃爲漏網地富分子或破壞分子。前者是反“左”的，後者卻是執行“左”的！一九六四年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這些基層幹部的大多數又被打成“四不清”幹部，遭到殘酷鬥爭。

14・痛定思痛

幾十年來我曾無數次苦苦地思索著父親的死因。他何以能毅然地捨棄我們？他嗷嗷待哺的孫子孫女，他未成年的兒子和曾讓他經常生氣的憨兒子（我的二哥），還有他奄奄一息的老父親？他應該知道母親是沒有能力領著全家度過這個凶年的。

在埋葬了父親的當天晚上，我曾經問過母親父親爲什麼會上吊？因爲接著去料理叔父的事了，母親沒有來得及給我說。後來我從母親、嫂子和店裏大嬸那裏得知，父親早就不想活了。他多次對店裏大嬸說：這樣活著有啥意思？不如死了。每一次，店裏大嬸都這樣勸他：“你不能死，你上有八十多歲的老爹沒有送到南門坑裏，下有沒成年的兒子，還有幾個月大的孫女，你怎麼能死？再說，你死也死不起，家裏連個三寸板（薄棺材）也沒有。”聽著大嬸的勸告，父親不語，只是歎氣。最後總是說：“眼一閉，啥也不管了。死了也不用三寸板，用一張箔一卷，拉到南門外高頭底下挖個坑埋了就算了。”想不到父親的話竟成了讖言。

不久，也就在父親自殺前半個月的樣子，嫂子早上起來到鍋屋裏抱柴禾，一眼看見父親正站在鍋臺上往房梁上掛繩子，嫂子上去抱住父親的腿，大聲哭道：“大大，大大，你不能死……大大，你怎麼能捨得我們老少娘們？大大，我的好大大……”

父親從鍋臺上下來，嫂子趕忙跪倒在他面前，連聲喊：“大大，我的好大大，求求你，你可不能撇下我們不管……”

嫂子的哭聲把全家都驚起來了，母親、二哥和和不懂事的侄兒、侄女，全家都過來了，一起跪在父親面前，全家哭作一團。最後，父親一個個把孩子們從地上拉起來，泣不成聲地說：“起來吧，乖乖，我不死了，我陪著你們……”

嫂子還是不起，父親又說：“快起來，乖乖，大大真的不死了，我帶著你們一起往前熬……”

母親拉著長音哭著說：“我的爹啊，我的娘，你怎麼想起來的上吊？……你看看這一家人，老的老，小的小，哪個能離開你？我的爹啊，我的娘，……你到底是怎麼想的？”

父親又一次當著全家的面表示“不死了”。

母親把這件事告訴了店裏大嬸，大嬸對父親連勸帶數落：“傳先哥，你是憨了還是傻了？你怎麼想起來走那條路？看看你那老少一家子，你就能捨得他們撒手走了？你對得起你的老父親嗎？不把他送到南門坑裏，你就能先走了？再說，你走了，嫂子能帶著這一家子熬過去嗎？眼見得地裏麥子長高了，再過幾個月新糧食不就下來了嗎？我不信日子能老這樣……”

聽著大嬸的話，父親還是不語，只是一聲接一聲地歎氣。最後說：“放心吧，您大嬸子，我不走這條路了。”

大家都信了父親的話，他以後也沒有再說“不想活”的話，全家都以爲他不會尋死了，以爲他會帶著全家往前熬。一家人重新以

一種積極的態度過日子，母親便帶著侄子去了舅舅家。據說舅舅那裏地裏還能撿到紅芋根。

在那些日子裏，父親經常被小侄女的哭聲攪得心神不寧。一聽到小侄女的哭聲，他就睡立不安，在嫂子的住房門口來回走，然後問：“小閨女咋老哭？是餓的吧？”

“不是，大大，你睡吧，”嫂子這樣安慰父親。

小侄女的哭聲常常持續一夜，父親也就一夜一夜地在院子裏來回轉。他在受著煎熬，在心裏進行著艱難而痛苦的生與死的鬥爭。後來在說到父親的死因時，母親多次說過：“要不是那小閨女，你大大不會走那條路的。”

應該說，小侄女的哭聲是促使父親最終決定終結自己生命的重要原因：他不忍心眼睜睜看著自己嗷嗷待哺的孫女，還有年過八旬奄奄一息的老父親都活活餓死，都拖延而屈辱地死去。

過去農村裏流行著“餓死不作賊”的俗話，但在那個年成，人人都突破了這個道德底線，撐死膽大的，餓死膽小的，為了活命，家家戶戶都在偷。用社員的順口溜說：社員偷地裏的，隊長偷場上的，連長偷倉庫裏的，整個農村形成了一個“偷”的鏈條。生產隊長趙子科說，除了朱敦宣外，整個第四隊的人沒有一個不偷的。但不久朱敦宣也在偷莊稼時被趙子科逮了個正著！

聰明人的偷竊還有點“技術含量”。有一陣子，食堂裏憑票發饃。當時的“票”也極簡單，就是一個蓋了會計私章的白紙條。時間長了，張會計發現一名姓唐的社員每次領的饃都比別人多，他把食堂回收的“票”仔細一數，發現比發出的“票”多出很多。張會計便對這位唐姓社員進行逼問。唐招了，並拿出了自己埋在茄子地裏的偷刻的張會計的私章。張憤怒至極，讓唐脫下褂子跪倒，拿起

一塊劈柴，照著唐的脊樑狠狠地抽打。不大會，唐的後背變得血肉模糊，鮮血順著一滴一滴往下流。

那年，我的妻叔在外邊教書，妻嬸一個婦女帶著四個孩子在家，最小的孩子才只有兩三歲。當時幾個孩子被餓得半死，脖子已經挑不住腦袋，天天在屋裏躺著昏睡，如果沒有人叫他們，他們可能就從此不再醒來。妻嬸不忍心看著孩子餓死，大著膽子出去偷。有一天晚上偷了半麻袋地瓜（一種像黃瓜但比黃瓜大得多的瓜類）回來，把孩子喊醒，掰斷分給孩子吃。她描述當時的心情說：“一開始我很害怕，以爲只有我一個人在偷，到地裏一看，滿地都是偷瓜的，誰也不怕誰，以後再偷膽子就大了。”後來她也被弄到大隊去鬥。鬥就鬥吧，鬥過還得去偷。

二〇〇六年秋天，我採訪劉以臣叔的時候，稱讚他八十九歲的高齡還每天下地。劉以臣叔自豪地說：“我一輩子行好，不做虧心事，吃得香，睡得著。但是那幾年我孬了，我偷東西了，天天晚上出去偷，只要是好吃的，什麼都偷——我不能眼看著一家子人餓死。”他還向我敍述了發生在當年的一件事：劉以臣叔當時在隊裏擔任飼養員。有一天，不知哪個村子的一隻牛犢跑到他們的牛屋裏。幾個飼養員一商量，把小牛犢宰了，美美地吃了一頓之後還各自往家帶了一點小牛肉。但不久東窗事發，隊幹部要鬥他們。爲了逃避鬥爭，幾個飼養員統統逃往他鄉。劉以臣叔在東北過了好幾年，直到反“五風三害”之後，當年的幹部都被整下去了，他才敢回到家裏來。崔庭芳也和他們一起偷吃了牛肉，後來又偷了油，被工作隊打了二十八鞋底！但是，他活過來了。

“別人家都是大人養活孩子，我們家是孩子養活大人，”現爲廳級幹部的妻弟回憶當年時說。岳父念過私塾，孔孟的書讀了不少，雖當時已被餓得肚子腫了起來，也斷不願偷；岳母有殘疾，自不能

偷；上面還有六七十歲的奶奶，全家處在鬼門關口。我的妻子雖爲老大，但正在學校讀書，救活全家的使命便自然地落在只有八歲的妻弟身上。我的妻弟不辱使命，他白天假裝玩耍四處溜達踩點，晚上偷偷摸摸出去，不大會總滿載而歸，或是紅芋，或是南瓜、地瓜，有一次竟然弄了半口袋糧食回來！一天晚上，他爬到地裏摸到個瓜，但摘掉後發現這是一個留作種子的大冬瓜，他根本弄不動它。想了一會，他把褲腰帶解下來撕成兩半，接起來把冬瓜拴上，系在腰裏，然後匍匐著往家爬，拖著冬瓜在後面滾。他累得出了一身大汗，但到底有大收穫：全家人吃了兩天！

還有一天，他在乾涸的坑裏挖野菜，竟然發現了兩小口袋黃豆！他趕緊抱起一口袋放在糞箕裏，用草蓋上挎回家。他想晚上再把那一口袋也弄回來。可是，等他天黑後再找到那個地方時，那一口袋黃豆已經不見了。他至今想不清楚，是誰把兩小口袋黃豆埋到那個地方？

摩西十誡之一是不准偷盜。但在那個時候，一些高級知識份子也違了這個誡。經濟學家顧准被打成“右派”後，下放河南商城監督勞動。在《商城日記》裏，他毫不諱言地記錄自己爲了果腹而偷吃蘿蔔的事情。

楊顯惠的《夾邊溝紀事》裏說道：在夾邊溝農場，對於苟且偷生的右派，偷盜是“自然而然”、“水到渠成”之舉。生性本份的原蘭州市工商局的科長俞兆遠“見吃的就偷，不管不顧地偷”，成了一個“賊骨頭”！倉庫裏的糧食、食堂裏的窩頭、豬圈裏的豬食、野地裏的花生秧，管教幹部扔在房頂上的羊皮……都是他的目標。偷盜和吃生食，這就是夾邊溝農場三年勞教教給他的生存之道。

然而我們這個農民家庭卻連這個最淺顯的生存之道也不懂，全家人一直迂腐地恪守著這條人生準則，沒有一個人會偷。父親一輩子老實忠厚，謹小慎微，奉公守法，不願到老了反倒落個“偷盜”

的名義而被鬥。二哥可能是在學校受過教育的原因，也不會偷。母親和嫂子更不是那種“有本事”的人，全家人只有呆在家裏餓以待斃。

父親眼睜睜地看著鄰居一個接一個、一家接一家地死去，皮子大爺死了，唐占廷死了，何香林一家弟兄倆個死了，王成賢一家娘兩個死了，楊文彬死了，楊文棟死了，唐朝豐七、八歲的兒子也餓死了，……

楊文彬臨死的頭一天晚上，呻吟了一夜，斷斷續續地對兩個兒子和兩個兒媳婦重複著同一個要求：“你……你們能給我燒……燒碗湯喝嗎？給……給我一個糁……糁子窩……窩窩吃吧……”可那個時候，家裏用什麼給老人燒湯呢？不要說米麵，連一棵野菜也沒有。食堂裏倒是有糁子、澱粉，可人家給不給呢？再說那是夜裏，管夥的和炊事員都早回家睡覺了，找誰要去？第二天天麻麻亮，大兒子楊善運端著個面瓢找到食堂的時候，大門還沒開。他雙手抱著膀子守著面瓢蹲在門口等了好一會，管夥會計王念昌來了。楊善運把老父親在家裏嚎叫了一夜的話對他說了，王念昌還是不錯，把糁子、澱粉和野菜幾樣東西搭配著給了他大半瓢。當楊善運高高興興地端著救命的食糧回到家的時候，老父親已經斷氣了。可憐老人家念了一夜，沒來得及吃上糁子窩窩，喝上湯就匆匆地上了黃泉路。一家老小面對著死去的老人，連哭的力氣也沒有。最後，兒媳婦用從食堂要來的東西貼了幾個餅子，全家人吃了這幾個餅子，才對老人哭了一陣，送到地裏埋了。

我那不滿周歲的小侄女每天一夜哭到天亮，父親又眼見得自己八十多歲的老父親一天不如一天，而村幹部還在繼續打人罵人鬥群眾逼糧食——他實在看不到一點點生的希望。

父親當隊長時，村裏的頭面人物如村長唐朝敬、歐儒存等經常到我家裏來和父親商量村裏的事，他們都很尊敬地稱呼父親“傳先

哥”。後來，父親不當隊長了，還受著村幹部的尊敬，並繼續擔任村裏糧食保管員的要職。到了一九六〇年，村裏已沒有什麼糧食，幹部便讓他看管紅芋育苗床。那時看管紅芋育苗床比當糧食保管員更難。被饑餓逼瘋了的饑民，把紅芋育苗床當成最好的目標，冒著挨打、被鬥的風險，想盡一切辦法去偷。用劉以臣孀子的話說：“你栓個老虎也看不住。”所以儘管父親盡心盡意地看管，常常夜裏不敢合眼，苗床裏的育種紅芋還是日漸減少。父親曾向隊長提出辭去這個看管員的職務，但隊長不准，因爲除了父親他實在找不到更放心的人。這在父親是個很大的壓力：紅芋在減少，父親又抓不住偷紅芋的人，別人就會自然地懷疑是父親自己在監守自盜。說你自己沒偷，有誰信呢？跟誰去說呢？父親膽小，想不開，背著沈重的思想負擔。終於有一天，趙子科隊長發話了：“要是再抓不住偷紅芋的人，就是你自己偷的！”許多人都是一邊挨鬥一邊再偷，抓住了就挨鬥，抓不住我就吃，所以這些人不會餓死，當然更不會去自殺。然而父親則不然。他雖不能像老舍先生那樣在投水自殺前說出“士可殺而不可辱”的豪言，卻一樣不願意讓別人往自己一世清白的身上潑髒水，所以，就這麼一句話足以使父親最終作出死的決定。

前面已經提到，每次去食堂領飯回來的路上，二哥都在每一個饃上咬一口，罐子裏的稀飯也被他喝掉半碗，對二哥置全家人於不顧的做法父親很感到寒心，從而看不到一點陽光，對生活感到徹底絕望。

“哀莫大於心死”。學者們對自殺的研究表明：自殺的人實際上心理上早已經死了，徹底絕望了，自殺只是消滅身體而已。而且，根據他們的研究結果，百分之四十六的自殺者從自殺動機的產生到實施只有五分鐘的時間。所以，從理論上看來，父親的自殺是不可避免的了。

學者們對自殺的研究還說：自殺都是有先兆的。如果別人得知這一先兆後及時與之溝通、交流，大部分自殺是可以中止的。

在父親自殺的前兩天發生了一件極其悲慘的事。王福雨是我不同姓的一個叔輩，他事先“流竄”到東北，家裏剩下福雨嬸帶著兩個孩子。福雨嬸到親戚家給孩子要了兩塊紅芋，被村幹部看見，隊長懷疑她家藏有更多的紅芋，所以要開會鬥她。她家有兩個孩子，大的是女孩，七、八歲，小的是男孩，只有一兩歲，家裏還養著一隻綿羊。臨去參加會議時，福雨嬸給孩子點好燈，鎖好門，安排好兩個孩子在豆秸、麥草鋪成的地鋪上睡覺。

福雨嬸正被鬥得焦頭爛額時，突然外邊有人喊“救火”，村長出門一看，只見火光沖天。於是，連長宣佈會議暫停，叫大家出來救火，福雨嬸這才得以解脫。大家跑出來一看，失火的正是王福雨家，福雨嬸立時癱倒在地。救火的人們趕到的時候，大火已經吞噬了整個房子。人們七手八腳，澆水的澆水，拆房的拆房。當火終於被撲滅的時候，人們發現王福雨的兩個孩子和綿羊全被燒死了，大女孩倒在門旁，手扒著門框，小男孩被燒死在床前，已經被燒成了兩個小炭棒。

王福雨兩口子哭天嗆地，他們的孩子沒了，他們的綿羊沒了，他們棲身的草屋也沒了，他們的家沒有了，他們成了真正的、徹底的無產階級！

事後人們分析，兩個孩子一定是在睡覺時不小心弄翻了燈，燈油潑了，燒著了鋪床的草，然後引燃了房子。

這件事對父親、對全村的人都是一個極大的震動。後來歐儒存、張善合、趙子科幾個幹部之所以被判了重刑，都是牽涉到這起人命事件。

一天晚上，嫂子和三個侄女已經睡著，父親從外邊喊道：“小紅的娘，叫孩子們起來，起來吃肉。”

嫂子半信半疑，這年頭哪裏來的肉？順便說道：“孩子們都睡著了。”

“叫他們起來，把他們叫起來，起來吃肉！”父親又催促道。

嫂子把幾個孩子喚醒，開開門，見父親雙手捧著一個紙包。

“您福雨叔家的羊給燒死了，我去買了點羊肉，讓孩子們吃吧，吃飽。”父親補充說。

嫂子接過羊肉，喊醒昏睡的孩子，讓孩子們解了饞。

此前，父親已先把一小包羊肉送給了爺爺。

這時，父親好像感到了結了一個大心願，一個最終的心願。

第二天早晨，父親醒得很早（他應該是這一夜都未睡著），對二哥說：“咱家的土地證和合作社股份證放在一個那個木盒裏。”

二哥“嗯”了一聲。

“木盒藏在堂屋東山的牆洞裏。”

二哥又“嗯”了一聲。

這分明是父親在做身後的交代，是重要的先兆。以二哥當時的心理狀況，他不可能意識到這一點，更不會及時與之溝通、交流，那麼，父親的自殺行爲就沒有人去中止。

二哥醒來發現不見了父親，有點心慌。他去問嫂子：“咱大大到哪裏去了？”

嫂子一聽更加害怕：“不在屋裏嗎？”

“不在。”

嫂子更慌了：“紅芋床子那裏呢？”

“我去找過了，也沒有。”

“他沒給你說啥嗎？”

“他對我說股份證和土地證都放在那個木盒子裏。”

一種不祥的恐懼倏地襲上嫂子的心頭，嫂子一骨碌從床上下來，急忙跑到鍋屋，一眼看見父親正吊在房梁上。

嫂子慌了神，趕忙大喊：“快來人啊，俺大大上吊了！”

聽到喊聲，住在我家堂屋西間的李樂斌第一個沖進鍋屋，他跳上鍋臺，拿起菜刀，一把割斷了房梁上的繩子，陸陸續續到達的人們慌忙找來棉衣棉被，把父親的鼻子、嘴和下身全部捂緊，然後李樂斌爬到房頂上，用笤帚把敲打著簸箕，大聲喊道：“傳先大爺……回來啊！傳先大爺……回來啊！……回來啊，傳先大爺……”

然而父親終究沒有回來，他走了，永久地走了。

我的同桌翟素霞在不到一年的時間裏，先後失去了兩個最親的親人：母親和大姐。大姐死後，姐夫又回到自己的家裏去了。在大姐死後的一個星期六，翟素霞回了家，但家裏已人去房空，再沒有一個親人。面對著空空的院子，她傷心地哭了起來，哭著哭著自己餓著肚子睡著了。第二天上午她用學校發給她的一斤糧票到糧站買了一斤紅芋片，自己煮熟吃下，然後又回到學校了。我們的校花枯萎了，我們的小燕子變成了無巢的鳥，她和她也正在讀書的哥哥變成了孤兒，我們的“四白”突然之間變成了一個孤苦伶仃的孩子。無家可歸了，她只好以校爲家。假期裏，她到處“打工”，幫助陳文傳老師修樹，在菜園裏跟尉師傅種菜，還跟黃師傅放過羊。這樣，學校給她三頓飯吃。高三畢業後的那個暑假，學校無處“打工”，她只好回到自己的家所在的生產隊，給隊裏看場。別人常看見她孤零零的一個女孩子坐在麥場邊，手裏拿著一根小棍，眼神木然，神情呆滯。

二〇〇六年十二月六日我去拜訪昔日的同桌。“那時候我怕過星期天，更怕過年，”翟素霞眼裏噙著淚水向我回憶起往事時說。放了假，別的同學都回家了，整個學校變得空蕩蕩的，常常只有她

一個人形單影隻，連個說話的同學都沒有。晚上，平時擁擠的寢室變得空曠，她一個女孩子被寂寞、淒涼、寒冷、饑餓所包圍。這時候，她就用被子把頭緊緊地裹起來。她告訴我，她第一次一個人在學校過年的時候，蒙著頭哭了半夜。

當我動手寫這本回憶錄的時候，我曾動員她也拿起筆來。她當時答應了，但一個月後她回答說，她無論如何不願意做這件事。往事不堪回首，她寧可讓往事被慢慢遺忘，也不願意去揭心上尚未愈合的傷疤。

盼星星，盼月亮，好容易熬到麥子黃了。然而，當麥子成熟的時候，安徽省固鎮縣孟廟村的麥子卻無人收割——這個村子的社員們已全部被餓死。我愛人王彩霞的老師王衢生帶領宿縣師範的學生來到這裏幫助午收。當他們到達這個村子的時候，但見牆倒屋塌，滿目瘡痍，荒草從倒塌的房子下面竄出來，長到一人多高。他們滿村子尋找，竟然找不到一個人，也找不到一口可以做飯的鍋。最後，他們在村邊莊稼地的麥壟裏，發現一個苟延殘喘的老太太。他們扶著老太太來到村裏，老太太把自己原來用的鍋借給他們。

學生們用這隻鍋做了飯，可是第二頓的飯做好了卻沒有人願意吃。王衢生老師很是納悶。一個學生偷偷地告訴他：他們聽老太太說，她之所以能倖存下來，是因爲她用這口鍋煮過兩個死孩子吃。後來，連死孩子也找不著了，她就鑽到麥壟裏吃麥苗，吃未成熟的麥子，活到了今天。當他們一個星期後回校時，那個唯一倖存的老太太也斷了氣。

彭捷老師告訴我，他的一位遠門的爺爺餓死後被草葬入地，老翁的侄子夜間偷偷把他的屍體弄回家，扒下他的棉袍，隨手搭在屋樑上，然後把老翁拆散放在大鍋裏煮而食之，還將沒有吃完的肉賣給了鄰居。有人懷疑，把情況偷偷地告訴了老翁的女兒。老翁的女

兒聽說後，回娘家探聽情況。走進堂兄家的門，她一眼看見屋樑上搭著父親的棉袍；掀開鍋蓋，鍋裏還殘存著幾根大骨頭。女兒頓時一切都明白了。她氣昏了頭，憤憤地瞪著堂兄，罵了一句很不得體的髒話："你這個千刀萬剮的，什麼鳥東西都能吃！老天爺有眼五雷轟你！"

店裏大叔朱樓的本家侄子李守常小收成哥一兩歲，當年 20 歲左右。一九六〇年青黃不接的時候，守常拿著幾毛錢去唐寨街上買吃的，然而他走到離街還只有裏把路的地方倒下了，從此再也沒有爬起來。他在那裏暴屍兩三天，路人無人問津。家裏人幾天不見蹤影，正在焦急，聽說唐寨街東頭不遠的地方有一個死人，他們趕忙跑去看，果然死者就是他們的親人！

唐德剛在《大躍進後安徽餓死人的實例》中寫道："發生在幾十年前中國的'大饑，人相食'的史實，因爲死人太多，每一個華裔家族，幾乎是沒有不受衝擊的。……1959 年春青黃不接，全家斷炊。堂弟德謙不得已加入盲流，擬在城市乞食維生。然因無城市戶口，乃被公安趕回鄉下。德謙被逐還鄉之後，不出三數日，一家四口便同時餓死了。從德謙之死開始，我才知道幼年期在農村的玩伴：小烏龜、小和尚、楊道士、小根子幾乎全部餓死……。最不忍卒聽的是，人死了留在家中不敢埋葬，因爲饑民往往於夜間盜墓，偷吃死屍也。更無法卒聽的是父母往往乘幼年兒女熟睡時，用枕頭或被褥把他們悶死，然後與鄰人交換蒸食。這就是古史上所說的'民易子而食'活生生的現代版。……我記得在母省旅行時，麵包車司機爲我指點，某村死光，某村死一半，某村逃亡，始終無一人回村……"

一九五九——一九六二年非正常死亡人數究竟是多少？沒有官方公佈的精確數字，民間統計的數字爲四千萬——六千萬不等。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原副主任廖蓋隆在《炎黃春秋》第二〇〇〇年第

三期著文透露，在“大躍進”期間，全國非正常死亡人數達四千萬人之巨。一九九三年，上海大學金輝以國家統計局發佈的人口統計數字爲依據，得出結論：“僅僅中國農村的非正常死亡人數，就可能達四千〇四十萬。”陳一諮說，全國大饑荒期間的死亡人數在四千三百萬到四千六百萬之間，在黨內高級幹部會議上，還有人說出高達五千萬到六千萬的數字。（見《餓鬼》第 396 頁）

其實，爭論究竟是四千萬還是六千萬是沒有意義的，因爲中國人民只知道在一九五九——一九六一年期間發生了“百年不遇的自然災害”，又由於蘇聯修正主義領導人背信棄義撕毀合同撤走專家，使我國度過了“三年困難時期”。這背後的龐大數字和真正的原因是極少有人知道、也極少有人追問的。直至今天，很多中國人，尤其是中國的年輕人，仍然不敢相信這場奪取了數千萬同胞生命的災難曾經存在過。

我全家當時有十二口人，在短短的二十八天中五位親人先後死去，他們是這四千萬——六千萬人中間的五人，他們是我們全家人口的十二分之五，幾乎占了我們全家人口的一半！還有千千萬萬的家庭全家都被餓死，換言之，他們這些家庭的死亡比例達到了100%！

歷史教科書上公佈的整個抗日戰爭期間死亡的中國同胞爲四千五百萬。也就是說，一九五九——一九六二年“非正常死亡”人數接近於、或等於或大於整個抗日戰爭期間中國人死亡的數字。我們可以憤怒地說，日本帝國主義殘酷殺害了四千五百萬中國同胞，但誰是這四千萬——六千萬“非正常死亡”的罪魁禍首？我的父親和叔父沒有死於地主的剝削，沒有死於國民黨中央軍的戰火，也沒有死在異族入侵者日本鬼子的煤窯裏，卻死在了……

半個世紀前的那場災難對我的身心都產生了巨大的影響。雖然我的爺爺、父親、叔叔、乃至我的大哥都是中等身材，我卻只長到一米六。按現在的標準，應算是三級殘廢。也就是說，饑餓使我違背了遺傳基因，我就像一個正在生長的葫蘆被斷了水和肥，然後萎了。而且，在那些年裏，我自己擔當了太重的責任，像是一隻螞蟻，身上肩負著遠遠大於自己體重的負擔。

每次回鄉經過大南門口的時候，我都不由得扭過頭去看那荒灘上的三座墳塋，那裏並排躺著撫育我長大的五位老人，辛酸的回憶使我淚如雨下……在與家人和鄰居的相處中，每每聽到對往事的回憶。於是，痛苦在我的心裏層層地疊加、積累。

一九六〇年，呼啦啦如大廈傾，我還沒有反映過來，就家敗人亡，於是我真正理解了父親剛去世時母親說的“天塌了”的意思。這種家庭的敗落，使我產生了強烈的自卑感，而且這種自卑感一直伴隨了我許多年。別人父母雙全，我沒有了父親；別人能享受到的，我已經無權享受；別人不能忍受的，我必須忍受。

我曾經無數次地考慮過：如果父親不自殺，家庭的悲劇是否可以避免或者減少呢？父親屬豬，辭世時年僅六十一歲，用母親的話說：“正是領家過日子的時候”，是不當死的年齡，是應該能熬過來的。有父親在，我們家的“天”就不至於塌。祖父當時年事已高（據推算應當是 82 歲），在當時幾乎完全斷炊的情況下，恐怕難以熬過去；小侄女生不逢時，怕也在劫難逃。叔父如果沒有父親自殺的強烈精神刺激，雖然挨了鬥並受了外傷，也應該不至於撒手人寰；有了叔叔的相伴和照顧，嬸母也應該能挺過來，因爲叔叔畢竟當時只有五十二歲，嬸母還不到五十歲。但是，我理解父親：他怎麼能眼睜睜地看著自己的父親和自己的孫女在自己面前死去呢？

大饑荒已過去快半個世紀，但它像一張巨大的陰影，我永遠無法走出。這種揮之不去、斬之不斷的刻骨銘心的黑色記憶被定格在我的腦海裏，我獨自一個人在心裏默默地承受著這人生最大的悲痛。它融入我的血液，鑄進我的骨髓，滲透我的靈魂。三月七日，是父親的忌日，是我家天塌地陷的日子。每年的這一天，我避開家人，獨自一個人撒酒於地，面北而跪，恭恭敬敬地磕三個頭。我祭奠的當然不只是父親一個人，而是祖父、叔父、嬸母、甚至我的小侄女，還包括十一年後同樣死於非命的母親。我不是教徒，但我誠心地希望有來世，希望有另一個世界存在，我請了一尊觀音菩薩像，供奉在客廳裏。每天早晨淨面漱口之後的第一件事便是對著觀音娘娘的佛像恭恭敬敬地焚上一柱香，心裏默想著祖父、父親、母親、叔叔、嬸嬸、大哥、二哥連同我不曾晤面的小侄女的面容，默默地許著願：願大慈大悲的觀世音保佑他們在另一個世界裏享受著幸福，然後以頭觸地叩拜三次……

母親去世後，每次看望岳父母，他們都盛情留我多住，好飯菜款待。他們的好意我當然理解——讓我得以繼續享受到父愛和母愛。然而，我卻一天也不願意在那裏多呆：看到妻子父母叔嬸俱全、奶奶健在，全家沐浴著融融的天倫之樂，我便會油然想起我的家，我的父母、我的爺爺、我的叔叔嬸嬸……羨慕之後是一種鑽心的痛苦，一種"子欲養而親不待"的愧疚與遺憾交織的痛苦。

此後的幾十年裏，不論在任何場合，一提及一九六〇年、家庭、父母等敏感字眼，我就會淚如雨下，不能自已。有的人說我感情豐富，實在是我的痛苦太深，在我心裏積澱得太久，就像地火在地下醞釀得太久，一有機會就噴發。

高中畢業時原初三（1）班全體同學合影。第二排右起第一人是我，第二人是班主任趙耀久老師；左起第一人是李樂銀，第二人是炊事班長的弟弟潘振海，第四人是鄭立華。第三排右起第一人是唐恩成，左起第一人是李恥門。第一排右起第二人是翟素霞，女同學中已經沒有了王秀真和唐愛華。攝影時間：1963 年 4 月

我與好友王明義 1960 年初中畢業時的合影。我當時仍然穿著重孝。我比王明義要矮兩頭。



我所在的碭山中學高三（2）班畢業照。攝影時間：1963 年 4 月。

第四排左起第三人爲李鴻儒，第五人爲劉法強（見第五章第 11 節“風雨又起”），第八人爲孫光華，第十二人爲王洪周，最右邊爲作者。

第三排第一人爲李恥門，第三人爲汪海忠，第六人爲胡炳義。

第二排第第四人爲俄語老師程傳康，第七人爲教導主任楊榮清老師，第九人爲班主任張士魁老師。



第三章　我的高中

（1960 年秋——1963 年夏）

1・相依爲命

一九六〇年夏天，我順利地通過了高中入學考試，被錄取到碭山中學高中部。

快開學的時候，母親突然得了病，腹瀉不止。我想了很多辦法，先採用土法煮馬齒莧水喝，後來又去醫院給她買了藥，只是治不好。經過了幾年饑餓的煎熬，剛剛從死亡邊沿上掙紮出來，母親已經骨瘦如柴，那裏能經得起疾病的折磨？幾天之後，母親眼見得就起不了床。我極其擔心，很害怕母親闖不過這一關。後來，別人告訴我一個單方：用棉油炸雞蛋吃。可是，家裏哪裏有棉油呢？好心的鄰居告訴我，大隊油坊裏有棉油，讓我去求求大隊幹部。我找到大隊會計張懷宏，向他說明瞭情況。張本來是高我兩個年級的同學，又目睹了那些橫行霸道的幹部的下場，很爽快地答應了我的要求，給我寫了個條子，又加蓋了大隊的公章。符著這個條子，我便到油坊裏順利地領來了一斤棉油。爲了保證母親用兩間小屋換來的那隻老母雞每天下蛋，我精心地餵養著它。在地裏我一邊割草，一邊逮螞蚱，然後穿在一根長狗尾巴草上。這樣回家的時候，總能爲那隻老母雞帶一串螞蚱。另外，我還縫了一個小口袋帶在身上，把在地裏搓的草種子裝在裏邊，以作母雞的飼料。

每天下午割草回來，我便支起兩塊磚頭，點著柴禾，往一隻小勺子倒些棉油，架在那兩塊磚頭上，棉油煮開後，我把一個雞蛋打進去，來回翻幾個個兒，等雞蛋炸得發黃，我便叫母親趁熱吃了。

每天我耐心地重複地做著這同樣的事。不知是這個藥方真的有效，還是老天爺可憐見我，不願意讓我淪爲孤兒，漸漸的，母親的腹瀉止住了！謝天謝地，我長出了一口氣。

雖然母親的病好了，我還是不放心，因爲我走後家裏就只有母親孤零零的一個人，萬一再有個病災的……家裏雖然有嫂子和侄兒侄女，但我哪裏指得住他們？大哥好像知道了我的心思，告訴我，他已被調到唐寨中心小學來，離家近了，隨時可以家來，母親的事儘管放心。有了大哥的這番話，我的心略微放寬了。我把一些事向母親做了安排，從井裏挑水把家裏的水缸和罎罎罐罐裝滿，又吩咐大侄女經常給母親挑水等，這才去學校報到、註冊、上課。

高中不再像初中那樣按地區分班，我和翟素霞分開了，他在高一（1）班，我在高一（2）班。但我們還是經常見面的。或許因爲經過了大劫大難，也或許因爲又大了幾個月的年齡，她變得沉默了，老成了。她退出了體操隊，那個在高低杠上翻飛的小燕子身影消失了，我們也聽不到了她“咯咯”的笑聲。見面我不再叫她“四白”，而改稱“素霞”。

開學的第一堂課是下鄉支農。我們由職老師帶領到了城東良梨公社的王暗樓，而且一幹就是一個月。我們幫助社員幹各種農活，拾棉花、刨紅芋、割豆子等等，反正是有什麼活幹什麼活。一天三頓吃的都是紅芋，早晨是紅芋稀飯，中午和晚上是蒸紅芋，不過是中午和晚上多了一碗煮白菜或野菜湯而已。

王暗樓靠近我姨媽家，離我家也只有十來裏路。我惦念著老母親，計畫著瞅空回家看望她。休息的時候，別人都放平身子在地上躺一躺，放鬆一下彎折了的腰。我不捨得浪費這個時間，一個人走到收過黃豆的地裏去，蹲在地上一粒一粒地撿拾地上撒落的豆粒。每次工休，我總能撿到好幾把。爲此，我還用碎布縫了一隻小布袋。

每撿一把，先倒進我的褂子口袋；等褂子口袋滿了，再掏到那隻小布袋裏去。這樣，一個多星期後請假回家的時候，我就帶給了母親二三斤黃豆。在那個不見粒米的時候，二三斤黃豆夠母親貼補一陣子呢。這一段時間裏，我一共回了三次家，共給母親帶回了十來斤黃豆。

回校上課以後，我仍然時刻不能放心在死亡線上掙紮的母親。二哥此時還在服刑，大哥平日忙著工作，難得回家，嫂子本來就與母親關係不好，侄兒侄女不懂事，誰能照顧母親呢？伴隨母親度過那漫漫寒夜的只有母親那隻老母雞。母親吃水很困難。水井離我家半裏路，她挑不動水桶，每次都是提著一隻小罐子搖搖晃晃去井裏拎。爲了把小罐子灌滿水，她不得不趴在井沿上搖半天罐子。逢到天陰路滑，母親就沒了辦法。

在學校裏吃飯時一端起碗來，母親形銷骨立、面黃肌瘦的形象便出現在我的面前，使我難以下嚥；睡到床上，依稀可見黑暗和寒冷包圍中的母親孤苦伶仃蜷縮著的身子，久久不能入睡。我曾動過退學回家陪伴母親的念頭，但大哥堅決不同意：學校裏畢竟還有二十多斤口量供應，而那時農村的食堂還是以紅芋葉子爲主，還是吃著一天三兩、四兩的標準。

我回家更頻繁了，大概每兩周就回去一次。每回一次家，我都帶回給母親省下來的窩窩頭，第二天上午幫母親挑水，把水缸、水罐、水盆甚至飯鍋裏都裝滿，好讓母親多用幾天。每個星期天下午返校的時候，我們母子都少不了落淚，然後，母親總陪我一起走到村西邊的地裏，她一邊拾柴一邊目送著我，我也一步三回頭地回望著母親，直到我們彼此都消失在視野裏。死神在我們周圍徘徊，每一次分別都有點像是生離死別。回到學校，我要有一兩天心情都沈浸在痛苦的思念裏。

一個星期六的下午，我很想回家看望母親，可是頭一天的下午我發了瘧疾，萬一路上犯了病怎麼辦？我每次發瘧疾都持續好幾天，最厲害的時候要高燒到 40 多度！考慮一番之後，我還是放心不下母親，決定破例乘火車回去。那班火車到離家十八裏路的黃口車站才停。下了火車，背著裝有我省給母親的饃饃的小包，往西北直奔大南門。才走了不到一半路，身上開始發冷。我心裏明白，是瘧疾發作了。我得趕緊往家走，不能病在路上——半路上想喝一口水都找不到。走了一會兒，腿開始發軟，頭也劇烈疼痛起來。我用手摸一摸自己的額頭，滾燙。我實在邁不動腳步了，得坐一回休息一下。可是我哪裏坐得住？便就勢躺倒在路邊地頭上。我抱著頭，蜷縮著身子，在地上瑟瑟發抖。我自己也不知道在地上躺了多久，睜開眼一看，太陽已經落了，天也漸漸黑下來，西北風裏挾著塵土豆葉揮揮灑灑蓋了我一頭一身。我頭腦還是清醒的。我提醒自己：得趕緊上路，天黑下來更難走了，而且有被吃掉的危險——我聽說過的人吃人的故事在我腦子裏打轉。我掙紮著爬起來，一步步地往前挪動。冷過了開始發熱，頃刻間汗水沿著臉頰、順著全身往下淌。瘧疾要過去了，我給自己加油，出過汗就算過去了。我口渴得厲害，喉嚨乾得出火，可哪裏有水呢？深秋的地溝早已乾涸。到離我家還只有兩裏路的歐套村的時候，我看見一位挑水的老人，向他說明瞭情況。

“喝吧，”好心的老人答應。我嘴貼著水桶邊顫抖著咕咚咕咚地喝了起來。

“你是誰家的孩子？”歐套與大南門雖分屬於蕭縣和碭山兩個縣，但是鄰村，我們地連著地，父輩的人在一塊耕作，都互相認識。

“俺大大是李傳先，”我說。

“您大大可是個有名的好人哪，想不到他咋走那條路。唉……”老人低頭沈思了一會，擡起頭來說：“少喝點吧，孩子，馬上就到家了，喝多了肚子疼。”

我謝過老人，趁著朦朧的夜色繼續趕路。

到了家，我渾身像是酥了似的，一頭栽倒在床上。母親看見燈光下我蠟黃的臉和滿身的塵土落葉，嚇了一跳。聽我敘說完經過後，母親放聲哭了起來：“我的兒啊，害著病你還往家跑啥？你要是有個三好兩歹的叫娘怎麼活呀？”

我昏睡了一夜，正好第二天大哥回來了，把我帶到醫院裏打了針奎寧，瘧疾被止住了。我以前得瘧疾都是挨，心裏知道挨一周就會好的，從未吃過藥打過針。這次應該算是奢侈的享受。

返校的時候，母親又一再叮囑我：“放心念書吧，不要掛心我，娘不要緊，不要老往家跑了。”

但一個月後發生的事卻讓我更加對母親放心不下了。

我二姑母的大女兒、我的大表姐那時在黃口的一家小飯店當服務員，與我高中的同學李善忠結了婚。一個週末，我的這位表姐夫約我一塊回家，於是我們同車到了黃口。當晚表姐沒讓我走，第二天早晨表姐帶我們兩人到她的飯店吃飯。表姐端給我們兩盤肉絲，四個大白麵饅頭。這應該是我有生以來最美的一餐——在那個饑腸轆轆的年代，我們早已見不到肉和白麵了。我不忍下嚥，恨不得把我的那一份留下來帶給母親吃。但那顯然不是我省飯的恰當場合，我只有粗著喉嚨吞咽。

吃過早飯我告別表姐和姐夫上了路。此時正掛著西北風，飄著碎雪，路被凍得硬棒棒的。我趁著好飯力，一路頂風冒雪，半上午便到了家。但這時母親還在床上躺著，沒有吃飯。

母親見了我，先哭了：“兒啊，該著倒楣啊，老天爺讓我遭罪……”母親接著告訴我，前幾天做飯砍紅芋的時候，不小心把手指頭碰破了。母親以爲是小事，沒放在心上，誰知傷口卻發炎了，整個手腫得像個大發麵饅頭。母親把包傷的布解開，我發現隆腫的手面已鼓了膿，中間有個破頭的白頂，血水從白頂中間往外滲。我渾身起了一層雞皮疙瘩——這個罪母親怎麼受的？

母親說，夜裏受傷的手霍霍地跳疼，天又冷，一夜一夜地睡不著覺。一隻手飯也做不成，有時一天隻吃一頓，好一陣子都沒喝過湯了。晚上不喝湯（吃晚飯），夜裏更覺得冷。嫂子不過來，有時大侄女盛了碗稀的端出來，把飯偷偷地倒給奶奶。

我一邊聽母親訴說，一邊趕緊動手給母親做飯。我把鍋裏倒上水，砍兩塊紅芋，放上兩根棍子做成的箅子，從小包裏拿出一個饃放上，蓋住鍋，把那只用了十幾年的舊軍壺灌滿水掉在鍋門口，便燒起火來。不大會，鍋裏冒出蒸汽，我們的小屋子頓時顯得暖和起來。停了一會，我取出箅子和饃，在鍋裏攪了一點紅芋粉，鍋開了稀飯就算好了。我先把壺裏的溫水倒在臉盆裏給母親洗手擦臉，再給母親盛上碗，拿上饃。這一切我做得井井有序。母親說，好久沒有吃上這麼一頓熱乎飯了。聽了母親的話，我眼裏湧出了淚水。

原來的食堂會計王念昌本是外村人，勞教了半個月之後，回來當了普通社員。因爲他家與我嫂子娘家有點親戚，就住到我家的東屋裏來了。晚上念昌的母親送過來一碗熱菜湯，母親邊喝邊說：“好幾天晚上沒喝口熱湯了。”見我回來了，嫂子也端了一碗菜湯給我喝。

晚上我與母親睡一個被窩。母親告訴我，他一個人睡的時候，暖不熱被窩，從來沒脫過棉衣。我真的無法想像，母親是怎樣空著肚子，挨著病痛熬過那些嚴冬裏的漫漫寒夜的？

我想起了鬱達夫在一封信裏對一個文學青年的勸告：陪著你的母親吧，不要外出遠走，到地裏挖點野菜扒點樹皮給她吃；倘若樹皮草根也被別人吃光了，就與你的母親睡在一起，用你的身體給母親一點溫熱。我決定退學。我可以不上學，我可以不要文學，我可以忘掉學校生活，但我不能沒有母親。一連幾天，我在家裏給母親做飯，用熱水給母親洗傷口，晚上陪母親睡覺。母親沒有攆我，看來她默認了我的做法——她明白，沒有人照顧她確實活不了了。

一天大哥回來了。當知道我缺了幾天的課，他很急。他把母親的事全部攬了過去，催促我返校："你趕緊走吧，我這就帶咱娘去看病。"但這次我沒有聽大哥的話——大哥能給母親看病，能一天到晚呆在家裏給母親做飯嗎？能陪著母親睡覺嗎？但不料第二天大哥又來了，見我沒走，他有點生氣了——他平時是個不會生氣的人——說話都有點結巴了："你……你還不快……快回去？你都缺……缺幾天課了……"

大哥給母親買來了藥膏和紗布，給母親塗了藥，包了紗布，並叫來了大侄女，作了一番安排，諸如每天晚上給奶奶送碗湯來之類，然後催促我返校。當時天已晚，我答應第二天一定走。雖然如此，我心裏還是不踏實：侄女畢竟是個小孩子。

傍晚，見王（念昌）大娘又給送湯來，我急忙迎到大門口。我對大娘說："大哥連著催我回去，我明天要走了……"說到這裏，我哽咽得說不下去了。

"別難過，世華，你放心走吧。有你大娘呢。"

"大娘，我……我認你作乾娘吧……"我終於鼓起勇氣說出了我的心裏話，然後屈身下跪。我心裏想，我認了大娘作乾娘，大娘就會悉心地照顧母親，我也可以更放心地把母親託付給她。

大娘用端碗的手擋住我，說："孩子，千萬別跪，千萬別跪，你大娘該怎麼做就怎麼做。放下吧，你娘不要緊，上了藥就會好的。"

“……”我眼淚刷刷地往下掉，什麼也說不出。

第二天，我給母親挑好了水，動身返校了。臨行前，我先對母親囑咐一番，又去跟大娘和念昌哥告了別，他們都一再安排我放心。這時我覺得母親有了託付，心裏踏實了。

母親又躲過了一劫。母親後來告訴我，我走後大哥又給換了幾次藥膏，王大娘也經常過來送湯。兩周後我再來家時，母親手上的傷已經癒合了，但手面上留下了一個大疤。因為疤結得緊，手掌不能完全張開，拇指與其他的手指不能合攏，從此不再能做任何針線活。那時買來的襪子，是薄薄的一層針織品，如果不張個底，幾天襪底就穿破了。自打母親的手殘廢了之後，不僅不能給我做鞋，連襪底也不能給我張了，更談不上給我做其他衣物了。

當時我想，將來有了力量，一定要好好報答乾娘的粥飯之恩。但沒有等到我大學畢業她老人家就過世了，她沒有吃過我一分錢的東西，我沒有給她送終，甚至沒有給她磕一個頭，至今心裏覺得是個遺憾。

前幾年在報上讀到一位河南的美籍科學家在得了諾貝爾獎後發表的感言。他說：他的母親在那個荒年餓死在老家。早知如此，他寧可陪著老娘在家，也不出去讀書，不要這個諾貝爾獎。如果我的母親沒能熬過那一關，我也會像這位科學家一樣抱憾終生的。

一九六二年，我已經十九歲，讀了高二了。由於生活的好轉，母親的身體也漸漸好起來。儘管如此，我仍然牽掛著、依戀著母親，仍然定期回家探望母親。

有一個星期六的下午，我步行了五十裏趕到家的時候，卻見家門鎖著，母親不在家。嫂子告訴我，舅舅生了病，沒有人照顧，就住到了姨母家。母親聽說後，就到姨母家幫助照顧舅舅去了。沒有

看到母親，我感到十分悵惘，心裏很難過，恨不得馬上再趕到姨母家去，可是天已經黑了。

嫂子叫我在她家吃了晚飯。晚上，我一個人睡在空蕩蕩的屋子裏，淚水一滴一滴地往下淌。這是上中學以來第一次回家見不到母親，我心裏空落落的，感到很傷心。我不動手擦眼淚，一任它流，聽憑它濕了我作枕頭的棉衣。

回一趟家，我和母親呆在一起的時間總共只有一個晚上和一個上午。現在一個晚上已經過去了，我不能再耽擱時間了。第二天一大早，我沒有吃早飯就跑到了姨母家。一看到母親，我就趴在她膝蓋上委屈地哭了。姨母見了，笑著說：“三兒，想娘了是不？你馬上都該娶媳婦了，看你娶了媳婦還想娘不？”

舅舅得的是腹瀉，吃什麼拉什麼，什麼藥也止不住，一直拉了幾個月，最後起不了床，就拉在床上。姨母和表嫂天天給他洗褲子、拆被褥。說起來，舅舅無兒無女，應該是他們李寨村的五保戶，但他們就沒人問這個事。最後舅舅死在姨母家，也就埶葬在姨母家的村邊上。

那年放寒假的時候，王作軍當隊裏的糧食保管員，睡在一間屋的倉庫裏。他讓我與他“打撐腿”（兩個人一頭一個睡一個被窩，每個人用自己的體溫去溫熱對方，也從對方得到溫暖）。我本來想和母親睡在一起，幫她暖暖被窩，但王作軍的意思是顯而易見的：倉庫不是一般人隨便可以進的。我答應了。那一間被作爲生產隊倉庫的小屋，靠北牆裏頭放著兩個荊條編的糧食囤，裏邊豎著幾個口袋，分裝著黃豆、玉米、綠豆、紅芋幹等——這是全生產隊一春天的糧食。在糧囤邊上，靠西牆南北著用豆稭、麥草搭了一個地鋪，那便是我們睡覺的地方。每天晚飯後，我按時約了王作軍去倉庫裏。我們先對著油燈說會閒話，然後放身睡覺。我沒有被子帶，和王作

軍用一條被子，把自己脫下來的衣服再壓在被子上，本來屋子小，地上又鋪著保暖的麥稭，睡得很暖和。

第二天天濛濛亮，王作軍便把我叫醒，讓我把裏邊的幾個衣袋裏裝滿糧食，用外邊的褂子蓋上，趁天不亮回家。不知是自己經歷的太多變聰明瞭，還是"墮落"了，反正這一次，我沒有自作"清高"，而是突破了自己恪守的道德底線，心甘情願地做起了"賊"，在人民公社一個生產隊的倉庫裏進行了"盜竊"。每天如此，整個寒假我大概"偷"了二十來斤糧食，爲母親度過荒春準備了含熱量較高的食物。

今天想起這件事來，我仍然不悔。非但不悔，而且恨自己爲什麼當初不把衣服口袋縫大一點，好讓自己切切實實地當一回"碩鼠"？

2．戰勝饑餓

饑餓仍然如影隨形地伴隨著我們。我們還是重複著初中時的方式，每輪到我們在菜園裏值夜班，我們便飽餐一頓，而不管是茄子妞或生冬瓜。

每週半天的勞動給了我又一次加餐的機會。每逢勞動課，我和另一個個頭最矮小的同學李鴻儒跟著黃師傅放羊。我們手持鞭子把羊群趕到收割完莊稼的地裏，當羊群開始安靜地覓食的時候，黃師傅採取減少活動以保存熱量的方式，挑個暖和而舒服的地方打盹，我和李鴻儒便開始我們的覓食。其實我們所進行的覓食就是複收，不過所使用的工具只是鞭杆而已。我們用鞭杆在地上挖掘，被挖掘出來的可能是小胡蘿蔔、紅芋頭，有時可能是花生。如果是花生，我們剝開便吃，那是最省事的；如果是紅芋、胡蘿蔔，對上邊的泥稍作處理——或用鞭杆刮一刮，或抓把乾草擦一擦，或用衣角擰一

把——就嚼食起來。到下班的時候，羊吃飽了，我們也吃飽了，晚上的饃饃我就可以省下來。那時，我們的胃的消化力特別好，這些生食居然被完全地消化吸收，而我們也從沒有鬧過拉肚子或胃疼的毛病。如果黃師傅帶我們去了收割過的黃豆地，我便像下鄉支農時那樣，撿拾地上的黃豆粒。一個下午也能撿兩三斤，下次回家時我便連同我省下的饃饃一起帶回家。總之，對每一次的勞動時間，我們都相當珍惜。

但到了冷天，日子就不那麼好過。天寒地凍，我們都只穿著薄薄的棉衣，田野裏的風使我們瑟瑟發抖，黃師傅早躲到避風的草堆旁邊或地溝裏去了。倘若結了冰，鞭杆挖不進土裏去了，地裏殘留下來可吃的東西也沒有了，偶爾挖出來的胡蘿蔔都帶著冰碴，即使如此，我們也稍事處理吞到肚裏去了——饑餓使我們顧不得更多。

一九九八年我們碭山中學六三屆畢業生離校三十五周年聚會的時候，我沒有見到我昔日的“牧友”李鴻儒。打聽後得知，他當年沒有考上大學，便回鄉當了農民。不久，染上了一種什麼病，便不治而死。我聽後默然。他年紀輕輕的能得什麼暴病呢？會不會與我們當年吃了那麼多的生冷食物有關呢？

有的同學甚至沒有等到畢業。

高二年級（一九六一年）的一個深秋時分，一個消息像電一樣迅速傳遍了全校：高二（1）班的王秀真死了！王秀真和翟素霞一樣，從小學五年級到初中都與我是同班同學。她平時文文靜靜，說話細聲細氣。我哪裏敢相信這麼一個活蹦亂跳的同學會突然死掉？我去問翟素霞——她們從小學就是好朋友。翟素霞確認了這一殘酷的事實，有的同學還進一步地說，他們見到學校派一輛馬車把裝著她屍體的小棺材送回家。我這時才相信，與我同學六年的王秀真真真切切地死了。

二〇〇六年十二月我與翟素霞再次談到此事時，她說：“我們倆多年來一直睡一個被窩，那天早上起床時，我見王秀真不動，動手拉她，她的手冰涼。我起來一看，她滿嘴都是白沫。我趕緊報告了學校，校長帶著校醫來了，叫兩個工友擡著送了縣醫院，實際她夜裏早斷氣了。我等於是摟著一個死人睡了半夜，現在想起來都毛骨悚然。”

“他到底得的什麼病？”我問。

“不知道。”

幾天後，我去宿縣見了彭捷老師，我想向他打聽王秀真的死因。

“沒有人知道。校長和校醫都對外闭口不談。”彭老師說。

第二年的暑假後開學，我的另一個初中的同班同學唐愛華沒有按時來校報到。不久消息傳了出來：唐愛華暑假裏死了。同樣，對於她的死因沒有人知道。

我的女同學中有三個個頭最矮的：翟素霞、王秀真、唐愛華，她們三個是形影不離的好朋友。現在她們三個死了兩個，有人對翟素霞說：“你的兩個好朋友都死了，你恐怕也活不長了。”翟素霞說，她那時確實以爲自己活不長了，隨時等待著死神的召喚。

那時候，家裏有勞動力的同學，生活情況都已開始好轉，他們可以從家裏帶些吃的貼補自己，最好的是炒麵、饃饃，也有的帶胡蘿蔔、生紅芋和紅芋片，學校裏給提供便利條件，比如，你可以把從家裏帶來的饃饃和胡蘿蔔、生紅芋、紅芋片裝入一個小布袋放到蒸籠裏，食堂給免費蒸熟、加熱。每到開飯時間，伙房裏燒一大鍋開水供學生沖炒麵用。

上午最後一節課下課鈴聲一響，安靜的學校頓時沸騰起來：每班的幾個值日生手提擡飯桶的杠子奔向伙房，加餐的同學跑步去取自己蒸熟、加熱的東西——如果去晚了，自己的東西便可能被別人

拿走吃掉，或者自己質量較好的東西被人替換了。這樣的事情經常發生。另一部分同學急急忙忙地吃完自己的那份飯，到寢室裏把炒麵倒入一個搪瓷碗，再去伙房用開水沖熟。當然這也要用跑的速度，因爲如果晚到，開水可能被用完，或者熱水變涼，不能把炒麵沖熟。燒開水的大鍋周圍一片擁擠，大鍋周圍站不下幾個同學，而且舀開水的勺子也只有兩三個。終於有一天，悲劇發生了：一個女同學被後面的男同學擠到鍋裏去了。幸好鍋不深，幸好她穿的是棉衣，只有腳和小腿部被燙傷，不然人肯定會被煮死的。爲了使這一切進行得迅速而無誤，同學們組成互助組，分工合作：有的負責取蒸籠裏的東西，有的負責在班裏領飯，有的負責到開水鍋前搶一把勺子……

但這些人群裏都沒有我。我沒有資格享受額外的加餐，六十歲的母親不僅不能給我創造任何額外加餐的食物，而且我還得繼續給母親省饃。雖然每次母親見到我帶回的饃都千叮嚀萬囑咐地安排我說：“你可不能這樣虧自己了，你正在長身子，年輕時受了虧是一輩子的事。”但是我還頑固地繼續給母親省饃，尤其當食堂加餐吃丸子的時候，我幾乎全數給母親留下。那時，我的最高願望是：有朝一日我能完整地享受我的一份飯。

我的高中的幾個朋友如胡炳義、汪海忠、孫光華、王洪周等都無數次地拉我跟他們一起分享加餐，但都被我拒絕了：畢竟他們帶的也不會很多。

我們有時採取另一種加餐方式：燒小竈。爲了便於給自己加餐，工友們在自己的小屋裏都支有一個小鍋竈。胡炳義、汪海忠、孫光華、王洪周等便動了主意：到黃師傅住的地方用他的小鍋煮紅芋片吃。雖然我並沒有帶紅芋片，此時我便接受他們的盛情：黃師傅是我的關係户，要由我出面聯繫。約好以後，我們就在課外活動或星期天帶上一小布袋紅芋片到黃師傅住的小屋。黃師傅是個好人，我

跟他放羊也有好幾年了，所以有求必應。燒這樣的小竈不需要複雜的手藝，把紅芋片稍微洗一洗，放在鍋裏兌上水，然後燒火煮就行了，既不要油也不要鹽。燒煮半小時的樣子，紅芋片熟了。我們就用勺子分盛到每人自帶的茶缸裏，大家就狼吞虎嚥地吃起來，邊吃邊爲我們創造的加餐方式感到高興。別看那是少鹽無油的劣質食品，我們吃起來卻是那麼香，現在想起來依然覺得津津有味。

在整個的過程中，我付出的勞動最多：洗紅芋片，撿柴，燒火，直到最後的刷鍋洗碗，因爲我感覺自己吃的是別人的東西，唯有多幹點活、多做點事才吃得心安。

終於，我的最高願望實現了。曾希聖一下子從“極左”跳到“極右”，在安徽實行了“三自一包”（自由市場、自留地、自負盈虧和包產到戶），雖然後來被中央批判，倖存下來的千千萬萬的農民卻從中受了惠。一九六一年的暑假裏，我和母親辛苦勞作了一個多月，到了下半年，母親所承包的責任田裏生產出來的東西可以夠她吃一年了。這時，母親和大哥一起勸說我，不要我再省我的口糧了，而且母親還讓我帶點東西到學校去貼補自己。我接受了他們的建議，從高二上學期（一九六一年下半年）開始，我能全部地享受我自己的每一頓飯，而且有時候也像別的同學一樣，拿著裝有紅芋片、胡蘿蔔的小布袋到伙房去蒸，或者端著小茶缸去沖炒麵。當然，我的炒麵在質量上是不能和別人的相比，我的是紅芋片粉的，而其他同學早已換成玉米麵甚至小麥麵的了。

我永遠不能忘了我的學兄胡炳義。胡炳義長我兩歲，他和他的夫人一直把我看作他們的弟弟。在班上，胡炳義是班長，我是學習班委，工作上自然是互相支援的，晚上我們兩個“打撐腿”。在我沒有能力自我加餐的時候，胡炳義時常把自帶的東西勻給我一部分

吃；在我只能帶低質量的補給品時，他堅持把他的東西和我的東西混在一起，跟我同甘共苦。

3・寒窗苦讀

我想，我不能在家裏孝順母親，在學校裏一天還奢侈地享有三頓飯吃，我不能浪費自己的一分一秒時間。我除了吃飯、睡覺的時間都在教室裏看書，課外活動的時間也不出去。自覺得唯如此才能對得起故去的先人和孤身一人苦度饑寒的母親，自己的哪怕一點點在學習上的懈怠都是對他們的不孝。

“那時候，你是個瘦骨伶仃的小不點兒，一副深沈負重的樣子，一天到晚憋在教室裏看書。人家都去玩，你也不出去，好像只會看書時的。”彭捷老師現在回憶起來這樣說我。

有一段時間，我的額頭上長了一片無名的瘡，害得我頭也不能擡，眼也睜不開。班主任勸我回寢室睡覺去，特許我不交作業。我哪捨得“浪費”這個時間？我利用課間休息時間打針看病，堅持上課。不能看黑板，不能記筆記，我便用兩手捂著雙眼聽。那時俄語程老師正在講定語從句，而這一部分是高中階段最難的語法內容，許多同學分不清которий、которая和которое，不知道什麼時候該用哪一個。我聽得很專注，老師的話字字入耳，一點也沒有遺漏。晚上睡到床上，我再把白天聽的內容回憶一遍。十多天後，我的瘡治好了，參加了期中考試，俄語竟然得了滿分！程老師感到十分驚奇，問我：“你這一段時間不在生病嗎？書也沒看怎麼還考這麼好？”“我聽的。”我淡淡地說。程老師想進一步試試我，讓我背那段時間學的奧斯特羅夫斯基的一段名言：“生命是寶貴的，生命屬於人只有一次而已……”，我竟一口氣流利地

背了出來，一字不錯。在以後的俄語考試中，我始終保持著全年級領先的地位。

一九六二年暑假，我依然像往年一樣，白天幫母親和嫂子種他們的責任田，幹各種農活，但我下地的時候，在糞箕裏一定帶一冊《古文觀止》。休息的時候，我躲到一邊，取出書來讀。那時我對這一套書真有如饑似渴之感，讀得津津有味，一篇文章讀兩三遍就能背誦。就這樣，一個暑假，其中的許多文章都被我背了下來。這大大豐富了我的修養，增加了我的文學積累。

那幾年中蘇之間正進行著共產主義大論戰。每天晚自習前有半個小時的讀報課，讀報課上都是由我這個學習委員宣讀代表著中共中央高論的聲音。這些中共的最高秀才們似乎掌握著共產主義的真諦，他們的文章引馬克思主義之經據列寧主義之典，文筆犀利，大氣磅礴，給蘇共“修正主義”以有力的批駁。我讀報的時候，也覺得真理就在我們這邊，雖然餓著肚子，讀起報紙來卻理直氣壯，抑揚頓挫。至今我的許多同學都記得我當年讀報時激昂慷慨的樣子。“你那時報紙讀得真好，又通暢又有力，我們的耳朵都跟不上。”F 君現在回憶起來還說。

那時候，理工科和醫農科每年高考的錄取比例遠遠高於文史科。高二的時候，老師們勸我，我自己也意識到，爲了將來考上大學，我應該在理科上多下點工夫，使自己的數理化各科也像語文、俄語一樣拔尖。我充分地利用了高二那年的暑假，在田野地頭，在昏暗的燈光下，我一門課一門課地攻。

沖著屋門擺放著爺爺原來的那張大桌子，上面放滿了麵缸、鹹菜壇和糧食笸斗，雖然它們多半是空的，卻占滿了那張大桌子。晚上，幹了一天的活，又累又困，還經常沒有晚飯吃。但不管怎樣，我仍然要按我自己制定的計畫看書。我坐在床頭上，光著脊背，點

起煤油燈，就著一個桌角，開始我的“夜自習”。做數理化不像看《古文觀止》，很多題目要演算，我不得不一隻手扶著把課本立靠在麵缸上，另一隻手壓住演草紙。一燈如豆，光線昏暗，看起來十分吃力。汗水沿著我的臉、我的脖頸往下流，一直流到脊背上，然後順著尾根往下滴。我來不及擦，除非汗水醃得眼睛發酸才用手背抹一下。蚊蟲圍著燈光“嗡嗡”地飛，時不時地往我的腿上、背上發動猛攻，弄得我老是要騰出手來去招架它們。

“睡吧，”母親不停地催促我，“幹了一天活還不累嗎？聽聽，蚊子（的聲音）像敲鑼的樣。唉，還點燈熬油的……”

“一會兒，一會兒就睡。”我答應著，知道母親一方面是疼我，一方面也心疼她的煤油。天不熱的時候，母親也會湊著“我的燈光”紡一會棉。

工夫不負有心人，到高三年級開學的時候，我的數理化各科成績已經躋身於班級前列。這樣，我的各門功課都在班裏名列前茅，得到老師和同學們的厚愛。我成了全校六個班的一顆小明星，老師常拿我作例子教育其他學生勤奮學習。

我這時磨練出的毅力，養成的刻苦努力、珍惜時間的習慣是母親和此前故去的爺爺、父親等給我留下的最珍貴的遺產。我後來之所以能比別人多做了些事情，完全歸功於此。

4・探監

我時常收到二哥從他的勞改地碭山果園場寄來的明信片。也許他見到別的難友能吃到家裏送去的食品，幾乎每封信都說要我給他送點鹹菜、炒麵等吃的東西。但是，果園場離縣城有五十裏的路程，那時又沒有任何交通工具，我怎麼去？夜裏住哪裏？

一九六一年下半年，我讀高二，家裏情況進一步改善，我便動了去探望二哥的念頭。經打聽，碭山果園場與胡炳義的家權集公社胡套村只隔著一條老黃河。與胡炳義商量後，他主動提出可以把他家作爲一個中轉站，在他家吃住。

頭一個週末，我回家跟母親說了這事。母親說：“去看看您二哥吧，我也想他。見了您二哥千萬安排他好好的，問問人家他哪天能回來……唉，您二哥是我一輩子的心事，叫我死了也不得合眼……”說著，母親又落淚了。我聽著心裏也很難過。二哥那年二十五歲，正是撐門立戶的年紀，而他短短的二十五年裏已經經歷了兩次牢獄之苦，而且還不知道他那年才能出來過上正常人的日子……

“他要是回來了，我也有個伴，你也少操點心，”母親的話打斷了我的思緒。第二天上午，我們娘兩個擁磨（人抱磨棍推磨）磨了一點紅芋麵粉，在鍋裏炒熟了，裝入一個布袋，準備帶給二哥。這個星期學校食堂加餐的丸子我一個也沒吃，全部留下，又去鹹菜店給他買了點辣菜疙瘩，算是探監時帶給二哥的禮物。

下一個週六下午，帶上那一布袋炒麵、我省下的丸子和一包辣菜疙瘩，與胡炳義一起回家，當晚住在他家。大娘、大爺待我很熱心。聽我說了二哥的事，大爺什麼也沒說，帶我到村後的老黃河壩上。大爺指著面前的昔日黃河裏一望無際的沙灘和一片片的果樹說：“這整個黃河套都是果園場的地，不知道有多少人在這裏勞改，天天見到往這裏送人。這兩年裏邊苦得很，餓死的人沒有數。你看看那一片墳頭圪塔……”大爺指著果樹行邊上一片高低不平的地帶，繼續說，“犯人死了，家裏也沒有人來領，就埋在這片沙地裏。坑挖得淺，就用薄博的一層沙土蓋上，一刮大風，死人就露出來了。站在這壩子上，夜裏到處是鬼火，一閃一閃的。唉，這是啥年成……”

大爺還在講著，但我再也聽不進去。此時正是夕陽西下的時候，呈現在我面前的是古詩裏所描述的大漠孤煙長河落日的蒼涼景象。望著一片片高低不平的墳塋，我思緒萬千。望不到頭的黃河故道正漸漸沒入無邊的黑暗，我感受到了一種莫名的恐懼，我似乎聽到了無數無家可歸的冤死鬼“天陰雨濕聲啾啾”，我們的董大一老師說不定就躺在這裏的某一座墳塚裏……想到這裏，我打了一個寒噤。

第二天大娘早早地起來給我做了早飯，囑咐我吃飽。背上帶給二哥的東西，按照大爺指給我的路，我出發了。那天刮著大風。一出村，我就被捲入遮天蔽日的沙塵，睜不開眼，看不見路。呼嘯的西北風裹著大把大把的沙子往我身上灑，微小的沙塵直往我耳朵裏、鼻子裏鑽，我甚至聽得見沙粒打擊我的牙齒發出的“啪啪”聲。我閉上嘴，裹緊衣服，掙紮前行。好在路較寬，路兩旁又栽了樹，我沒有掉路。

前面出現一片房子，大門兩旁站著持槍荷彈的衛兵，我斷定這就是果園場了。就在這時，在兩個軍人的押送下，一隊人從院子裏出來，他們個個手持鐵鍬，雙手掩裹著衣服，躬著腰低著頭跟著隊伍往前跑。他們顯然是去接受改造的勞改犯，我努力睜開雙眼，一個一個地看，想找見我的二哥。但隊伍走完了，我沒有發現我要找的親人。

我走到哨兵跟前，怯怯地問：“李世儉在這裏嗎？”

崗哨旁邊的小屋裏走出一個幹部模樣的人來，上下打量了我，好像不相信這麼一個矮小瘦弱的孩子是來探監的犯人家屬，問：“你找誰？”

“李世儉，”我答道。

那個幹部一頁一頁地翻手裏的花名冊，過了一會，他擡起頭來，用手往西指了一下說：“在七隊。”

“有多遠？”我又問。

“六七裏路，”他合上名冊，又補充說，“一直往西走。”

我謝過這個幹部，開始了第二段旅程。

總場通往各隊的路是羊腸小路，蜿蜒在落了葉的果樹間。風好像小了些，眼前的小路顯得清晰了。茫茫的黃河故道似乎只有我一個人，雖然是大白天，我感到有點恐懼。

我終於來到一片房子前，拿槍的崗哨叫我站住，我停住了。屋子裏走出一個幹部來，問我是幹什麼的，我說明瞭來意。他把我領進了一間小屋，讓我坐到一個方凳上，自己坐到正中的一把椅子上，然後吩咐另一個人去叫我的二哥。

“你家住唐寨大南門？”他先問我。他肯定從犯人的檔案裏知道我們家的地址。

“是的。”我答道。

“你認識李愛芝嗎？”

“我們兩家是世交，我叫他二叔。”

“我們家跟李愛芝家有親戚。——你是從大南門來的？”他又問我。

“不，從碭中。我在碭中念書。”

“你認得鄭立華嗎？”

“我們是同班同學。”

“我是他舅舅。”我們的距離一下拉近了，他跟我攀談起來。

“李世儉判了十年。在這裏表現不好，幹活沒有勁，整天到地裏逮東西吃，什麼都吃，抓住舌頭粒子（蜥蜴）也吃，抓住屎殼郎也吃，”他頓了頓，又接著說，“那些東西能吃嗎？有時候吃不巧能把人吃死。家裏有人能來就常給他送點東西來，省得他吃那些亂七八糟的東西。你看看那邊，”他用手指指不遠處的矮小的土堆，“那些人家裏沒有親人，沒有人給他們送東西來，就餓死到這裏了。唉……說起來可憐！”

不大會兒，那人把二哥領進來了。我有一年半沒見二哥了，他更加沒有人形了。雖季節上才剛入秋不久，他卻早早地穿上了棉襖。棉襖爛了幾處洞，露出棉絮，由於紐扣完全脫落，腰間紮了根繩子。他瘦削的臉呈土灰色，眼神呆滯。

“李世儉，你兄弟看你來了，”隊長對著二哥說。

二哥見了我，“嗯”了一聲，並不看我，眼睛卻盯著我的包。我趕緊解開包，先把丸子遞給他，他蹲下，把包丸子的紙包放在水泥地上，用漆黑的髒手抓起兩個塡到嘴裏，快速地咀嚼起來。他忽然想起什麼，用黑手捏起兩個丸子遞給隊長，“隊……隊長，你……你也吃……”隊長擺擺手，拉給他一隻小板凳：“你快吃吧，坐下吃。”

我本來有很多話要說，但看到二哥這副半死不活的模樣，我突然傷心地啜泣起來，全身都在隨著我的啜泣而顫抖，一句話也說不出。想到我的親人在這一兩年裏死的死，坐牢的坐牢，剩下的爲數不多的親人中，母親仍在鬼門關前徘徊著，二哥被折磨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我哭得更傷心了。二哥埋著頭不顧一切地吃，沒有擡起頭看看他這個許久不見面的弟弟，像是幾年都沒吃過飯似的，一會兒把所有的丸子都一掃而光，又去拉盛炒麵的口袋。

“別吃了，留點以後再吃吧。吃多了會撐死人的。”隊長提醒他。

二哥停住了，用舌頭去舔手上的油，眼睛盯住地上包丸子的油紙，仍然沒有擡起頭來看我一眼，更沒有問我怎麼來的，也沒有問家裏的事和母親的情況。

在這整個的過程中，我感到傷心極了，由啜泣而哽咽而抽搐，渾身隨著抽搐而抖動，原來想好要給他說的話竟然一句也說不出，也沒有向他詢問他的任何情況——我面前的他已經向我說明瞭一切。

大約過了半個多小時，隊長見我們雙方都不說話，就對二哥說："回去吧，回去好好幹活，記住不要再亂吃不能吃的東西了。"

二哥走了，我哭得更厲害了，完全不顧當著外人的面。

"你也回去吧，別傷心，你二哥暫時不要緊的，有時間抽空再來，"隊長客氣地對我說。

我帶著滿臉的淚點了點頭，然後往回走了。我離二哥越來越遠了，路上的沙土裏留下我一串串的淚痕。

我自己也說不清我爲什麼一直傷心地哭，是怪自己沒有早來？是恨二哥不爭氣？是擔心二哥變成黃河灘上的怨鬼？還是爲自己的家破人亡？

回來後，胡炳義和他們全家問我二哥的情況，我邊說邊忍不住地哭，大娘大爺也陪著落淚。他們做好了豐盛的午飯：烙餅卷雞蛋炒辣椒。那年頭這算是最好的飯了。回校的時候，大娘大爺給我和胡炳義各準備了一份加餐的炒麵。後來，嫂子知道母親的手有殘疾不能做針線，還特意讓胡炳義帶給我她親手張了襪底的兩雙襪子。

我一直感念著大爺大娘和嫂子對我的深恩，每次回老家碭山時都沒有忘記帶著禮物去看望胡炳義夫婦和大爺大娘。後來得知大爺先去世了，大娘信了基督教。一九九八年我再次去看望大娘時，正逢星期天，大娘去做禮拜了，沒見著她老人家。當晚我住在妻子的侄兒家，第二天我要返回的時候，想和老人說幾句話，就撥通了電話。老人在電話那頭以響亮的聲音對我說："世華，主保佑我，我身體好得很，別擔心我！你娘好吧？你二哥呢？"

大娘一句話觸動了我的痛處，使我想起了三十多年前的情況，竟然當著妻子和她的侄子侄媳的面放聲哭了起來。我想告訴她老人家母親已於二十七年前去世，二哥也于五年前死了，但我一個字也說不出，趕忙掛斷電話……

5・我的初戀

我們班有個女同學 F 君，聰明漂亮，性格開朗活潑。她三個哥哥，是母親唯一的女兒，當然是母親的嬌閨女。母親疼著她，哥哥們呵護著她，老師們也寵著她，她有著自己歡樂幸福的童年。她像一位不食人間煙火的天使，不知道饑餓，不知道煩惱，在我們都忍饑挨餓的時候，她還像一隻不知疲倦的百靈，不停地唱，爽朗地笑，露著一隻雪白的虎牙。在那個年代裏，她的歌聲和笑容足以驅趕饑餓，打破我們班的沈悶空氣。她的存在，使我們班有了歡樂，有了生機。她是暗夜裏的一線亮色，是盛開在嚴冬裏透著馨香的茉莉。她是公認的校花，是男同學們在寢室裏議論的對象。

我對於 F 君只有敬重的份兒，交往上保持著適當的距離。如果說關係接近的話，我們對文學有著共同的愛好，在俄語上始終共同保持著領先的地位。她時常向我借閱哥哥買給我的《唐詩一百首》、《宋詞一百首》、《唐宋詞一百首》等文學普及讀物，甚至把她新學會的詩詞背給我聽。

高三的時候，我已經進入了二十歲的年齡，雖然個頭沒有怎麼長，卻開始有了思想，對前途、未來也有了考慮。文理分科的時候，我突然覺得即使考上了一個名牌大學，如果終生所從事的事業不是自己所愛好的，將是一生的悲劇。最後，在高考前兩個月，我沒有和大哥商量就毅然選擇了文科，這樣，我和 F 君仍然在一個班。

高三的復習是緊張的。除語文、俄語外，文科的學生有那麼多的歷史、地理、政治要背。政治老師楊榮清主任、歷史老師徐子昭給我們編了那麼多的講義，每天晚上有幾科老師輪流給我們講課到十點以後，徐子昭老師的嗓子一直是沙啞的。沒有了課外活動，取消了體育課，除了吃飯、睡覺外我們都在教室裏進行高考前的衝刺。

一天晚飯後，我在去教室的路上與 F 君相遇。她若無其事地遞給我一本新近出的《宋代散文選注》。我接過手，想翻看一下，一張疊成三角形的信紙滑落了下來。我連忙撿起來，看了看 F 君，F 君正看著我，眼睛裏透露出的是令人銷魂撼魄的眼神，頓時一股電流通過我的全身——這是我第一次有這種感覺。我明白了一切。我落荒而逃，慌亂走開。

那天晚上的課我沒有聽進去。手裏握著那個三角形的信紙，我第一次上課思想開了小差。

晚上躺在床上，我睡不著，手裏仍然握著那個三角形的信紙。我眼前浮現出母親愁苦的面容，二哥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身影，繼而這兩年家裏發生的天塌地陷的事情像電影一樣一幕幕在腦子裏閃過，爺爺、父親、叔父、嬸母的影像在我眼前交替出現。接二連三的災難已經把我小時候漸漸生長起來的自尊心徹底催垮，我幾乎像一個乞丐一樣在這個世界上存活著，經常乞求著並接受著別人的幫助，除了學習成績之外，我吃不如人，穿不如人，長得不如人，強烈的自卑始終讓我自慚形穢，我哪裏有資格享受愛情，而且是美若天仙的 F 君的愛情？F 君之與我猶如七仙女之與董永。不，我不能做對不起先祖的事，我不能做對不起在死亡線上掙紮著的母親的事情，我不能對不起大哥和家裏尚且活著的其他人！我把那個三角形壓在我用自己的舊衣服折疊而成的枕頭底下，決心不去看它。

第二天，我若無其事地去上課，努力把昨天的事情忘掉。這樣平靜地過了兩天，第三天的下午我又與 F 君再次單獨不期而遇。她又用那種令人銷魂撼魄的眼光看了我一眼，然後遞給我一本《明清筆記小說選譯》。我接過書，輕輕地一捏，知道裏邊另有東西。我不敢再與她的眼光對視，低著頭很快地走開。有了第一次的經驗，我不慌亂了，我依然安靜地上課，安靜地睡覺。

對了，我還欠著她一塊五毛錢。我得還給她，把一切聯繫切斷。我從汪海忠那裏轉借了一塊五毛錢，用一個白紙條裹緊，寫上：“還你的錢，謝謝。李”，趁她不在時放入她的鉛筆盒。

晚上徐子昭老師給我們講歷史。因爲他嗓子啞得厲害，要我們前面幾排的同學臉朝後坐，這樣他就可以站在中間講。豈知我一轉臉正遇上 F 君火辣辣的眼光。我又慌亂了，忙低下頭去，無意間看到我的鉛筆盒裏放著一個包著錢的紙卷，上面以一種不容置疑的口氣寫著：不許再還！

我想結束這種拉鋸戰，沒有再還。至今我還欠著她這一塊五毛錢。

又安靜地過了幾天。一天傍晚，S 君來班裏找我。S 君是我初中的同班同學，家住唐寨街上，每次週末回家我們都同路。她長我一歲，以弟弟待我，我也以姐姐敬她。她與 F 君是最要好的朋友。我隨 S 君來到教室西頭的一個無人處，她劈頭問我：“那兩天你怎麼沒去？”

“往那裏去？”我一頭霧水。

“F 給你的信上不給你寫清楚了嗎？”

“我沒有看信。”我只得承認。

“你清高的啥？”她以姐姐的身份訓斥我，“F 哪裏對不起你？”

“是……是我對不起她。”我低下頭看著自己的腳。

“那你說你願不願意見她？”S 君又逼問。

“……”我心裏沒有主意，仍然低頭看著自己的腳。我心裏想說的是《天仙配》“路遇”中董永的那句唱詞：“你爲何耽誤俺窮人的功夫？”

“你定個時間吧，”S 君不依不饒，非要個結果。

“那……那就高考結束再說吧。”

“不要再說了，就定在七月十八日晚上，什麼都考完了。記住：東菜園水井旁邊。”S 君不容分說把時間、地點都敲定了。

這樣我倒輕鬆了，我可以安安靜靜地進行最後一段時間的復習了。

那年的高考作文題有兩個：《五一節記事》和《唱國際歌時所想起的》。我選了第二個題目。這幾年的讀報生涯，不僅鍛煉了我的閱讀能力，而且給我積累了大量的國際共產主義理論。在考場上，我發揮了平時的積累，洋洋灑灑，闡述了美好的共產主義理想，一氣呵成，最後以李大釗的名言作結：將來的世界必定是赤旗的世界！

高考結束的那天晚上，學校在大操場放電影，我踐約在東菜園見了 F 君。這果然是談情說愛的好時間、好去處。其他年級的學生都已放假回家，打拼了幾個月的高三學生全在操場上看電影，盡情放鬆自己，菜園裏沒有一個外人。這正是各種蔬菜勃勃生長的季節，微風送過，聞得見菜葉上發出的清新。菜園裏很靜，只有菜畦裏的青蛙偶爾發出清脆的叫聲。我們坐在井臺上，靠得很近，聽得見彼此的心跳，F 君身上少女的甜甜的香味使我陶醉。談話沒有馬上切入正題，我們講了各自在高考中的情況。她似乎很悲觀，總以爲自己要落選。我鼓勵著她，說：“不用擔心，憑你平時的成績，你肯定會考上的。”

“假如我考不上，你就不理我了吧？”她突然問我，語氣裏帶著嬌嗔，同時扭過臉對著我，星光下我看得見她閃亮的乞求眼神。

“當然不會！”我講得很肯定，就勢抓住她的手，算是對她的安慰，也算是對自己以前的怠慢表現的懺悔。

她順勢倒在我的雙膝上，我吻她的臉，她的頭髮。她的皮膚的馨香讓我陶醉，我有生以來第一次享受到愛情的甜蜜。

“給你這張照片，”她遞給我一個小紙包，“不管將來我們能不能在一起，你都不要忘記我。”她躺在我的懷裏，熱辣辣的眼光在暗夜裏閃著光。

我狂熱地吻著她，撫摸著她冰清玉潔的雙臂和秀手，一邊山盟海誓信誓旦旦地說：“我永遠不會忘記你，永遠愛你，永遠記著今天晚上……”一邊接過她的照片，放入我的上衣口袋。

“那我暑假裏就到你家去，你同意嗎？”F 君突然撒嬌地問我。

我像被電擊了一下，猛地把她從懷裏推開，斷然說：“不行，不行！”

她很茫然，不知爲何我的態度發生突變：“你不是說永遠愛我嗎？爲什麼不同意我到你家去？”

“我的意思是……這樣吧，我……我回到家給你寫信，你接到我的信再來。”我臨時構思著自己的解釋。

我的家？我的什麼樣的家？那一片斷井頹垣？我殘疾的母親？我出獄不久尚未恢復人形的二哥？……這一切能給這位天仙女看嗎？一種強烈的自卑感頓時籠罩了我，後來我們的談話與行爲開始降溫。

我違背了自己的諾言，暑假裏沒有給她寫信。後來我們考入了不同的大學。當然，我的初戀無果而終。但是我始終珍視著她對我的那份純真少女的愛，珍視我們姐弟一樣的情感。在我去上大學前，我把她的照片和幾封疊成三角形的信放在我的日記本裏，連同我的其他幾本日記封起來放在大哥的箱子裏。可惜，文革起時，大哥擔心我的日記惹出禍來，把它們統統付之一炬。

二十一年後，我早已爲人夫、爲人父，她也早爲人妻、爲人母，我們又幾經曲折取得了聯繫，而且在她的幫助下，我調入了她所在的城市。我依然敬重著她，以姐姐視之。



第四章　我的大學

（1963 年夏——1966 年 7 月）

1. 遠行之前

高考結束了，我回到了母親身邊，回到現實中來，開始了我的農家生活。一九六二年冬天，大哥把二哥保釋了出來，保住了二哥的命，沒有使他變成黃河灘上的怨鬼，也使母親少了一份心事。

我每日與母親和二哥一起種我們的責任田，割草曬乾了賣錢，也幫助嫂子種她的責任田。畢竟她的孩子小，大哥不在家，她一個人種不過來。我忘記了學校，忘記了理想，忘記了未來，也忘記了與 F 君的那段戀情，沒有勇氣寫信給她。

一天上午，我正在村邊田裏割草，突然聽到有人叫我的名字。擡頭一看，是郵遞員唐成良。他邊騎著自行車邊趕路邊對我喊著說：“世華，你的大學錄取通知書來了，送到你家裏去了。”

我像是被突然從夢中喚醒，趕緊挎起糞箕往家跑。到了家，我上氣不接下氣地問母親：“我的信在哪裏？”

母親遞給我那封決定我命運的掛號信。信的右下角赫然印著大紅的“安徽大學招生辦公室”。我用發抖的手拆開信，只見信的第一句寫著：“李世華同學，祝賀你被錄取到我校外語系英國語言文學專業！……”

大哥於第一時間趕到家。顯然，唐成良已把這一消息告訴了他。對這一消息他是家裏人最感到高興的——他的十幾年的心血沒有白費，他比誰都更理解這其中的意義。

母親心裏不希望我走，不希望我離開家。但她看見我高興的樣子，不說不讓我上大學的話，而說：“認多少字算夠？”她認爲讀

書就是認字，上了十幾年學認的字還不夠用嗎？而且，在莊稼人看來，會算帳、能看秤、認得票子（錢）就算識字了，就夠用了。

大哥對母親說：“上大學上邊管吃，家裏不要花多少錢。再念四年就有工作了，有了工作就能領工資了。”大哥選了個恰當的切入點，一個比較容易勸服母親的說詞。

但母親卻說：“我不知道還能等到那一天嗎？”

母親的話使我心裏一酸：是的，母親已經是六十二歲的人了，歲月的滄桑把她折磨得如西風殘燭，再也經不起任何風雨，死神隨時會把她帶走。這幾年雖說不像一九六〇年那樣，但家裏吃的真正能算得上“糧食”的並不多，主食仍然是紅芋片子，青黃不接時還得吃野菜樹葉。二哥雖說結束了勞改生活，精神上比我一年前探監時的那個“勞改犯”並無大改善，照顧母親是不能指望他的。說不定母親真的等不到我畢業拿工資的那一天。

我猶豫了……

遇到這樣的事，我總找店裏二叔商量。

“咋能不念，憨的！”愛芝叔把手裏的煙袋往地上一磕，眼睛從厚厚的鏡片後直直地盯著我，“種莊稼有啥出息？您守成哥畢業了分到北京二機部，現在一個月拿五十多塊錢了！”

店裏大嬸插問我：“世華，你走了想娘不？”

我說：“我就是對俺娘不放心，心裏還是想上學……”

店裏大嬸說：“想上就去吧，上出來不就能孝順娘了？您守成哥不是苦出來了嗎？您娘不要緊的，這兩年不像前兩年了。”

聽了大嬸的話，我心裏踏實了些。

自從爺爺、父親、叔父去世後，我們與二姑家來往得少了。大哥畢竟是個貧農出身的校長，又經過了幾次政治運動，他懂得，在那大講階級鬥爭的年代，不知道什麼理由都會禍起蕭牆。所以，他謹慎地與姑母家“劃清階級界限”，逢年過節都是讓嫂子代爲看望

二姑。二姑漸漸年齡大了，二十五裏的路程對她來說不是件容易的事；還有，二姑每次來，一進南門口，就看到她的父親和兩位哥哥的那一片墳頭，心裏像刀割一樣，就一路哭到我家。她受不了這種感情刺激。再說，她自己也是戴著帽子的“四類分子”，外出要向隊長請假。所幸的是，她所在的小吳樓村大都姓韓，與姑夫同姓，當隊長的還是他的晚輩，所以給了許多照顧，免了許多勞役。外姓的“四類分子”可就享受不到這份待遇了。姑母每講到此時，還透著幾分優越與自豪。

我考上大學是件大事，大哥沒顧得許多，自己親自出馬用自行車接來了二姑，請她幫我拆洗被子、縫補衣服鞋襪。母親殘疾的手再也不能幫我做這一切，嫂子的針線活也做得不好。

二姑一到，就高興地對母親說：“嫂子，你看三兒熬出來了吧？再過幾年你不就得濟了嗎？”

“我就是怕等不到那一天。”母親還是那句話，不過話是這麼說，態度已經鬆動了。

二姑把我在中學時代用過的被子拆掉，換上個新的面子，把板結了的棉絮重新彈過，仍舊用原來的被裏給我縫了條被子。二姑又把我原來的被面一撕兩半，中間加了點舊棉絮，給我縫個小褥子。我的衣服，有的要補，有的要漿洗，有的要拆了重做，這一應的事情，二姑都給我做了。臨走的時候，我姨母家的兩個表嫂每人給我做了一雙鞋、張了一雙襪子。這樣，一切就基本上齊備了。

快開學的時候，天下起了連陰雨。這些年，除了饑餓之外，我們最擔心的就是下連陰雨。一下連陰雨，家裏便沒有乾柴禾燒鍋，縱然有糧食也吃不成飯。所以，每次一見下雨，我們就趕緊往屋裏抱柴禾，把鍋門口堆得高高的滿滿的。這一次的雨來勢兇猛，不僅下得大，而且延續時間長，白天黑夜，嘩嘩啦啦的麵條雨一個勁地

下。有時候很怪，看著天上雲彩不厚，甚而太陽還露著半個臉，雨照樣淅淅瀝瀝下個不停。眼見得鍋門口堆的柴禾已經燒光，我們只好把外邊淋透的濕柴禾抱進來，每次吃完飯後塞進鍋底下烤。晚飯全免了，有時吃點中午剩的東西，有時什麼也不吃。好在白天不能幹活，消耗的能量也不多。到了第四天，聽見外邊“呼嗵”一聲響，把我嚇了一跳。母親說：“不知道誰家的房子倒了。”此後，這樣的聲音越來越頻繁，我們也越來越緊張。俗話說：屋漏偏逢連陰雨。父親、叔父去世後，兩家的房子沒有人修理過，我們的房子能經得起這場考驗嗎？萬一倒了，我們何以爲家？屋四處在漏雨，有的地方已露了天，雨水直往下淌，我們把鍋碗瓢盆都動員出來接水。爲了躲開雨腳，我們不得不擡著床轉來轉去，以使夜裏能有個地方睡覺。正如杜甫在《茅屋爲秋風所破歌》所描述的：床頭屋漏無幹處，雨腳如麻未斷絕。第五天、第六天雨依然不緊不慢地下。母親望望天，不知說了多少遍：“老天爺，你行行好，睜睜眼吧，可憐可憐俺們窮人！”

老天爺許是被母親的誠心感動了，到了第八天，太陽掙紮著從雲層裏爬出來，雨嘎然而止。我們的房子保住了，我們又躲過一大難。

王作軍也把我考上大學看成一件大事，他說：“咱大南門那麼多上學的，就你一個上出來了。”

是的，讀書就像一場馬拉松比賽，跑的過程中，陸續有人掉隊，最後就剩下少數人沖線。大南門與我一起在村小學念初小的有十幾個，到了高小就剩下五、六個人，到了中學就只有我一個了；念初中時，我們初三（1）班唐寨的同學有三十多人，升入高中的只有十多個同學，而這十來個同學中考上大學的只有五、六個。在這場艱苦而漫長的馬拉松比賽中，我沒有掉隊，跑到了終點。

因爲我這一走是出遠門，短時間內見不著面，王作軍執意要請我吃頓飯。可他用什麼請我呢？他家裏有一隻不大的公雞和一瓶不知從哪裡弄來的老白乾酒，一個菜怎麼請人呢？我理解他的盛情和窘境，便從大哥給我的錢裏拿出兩塊錢，說：“你用這兩塊錢再買點肉，也不用說是你請我還是我請你，咱們兩個在一起吃頓飯就是了。”他答應了。他把小雞和南瓜一鍋燉了，然後把雞肉和南瓜分開盛作兩碗算兩個菜，粉絲和豬肉燴了一碗肉，調了根黃瓜，共計四個菜，有涼有熱。他把每樣菜都夾幾塊放在另一隻碗裏，端給三嬸，讓她老人家到別處吃，我們兩個坐在兩個小板凳上，就著矮方桌對酌。這是我平生第一次“吃請”，也是第一次吃到這麼豐盛的菜肴。席間，我也安排王作軍家裏的事替我多操點心，多說說二哥，等等。

我把要帶的被褥、鞋襪、衣服和店裏二叔送給我的三本《古文觀止》用一個大包袱皮裹成一個大包，用毛巾把母親給我烙的路上吃的饃包好，連同茶缸一起裝入我中學時來回帶饃的小書包，母親在我的褂子裏面貼塊布做成個小口袋，把大哥給我的錢縫進去。這樣，我就可以走了。

我第一次出遠門大哥不放心。他的熟人的弟弟陳洪斌在安徽農學院念大三，大哥安排我與他同行，囑咐他一路上多關照我。

母親望著我那個裹被褥的大包袱說：“包袱太大了，小褥子不要帶了吧。”

中學六年我都是只用一條被子，晚上與別人“打撑腿”。到了大學，沒有認識的人，我跟誰“打撑腿”？於是說：“不要緊，我能背動。”

後來母親又說：“包袱大不好上火車，不要帶小褥子了。”

我仍然說：“有同路的，上火車時可以互相幫忙。”

後來，我還是把小褥子帶走了。

若干年後，回憶起這一段情景，我忽然悟出：母親和二哥的被子早就破爛不堪，被絮被壓成金屬板塊一般，正是“布衾多年冷似鐵”，不能禦寒；而母親自己又沒有能力再拆洗縫補，她想叫我留下小褥子以便娘倆可以將就過冬。

我真笨，這麼多年來與母親相依爲命，怎麼不理解母親的意思呢？怎麼不能體諒母親的難處呢？直到今天，每想起這件事我都後悔不疊，自咎難過得落淚。

2·大學第一課

經過徐州、蚌埠兩次轉車，我乘坐的列車往目的地合肥開去。一路上我們都沒有座位，走道上和兩排座位之間都擠滿了人，行李架上堆滿大大小小的包裹、網兜、麻袋等。我與陳洪斌早已經被擠散了。我在兩節車廂的連接處找了個空，放下裹著被子的大包袱。我想去找他，可是望望水泄不通的走道，又打消了念頭，只好坐在包袱上面打盹。那天天特別悶熱，車走起來時還好受些，要是車一停，一點風都沒有，滿車廂都彌漫著混雜有鞋臭的汗味。在那個年代，人們學會了忍耐，沒有憤怒，沒有抱怨，把命運交給了這輛緩緩行駛的破車。

不知過了多長時間，也不知走了多少路，我被熱醒。大滴大滴的汗珠順著我的臉往下淌，把褂子都濕透了。原來車早就停了，一打聽，車已經到了水家湖。我站起來往窗外一看，眼前的景象把我驚呆了：火車兩邊一片汪洋，水天相連，遠處水面上冒出的樹梢表示那裏原來是個村莊，偶爾露出幾個房頂，屋草飄散在水裏，掛在樹梢上。至於村裏的人到哪裏去了，不得而知。從車窗往下一看，

水已經沒了鐵軌。我意識到，這一切都是前一段時間的那場大雨惹的禍。

這下完了，我們的火車要被困在這片水澤之國了。滿臉、滿脊背都在流汗，饑餓已經讓位於口渴，喉嚨眼直往外冒煙。過道裏被人和行李塞得滿滿的，要去打水根本通不過，也許茶水爐裏就沒有水，或者火車上壓根兒就沒有水爐。滿車廂的人都在無助地等待。

不知過了多少時候，我看到兩邊的電線杆在緩慢地後移——我們的車開了！從窗戶往下望，火車在鐵軌上輕輕地滑行，車過處鐵軌在水面上一上一下，晃出一小片漣漪。但剛走了不大會，又停下來了，然後又往前爬了……就這樣，火車走走停停，停停走走，到合肥的時候已經天黑了。三個小時的路程整整費了七個小時。

我背著包袱出了站，這時才遇到了陳洪斌。他幫我找到了安徽大學新生接待站。接待站的同學把我送上一輛卡車，遞上我的包袱。汽車把我拉到學校的時候，大約有九點多了。

一個高年級的同學把我領到一間宿舍，幫我把行李放到一張床上，安排我說："你今天晚上先睡這裏，明天重新調整。床上已經鋪好了席子。睡覺的時候要關好帳子，這裏蚊子多。"

他忽然想起來什麼，問我："忘了問你了：你還沒吃飯吧？我帶你到伙房買飯去。"

我說："我倒不怎麼餓，就是渴得厲害。"

"吶，這水瓶裏打好了水，你喝吧。——別的還有什麼事嗎？"

"沒有了。"

"那我走了。喝好水早點睡吧，該累了。"說著，他帶上門走了。

我說了聲："好。"我這個鄉裏來的孩子，連聲"謝謝"也不會說。

那晚整個房間裏就我一個人。我“咕咚咕咚”先一連喝了兩茶缸水，這時才覺得有點餓了。我掏出沒有吃完的烙饃，就著熱茶吃了起來。可能是第一次離家這麼遠，我吃著吃著突然想起了母親：不知母親這時候睡了沒有？她還在擔心我嗎？……

我把行李解開，只用包袱皮當被單蓋上肚子，關上帳子，拉滅燈，酣然入睡。旅途的疲勞使我一覺睡到大天亮。我睜開眼，環顧蚊帳，頓時渾身起了一層雞皮疙瘩：白色的蚊帳上爬滿了大大小小喝飽了血的臭蟲！再回頭看看自己，全身密密麻麻佈滿了小紅點。這些餓了一整個暑假的臭蟲在我渾然不知的情況下飽餐了一頓，個個喝得圓滾滾的。

我拿出被單，倉皇地從帳子裏逃出，像是被一群野獸追著。

我們這一屆共招收一百名新生，俄語專業四十名，英語專業六十名。後來文革中一位老師閒聊時順便問起我的學號，我告訴他是63E041。他翹起大拇指對我說：“你很厲害，是那一屆英語專業的高考成績第一名！”他告訴我，他參加了我們這一屆的分班工作。學號完全是按照高考成績排列的。“63”代表 1963 屆，“E”代表外語系，俄語專業四十名，學號從 001 到 040；英語專業六十名，學號從 041 開始，到 100。

我們新生的第一次大會是在文科樓 401 會議室開的。系主任李東光、副主任姚企文等都和我們見了面。李主任身材魁梧，滿臉威嚴。他先在會上講了話，歡迎我們考入安大外語系，勉勵我們好好學習，最後說：“有的同學專業思想不鞏固，剛進校就打報告想轉系。我現在答復你：想念就在外語系好好念，要轉就轉回家！”接著，副主任姚企文向我們介紹了系裏著名的教授及先進的教學設備。最後，系團總支書記張鏡波宣佈了分班和任命：我被任命爲英語專業甲班班長。

我們八個人住一個宿舍。我的室友有另一位來自碭山中學的同學盧洪泉，臨縣蕭縣的任予懷、陳愛民、鄭宗平、夏平安，望江縣的周成煦和太湖縣的梅義常。南方同學和北方同學在風俗習慣等諸方面有不少差異，即使同是北方同學，各人的性格脾氣、爲人處世方式也不盡相同，時間長了，漸漸地鬧出一些小摩擦，生出一些小意見來，有的彼此產生了隔閡，甚至有了芥蒂。在我們分開後反思這一段生活時，我驚奇地發現：其餘的七個同學之間，儘管相互都有點小不和，但都與我無怨，都與我爲友！

我問過自己：是否因爲我是個班長？是否自己過於無原則和稀泥？都不是。長期的自卑心理使我滋生了包容。自己經歷了太多的不幸，所有不堪忍受的東西都忍受了，同學之間還有什麼讓我不能容忍的呢？

漸漸地，我與其他班的同學也熟悉了，有的甚至成了我的至交。孫旭培是乙班的班長，他與我個頭相仿，別人說我們兩人長得很像，所以常有人問我們是不是弟兄兩個。爲別人所不知的是我們有共同的悲慘童年。一九六Ｏ年，孫旭培也正在讀初三。他家所在的懷寧縣萬橋公社三元大隊前進生產隊，只有二、三十戶人家，全生產隊不過百十口社員，大饑荒時期卻餓死了三十六人。父母親不忍心眼看著三個兒子餓死，決定帶領他們奔江西省彭澤縣度荒。江西省浮誇風起步晚，所以大饑荒也來得遲（但江西後來居上，《江西日報》頭版頭條報導，鄱陽湖畔的一個生產隊的“衛星田”畝產二十萬斤，放了一顆超過廣西環江縣的特大衛星）。當安徽已餓殍遍野時，彭澤人還有點吃的。孫旭培輟了學，隨父母到了安慶，準備乘船去九江。但是，沒有證明信碼頭不賣給票。望著滔滔的江水，全家人只好原路折回。孫旭培發愁了：還繼續自己的學習嗎？已經三四天沒到校了，到了學校怎麼交待呢？這時，村裏的一位長者給他出了個主意。孫旭培按照這位長者的意思對班主任說：“家裏生活困難，

父母親想去江西，我跑到安慶把他們追了回來。”這樣學校不但沒有批評孫旭培，反而在他的期末鑒定裏寫道：對當前形勢看法正確，對家庭中出現的問題有很好的認識。

入班不久我們就評定助學金。當時的全額助學金標準是伙食費十元、生活補助費兩元，最高的總數爲十二元。每個人先填表，介紹家庭經濟情況，申請助學金數，由全班同學評議，最後由系辦公室敲定。

這時候，我家裏早已破敗不堪，母親貧病交加，二哥已喪失勞動力，但自己仍然把自己歸於“家裏有工作人員”的條件優越的家庭，沒有申請最高的助學金，只申請了十一元。但同學們聽了我的家庭經濟情況介紹後，一致認爲我應該享受最高的助學金，所以“班級意見”那一欄填的是十二元。系辦公室汪源林秘書單獨找我，談了辦公室的折中想法，徵求我的意見。我慨然應允，所以我的助學金最後評定爲十一點五元。與我的情況相反，絕大部分同學的最終評定數是低於申請數的。

系裏見我生活困難，補助了我一條絨褲，這條絨褲一直伴隨了我七年，後來二哥又接著穿了多年，直到這條絨褲被補得面目全非。

3．“黃金”時代

人們都說，大學時期是一個人的黃金時代。大學生活確實不同於中學，但有一樣沒有改變：饑餓。

十元錢的伙食費是固定的。一天三餐也基本上都是老菜譜，同學們稱之爲“老三頓”：清早一舀稀飯加鹹菜，中午和晚上一小碗米飯和一勺燒冬瓜、南瓜、茄子、白菜等。那時的燒菜其實是白水煮菜，菜湯上連油花都沒有。這個標準是不夠吃的，尤其早上的一

碗稀飯兩節課後就消化完了，後邊的兩節課是抱著餓肚子熬過來的。遇到第四節有體育課時，酸軟的雙腿實在拖不動我們的身軀，我們就偷懶坐在地上。中午開飯時，同寢室的八個同學圍著一個方桌，盯著值日生同學分飯菜。八個人一淺搪瓷盆乾飯、一盆燒菜，值日生先用一個薄竹片在米飯盆裏劃兩道垂直線把乾飯分成四塊，每一塊再均分成兩小塊，然後扒到每個人的碗裏。接著值日生開始分菜，用勺子把菜盆裏的菜分到菜盆周圍的八隻碗裏。我們宿舍的夏平安同學個子大，飯量也大，常常不等到分好菜就先把米飯吃完了，所以他的飯菜是分開吃的：先吃飯，後吃菜。

每天早晨開飯以後，我們總見到一個衣衫襤褸的同學，背著一個打著補丁的書包，弓著腰用手刮吃飯桶上殘留的飯渣。如果不是他戴著的一副近視眼鏡和他身上背著的書包，你無論如何也不敢相信他是大學生。別人告訴我們，他那年大四，家庭極困難，但學習特別用功。爲了給自己增添一點讀書的能量，顧不得尊嚴，採取了這樣一種“有傷大雅”的方法。時間長了，我們見怪不怪，伙房的工友也不攔阻他。我們時常在我們外語系文科樓上遇見他，依舊是那身襤褸衣服和肩上背著的滿是補丁的鼓鼓的大書包，裏邊裝著他的書和一隻破搪瓷碗。

每星期四中午吃一次肉，用肉燒冬瓜或南瓜或萵筍等。我們也稱之爲“星期肉菜湯”。大家都不情願擔任這一天的值日工作，因爲它的“技術含量”高：八個人眼巴巴盼了一個星期的一頓盛宴要分得絕對平均並非易事，搞不好說不定會鬧出意見來。這天中午分菜的時候通常兩步走：先分肉，再分菜。值日生把肉一塊塊地用筷子夾著平均分到八隻碗裏，然後分菜。當然，肉塊有大小，肉塊的數量也很難被八整除，這就要看值日生的本事了：肉塊小的可以塊數多一點，反之，肉塊大的塊數就應該少些。這個“調整”工作牽動著大家的心，值日生也做得特別精心。

我們那時候總把餓肚子歸咎於伙房的工友，認爲他們克扣了我們的口中食，所以禮堂門口的佈告欄常常出現同學們抱怨食堂的大字報，說早上的稀飯是“洪湖水浪打浪”，有的用漫畫把工友們畫成偷吃我們飯食的碩鼠，有的套用《洪湖赤衛隊》的詞編成歌曲：“娘啊，兒死後，你要把兒埋在那食堂旁，將兒的墳墓向伙房，讓兒常聽那鍋鏟兒響，常聞飯菜噴噴香……”

那時的學校各層幹部中，膳食科長恐怕是最難當的。我們時常看見膳食科長愁眉苦臉地站在佈告欄前看大字報。饑餓使學生與食堂工友之間形成了尖銳的對立，稍有摩擦，大群學生會群起而攻之，工友也迅速圍攏起來保護他們的夥伴，由此釀出了許多衝突。

我們宿舍的周成煦、梅義常兩個江南的同學，家庭境況好得多，經常寄米粉、餅乾、炒芝麻來。我們蕭縣、碭山的六個皖北同學就沒有一點額外補助。收到家裏的包裹後，他們一般躲著我們拆開，避著我們吃。不過，我們也不是小孩子，看到他們拆郵包，就知趣地走開。周成煦跟我感情很不錯，每次收到家裏寄來的東西時，都偷偷地執意讓我分享一點。

我們的前幾屆有很多上海學生。他們的家庭情況更好。合肥的花生很便宜，炒熟的花生兩毛錢一斤。他們經常到校內路邊的小攤販那裏買炒花生吃，在校園裏一邊吃花生，一邊散步，瀟灑極了。我在他們走過的路上念書的時候，花生殼中間不時能看到灑落的花生米和未剝開的花生。我環顧左右，如若身邊無人，便撿起來吃。後來，這變成了我的一個有意識的行爲：無論散步還是讀書，我都循著那些上海學生常走的路，而且眼睛仔細地掃視著地面，每次都是有收穫的。

合肥的雞蛋也便宜，三四分錢一個。醫務處備有爲病號學生煎中藥的火爐，有些條件更好的學生買了雞蛋端著茶缸到醫務處煮著吃。這應該是最奢侈的了。

丙班的同學比較幸運：他們班有好幾個合肥市的同學。這些同學逢週末就回家加餐去了，同宿舍的其他同學就可以分享他的那份飯。一個週末，同一個寢室的三個同學都回了家，一個同學把他們的三份飯都吃了，結果晚上撐得受不了，半夜三更到操場上跑步。

每月一塊五毛錢的生活補助費我一直領了五年，直到我一九六八年離開安徽大學。我知道大哥爲了我上學受盡了難，我不應該再給他增加負擔。我的日常開銷如購買肥皂、牙刷、牙膏、毛巾等等，進城買公交車票，看電影（當時，每週末都在草棚電影院放電影，票價五分錢），等等，都從這一塊五毛錢裏出。月終結算，發現這一塊五毛錢竟然還有盈餘。

當時，老師要求我們每人有一本工具書，並向我們推薦了《英華大詞典》。有條件的同學馬上就買了，看到別人都有了，自己心裏癢癢的。一本《英華大詞典》定價五塊二毛錢。我盤算著，如果我每月節約五毛錢，那麼，一年我就可以省出一本詞典來。

我們的一些公共課如政治、現代漢語等都是與中文系合上的，慢慢地我認識了一些中文系的同學。段同學常往我們班來找他的老鄉，漸漸跟我也熟了。中文系課業負擔輕，壓力小，段同學經常去逛大街、吃飯店。段同學並非紈絝之家出身，家裏寄的錢常不夠用。當他聽說我的計畫後，叫我每月給他五毛錢，他一年後負責給我買一本詞典。我答應了。每月領了生活補助費，按時給他送去五毛錢，計畫著以這種沒有利息的零存整取的方式進行“儲蓄”。

如果有事進城，我一律步行，以便省下兩分錢的公共汽車票。學校裏有縫紉組，衣服破了，拿去補補，只要三、五分錢；星期天一大早，女人的長音在樓道裏回蕩：“洗——被子嘍——”。她們早晨把被子拿去，傍晚便給你送來拆洗過的乾乾淨淨的被子，這也只要兩毛錢。但這些事都是我自己幹，不僅衣服破了自己補，被子

髒了也自己拆洗。總之，我把能省下來的每一分錢都省下來了。一年多的時間過去了，我共給了段同學五塊五毛錢。

段同學卻以種種理由拖延著，並不給我買詞典。見了我，有時說：“我好長時間沒進城了，晚幾天再給你去買。”有時又說：“你要的詞典叫什麼名字？我到了書店把名字忘了。”後來，文革開始，他四處串聯，難得見著他的面。偶爾相遇，他也不提買詞典的事。再後來，他畢業分配到自己的家鄉去了，我則和大部分同學去了農場，再沒見過他的面。這樣，等於說，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裏，我從自己的一塊五毛錢的生活補助費裏省出五毛錢給了這位公子去逛大街、吃飯館！

古人雲：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我遠沒有到能夠“兼濟天下”的“達”的程度，但我確實一直在做著力所能及的善事，對別人的困難也盡可能去幫助。但我卻至今記著這五塊五毛錢，也記恨著那位段同學的不義，因為這五塊五毛錢實在來之不易。

4·張開你的嘴

我們甲、乙兩個班的同學高中都是學俄語的，也就是說，我們的大學英語是從 ABC 二十六個字母和音標開始的。我們採用的是許國璋主編的教材，二十六個字母和音標之後是 I am…、You are…、He is…，I have…、He has…和 There is…、There are…等等簡單句型，枯燥而乏味，遠沒有《古文觀止》裏的那些文章有意思。我腦子裏多次閃過轉到中文系的想法，但一想到李東光主任在開學典禮上講的話，馬上打消這個念頭——我不能再回到我那個窮困的小套子去。

到了第二冊、第三冊，教材開始接觸了一些從外國經典文學作品改寫的文章，如《The Last Lesson》（最後一課）、《The Cop and

the Anthem》（警察與聖歌）等，我開始對英語產生了興趣，課文讀起來也開始有了味道。但不幸的是，我們剛剛要入門，大門又被無情地關上了。

系領導向我們傳達了毛澤東關於教育革命的春節講話。毛澤東舉了孔夫子、李時珍、祖沖之、佛蘭克林、高爾基等大人物讀書不多的例子，說：“舊教學制度摧殘人材，摧殘青年，我很不贊成。”又說：“學制可以縮短，課程可以砍掉一半。”

在大禮堂舉行的全系同學參加的思想革命化的彙報會上，大四的孫同學結合自身經歷“控訴”了舊教材腐蝕學生思想的“罪行”。孫此前政治上不思進步，不熱心集體活動，講究穿著，追求資產階級生活方式，成了班裏的落後分子。他分析原因，是受了舊教材的腐蝕。他特別舉了教材中王佐良翻譯的一首詩 A Red, Red Rose（一朵紅紅的玫瑰）作例子，說：“這樣腐朽的資產階級的東西是我們青年學生思想的腐蝕劑，它瓦解我們的鬥志，讓我們迷戀於卿卿我我花前月下的愛情，放棄思想改造，而最後墮落成資產階級的接班人。”

於是乎，《許國璋英語》被叫停了，我們開始教育革命了。

我們年級是教育革命的試點，教改的重點是口語，用劉敏良老師的話說就是“Open your mouth first.”（先張開你的嘴）爲了適應這一要求，便於我們練習，全年級甲、乙、丙三個班根據成績進行了重組，變成了四個更小的小班，每班十五人，原來高中階段學過英語的丙班的同學被摻砂子分到各個小班裏。這麼一來，原來乙班的李慶厚、丙班的邢凌初都調到我們班來了。每個班要求同桌的兩個同學是一對，上課坐在一起，下課後在一起對講英語。

我的伴是一位姓蔣的女同學。除了上課我們在一起練之外，課外活動和晚飯後我們也經常約好出去散步。蔣同學是一個勤奮而又不拘小節的女生，經常晚飯後在我的宿舍樓下叫我：“Little Monitor!

（小班長）”這時候，幾個好開玩笑的室友們就會說：“呶，李世華，聽到了沒有？有人喊‘Little Monitor!’呢！”雖然我們確確實實是在一起練口語，但後來卻被幾個同學演繹成緋紅色的笑話傳播。

上課的時候，不再是老師講、學生聽，也用不著黑板和講臺。我們把課桌圍成一個矩形，大家面對面地講口語。我們採用的是老師自編的講義，內容全是日常生活會話。我們一日三餐的食譜，如饅頭、稀飯、麵條、油條、獅子頭、粉絲燒肉和當時時髦的政治口號“又紅又專”、“思想革命化”都被編進了講義。

爲了體現領導的重視，系副主任姚企文、政治輔導員烏傳袞和系團委書記張鏡波都參加到我們中間來，和我們一起上課，一起講口語。其實，烏傳袞老師原來是教俄語的，張鏡波書記是行政幹部，他們要和我們一起進行這場教育革命。

有一天，剛上課的時候，張書記用漢語解釋說他昨天沒能來參加上課，是因爲去開了一個會。我順口接了一句英語：“No wonder.”（怪不得）不料張書記馬上反問：“那怎麼完蛋了呢？”

聽了張書記的話，我們全班同學都感到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

我用漢語問道：“沒人說‘完蛋’了啊？”

“你不是說‘那完蛋了’嗎？”張書記分辯說。

我們這才恍然大悟：原來張書記把“No wonder”聽成了“那完蛋了”。全班同學爆發出一陣哄堂大笑。

此後，我們再沒接著學《許國璋英語》，更沒接觸到俞大絪教授編的後幾冊教材。說起來可憐，我們上了五年大學，系統的教材就僅僅學了三冊，遠遠超過了毛澤東說的“課程可以砍掉一半”的標準。

5. 家書抵萬金

我離開家總是對母親放不下心。我不可能再像中學時那樣利用星期天回家，只有靠書信瞭解家庭情況。我對家庭的思念使我把寫家書當成了一件經常的事。我一分錢一分錢地計畫著每月一塊五毛錢的生活補助費的用項，但從不為了省八分錢的郵資少給家寄信。我每次寄給大哥的信都是一個信封裝兩封信：一封給大哥，另一封給二哥。給大哥的信我主要是詢問母親的身體情況，家庭的收成，二哥的精神狀態，等等。我問得很瑣碎，近乎絮叨，比如：母親每天晚上燒湯嗎？母親的被子拆洗了嗎？家裏的那隻老母雞還生蛋嗎？天冷了，母親穿棉衣了嗎？給二哥的信我主要是勸他安心在家勞動，把責任田和自留地種好，多關心母親等。我有時擔心大哥給我報喜不報憂，也把給大哥的信裏的內容再問二哥一遍。

只要有信去，大哥很快就會有回信。大哥的每封來信都是平安信，事無巨細，和我的信一樣瑣碎、絮叨，告訴我：母親的身體比過去好多了，天天晚上都燒湯。責任田裏收了五、六十斤豆子，能夠經常摻著紅芋片麵擀豆雜麵條吃了（單用紅芋片面是不能擀成麵條的。在剛剛熬過饑荒的那些年代，人們把能吃上豆雜麵條看成生活的高追求）。晚上，母親有時候喝鹹湯，有時候吃麵條。還用黃豆換了幾斤豆油，平時也能吃上炒菜了。家裏收的細糧多了，今年年底分了 XX 斤糧、X 斤油，其中有 XX 斤粗糧、XX 斤細糧。母親的棉衣和被褥都拆洗過了，二哥能夠安心在家幫母親幹活，等等，等等。但大哥的來信從來都不說督促我努力學習的話。他對我的學習是放心的。

我們每兩個星期左右交換著一次信，信裏都是寫著這樣芝麻穀子的小事。但就是這樣平淡的信，安慰著我的心，穩定著我的情緒。每到大約有大哥的回信的時候，一吃過午飯，我就會站在走廊裏等我們系的那位高個子的女分發員同學。一般的時候我不會失望。

寒假到了。離家半年了，而且是生平第一次離家這麼長時間。

我很想家，很想回家看看母親。母親這半年來變得怎麼樣了？二哥在家聽話嗎？還有大侄女、侄兒都上學了，他們上學情況如何？等等。我多麼想像其他同學一樣毫不猶豫地買票回家——從合肥到離我家最近的文莊火車站的學生票只需要三塊錢。但，我兩個月的生活補助費不化一分才能有三塊錢！我也不願意增加大哥的困難。這麼多年來，爲了這個家，他付出的太多太多。我寫信給大哥，委婉地徵求寒假回不回家的意見。

大哥回信了：

> 三弟，
>
> 來信收到了。
>
> 今年家裏過年的東西特別豐富。隊裏每人分了十斤小麥、十斤綠豆，還分了三斤油。這樣，過年母親和你二哥過年就能吃上饅頭和丸子了。隊裏還準備殺頭豬，到時候，我再給他們割點豬肉，讓他們過年吃上肉餡的白麵餃子。這幾天，你嫂子正在操辦把兩家分的小麥一塊磨成粉，把綠豆磨成糝子炸丸子。咱母親的手不方便，我叫你嫂子把兩家的饃一起蒸了。咱們去年秋天的收成不錯。我去咱母親那裏看了，大豆、玉米、高粱和紅芋家裏都有，他們娘兩個一春天不用愁吃糧了。
>
> 咱們自留地裏種的蘿蔔收了不少，都存在紅芋窖裏，到時候可以作丸子餡。咱姨家下了很多紅芋粉絲，你二表哥給送來了不少，母親他們娘兩個炸丸子都用不了。
>
> 入冬的時候，用咱責任田裏產的棉花給咱娘做了個裏外三面新的棉襖，棉褲翻拆過了，被褥的棉絮也重彈了。他們娘兩個今年冬天過得很暖和。

你二哥身體和精神都比過去好了，在家裏知道幫助母親幹活，責任田裏的農活全靠他。

小紅上五年級了，成績還不錯。小運也上二年級了，算術差一點。

寒假你回不回來你自己決定。如果回來，我再給你寄點路費。

祝好！

世隆

大哥說是讓我自己決定，但他的意思是明白的。我決定寒假留校。與我一起留校過寒假的還有任予懷、鄭宗平等兩位蕭縣的同學。

為了照顧我們這些回不起家的困難同學，學校讓我們留校生過了個“肥年”：膳食科安排留校同學年三十到年初三四天會餐，即不再把飯菜分到每個人的碗裏，而是全組圍在一起吃。我們這些飽嘗饑餓之苦的大學生，面對大盆大盆的豬肉、丸子、紅燒魚等，個個饞相畢露，絲毫不講“文明”。一位陳同學總結了一條“十二字會餐經驗”：看得准，（筷子）夾得穩，咽得快，不怕滾（燙）。系領導大年初一來看望我們，還給我們送了戲票，讓我們到江淮大劇院看豫劇《朝陽溝》。這一切都是我生平第一次享受。

暫時的物質享受並不能排遣無窮的鄉思。到了晚上，平時擁擠的宿舍顯得特別空曠，我們房間裏只剩下我和任予懷兩個人。我們被無邊的孤獨和淒涼包圍著，偶爾滑過夜空傳來的鞭炮聲提醒著我們：這是家家戶戶團聚的佳節時日，使我們平添了許多鄉思。那時沒有電視，也沒有別的娛樂活動，我們兩個有時相對說點閒話，有時面對面坐著什麼也不說，有時滅了燈早早上床。其實，我們都久久不能入睡，彼此聽得見對方在床上輾轉反側，各人想各人的心思。

我牽掛著母親，吃的愈好，我愈心裏不安，常對著碗裏的魚肉發呆、掉眼淚，恨不得把飯菜省下來給母親送去。

再之後不久，我們的伙食標準由十元提高到十三元，口糧標準由三十斤增加到三十四斤，每個月還給我們二斤副食品票，可以到校內小店裏買餅乾、三刀酥之類的糕點。這時候，我癟了五、六年的肚子才開始差不多能填滿了。

福兮禍所伏。農學院有一個同學，第一個月領到糕點票時，想過一把癮，把二斤票一次用光，然後將買來的二斤糕點一頓吃掉，撐得哭爹喊娘滿地打滾，後被送到醫院，竟不治而死！聽說醫生開刀後發現，他的腸胃都給撐破了。

後來知道，母親的日子並不像大哥信裏所說得那樣令我放心。那年秋天的大雨使秋季作物幾乎完全絕收，大哥不得不從工資裏抽出很大一部分給家裏操辦吃的，給母親的零用錢也少了。有相當長的一段時間，母親天天到唐寨中學去撿破爛，而唐寨中學就與我大哥所在的唐寨小學一牆之隔。她之所以去那裏，是因爲那裏能撿到更多的廢紙。起初，看門的不讓她進，後來知道她是隔壁李校長的母親，便不再攔她。母親很自覺，並不去辦公室、教室等不該去的地方，也從不動別人不讓動的東西，她只撿老師、學生們丟棄的廢紙。撿了半上午後，她就勢賣到街上的收購站去。但收購站後來不耐煩了：母親每次送到那裏的東西還不能蓋滿那隻破籃子底，只有斤把重，只能賣兩、三分錢，收購站嫌這兩、三分錢的買賣太費事了，所以見到母親常說：“多撿兩天再來吧。”母親只好挎回家，聚三四天之後再挎去賣。這樣，她每次可以賣得一毛錢，而當時的物價是四分錢一個雞蛋、兩分錢一盒火柴、一斤鹽一毛四，一斤煤油三毛二分。也就是說，一毛錢可以買到兩個半雞蛋或五盒火柴或三兩多煤油或七兩鹽！

三嬸子和店裏大嬸問我母親：“你天天到中學裏撿破爛，您兒就在旁邊學校當校長，你不給您兒丟人嗎？”

“那丟啥人？我又不偷人家、不搶人家。就算拾人家不要的東西換點洋油、洋火。”母親不以爲然地說。

實際上，大哥早知道母親在撿垃圾，也早勸過她。但母親說：“你的孩子大了，小紅、小運都上學了，還有一家人的穿，花錢都靠你咋行？拾破爛累不著我，咱不偷不搶也不爲丟人，我孬好一個月撿四、五千塊錢（四、五角錢。新幣制實行後的很長時間，母親都不習慣，老習慣使用舊幣制單位），夠俺娘兩的油鹽錢和零花錢了。”

大哥知道說也沒用，便不再說。

在我上大學的那幾年，二哥也沒有少讓母親操心。他並不聽我們的勸導，不在家安心勞動。他當時剛過三十歲，正處於人生中的壯年階段，吃了兩年糠菜半年糧的飽飯之後，似乎內心又滋生了幻想，想再與命運作一番博弈。他忍受不了家庭的貧寒和生活的單調，在家呆不了幾天就揣上幾個饃不告而別，但在外邊混一陣之後，他又自己回來了。來無影，去無蹤，獨來獨往。那時候，政府已不再抓“流竄犯”。一開始，他爬火車往外地去，企圖逃離窮困的小套子，找一個幸福的所在。他沒有目標，爬上火車，鑽進運煤的車廂，沿隴海路一路西行。什麼時候火車不開了，或者他帶的饃吃完了，在車廂裏餓得受不了了，他就下車。那些年，他曾到過鄭州、洛陽、開封、商丘。下車後，他先討飯，然後隨人到豫南的山裏幫人打窯洞。河南的生活並不比安徽好。討來的東西填不飽肚子，晚上睡到街上的店門口或鄉下的草垛邊。他雖年紀輕輕，兩次牢獄生活和連年的饑荒已耗盡了他的活力，幹活有氣無力，精神萎靡不振，所以幹不了幾天活，就被人家給攆了。然後，他只好打道回府，討著飯

爬火車回家。他每次回到家時，都是滿臉滿身的煤渣，比離家時又瘦了一圈，衣服上也長滿了蝨子。於是，母親就連勸帶數落地說他：“你看你變得還有個人形沒？你再看看你有啥本事？比你有本事的多了，不都在家幹活嗎？”大哥也說他，他只是不聽，休整一陣之後，又不告而別了。只是跑的路程越來越近了，由洛陽而開封，由開封而商丘，由商丘而碭山縣城。再到後來，他縣城也去不了了，就到親戚家去。他最常去的是姨母家、姑母家，也去表姐家。到了親戚家，雖說親戚都知道他磨叨，也並不把他當病人，照樣好菜飯招待他。他得以換一個環境，調節一下心情，也得以吃幾頓好飯。不過走親戚的時候他也沒忘帶“禮物”：幾根油條或一串包子。為了攢點買“禮物”的零花錢，他也撿破爛，不過他撿的是牙膏皮和骨頭。這兩樣東西收購站給的價錢高。

在二哥不在家的那些日子，母親一夜一夜地睡不著，她擔心著自己的兒子。那些年，出外逃荒的，沒少被火車軋死、擠死的，也有餓死在外邊的。有一年冬天鵝毛大雪紛紛揚揚下了三天，封了路，封了井口，封了河溝。到處聽說有人掉到井裏、河裏凍死了。而二哥出去幾天了沒有回來，母親吃不下飯、睡不著覺。天晴了，雪化了，二哥居然腿一跛一跛地回來了。母親抱著他大哭：“我的兒，你沒死到外邊？你能不能聽娘的話，不叫娘操心，守著娘在家安安生生過日子？”

6. 與疾病作鬥爭

一天中午開飯時間，迎著校廣播站大喇叭裏播出的“社會主義好”的歌曲，我拿著飯碗走向食堂。突然，我一眼看見我的母親，她手裏拄著一根棍子，步履蹣跚地正對著我走來。她還是那樣衣著襤褸，還是那樣彎曲著身體，稀疏的頭髮被風吹得零零散散，露出

憔悴的面容。對，就是我的母親！我來不及多想，對著她老人家跑過去。到了跟前，剛要喊“娘”，我又停住了——那不是我的母親。

像這樣類似幻覺的事情時而出現。有時看見一個踽踽而行的瘦弱老者，我會誤認爲是我的爺爺，我也在大街上看見過我的“父親”、“叔父”和“嬸母”。這樣的事有時發生在在夢裏，一覺醒來，並不見親人。而後，很長時間我都睡不著覚，這幾年家庭的不幸像電影一樣一幕幕在頭腦裏閃現，想著想著，不覺淚流滿面，濕了枕頭。

我開始失眠了。

我發現自己上課時思想不像過去那樣集中，聽著聽著心卻飛到家裏去了，飛到過去的年月裏去了……當我意識到自己思想開了小差時，趕緊強迫自己回到課堂上來，可是要不了多久，腦子又溜了號……

我不得不在功課上化更多的時間，課外活動和晚上的時間我都利用上了。我發現自己學習的效率低了，心情開始焦慮，而焦慮使我越發睡不好覺。

我必須去看醫生了。好在大學生享受公費醫療，看病不要錢。後來，衛生科成了我常去的地方，而且與很多醫生熟悉了。但他們給我開的穀維素、Vb6、六味地黃丸之類的藥卻治不好我的病。我的失眠越來越嚴重，一直困擾我到四十多年後的今天。

俗話說：黃鼠狼偏咬瘸鴨子。從一九六五年春天開始，我患上了痢疾，一個勁地拉肚子，中藥、西藥、偏方全吃了，就是止不住，最後弄得我“人比黃花瘦”。這時，我才相信了母親的話：“年輕時受了虧是一輩子的事”。那些年我吃了那麼多的黴變的饃頭，現在該是報復我的時候了。我想起了中學時期死去的王秀真、唐愛華和我那位多年的“牧友”李鴻儒。我思想有點緊張，真擔心自己也死於年輕。

在那段時間裏，我幾乎跑遍了合肥市所有的醫院，包括精神病院。每天晚飯後，我端著藥鍋到衛生科的小煤爐子煎藥，一邊與管病例值夜班的小孟醫生聊天。

“你年紀輕輕，不能靠天天抱藥罐子，要設法鍛煉身體。”小孟醫生勸我。

我本人也意識到，我必須鍛煉身體戰勝疾病。不久文化大革命開始，課全停了，在別人忙著鬧“革命”的時候，我有了充足的時間。我開始採用一切我能採用的手段鍛煉，包括跑步、洗冷水澡、打太極拳、做自我按摩等，還打過雞血針。

鍛煉身體是需要毅力的。我中學時期培養起來的毅力幫助了我。在別人還在酣睡時，我早早起床端著臉盆到洗臉間，用冷水往身上澆，再用毛巾把全身搓得發紅，然後去操場跑步。這在夏天是舒服的，可是到了寒冬臘月，沒有堅強的毅力是絕對堅持不下來的。

漸漸，我養成了鍛煉身體的習慣，鍛煉成了我生活的需要，也使我慢慢強健起來。幾十年來，我一直堅持著跑步、打太極拳、做自我按摩等運動項目。我之所以能在退休後完成這段歷史的回憶，歸功於我那時養成的良好鍛煉身體的習慣。

7・我入了另冊

爲了反修防修，一九六四年學校掀起“思想革命化”運動。要求我們在思想上“興無滅資”，要經常性地鬥私批修，提倡又紅又專，摒棄只專不紅，反對走白專道路。持續了幾年的中蘇關於國際共產主義的大論戰，使我們看清了赫魯雪夫使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蛻變成“修正主義國家”的悲慘事實，從思想上認識到階級鬥爭的嚴重性和“反修防修”的必要，自覺地進行思想革命化。

憶苦思甜是這個運動的一部分。系裏請了苦大仇深的王老師在我們外語系文科樓 401 大會議室給我們作憶苦思甜報告。他的演講感動著在場的每一個人，不少人感動得落淚，有的人甚至發出抽搐聲。他時而聲淚俱下，哽咽地說不出話，全場馬上一片唏嘘。這時，就有人帶著大家呼口號：“打倒萬惡的舊社會！”“不忘階級苦，牢記階級仇！”“翻身不忘共產黨，幸福不忘毛主席！”“偉大領袖毛主席萬歲！”於是，會議被推向一個又一個高潮。大家萬分痛恨萬惡的舊社會，熱愛社會主義新中國，爲能生活在新社會而感到十分幸福。

大會之後往往會伴隨著分班討論。這樣的討論會常常由團支部書記 H 同學主持，大家在討論會上輪流發言，我這個當班長的負責記錄。在這種場合，出身貧下中農的同學回憶自己和自己的長輩在舊社會所受的剝削和壓迫，暢談毛主席共產黨給他們帶來的幸福；出身於地主、富農、資本家等剝削階級家庭的同學往往揭發自己的家庭如何剝削、壓迫工人和貧下中農的醜惡家史，並表示對罪惡家庭的痛恨，痛心疾首地表示要與自己的剝削階級家庭在思想上劃清界線。“出身不能選擇，但道路是可以選擇的。”這是我們常用來鼓勵非無產階級出身的同學的話。無論是講話的人還是聽者，都表現得十分虔誠。

“不要忘本”是用來教育我們貧下中農子女的術語。不願意穿舊衣服，不願意再過艱苦生活，在體力勞動中怕髒怕累，甚至羨慕別人的某一件值錢的東西，都被認爲是“忘本”。被廣泛使用的例子是：有一位貧下中農出身的學生考上大學後忘了本，甚至不認自己的親生父親。有一天，他的父親去給他到學校裏送東西，別的同學問他來人是誰，他竟說那是他家的傭人！

當時提倡“一幫一，一對紅”，號召貧下中農出身的同學和剝削階級家庭出身的同學互相交流思想，以達到幫助後者提高階級覺

悟的目的。周成煦出身地主，他自願和我這個貧下中農出身的班長結成對子。我們住在一個宿舍，關係又處得好，交流思想不拘形式。另外一些與我並不是“對子”的同學，也經常找我“談心”。他（她）們經常向我暴露他們的非無產階級的“活思想”，比如愛打扮，好穿新衣服，喜歡看充滿資產階級或小資產階級思想的小說等。晚飯後，你可以看到一對對的同學在馬路上散步。他們是在交換思想，而不是在談戀愛——大學生談戀愛在那時是被禁止的。

民主生活會是思想革命化的另一種形式，它是我們作批評和自我批評的一個平臺，其宗旨更主要的是前者，即不留情面地當面給別人提意見，批評別人的缺點或錯誤。我的同桌蔣同學與家鄉的一個同學戀愛著，她的男友還到學校看過她。這事被有的同學“揭發”出來，結合她平時愛好打扮等表現，被在班裏上綱上線批判。不知是大家言辭過於激烈還是蔣同學過於脆弱，她當眾放聲哭了起來。一天，學校游泳池旁邊吊死了一個女人，學校用一輛汽車把她的屍體運出去。孫旭培信口說：“這個人活著沒坐過汽車，死了坐上了汽車。”這句話被“揭發”出來，被認爲是“對現實不滿”，在全班範圍內批鬥了一場。在民主生活會上，我不止一次地被指責爲“只專不紅”。反躬自問，相比之下，我確實對專業學習的興趣遠遠超過我對政治學習的興趣，而且我的每次英語考試成績基本都是 5 分。我們的團支部書記 H 同學表現出對政治更高的熱情，而他的英語成績基本都停留在 3 分。在當時，他被認爲走的是時尚的“又紅又專”的道路，而我走的則是“白專道路”！

有一次，我與任予懷、陳愛民同學進城，回來時饑餓難忍，任予懷出了一斤半糧票，我們三個在學校東門口的小飯店每人買了半斤米飯吃，沒有買一分錢的菜。後來，這件事被人知道，在民主生活會上被指責爲“資產階級思想”作怪。

上頭號召我們“向組織交心”，即在會上或以個別談話形式向團支書坦露自己的心扉，對自己的非革命化的思想（當然是自己最隱秘、最“醜惡”的思想）揭露、批判得越無情說明你“化”得越徹底。這是一種懺悔式的告白。人人都想表明自己追求進步，以便“丟掉包袱，輕裝上陣”，早日解脫。想不到有的同學的“交心”材料被入了檔案，甚至成了“秋後算賬”的憑據。我們系大四的一個外省同學在會上講述了自己的一次內心活動。在乘坐海輪從青島經上海返校時，面對波瀾壯闊的大海，他突發奇想：如果會游泳的話，遊過大海不就可以到日本了嗎？不料，他這個浪漫的想像被上綱上線批成“叛國投敵”，不久被定為“反動學生”！另一個上海籍同學阮欽安是系裏有名的“書呆子”，英語學得特別好，但因為他本來家庭出身不好，又“不關心政治”、“只專不紅”，也被定為“反動學生”。一旦被定為“反動學生”，性質就發生了變化，就成了敵我矛盾。全系的人都知道阮欽安是一個學習成績最好但思想最“反動”的學生。阮欽安走路時總是低著頭，從不與人答話，與他們上海老鄉也不來往。畢業分配時他們屆的大部分同學都被分到大城市，有不少還被分到國家各部委，他卻被發配到皖北靈璧縣的一個農村中學，若干年後才調回上海。近日在互聯網上讀了中央電視臺《見證》欄目製片人陳曉卿的一篇題為《改變的和不變的命運》一文，文中特別提到他“高中時代的英語教師阮欽安”，說：“我特別懷念我中學的阮老師——我到今天見過的最好的英語老師——我一點兒都不誇張，阮先生讓我感到學英語是一種樂趣。”

思想革命化後，老師和學生都發生了變化。我們“成熟”起來了，彼此談話都十分小心，不再言及非無產階級的東西，像我這樣曾被人指責為“只專不紅”的同學不再“明目張膽”地一天到晚捧著專業書。我躲到圖書館的閱覽室裏去看書，在那裏不容易被發現。一些講究打扮的女同學，也換上了土氣一點的衣服。過去，張定興

老師總是穿著西裝革履，打著領帶，頭髮也梳得油光。現在，他上身著一件褪了色的黃軍裝，腳上穿的是雙半舊的解放鞋。

作爲思想革命化的結果是同學們紛紛向組織靠攏，沒有入團的同學爭相寫入團申請書，找團員同學交換思想；已經入了團的同學則向黨組織靠攏，申請加入中國共產黨。我們班的團支部書記 H 同學第一個向黨組織遞交了申請，並不久被批准爲中共預備黨員。我也遞交了申請，聽說系黨總支也對我組織了外調，H 同學還代表黨組織給我談過話，要我加強政治學習，注意思想革命化，走紅專道路，經受得起組織的考驗。但直到我畢業離校也沒有被批准。

我聯想起一件事。

前幾年我曾當面問過大哥是不是黨員。在我看來，他是貧農出身，當了許多年校長，爲人忠厚老實，工作兢兢業業，應該是黨員。

“不是，”大哥給我解釋道，“黨員要求很高，我還不夠標準。”

還不夠標準？我有點不解。

若干年後，我問一位黨政幹部。他與我們關係甚好，也瞭解我的家庭情況。

“黨內有文件，在入黨、任用方面，對三年自然災害期間家庭有不正常死亡的嚴格控制。”他直言相告。

我感到愕然，也感到憤怒：我以前單知道“地富反壞右”五類分子的家庭是被另眼相看的，原來我們也被當成另類人了！我們家裏爲“三年自然災害”付出了這麼慘重的代價，難道這是我們的錯？

丁抒先生在《人禍》一書中寫道，在大饑荒以後的幾年裏，解放軍徵兵規定禁止招募饑荒年代倖存下來的孤兒，因爲這些孤兒政治上不可靠，完全有理由擔心他們由於家庭的災難而採取復仇行動。這印證了那位黨政幹部的話。

令我更不能容忍的是，文化大革命期間，一位參加了對我家庭外調的同學把二哥兩次坐牢、尤其是二哥吃小侄女的“醜惡”家史到處播揚，使我無法容身。

從此，我沒有再寫過入黨申請書。我知道，我不夠條件：我像那些剝削階級家庭出身的人一樣有著“醜惡”的家史：在“三年自然災害”期間死了太多的人。我們這樣的家庭已被列入了另類，被排斥、受歧視的那一類。

8．我們的主課

1964 年 8 月毛澤東與在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讀書的侄子毛遠新談話時說：“階級鬥爭是你們的一門主課……，階級鬥爭也不知道，怎麼能算畢業生呢？”隨後高教部提出：“要把階級鬥爭鍛煉作爲一門主課”。

爲了讓我們接受階級鬥爭教育，也爲了繼續貫徹黨的教育方針，像中學一樣，學校經常組織我們到農村參加體力勞動和社會活動。一九六四年的秋天一開學，我們就被組織到肥東縣張窪公社勞動，與社員們同吃、同住、同勞動。我和另一個同學住在一位苦大仇深的貧農家裏，而且一住就是一個月，國慶日前夕才回到學校上課。

爲了讓我們進一步上好階級鬥爭這門主課，一九六五年秋季開學後，我們和省內其他院校的大三以上的學生一起參加了四清運動，或曰社會主義教育運動。

我們隨著《安徽日報》社和其他省直單位的幹部開赴長豐縣的雙墩公社。到達公社所在地雙墩後，我們先學習了中共中央對運動的指導性文件《二十三條》。學習之後，我同另外兩個同學與《安徽日報》社兩名記者、工學院的一位校醫、省供銷社的一位幹部一

起被分到石澗大隊，組長是省報副刊編輯。我被分到該大隊最偏遠的白土崗村和周牌坊村。我於是背起行李住進了社教陣地白土崗村，開始了我的四清工作。

白土崗本來是個大村，經過“三年自然災害”，只剩下二十來戶人家。破破爛爛的幾處草房座落在一片黃土崗上，連一棵拳頭粗的樹都沒有。

當時農村已建立了貧下中農協會，隊長被掛著，大事由貧協主席決定。社教要依靠貧下中農，所以我住在該村貧協主席老王家裏。老王是個苦命人，老婆在“三年自然災害”期間被餓死，光棍一個帶著七、八歲的兒子“伢子”。我來了，他們爺兒兩個擠在一張床上，讓給我一張繩子攀的小軟床。飯是在各家輪著吃，叫“吃派飯”。

進村後的第一件事就是訪貧問苦，紮根串聯。我一邊與社員一起幹活，一邊注意瞭解村裏情況。社員們待我很熱情，不管年老年少都叫我“老李哥”，也願意把知道的情況給我講。在訪貧問苦時，令我尷尬的是，這裏的貧下中農向我講述的都是一九五九－－一九六一年間所受的“苦”：村裏餓死了多少人，某某因父母兄弟餓死而成為孤兒，某某因孩子全部餓死而變成鰥寡孤獨，某某家全家人都被餓死，絕了門……。他們沒有向我控訴地主富農如何剝削壓迫他們的血淚史，倒是一概向我檢舉大饑荒時代幹部如何多吃多占，如何強迫命令打罵社員，甚至逼死人的事情。那時，我們常常要開憶苦思甜會，請一些苦大仇深的老貧農憶舊社會之苦思新社會之甜，以激發社員熱愛黨、熱愛社會主義的情感。這些老貧農講著講著卻總是自然地講到三年困難時期所受的苦，食堂如何克扣他們的伙食，幹部怎麼逼他們的糧食，聲淚俱下地哭訴家裏餓死人的情況……等等。每逢此時，我趕緊提醒他們要講解放前、舊社會的苦，而他們則說：“我說的全是實際情況，那時候（“三年困難時期”）比解放前苦得多了！老李哥，你沒挨過餓吧？”

我的眼淚往肚子裏流。

幸虧我們較早地離開了社教陣地。不久，文化大革命爆發，農村的社員也起來造反了，說社教工作隊執行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很多社教隊員沒來得及撤離就遭到了批鬥，也有的社教隊員已經撤離又被揪回去批鬥。

一九六六年三月，我們從“四清”陣地回校上課。那時我們已是大三下學期的學生了。誰將教我們的專業課呢？這是大家十分關切的問題，人人在心中都有諸多期盼。後來聽說我們班的專業課由巫寧坤老師擔任，大家無不感到歡欣鼓舞。

未見其人先聞其聲。在低年級學習期間，我們早就聽說過這位巫寧坤老師：抗戰期間赴美擔任中國在美受訓空軍翻譯，是芝加哥大學的博士，三十歲時就被聘爲副教授，在我們系裏教學水平最高，深受同學們歡迎，早些年翻譯了《白求恩大夫》一書，……得知巫老師要代我們的課，有的同學專門到圖書館借來了這本大部頭的譯作拜讀。我們懷著敬意都切盼著這位沒見面的老師。

巫老師來給我們上第一堂課了。他走進教室，我們忙不疊起身致敬。然而，面前的這位久聞大名巫老師卻讓我們感到驚訝——他遠非我們所想像的模樣：既不像系主任李東光那樣高大魁梧，也不像姚企文副主任那樣容光煥發，連楊肇燕那樣的西裝革履教授風度也沒有，和其他老師比起來簡直顯得有點土氣、寒酸。巫老師中等偏上的身材，帶著近視眼鏡，穿著褪了色的但乾淨整齊的藍色中山裝，由於身體瘦弱而顯得衣服肥大。聽說巫老師才四十多歲，然而皺紋卻過早地爬上了他的額頭，臉上還有菜色。

精讀教材是巫老師根據政治形勢自選的，他教我們的第一課是 *Reminiscences of an Interview With Chairman Mao Tse-tung On the Paper Tiger*，是安娜・路易士・斯特朗對毛澤東的採訪回憶。巫老

師講課語速不快，用詞平易，但他的富於磁性的、極具感染力的優美語言，猶如潤物細無聲的絲絲春雨，點點滴滴流入我們的心田，讓我們感受到毛澤東和斯特朗談話的那種平靜、祥和的氛圍：夕陽西下的時候，在延安的窯洞前的一蹲土台邊，一棵蘋果樹下，兩位大人物——一位世界名記者，一位中國革命的領導人——在聊天，在促膝談心，在進行著和諧融洽的對話。然而，就在這樣的時候，毛澤東提出了一個驚世駭俗的觀點：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對派都是紙老虎。

以前我們學的都是語音、辭彙、語法，我們課後所做的工作也是記憶和背誦。巫老師的教學使我們耳目一新，我們都被他的講課深深吸引了。巫老師平日裏衣著樸素，貌不驚人，但一進入課堂便神采飛揚，忘卻了自我，帶著我們一起陶醉在文學的聖殿。在課堂上他最喜歡用 vivid（生動的）來評價他所講的文章、文章裏的人物對話和精彩的句子，實際上，真正 vivid 的是他的教學，他的具有感染力的語言把我們帶入一個 vivid 的意境，他用天籟之音、手勢和面部表情引領我們與作品和作品中的人物進行心靈的溝通，使我們如坐春風，如沐甘霖。他講過的課給我們極深的印象，直至今天，毛澤東和安娜・路易士・斯特朗會談的情景，他們各自的神態連同作者描寫他們告別時的那個優美的句子“Bright，very bright were the stars over the wild, darkYenan hills.”都記憶猶新。

一天，我冒昧去拜訪了巫老師。巫老師住在三樓的一小套住房裏，房間裏擺放著幾張舊桌椅，桌子上堆滿了書籍。孩子們在地板上玩耍。巫老師和師母並沒有嫌棄我這個農家孩子的唐突，巫老師端了個方凳讓我坐下，師母給我端了一杯白開水。然後，巫老師笑著慢聲細語地與我交談，回答我感興趣的問題。巫老師和我談話的時候，不是居高臨下，像是與一個朋友在交心，說到高興處他會放聲大笑。後來，我又借送作業的機會幾次拜訪了巫老師。

想到我們從此將能與巫老師相處一兩年，我們內心都充滿了歡喜與企望。然而，我們的夢卻被一場大革命給無情地打碎了。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中共中央發出五・一六通知，半個月後，六月一日，《人民日報》發表了《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論。文化大革命開始了。全校，不，準確地說是全國，都停課了。這一停就意味著我們大學學習課程的終結，我們四年大學片片斷斷讀了不到兩年半書，巫老師的課才聽了兩三個月。可憐那些大一大二的學生才讀了不足一年、不足兩年的書。雖然中共中央、國務院隨即發出通知，將高校新生入學考試推遲半年，令通知制定者也沒想到的是，這一"推遲"就不是半年，而是"推遲"了一個輪回，一直"推遲"到十二年後的一九七八年大學才真正地上起課來。

1966 年 8 月 31 日被毛澤東接見後在天安門前留影。

第五章　我與文化大革命

（1966 年夏——1977 年春）

1・山雨欲來風滿樓

早在一九六四年，我們就讀到批判小說《劉志丹》的文章和毛澤東的定性斷語：“利用小說反黨，這是一大發明。”在社教期間，我讀了姚文元的大作《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把皇帝罷海瑞的官同廬山會議上撤銷彭德懷職務一事聯繫了在一起。幾乎是同時，全國各大報刊開始了對“三家村”的圍攻，集中揭出《三家村劄記》的“微言大義”，認定黨內存在著一個“三家村反黨集團”；鄧拓被認爲是黑店的“掌櫃和總管”，吳晗則被認爲是是“急先鋒”。

那幾年，階級鬥爭的風聲很緊，一直不斷有“蔣介石反攻大陸”的傳言，有人甚至從公開發行的報紙雜誌上的插圖裏找到了“打倒共產黨”之類的反動標語。於是，我們也開始翻報紙，四處尋找“階級鬥爭”的動向。終於有一天，一個同學從一幅畫裏發現了問題：那幅畫畫的是八路軍在蘆葦蕩裏打日本鬼子，大家把橫七豎八的蘆葦倒過來、斜過去、再翻過來看，居然湊出“蔣介石萬歲”幾個字！我們在思想上認識了階級鬥爭的複雜性。

《五・一六通知》明確指出：“像赫魯雪夫那樣的人物，他們現正睡在我們的身旁”。《人民日報》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使我們進一步體會到階級鬥爭的嚴重性，認識到開展文化大革命的必要。但鬥爭很快越出了“思想文化戰線”，鬥爭的形式也越出了文章撻伐。

學校停課了，大家都投入到天翻地覆的文化大革命。一夜之間，大字報鋪天蓋地，覆蓋了校園。一批批的教授、學者和出身不好的老師頃刻之間變成了“牛鬼蛇神”，遭到“橫掃”、“炮轟”。

學校中間的籃球場變成了一片由蘆席和竹杆構建的“八卦陣迷宮”，蘆席上貼滿了各系“炮轟”牛鬼蛇神的大字報。我們系姚企文、楊鞏祚、冒效魯等教授的名字首先出現在大字報上，他們的名字被用紅筆圈了紅圈並打了叉叉。這些大字報都是學生和年輕教師寫的，揭發這些“牛鬼蛇神”的種種罪行。我們學生三三兩兩倘佯在“迷宮”裏看大字報，突然，我發現了高年級學生寫的巫寧坤老師的大字報，揭發他這個“資產階級極右分子”的罪惡歷史：當過飛虎隊和國民黨空軍的翻譯官，譴責他抵制教學改革，堅持用英文文學原著作教材，用腐朽的資產階級文學和修正主義思想腐蝕青年。還有一張漫畫，把巫老師畫成一個笑面虎，下面寫著“死老虎還沒死！”幾個大字。更有一張大字報的大標題使用了驚人之語：“強烈抗議巫寧坤誣蔑偉大領袖毛主席！”大字報以質問的口氣說：“巫寧坤爲什麼給自己的女兒起名字叫‘一毛’？這不是對偉大領袖毛主席的惡毒誣蔑嗎？堅決捍衛偉大領袖毛主席！毛主席萬歲！”

這個問題嚴重了。我和任予懷等幾個同學面面相覷：是啊，巫老師給女兒起什麼名字不好，爲什麼非叫“一毛”呢？雖然我們認爲寫大字報的人牽強附會無限“上綱”，但我們擔心著問題的升級。那時候什麼樣的事都會發生。

近來，在互聯網上讀到了巫一毛寫的散文《我的奇名怪姓》，始知她的名字來於杜甫讚頌諸葛亮的詩句：三分割據紆籌策，萬古雲霄一羽毛。但巫一毛在文革中確實爲了這個奇名怪姓而飽受其苦。

革命師生的造反激情被點燃了，全校都沸騰起來了，紛紛揮毫潑墨書寫大字報，大字報上出現的帶紅圈打紅叉的名字越來越多，令人應接不暇。大字報的言辭越來越激烈，革命行動也越來越升溫。

有一天，我突然發現我的大名赫然出現在大字報上："呼籲李世華、邢淩初、任予懷站出來揭發巫寧坤的問題！"

那張大字報就貼在沖著我們外語系男生宿舍 208 樓出口的一張蘆席上。大字報的作者獨具匠心：這張大字報不僅是寫給我們看的，也是寫給整個外語系的人看的，要給我們施加壓力。在有些人看來，我們這幾個班幹部與巫老師接觸密切，一定知道他的很多"反革命罪行"。

當晚我們三人在 208 樓西邊的草地上進行了緊急約會。經過商量，我們決定以沈默相對。在巫老師的言談中，我們不僅沒有發現巫老師有任何"反革命罪行"，而且此前我們連他是"極右分子"的情況都不知道！

對方見我們沒有反映，第二天又貼出了一張大字報，這次在最前面加了個副詞，最後又加了兩個感嘆號，變成了："強烈呼籲李世華、邢淩初、任予懷站出來揭發巫寧坤的問題！！！"這張大字報就貼在前一張大字報旁邊，形成了一種聲勢。

我們依然保持著沈默。

他們也是紙老虎，嚇嚇人而已－－他們確實也沒有證據。之後，沒有再出現第三張大字報。我相信了那句諺語：沈默是金。

六月六日晚上，宿舍樓突然響起緊急的集合哨聲，哨聲和著回音在那筒子樓狹窄的走道裏變得震耳欲聾，令人心驚膽戰。緊接著 68 級姓 X 的一位小頭目用粗啞的聲音逐個房間地通知："集合、集合、集……集……集合了！抓……抓……抓巫……巫寧坤！"他因過於激動而變得結巴。

在那個時候，誰也不敢不去——那是“咸與維新”的時候，不革命就是反革命，就得爲革命受難。一個小隊列迅速在樓下集合起來，然後就有人帶著往教師宿舍方向跑去。到了巫老師樓下，幾個人竄上樓，那個小頭目帶著其餘的人在樓下呼口號：“打倒巫寧坤！”“打倒極右分子巫寧坤！”

不大會，巫老師被兩個大個子男生從樓上“揪”了出來：一個同學抓住巫老師的一個肩膀，居高臨下往樓下推。巫老師低著頭弓著腰，原本瘦削的身材顯得更加弱小。“打倒巫寧坤！”的口號聲喊得更響了。那幾個彪形大漢拖著巫老師就往籃球場走，一路又推又搡，拳腳相加。隊伍緊跟在後面喊口號。

在微弱的路燈燈光下，我一下子認出了那個高個子男同學！“那不是大四的汪 XX 嗎？”我用胳膊搗了一下旁邊的任予懷說。

任予懷仔細瞅了瞅，然後說：“不錯，就是他！”

籃球場已被圍得水泄不通，裏面已經跪著一片“牛鬼蛇神”，我看到了楊鞏祚、冒效魯、孔柯嘉幾位教授，巫老師也在挨了番拳打腳踢後被按著跪倒在他們中間。接著，那個姓 X 的小頭目站在一張課桌上講話，大意說：我們的革命行動狠狠打擊了這些反動學術權威的囂張氣焰，滅了資產階級的威風，長了無產階級的革命意志，云云。我沒有注意聽他的講話，眼睛一直盯著操場上低頭跪著的那些教授。天氣暑熱，他們很多人卻在瑟瑟發抖。不知爲什麼，我的腿也隨之顫慄著。是的，這些教授們昔日的尊嚴、威風確實蕩然無存了。但，這就是文化大革命嗎？我在心裏問自己。

不久，我們見到巫老師隨著一群“牛鬼蛇神”戴著高帽子遊校示眾。後來，我在安徽大學沒有再見過巫老師。一九六八年九月，

我們被發配到全椒縣的荒草圩軍墾農場接受“再教育”，從此與巫老師斷了音訊。

四十年後的二OO六年九月，通過我在美讀書的學生時雪蓓的幫助，我與巫老師取得了聯繫。從他的回憶錄《一滴淚》中得知，巫老師在文化大革命的煉獄中飽受摧殘蹂躪。一九六八年秋至一九七O年初，我在烏江邊的荒草圩軍墾農場接受“再教育”時，巫老師就在與我們一江之隔的和縣的一個村子裏，在那裏他和他的全家被貶成了人民公社的“賤民”，在政治上享受著“和大隊唯一活著的地主平等的待遇”，接受著精神與肉體的“洗禮”。巫老師從一九六二年九月開始享受的合同工待遇被取消，全家五口人靠師母李怡楷老師五十七元的工資艱難度日。雖然巫老師在《一滴淚》的前言中說“其中的悲歡離合和眾多知識份子家庭大同小異，滄海一淚而已”，但我卻每每爲之動容，不忍卒讀。巫老師在該書的的前言中以從凱撒的名言脫化而出的雋語歸結自己的一生說：“我歸來，我受難，我倖存。”我爲巫老師得以倖存於那場浩劫深深感到慶倖——千千萬萬的知識份子卻沒有活過來。我們在一九七O年元月被重新分配工作，離開了荒草圩農場，而巫老師一家卻在那裏一直呆到一九七四年。

2·瘋狂的熱月

一九六六年的夏季是一個悶熱的夏季，也是一個瘋狂的夏季。學校既不放假也不上課，我們的任務就是看大字報、寫大字報。那些出身“紅五類”家庭的年輕老師也加入了我們的戰鬥，向曾經是他們輔導老師的“牛鬼蛇神”開火。橫掃的對象也從“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到像 L 老師那樣出身不好的“資產階級小姐”，到平時不注意思想改造的年輕助教，到那些上課時口無遮攔的老師，到

“思想革命化”時被定性的“反動學生”……“揭發”的內容從他們的家庭出身，到他們的講課內容，到他們的“反動言論”，到他們的生活方式和衣著打扮，總之，一切你認爲不是革命的，都可以“橫掃”、“炮轟”。

冒效魯教授的家史被“揭露”得淋漓盡致：成吉思汗的後代，先祖冒辟疆是明末四公子之一，父親冒鶴亭爲近代“反動”學者。他登在官方刊物《安徽文學》上歌頌魯迅精神的七絕：“身無媚骨奉公卿，筆馳風雷魍魎驚。血薦軒轅真壯語，翺翔千仞一雄鷹。”被批判爲“給社會主義祖國下的戰書，是反黨的檄文”。平日手持洋傘身著西裝革履的楊鞏祚教授被批判爲“資產階級的走狗、洋奴才”，連年輕的張定興老師也被“揭發”出許多問題：整天油頭粉面，追求打扮，資產階級思想嚴重；向學生宣揚美國小說《飄》，“散佈封資修的東西，腐蝕青年學生”，等等。有的教授子女，爲了表明自己與“反動”家庭劃清了界線，也寫了揭發父母的大字報。我撿了隻死老虎打打，揮筆寫了篇批判吳晗的短文《我們也要破門而出》，發表在安徽大學的校報上。

乙班王祖定同學的父親是皖南大學（後更名爲安徽師範大學）生物系的教授，是《辭海》的分科主編。“文革”一開始就被打成“反動學術權威”，遭到“橫掃”，“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王祖定自然而然地淪爲“牛鬼蛇神子女”。消息傳到我們系後，以 D 同學爲首的“文革”積極分子聞風而動，決定拋出這個“反動學生”。他們經過密謀策劃，兩個同學把王祖定叫出宿舍個別談話，D 同學夥同另幾個同學乘機抄了王祖定的衣箱，翻出了他的日記，然後對日記中的內容進行斷章取義上綱上線分析批判，連夜趕寫出大字報，說他日記裏“充滿了‘封資修’的東西”，說王祖定“思想反動，與家庭劃不清界限”等等。於是乎，一夜之間，“打倒反動學生王祖定”的大字報貼滿了大字報欄，還有人別出心

裁用大字報封住他的蚊帳。於是，王祖定被限制了自由：不准走出安大的大門，並強令他保護好蚊帳上"炮轟"他的大字報。這樣，王祖定晚上睡覺時只好從床的一頭爬進蚊帳，夜裏小便的時候也只好從床頭掀開帳子先鑽出、後鑽進，弄得帳子裏飛滿了蚊蟲，全身佈滿了被咬出的紅疙瘩。

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人民日報》發表了毛澤東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把北京大學聶元梓等七人寫的一張大字報譽爲"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的大字報"，稱讚它"寫得何等的好啊！"使運動以銳不可擋之勢，迅速由校內向校外發展，由大學向中學發展，由城市向農村發展，由黨外向黨內發展，由地方向中央發展，由觸及靈魂向觸及皮肉發展。

省委向安大派駐的工作組還沒站穩腳跟就成了推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鎮壓學生運動的罪魁禍首，校長張行言、副校長孫陶林等校領導理所當然的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於是乎，他們這些共產黨的領導和原先被揪出的"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一樣成了"牛鬼蛇神"，一樣成了"橫掃"、"炮轟"的對象，一起住進了牛棚，一起接受"洗腦"和勞動改造。

一個酷熱的中午，這些黨內、黨外的"牛鬼蛇神"在球場接受批鬥。頭上烈日當空，腳下水泥地暑氣蒸人，"牛鬼蛇神"們個個低頭垂手，汗如雨下。突然，"啪"地一聲，張行言校長摔倒在地。兩個造反派過去一把從地上拽起來，罵他"裝死"，強迫他站好。但當他們看見張行言校長渾身抽搐，口吐白沫，才通知他的家人把他擡回去，還安排說："明天仍然來這裏繼續接受批鬥。"

後來當造反派得知張行言患有美尼爾氏綜合症，怕曬太陽，他們還寫大字報，罵他是"見不得陽光的牛鬼"。

接著這些“牛鬼蛇神”都被抄了家，他們的國畫、摺扇、書法條幅、金銀首飾、結婚禮服、飾花旗袍、乃至收音機、打字機、自行車都被抄來，放在球場上展覽。在陳列的查抄物品中，我見到了師母李怡楷老師經常使用的自行車和一台用白漆寫著“北京燕京大學巫寧坤”的手提打字機。事後知道，一九五一年在巫老師懷著報效祖國的滿腔熱血動身回國前，李政道博士幫他收拾行李，那白漆字便是那時李博士寫的。造反派頭頭 X 看見楊教授手上的手錶很好，馬上說：“借給造反派用用。”楊教授只得乖乖地摘下拱手相送。

目睹這樣的“革命行動”，我和很多同學退縮了。我和邢淩初、李慶厚、任予懷等幾個同學經常躲在一邊發牢騷，有時還使用“國罵”：“他媽的，憑什麼拿人家的手錶？”“收音機、自行車也是反動的嗎？”……

令我們不可理解的事情還在後面。與我們同屆的俄語專業的劉芳同學是班上的團支部書記，校、系學生會幹部。平時她聽領導的話，在歷次政治運動中跟得緊。但在這場“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她“落伍”了，沒有站出來揭發“走資派”的問題，被認爲是“保皇派”，一張“劉芳想流芳百世，我們要叫她遺臭萬年！”的大字報格外醒目。劉芳除了在班裏接受了批判外，還被她班的造反派同學押送著遊了校。那天，聽得外面鑼鼓響，我們跑到操場上，但見鑼鼓開道，後面便是被“化”了“妝”的劉芳：上身一件綠色對襟小褂，上面貼滿了“保皇有罪！”、“打倒保皇派劉芳！”、“劉（流）芳一時，遺臭萬年！”的白紙條，下身穿一條鮮紅的拖地長裙。最後邊是“造反派”同學排成的隊伍，他們一邊走，一邊高舉胳膊呼口號：“革命無罪！”“造反有理！”“打倒保皇派劉芳！”

比起北京來，我們的“革命”“溫柔”多了。人的獸性的一面被革命的名義調動得天經地義理直氣壯，造反派們以“革命接班人”自居，暴戾恣睢。巫寧坤老師《燕京末日》裏記載：“及至六六年盛夏，新北大校園內‘紅色恐怖’肆虐。燕京大學的俞大絪教授不堪淩辱，率先悲憤自盡。不久，她的丈夫‘大右派’曾昭倫教授也含恨告別了他曾經熱愛的黨。才華蓋世的吳興華在校園烈日下勞改，口乾舌燥，向監工的學生討水喝，得到一碗未名湖的污水……污水下肚，繼續勞改，數小時後倒斃。……年近七旬的胡稼胎教授經不起勞改的折磨也離開紅塵。趙蘿蕤教授的丈夫陳夢家教授不堪紅衛兵的輪番淩辱，第一次自殺未遂，第二次正值蘿蕤精神分裂症發作，終於得以解脫。”

丁抒在《文革死亡人數知多少？》一文中說：北京市家被抄的多達十一萬四千多戶。伴隨著抄家的，是拷打進而殺戮以“五類分子”爲主的牛鬼蛇神。十幾歲的中學生將老師校長、鄰居街坊拷打致死，靠的就是一冊毛澤東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

一九六六年六月十日，“文化大革命”剛剛開始，毛澤東會見越南國家主席胡志明時說：“這次大大小小可能要整倒幾百人、幾千人、特別是學術界、教育界、出版界、文藝界、大學、中學、小學。”他大大縮小了打擊範圍，實際“整倒”的不是幾百、幾千人，而是幾百萬。

3・紅色風暴

一九六六年八月初中共中央公佈了文化大革命的指導性檔《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其中雲：“資產階級……企圖用剝削階級的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來腐蝕群眾，征服人心，力求達到他們復辟的目的。”這裏，採用了“四舊”替代了慣用的“封（建主義）、資（本主義）、修（正主義）”。

一九六八年八月，北京第二中學的紅衛兵寫出《最後通諜——向舊世界宣戰》，宣佈要“砸爛一切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隨後傳來消息說：北京的紅衛兵把外國大使館集中的東郊民巷改名爲“反帝路”，把故宮改名“血淚宮”，砸了清華大學牌坊上的“清華園”三個字……連理髮館、裁縫鋪、照相館、舊書攤……等等，概莫能免。“破舊立新”的紅色風暴迅速席捲全國。

別人都革命了，我們也得行動起來。革命先從自己革起。我們班有些同學的名字有“封資修”的色彩，紛紛更改。一位叫 X 德馨的同學，其名字是他的父親根據劉禹錫《陋室銘》的名句“斯是陋室，唯我德馨”起的，這明顯是“封建主義”的東西，遂改名爲“X 立新”。另一名徐姓女同學不假思索地說：“那我把我的名字改成徐破舊吧！”男同學中爆發出一片笑聲，李慶厚嘴快：“對，好名字，徐破舊，徐破舊，又破又舊！”這位女同學回過味來，雙手捂住自己通紅的臉，用腳狠狠地跺地板，恨無地縫可鑽。

光在家裏鬧騰不行，我們還得走向社會。於是，由團支部書記 H 同學帶領，我們的“破舊立新毛澤東思想宣傳隊”走上街頭了。H 同學舉著旗子走在前面，我們尾隨在後，個個手持小紅書，臂帶紅袖張，拿著紅紙、糨糊，一路呼著口號：“破四舊立四新！”“偉大的毛澤東思想萬歲！”可是，我們遲了一步，那些店鋪、門面都已貼上了新改的嶄新大紅革命名字。待我們走到四牌樓的時候，見火光沖天。走進一看，原來是省黃梅劇團的造反派在燒他們的封、資、修道具，那些龍袍玉帶、頂冠華翎在嗶嗶剝剝聲中化爲灰燼。我們無“命”可“革”了，只好打道回府。走到農學院對面的電子元件廠，我們看見一家理髮店，門邊的豎牌上寫的是“欣欣理髮鋪”。大家似乎找到了“革命”對象，不約而同地對著牌子端詳。

店主人見是一群“革命”學生，趕緊躬身相請熱情迎接：“諸位同學，進屋喝茶，進屋喝茶……”

沒有人進去喝茶，仍舊對著牌子端詳。不知哪位先發表了高見：“改成‘四新理髮鋪’吧！”

“可以不要改音，”我發表了自己的意見，“把‘欣欣’改成‘新新’吧。”我邊說邊在地上劃了“新新”兩個字。

“好！”幾個同學喝彩贊成。

“‘新新’好，還是‘新新’好，”店主人連聲說，我們聽不出他說的到底是“欣欣”還是“新新”。店主人怕我們誤解，趕忙又補充說：“破舊立新嘛！”

李慶厚拿出毛筆，在紅紙上寫了“新新”兩個大字，貼到牌子上，蓋住原來的“欣欣”。

店主人真的接受了我們的革命建議，後來用紅漆把“欣欣”改成了“新新”。若干年後，我又路過此處，理髮店尚在，原來的豎牌換成了一個帶玻璃框的橫匾，匾額上赫然寫著“新新理髮店”。我佇足凝視，不覺啞然失笑：當年的“革命”壯舉竟然被認可、被保存！

急進的造反派闖進了我們的校圖書館，拖出了包括《紅樓夢》、《三國演義》在內的“封資修”書籍，在操場上焚燒。這次我們卻步了，而且感到憤憤然：如果這樣燒下去，我們圖書館幾十萬冊藏書剩不下幾本了。館長見狀急中生智，對他們說，一九五八年夏偉大領袖大駕光臨新建的安大時，曾親到該圖書館視察，他們才悻悻而去，許多珍貴的書籍方得以保存下來。

比起外地的革命師生，我們真是小巫見大巫了。

頤和園內三百米長廊及無數亭臺樓閣，凡是人物畫，全部被用白漆塗刷覆蓋。“紅八月”過後，所有人物畫，包括昆明湖西邊遊人鮮至的亭台處，一個不剩。

四川什邡縣建於唐代的慧劍寺，寺內有宋代畫像和明代高手畫的五百羅漢像。在“紅八月”中，那些珍貴的古代壁畫均被用油漆或者黃泥漿塗抹。

新疆吐魯番附近火焰山千佛洞內珍貴的壁畫，在“紅色風暴”中統統遭了厄運：紅衛兵們把壁畫中的人物的眼睛挖空，或乾脆將壁畫用黃泥水塗抹得一塌糊塗，存心讓那些壁畫成爲廢物。

…………

文學家阿英（錢杏村）說：“過去帝國主義劫奪我們的文物，我曾痛心疾首，夢想有朝一日全收回來。現在我倒想通了，如果讓這些不肖子孫毀滅了，倒不如讓外國人保存起來，總不至於毀滅，還能留存在人間。”

4.鄉村的革命

我們家鄉的文化大革命是與四清運動緊相連的。一九六四年，我們家就開始了“四清”。社員們才吃了兩年飽飯，過了兩年安生的日子，平靜的農村又被掀起了階級鬥爭的波瀾。

此前，我們生產隊沒有一個“階級敵人”，成份最高的數歐四奶奶家，但她家也只是上中農，並不是專政對象。工作隊一進村便看上了歐四奶奶家的混磚到頂的瓦房，七算八算歐四奶奶家夠上了“地主”的扛，便認定她們家是“漏劃地主”，遂把她們家的成份改化成地主，歐四奶奶和她的三個兒子（大兒子已死）、四個兒媳婦全部帶上了“地主分子”的帽子，變成了無產階級的專政對象，她的十幾個孫子、孫女也都成了“地主羔子”。歐四奶奶被趕出她的院子，工作隊住進了她的瓦房，外間是工作隊辦公室。這時，歐四奶奶最大的孫子歐林廣剛剛結婚。新婚媳婦看到一大家都成了“黑五類”和“黑五類子女”，料定一生沒有好日子過，於是在婚

後第九天捲起包袱回了娘家。以後也再沒有人願意嫁給這個地主家的孩子。待到後來取消了階級成份，歐林廣已是三十開外的人了，錯過了談婚論嫁的年齡，所以，直到今天歐林廣仍然是光棍條子一個，在村裏享受著“五保戶”待遇。

工作隊在我們第四生產隊還挖出一個“階級敵人”毛傳明。雖然毛傳明家是貧農，但據說他有歷史問題，生活困難時期，他偷過隊裏的南瓜，又搞過“投機倒把”，把家織布弄到外地去換糧食，所以被定成“壞分子”。毛傳明有點不服，工作隊便組織開會鬥爭他。有一次鬥爭毛傳明的時候，有人別出心裁地把一個大碓頭（北方農村用來舂谷類皮殼的石具）拴住套在毛傳明的脖子上，繩子勒進他的肉裏。

爲了批臭毛傳明，工作隊組織青年人寫大字報揭發他的問題。只有初小文化程度的王作軍算是隊裏的小知識份子，被安排在大字報組。他們挖空心思回憶毛傳明的問題，經常熬到深夜，弄得頭腦昏昏沈沈。一天深夜，王作軍寫完了大字報，想以“打倒毛傳明，保衛毛主席”的口號作結，卻神使鬼差地寫成了“打倒毛主席，保衛毛傳明”！王作軍立時被打成了“現行反革命分子”，由積極分子變成了革命對象，於是乎，我們第四生產隊又多了一個“階級敵人”。王作軍當晚就被扭送到公社，關進一個專政機構。

但，王作軍畢竟是貧農出身，也沒有其他問題，挖不出他更多的“罪行”。歐四奶奶的二兒媳婦李瑞蓮一直對工作隊把他們家補劃成地主有意見，常發牢騷。李瑞蓮有文化，能說會道，工作隊對她很感頭疼。於是，工作隊便引導王作軍，動員王作軍說是受李瑞蓮指使寫的，把責任轉嫁給李瑞蓮，借此整服她。王作軍不願意做昧良心的事，工作隊的意圖始終沒能實現。結果，王作軍被關了一個多月。在那些日子裏，三嬸子每天三頓給兒子送飯，一隻手提著

一個盛著稀飯或南瓜菜的小飯罐，另一隻手拿著用家織布做的毛手巾包的兩個鍋餅。雖然最後沒有給王作軍帶上什麼帽子，但一有風吹草動，就會有人拿這一檔子事來整他，等於半個“階級敵人”。受這件事的影響，王作軍也沒有娶上媳婦，也在吃著“五保”。

到了“四清”結束文革開始的時候，我們小小的生產隊已經被“挖出”八個半“階級敵人”，除王作軍外，他們都戴帽子受管制，經常挨批鬥，還要隨時被叫去幹義務勞動。

一九六六年夏天，文化大革命的飆風刮進了我們小套子，農村裏也起來“革命”了。從中央到省裏、縣裏、公社的各級幹部都成了“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而年已四十多歲、當了十幾年大隊幹部的吳中新卻當上了村裏造反派的頭，帶著紅衛兵在大南們四處抄家破“四舊”。在吳中新看來，店裏二叔是個讀書人，“封資修”的東西肯定少不了，就帶領紅衛兵抄了他的家，把守成哥的中學課本和他心愛的課外書都席捲而去。他們走後，二叔發現家裏的布票不見了。我一九六六年秋回家時，我們大南門旁邊的三座碑已蕩然無存。我四處打聽，得知那塊節烈碑已被用來墊了牛槽，祁老化的大碑因爲太大，無法移動，被夯成幾截，鋪了路。我家前邊的歐四奶奶的瓦房飛簷上的鳥獸也全被砸掉。

《碭山縣誌》記載：1966 年 8 月，紅衛兵在全縣範圍內大破“四舊”，搗毀菩薩、神胎 1467 個，神像 674 張，石獅、石猴、石碑 6596 個，房上獸頭 7282 個，太公廟 712 個，聖牌、聖像 608 個，香爐、蠟臺 14617 個，花轎 218 乘，戲衣、道具 1105 件，……乃至帶有龍鳳圖案的被面、枕頭、床、桌、椅、樂器等，也被列爲“四舊”。

這場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在打倒“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之前，先把幾千年文化的“命”給徹底“革”了。

5．天降大任

得到林彪、江青支援的“紅衛兵”應運而生了。他們高擎“革命無罪，造反有理”的“尚方寶劍”，頭戴綠軍帽，身著綠軍裝，腰系武裝帶，臂佩紅袖章，手握紅寶書，以“捨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的英雄氣概，英姿颯爽地殺上了政治舞臺。八月十八日，毛澤東首次接見來京大串連的全國各地的紅衛兵，於是紅衛兵運動迅速發展到全國。

幾乎是一夜之間，我們學校冒出了幾十個紅衛兵組織，如“井岡山戰鬥隊”、“叢中笑戰鬥隊”、“全無敵戰鬥隊”、“百萬雄師兵團”等。我們都參加了紅衛兵，帶上了紅袖章，拿起了紅寶書。我們有一種自豪感和朦朧的使命感，意識到“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

八月二十八日傍晚，從當時安徽唯一的全國重點大學合肥工業大學傳來消息：紅衛兵可以免費乘火車上北京接受毛主席接見。我們來不及收拾行李，穿著隨身的衣服、挎上一個小黃書包，幾乎全班一起不約而同地奔向火車站。上北京接受毛主席接見，這無疑是最神聖的革命洗禮。內心激蕩著革命熱情，我們置擁擠、饑渴、疲勞於不顧。當火車把我們拉到北京時，已是晚上八、九點鐘。我們被領到車站廣場，排隊坐好，等待命令。廣場上坐滿了黑壓壓的來自全國各地的紅衛兵小將，並不時有隊列被帶走。這時，天下起雨來。我們沒有帶任何雨具，只有直著頭挨淋。不大會，我們個個都變成了落湯雞，渾身往下流水。

大約一兩個小時後，哨聲召喚我們起立，而後有人帶著我們徒步奔向駐地。我們並不知道目的地在哪裏，只顧低著頭冒雨尾隨別

人往前跑。鞋早已濕透，很多同學乾脆脫了鞋，光腳與水泥地面撞擊發出“吧噠吧噠”的聲音，路上的積水被踩得四濺。

不知跑了多少時間，我們看到了夜雨中的天安門。我們都不約而同地稍微停下來仰望了這個紅色革命聖壇。天安門上沒有任何燈光。它像一尊法力無邊的大佛，默默地安坐在那裏，等待著人們的朝覲。歷史上，有多少帝王將相夢想著站在這兒，聆聽臣民對他們山呼萬歲。我們將在這裏接受偉大領袖、偉大導師、偉大舵手和我們紅衛兵的偉大統帥毛主席的親切接見，想到此，我們激情湧動心潮澎湃。

雨中有人領著隊伍繼續往前跑。漸漸地隊伍拉長了，變得稀鬆了，有些女同學開始掉隊。但她們還是拚著命氣喘吁吁地掙紮前行，不願被拉下。

又不知跑了多少時間，終於到達了目的地：北京商學院旁邊的馬神廟小學。學校領導連夜接見了我們，對我們這些來自外地的“革命小將”、“毛主席請來的客人”表示歡迎，給我們發了麵包作晚餐，並安排我們住在他們的教室。我們把教室的兩張小課桌並起來，脫下身上的濕衣服，擰擰水，往書桌上一搭，穿著濕褲頭睡了。這一夜睡得很香。早上醒來的時候，雨已經停了，陽光從窗戶照進來，濕衣服也幹了。我們穿衣起“床”，走到院子裏，盡情地呼吸雨後北京早晨的新鮮空氣。

開早飯了，每人兩個麵包一碗稀飯，而且不用交錢也不用交糧票。吃飯的時候，見幾個手持皮帶的紅衛兵押著一個蓬頭垢面披頭散髮的婦女從我們面前經過。經打聽，這位婦女是這個學校被打倒的校長，正在接受批鬥。當時正值紅色風暴席捲京城之時，北師大女附中校長卞仲耘剛剛被紅衛兵群毆致死。不幾天，我們得知這位女校長也死於紅衛兵的拳腳棍棒。

飯後，校領導囑咐我們可以到周圍轉轉，領略領略偉大首都的風貌。但不要遠離駐地，等待中央首長接見。

北京，這個元、明、清幾個王朝的大都，歷次革命運動的發源地，歷盡了幾百年風雨滄桑，顯得莊嚴肅穆。今天，它不僅是我們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首都，而且成了世界革命的中心，是世界人民心中最紅、最紅的紅太陽毛主席工作生活的地方。置身於此，我們心情怎能不激動？

當日下午，我們突然接到緊急通知：有美蔣特務潛入北京，企圖進行破壞。晚上，當地居委會要我們參加值班警戒。保衛首都、保衛毛主席是我們義不容辭的責任。我們頭腦中立刻繃緊了階級鬥爭的弦，馬上排好了班。夜裏兩、三點鐘，我和李慶厚被叫醒接班。我們每人接過一根圓木棍，被領著來到一個小巷口，警惕地站在自己的崗位上。整個北京在安靜地沈睡，完全沒有了白日的瘋狂。北京八月的下半夜還有些涼意，我們一隻手拿著棍，另一隻手騰出來捂住上身，同時不停地原地跑步。

八點鐘的樣子，我們下班了，並沒有發現任何敵情。

我們盼望的日子終於來了！負責人告知我們：明天（八月三十一日）中央首長接見我們。他向我們強調了幾點必須嚴格遵守的紀律：要熱情飽滿，唱歌、呼口號要聲音宏亮；提高警惕，嚴防階級敵人搗亂，等等。

八月三十一日一早，我們就排好隊，高舉紅旗往天安門廣場進發。偌大的天安門廣場上，坐滿了來自全國各地的紅衛兵，紅旗如海歌如潮。我們按規定地點坐好，高聲頌讀《毛主席語錄》，高唱革命歌曲，耐心地等待著激動人心的時刻的到來。

“好消息：蔣介石死了。往後傳！”不知誰面朝後對我說。“好消息：蔣介石死了。往後傳！”我也照樣傳給後邊的一位。在極短

的時間內，這一振奮人心的好消息就傳遍了廣場上的一百多萬人。事後知道，那時蔣介石還沒死，他活到九年後的一九七五年。但當時，我們是虔誠地相信的。我們多麼希望一切階級敵人，包括帝國主義者、反動派、修正主義分子連同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資產階級司令部”的代表人物、“睡在我們身邊的赫魯雪夫”一起死掉，只剩下世界幾百年、中國幾千年才出一個的毛主席——我們心中最紅最紅的紅太陽，只剩下毛主席和他的親密戰友林副主席爲代表的無產階級司令部，只存在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

“毛主席萬歲！毛主席萬歲！毛主席萬萬歲！”不知誰先呼起了口號。廣場上的人群開始湧動。我們不約而同地站起來往天安門城樓望去。是的，我們也看見了，毛主席來了！他老人家健步向我們走來，神采奕奕，精神煥發（雖然離得太遠無法看清，但我們相信廣播裏的話），後面跟著他的親密戰友林副統帥，還有敬愛的周總理、劉少奇主席……我們手搖紅寶書，拼命地有節奏地喊了起來：“毛主席萬歲！毛主席萬歲！毛主席萬萬歲！”毛主席不時地向我們揮手，林副主席等其他中央領導人都手搖紅寶書，使廣場上升起一陣又一陣的熱浪狂潮，有的喊破了嗓子，有的熱淚盈眶。

周總理激動地雙手頻繁向下按動，示意要我們安靜下來。然後，他開始講話，代表毛主席，代表黨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向來自全國各地的紅衛兵表示歡迎，對我們的革命串聯表示支援。最後他說：“中央決定，全國各地的大學生全部和中學生一部分代表，可以分期分批地到北京來。”

總理講話的時候，我們的眼睛一直盯著毛主席，我們日夜想念的毛主席，爲人民謀幸福的大救星，世界人民心中最紅最紅的紅太陽。他老人家不時地向我們招手，引起廣場上一陣陣的轟動。

繼“八・一八”、“八・三一”之後，毛澤東又分別於九月十五日、十月一日、十月十八日、十一月三日、十一月十日、十一月

二十六日八次接見紅衛兵，共接見來自全國各地的紅衛兵一千三百多萬。

6·遠離塵囂

我們在北京的時候，八月二十七日，合肥百貨大樓出現了署名“合肥工業大學無線電系六七級全體革命同學”的《炮打安徽省司令部——造李葆華的反》的大字報。一部分持不同意見的人也貼出大字報進行批駁，雙方在大街上展開辯論，並發生了扭打，這就是所謂的“八·二七事件”。隨後，合肥工業大學和安徽工學院等院校及一些中學的部分學生成立了“八·二七革命造反隊”。

爲革命的洪流裹脅著，我們不假思索就參加了“八·二七革命造反隊”。然而，我們卻感到無“反”可“造”。經過商量後，我和李慶厚、黃 X、楊善亮等四個同學決定響應中央號召去外地進行革命串連。

我們胳膊上佩帶“八·二七革命造反隊”的袖章，每人帶一個小黃包，內裝《毛主席語錄》和褲頭、背心、茶缸，輕裝上路。

我們第一站到了安慶。當時，安慶市委已遭地方造反隊炮轟。聽說省城裏來了紅衛兵，他們待我們如欽差大臣，安排我們住在市委招待所，市委辦公室主任專門負責我們的生活起居和活動，一日三餐好飯好菜伺候，希望我們支援市委、市政府。這位主任向我們“彙報”了當地文化大革命開展的情況和市委主要領導的革命“業績”，邀請我們到市委“視察”……。我們深感情況複雜，如果參與進去，將來勢必無法脫身。我們謝絕了那位主任的再三挽留，登上了江亞號客輪沿江而上。

這是我第一次看見長江。站在甲板上，但見不盡長江浩浩湯湯，波瀾壯闊，不禁想起蘇東坡“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的

豪邁詩句。夕陽西下，“大姑小姑江中央”，沐浴在落日的餘輝裏。我欣賞著兩岸風光，陶醉在大自然中，忘卻了塵世的喧囂。

我與李慶厚悄悄地商定：把這次大串聯變成一次長途旅遊。各地都有紅衛兵接待站，吃、住、行一律免費，哪裏有這樣的好機會？

到達武漢時，我們被安排住在武漢大學珞珈山下的學生宿舍。接待站負責人告訴我們，北京南下串連的紅衛兵第二天在省體育場召開批鬥湖北省省長、省委第二書記張體學大會，宋要武要保張體學，將在會上與他們辯論。宋要武是當時的知名人物，她是東北局書記宋任窮的女兒，原名宋斌斌，八・一八在天安門城樓受到毛澤東的接見並接受禦意，更名爲“宋要武”，也因此使她成了叱詫風雲的紅衛兵明星。但我們對此不感興趣，我和李慶厚遊了東湖，上了黃鶴樓。

下一站到了長沙。我們就住在毛澤東當年讀書的長沙師範，遊覽了湘江，登了嶽麓山，然後懷著崇敬的心情參觀了毛澤東當年生活和工作過的地方長沙師範和清水塘，朝覲了“紅太陽升起的地方”——湘潭縣韶山沖。

這時，我和李慶厚發現身上沒有錢了。雖然吃、住、行不要錢，但終究要有一些零花錢，於是我們與另外兩位同學分道揚鑣。黃 X 去了廣州，楊善亮奔了親戚，我與李慶厚經南昌、杭州、上海、南京回到了合肥。當然，每到一地，我們也參觀當地的革命聖地、遊覽當地的風景名勝，如南昌的八一起義紀念館，杭州的西湖，上海的魯迅紀念館、虹口公園，南京的中山陵、玄武湖等。時值大串聯初期，一路有紅衛兵接待站護送，火車上也寬鬆，旅行是舒服的。

事後知道，黃 X 先到了廣州，之後遊桂林、貴陽、南寧、重慶、成都、西安，經鄭州、徐州回到了合肥；回校後他又馬上登程上了北線，去了濟南、青島、大連、秦皇島、瀋陽、哈爾濱；第三次又

去了東南，逛了南京、蘇州、上海、杭州、福州、泉州、廈門……他來去匆匆，我們難得見到他。當他第三次遠遊回校、又準備踏上西線征程時，我見到了他。我問他：“你哪來那麼多錢？”

他用食指頭點著我的鼻子說：“小傻瓜，沒有錢不會借嗎？”

“找誰借？”我有點迷惑。

“告訴你吧，每個接待站都可以借錢，還可以借衣服。吶，”他指著上身的一件新球衣說，“這件衣服就是從接待站借來的。”

不僅黃 X，許多“聰明”、膽大的紅衛兵都發了國難財。他們暢遊全國各地，飽覽了長城內外大江南北的壯麗景色，然後，帶著從各地借來的沒有用光的錢和物，瀟瀟灑灑回來了。但是，三年後，紅衛兵的歷史使命已經完成，文化大革命中的經濟賬被一筆筆地清算。那時，我們也已經領了工資，在軍墾農場“接受再教育”，大串聯中的借條一批批地從各單位轉來，借款被一一從工資中扣除，所借衣物也被折了款。有的同學的工資只給留下伙食費，其餘的全部扣掉，而且一連扣了好幾個月。所幸的是，在這些單子中沒有我的名字。

在政治上，紅衛兵的“革命壯舉”也遭到了“秋後算帳”。文革前，在入團、入黨、提幹等的政審材料裏，都分三欄問道：你本人、你的直系親屬、社會關係中“是否參加過何種反動組織？擔任何種職務？”文化大革命結束後的許多年裏，在這些檔案材料裏增加了兩欄：“在文化大革命中參加何種造反組織？擔任何種職務？”

7．衝破資反路線

莫裏斯·邁斯納所著《毛澤東的中國及其後——中華人民共和國史》說：“紅衛兵的行動並非到處暢通無阻……工人和農民奮起捍衛黨組織和社會秩序，反對這些年輕傲慢的不速之客。”

我親身經歷了這種對抗，或者說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高壓。

全國的紅衛兵都在大串聯，大哥知道我要用錢，給我寄來了十塊錢。然而，匯款單的字跡卻不是他的——我對大哥的字跡太熟悉了。我仔細端詳，認出來那是王彩霞的。王彩霞一九六四年中師畢業後就被分到大哥所在的唐寨小學任教。這說明大哥已失去了人身自由，我感覺到大哥出了事。我有些納悶：大哥只是師範畢業，算不上反動學術權威；我家出身貧農，僅是個小學校長而已，“走資派”也夠不上杠，那會是什麼問題呢？

湊巧，合肥師範學院碭山籍的同學通過副省長李任之借了一部客車回碭山串連，我即隨行。

果然不出所料，到家後得知，大哥已被撤銷校長職務，在唐寨西門村接受“勞動改造”。正在上小學的侄兒侄女被認爲是“黑五類子女”，不准參加紅衛兵，更不准外出串聯。

文革開始時，唐寨公社正在搞著“四清”。社員公認的“焦裕祿式的好幹部”公社書記梁學孔被人用莫須有的罪名打成“黑幫”，下放到蔣樓生產隊喂牛，住進了真正的牛棚。原副書記魯敬中當上了唐寨公社書記。魯敬中上臺後，要把梁學孔“一幫的人”全部整下臺。我大哥當了多年的區中心小學校長，與梁學孔工作交往甚多，被認爲是“梁學孔的人”，當然要整下去。他們到底找到了大哥的問題。

問題之一是歷史問題：國民黨員。對這個問題我一無所知。後來別人告訴我，他讀師範時參加了三青團；國民黨撤退時，在他本人完全不知道的情況下三青團員集體轉爲國民黨員。問題之二是政治問題。大哥在學校住的是地主唐老八堂屋的一個偏房。紅衛兵破

四舊時發現大哥所住房子的一塊屋瓦上有一顆十二角星，很像國民黨黨徽，由此斷定大哥懷念國民黨。這兩個問題都是百口莫辯的。

除上述政治問題外，大哥還有“刑事”問題：“姦汙幼女”。駐唐寨小學的四清工作隊和個別積極分子爲了徹底把大哥等一幫人整倒，想了個絕招：他們把一些低年級小學女生騙到學校，要她們寫被 XX 老師“姦汙”的檢舉材料。這些幼稚無邪的小孩子當然寫不出，於是，工作組派了成年的已婚女老師王守萍誘供。結果，“檢舉材料”被炮製出來了：有的是王守萍口述學生聽寫的，有的是照著王守萍寫好的東西抄的，還有的是在王守萍寫的材料上只按個手印的。其中細節、過程乃至“受害人”的感覺都寫得詳細逼真，誰看了都會相信。按照材料排隊一查，唐寨公社的小學教師中六十多個有“姦汙幼女”問題，幾乎所有的男老師都有這個問題。“問題”嚴重且態度頑固的唐世堅已被抓進了監獄。

到家的第二天，我便去了西門村，看見大哥正在兩個戴紅袖章的紅衛兵監督下曬糞。我大聲地與大哥講話，先告訴他，我們已去了北京，接受了偉大領袖毛主席的接見，又說了幾句安慰他的官話，如“相信黨，相信群眾”之類，故意讓那兩個紅衛兵明白：我們是欽差！

隨後，我去了王彩霞剛被調去的唐寨公社最西北的王集小學，想瞭解一些真實情況。但，王彩霞見了我卻三緘其口，說話吞吞吐吐。原來，她也因爲家庭歷史等問題正受著監視，調她離開中心小學到王集小學正是貶黜的意思。我約她到她舅奶奶（店裏大嬸）家去，她也不敢從命。她招待我吃了午飯，在一位黨員老師“陪同”下送我到唐寨。

我不敢久留，安慰了母親和嫂子，告訴她們大哥不會有大事的，要她們放心，而後到了碭山縣城。

縣城裏也建立了紅衛兵接待站，縣委辦公室的喬主任親自擔任紅衛兵接待站站長。我在接待站見到了先期到達的合肥師範學院的同學。他們已與縣委有了初步接觸，約好當晚與縣委、縣政府負責同志面談。

七點半鍾左右，我們正在縣委會議室與縣委、縣政府的負責人會談，會場遭到包圍。一些市民、工人模樣的人沖進會場，要與我們辯論。他們出言不遜，行動粗野，有的手裏還拿著棍子。

喬主任見狀趕緊說：“今天談不成了，咱們改日吧。”我們跟著喬主任出了會議室。這時縣委大院裏站滿了人，他們罵罵咧咧，有的呼著口號：“八二七滾回去！”出了縣委大院，馬路兩旁站著兩隊人，他們敲鑼打鼓喊口號，聲言要“送瘟神”。去招待所的路已被堵住，我們連住所也回不去了。這時，喬主任出現了，他早已安排人把我們每個人的行李收拾好遞到我們手裏，一邊嘴裏說著：“革命群眾的事，我們管不住。快點走吧，不然要出事！”

兩邊隊伍夾著我們，前邊有人打著“五保衛戰鬥隊”的旗幟，後邊鑼鼓鞭炮一路響著，“夾道歡送”的隊伍中不時有人打我們、用口水啐我們，把我們一路“送”到火車站。到了候車室，我們被強迫集中坐到兩排椅子上，“革命群眾”把我們團團圍住，對著我們漫罵、吐口水、說風涼話。在圍攻我們的人群中，我突然看到崔玉德、魏玉幫和李福安。崔玉德和魏玉幫都是我們村的，分別是一隊和二隊四清中剛被扶起來的貧下中農協會主席。村裏人說：吳中新的嘴，崔玉德的腿。意思是只要吳中新發話，崔玉德就行動。因爲跟得緊，所以連話也說不好的他也被提拔起來了。李福安是我二哥小學時的好朋友，現在是唐寨大隊貧協主席。他們和其他人一起對我指指點點，嘴裏不乾不淨。我聽不清他們的話，把頭扭向一邊不予理睬。

我們八二七造反隊是捍衛毛主席革命路線的革命隊伍，我們有自己的紀律，打不還手、罵不還口，挺著胸，手挽著手，作大義凜然狀，高唱《團結就是力量》、毛主席語錄歌“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千條萬緒就是一句話：造反有理，造反有理，造反有——理！”

火車來了。我們被連拖帶拉塞進車廂，他們又把我們的行李對我們劈頭蓋臉扔過來。站臺上響起了更響亮的鑼鼓鞭炮聲，有人帶領著重複地有節奏地喊起順口溜：“八二七，老鼠隊，晚上搗亂白天睡！八二七，老鼠隊，晚上搗亂白天睡！……”

我們的這次意在煽風點火的串連像阿 Q 的“革命”一樣，還沒開頭就結束了，我們個個如喪家之犬，被人當作“瘟神”送了出來。這場鬧劇明顯是縣委導演的。碭山好像是一片與世隔絕的蠻夷之地，“不知有漢，無論魏晉”，毛澤東思想的陽光好像根本沒照進來似的，他們不知道“造反”爲何物，到這個時候還在鎮壓群眾，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上了火車，我們個個義憤填膺：“他媽的，不像話，告他們去！”“對，上北京告他們，告他們反對毛主席的革命路線，挑動群眾鬥群眾！”“…………”

火車把我們拉到徐州，當晚住在黃河故道邊上一家地上鋪滿麥草的電影院裏，那是徐州的紅衛兵接待站。第二天我們開始寫材料，商量如何告狀，計畫重新殺回碭山。我被推選爲代表之一，與合肥師範學院的李叢昕一起先去了宿縣，打算先向地委反映。到了宿縣才知道，這裏八二七支援的造反派和保守派兩派正鬧得不可開交，地委已經癱瘓，書記孟亦奇稱病躲進醫院。我們通過八二七駐宿聯絡站去醫院見了孟書記，向他反映了情況，他表示無可奈何：“大家都是造反派，都說自己執行的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線，說誰誰都不聽，我有什麼辦法？”

回徐州時坐的火車是開往北京的。我靈機一動，與李叢昕商量：“我不下車了，直接上北京！地委管不了他們，看看中央文革小組能不能管住他們！”

“對，上北京！”李叢昕欣然同意我的意見。

我掏了掏口袋，囊空如洗，分文全無。“你有錢嗎？先借給我一點，”我問李叢昕。

李叢昕搜遍了口袋，只找到兩塊錢。於是，我就拿著這兩塊錢，肩負著“保衛毛主席的革命路線的偉大歷史使命”，隻身一人進了北京。

剛下過雪，車窗外是陰霾的天空和白茫茫的大地。一隊隊身著軍裝、臂纏紅袖章的紅衛兵挑著“XX 毛澤東思想長征隊”的紅旗，挎著草綠色的小背包，揮動著《毛主席語錄》，高唱著“擡頭望見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澤東”的悲壯歌曲雄赳赳氣昂昂地向著他們心中的革命聖地北京進發。我知道，這是徒步進行大串連的紅衛兵。

進京後，我按照李叢昕告訴我的方法，與八二七駐京聯絡站取得了聯繫。這時的北京已經完全是造反派的天下。八二七駐京聯絡站的頭頭聽了我們在碭山的遭遇，憤然說：“劉少奇都倒臺了，資產階級司令部也不存在了，碭山的混蛋還在執行資反路線！這種事找中央文革？掛不上號！像這樣的事在北京算個屁！到外邊看看吧，‘某某地方告急’、‘某某地方在流血！’的傳單多的是，中央文革管得過來嗎？回去找宿縣地區八二七聯絡站，叫他們派部汽車，安上大喇叭，帶上幾十個人，到碭山沖一沖，他們就垮了。”

經他一點撥，我茅塞頓開。沒在北京久留，我又回到徐州，把北京聯絡站那位頭頭的話向戰友們作了傳達。大家爲革命激情燃燒著，立即達成共識：到宿縣搬救兵。於是，我又一次踏上了去宿縣的路。

已經是下午，火車站沒有南行的火車了。我在車站廣場溜達，看見一輛寫著“蘆嶺煤礦工人造反派”的敞篷卡車。我上前一問，知道他們馬上開往蘆嶺。宿縣正在通往蘆嶺的路上，因此要求搭個便車。他們看了看我胳膊上的“安徽省八二七革命造反兵團”的紅袖章，很慷慨地答應了——天下造反派是一家嘛！

那是一九六六年的最後一天，十二月三十一日。開車的時候已經到了傍晚，天上彤云密布，天刮著朔風，飄著碎雪。刺骨的冷風從袖口、脖子直往身上鑽，雪粒敲在身上發出“沙沙”的聲音，臉被打得生疼。爲了顯示造反派的氣概，我和那些造反派的工人都站立著，昂首挺胸，迎風冒雪。

車過了符離集不遠，司機突然停下車對我說：“喂，對不起，你得下車了。我們的車要從這裏往東拐，不走宿縣。”

“從這裏到宿縣還有多遠？”我問道。

“二十里，”司機回答。

沒辦法，我只好下車。這時大約有晚上九點鐘。我又冷又餓，雪下得更大了，環顧四周，一望無際的白茫茫，不見燈光，更不見人影，好像這個冰雕玉砌的世界上只有我一個人。我踉踉蹌蹌上了路，脚下踩着乱琼碎玉。風扯著我，雪迷著我的眼睛，我一步一打滑，奮力掙紮前行。

這是我一生難忘的新年除夕之夜。在這個時候，我正肩負著神聖的歷史使命，進行著一項偉大的事業：保衛毛主席的革命路線。爲革命熱情充溢的我，沒覺得苦，也沒感到累。我理解了小說裏、電影上描寫的那些殉道的英雄，他們爲了自己的崇高信仰，拋頭顱撒熱血，置生死於身外。

我大汗淋漓地到達八二七駐宿聯絡站的時候，已接近午夜，也就是說，一九六七年就要或已經到來。在聯絡站草地上酣睡的幾個

戰友被我叫醒，看著我滿臉的汗，對我這個天降人物大惑不解。我給他們講了我的經歷，重複了北京那位頭頭的話。

“先睡覺，明天再說，”一位戰友說。

“我餓壞了。有吃的嗎？”我問道。

一個戰友指了指擺放在牆角的小桌子：“那碗裏有兩個窩窩頭，桌子底下的水瓶裏有開水。吃過咱們擠著睡吧。”

我狼吞虎嚥地把兩個窩窩頭吃了，然後和一個戰友打撐腿睡下。

“起來，起來，快聽！”不知誰把我從夢裏喚醒。

收音機裏正播送著《人民日報》、《紅旗》雜誌元旦聯合社論《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播音員正以鏗鏘有力的語調告訴人們：

“一九六七年，將是全國全面展開階級鬥爭的一年。

“一九六七年，將是無產階級聯合其他革命群眾，向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和社會上的牛鬼蛇神，展開總攻擊的一年。

…………”

不等社論播完，外邊就響起了歡呼聲、鑼鼓聲和劈裏啪啦的鞭炮聲。

“放鞭炮，咱們也放鞭炮啊！”不知誰提醒了一句。有人從小桌底下取出一盤一千響的鞭炮，在院子裏放了起來。

這社論猶如向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發動總攻的命令，是奪取最後勝利的衝鋒號。當年，解放軍打過長江、攻佔蔣介石總統府時的心情大概就是我們當時的心情。

然後，我們一起沖到街上去，跑到“五保衛戰鬥司令部”門口，想徹底搗毀“保皇派”的老巢。可是，我們到遲了：“司令部”的大門已經被砸倒在地上，院子裏堵滿了造反派的戰友，他們有的在

放鞭炮，有的在砸他們的窗玻璃，院子裏狼藉滿地，而那些“老保”們則個個如喪家之犬，低著頭，夾著他們的小包從人群裏往外鑽……

上午，碭山方面傳來消息，那裏的“五保衛”也在頃刻之間瓦解了，縣委、縣政府的頭頭已被他們扣住。

對我來說，一九六七年的元旦是我終生難忘的，我體會到了通過戰鬥獲取勝利的喜悅和激動。我真想像攻佔南京蔣介石總統府的解放軍戰士一樣，站到大街上對天鳴槍高呼：“我們終於勝利了！”只是我手裏沒有槍。

一月三日，碭山縣舉行“徹底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誓師大會”。爲了表示支援，宿縣地區造反司令部派了由幾十名工人和學生組成的聲援隊，開了四部裝有擴音器材的汽車，浩浩蕩蕩駛往碭山。

大會在碭山人民廣場舉行。我們到達的時候，碭山中學和工人造反派的戰友已經把大會組織好。我們被請到主席臺上。台前沿跪著一群戴著各色高帽子的人，包括縣委縣政府的頭頭、那位“接待”過我們的縣委辦公室喬主任、各單位鎮壓過群眾運動的“劊子手”等，魯敬中也被唐寨公社的造反派揪到臺子上。他們胸前都掛著牌子，上面倒寫或歪寫著他們的大名，名字上被圈了紅圈又打了紅叉。台下到處飄揚著“XXX造反隊”的紅旗，旗後是他們的人馬。整個廣場被塞得水泄不通。會議開始後，大會主席宣佈了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偉大勝利，號召造反派戰友發揚“痛打落水狗”的精神，徹底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接著，各造反隊的代表紛紛上臺誓師，表示“宜將剩勇追窮寇，不可沽名學霸王”，一定把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批深批透。還有一些受過壓制的造反派戰士，以他們所受的的迫害控訴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罪行。他們的控訴伴隨著“無產階級革

命路線勝利萬歲！”“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萬歲！”“毛主席萬歲，萬萬歲！”的口號聲，群眾情緒十分高漲。

會後舉行了大規模的遊行，十幾部汽車開道，高音喇叭呼著口號，唱著時髦的造反歌曲，穿過碭山縣城的大街小巷，後面尾隨著各造反隊的群眾。戴高帽子的人站在第一部汽車上，後面有造反派扯住他們的衣領或揪住他們的頭髮。

在我的記憶中，這是碭山縣的歷史上規模最大、參加人數最多、群眾情緒最高漲的一次大會。這是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和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勝利的日子，是造反派揚眉吐氣的日子！大家都感覺到今後是造反派的天下了。

在我爲“革命”奔走並爲勝利歡欣鼓舞的時候，母親卻受了大罪。我的家書被截了，魏玉幫、崔玉德回去後，大肆宣傳我在縣裏“挨鬥”的情況，說我“嚇得尿了一褲子”，最後把我打“跑到徐州去了”。在那猶如兵荒馬亂的年代，母親不得我的任何音訊，真的擔心我在外邊給人打死了。她一夜夜地睡不著覺，白天就到店裏大嬸那裏打聽。店裏大嬸只說：“別信他們的，三兒又不是小孩子了，哪就給打死了？”但大嬸確實也說不出令母親信服的理由。

縣裏開完大會我回到家的時候，母親一把抱住我哭了起來：“兒啊，咱哪裏都不去了，反正學校也不上課了，就守著娘在家過吧。”

我上次去王集小學見王彩霞也給她惹了大禍。我們王集見面的第二天，魯敬中就派人審她，問我到底給她說了什麼。當他們沒有得到滿意的答復後，就把唐寨公社所有的小學教師集中起來開大會鬥她，讓她在四個組輪流“交待”與八二七“勾結”的詳細情況，被批判爲“私通八二七”，有人還威脅她：“這個書想叫你教，你就能教；不想叫你教，你就教不成！”一個年僅二十二歲的女孩子，剛剛走上工作崗位，哪裏受得了這種罪？她不想活了。一天，她找

了一根帶子，想結束自己年輕的生命。正在她往房樑上栓繩子的時候，有人敲門進來。事後想想，家裏上有奶奶、父親、母親，下有弟弟妹妹，自己死了他們怎麼活呀？全家人都靠著她每月三十四元五角的工資……說到傷心處，她痛哭流涕。我抓住她的手，表示我的歉意，也表示對她的安慰。在那段時間裏，我們接觸頻繁。小時候我們青梅竹馬，這一段“革命”經歷又加深了我們的感情。

我們相愛了。

衝破資反路線後，大哥被解放了，王彩霞又被調回到唐寨小學。

不幾天，從收音機裏傳來一個振奮人心的消息：“安徽省合肥工人革命造反派聯合委員會”、“安徽省八二七革命造反兵團”等二十八個群眾組織舉行大會，奪了省委、省人委、合肥市委、市人委的權。會上宣讀了《奪權通告》和《罷官通令》，宣佈“把安徽省委、省人委和合肥市委、市人委的一切大權統統奪過來！”並罷掉省委第一書記李葆華，省委書記處書記李任之等人的官，撤銷他們的黨內外一切職務。原省委的喉舌《安徽日報》也被更名爲《新安徽報》。

在大好形勢的鼓舞下，唐寨公社的造反派奪了魯敬中的權、罷了他的官，並以“陷害革命群眾”罪把魯敬中和王守萍關進了縣看守所。小學老師批判了夥同王守萍炮製假材料的其他“積極分子”，放火焚燒了假材料，解放了所有受害的老師，唐世堅被從監獄裏釋放出來。我大哥當然也被解放了。

人們不約而同地想起了他們愛戴和尊敬的公社書記梁學孔。這時梁學孔還在蔣樓村當著飼養員。有人提議請老書記梁學孔回來主持“抓革命，促生產”的工作，一呼百應，一千餘群眾的隊伍馬上組織起來了，人們舉著紅旗，拉著地板車把梁學孔請了回來，一路

上自發的社員敲鑼打鼓吹著喇叭放著鞭炮。唐寨公社的人民群眾被壓抑了一年多，終於盼到了揚眉吐氣的一天！

不過，年輕的造反派不瞭解“階級鬥爭”的殘酷性和複雜性，他們不會想到他們的革命行動會遭到更殘酷的“秋後算賬”。

8．七月的槍聲

我在家呆不住了。我要投身到革命洪流中去，到革命的大風大浪中去鍛煉自己。我安慰了母親，告別了王彩霞，像當年抗日戰士參軍上戰場一樣回了合肥。

當時的革命形勢如排山倒海，很快全國各省、市都奪了權。革命總是難能統一的。文化大革命開始的時候，有人造反，有人保皇，產生了造反派與保皇派；推翻了資產階級司令部，奪了權，造反派因對“１·２６奪權”的不同態度又產生了兩派：一派認爲“１·２６”奪權好得很，好極了，被稱爲“極派”（G 派），被戲稱爲“老極”；另一派則認爲好個屁，被稱爲“屁派”（P 派），被戲稱爲“老屁”。兩派互相指責對方是“反革命”、“保皇派”，雙方進行著激烈的鬥爭。

我回到學校後，發現自己的鬥爭目標不再是那些執行資反路線、鎮壓群眾的當權派，也不是反對我們“革命”的“保皇派”，而是曾與我們並肩作戰的同一戰壕裏的戰友。我的好友李慶厚、孫旭培都參加了 P 派。在我們系裏，P 派支援原系主任、校統戰部部長李東光，G 派支援系主任楊醒夫。我猜想，這兩位驚魂未定的老幹部無意於參加什麼派，一定是造反派把他們拉進去的。

我和大部分八二七的戰士都屬於 G 派，因爲畢竟“１·２６政權”是自己打拼出來的。但 P 派自有他們反對的理由，他們說“１·

２６奪權”沒有實行“大聯合”、“三結合”，是“大雜燴”，是“維持會”，等等，要砸爛“１・２６政權”。

水泥籃球場依然是當初佈滿大字報的“八卦陣迷宮”，不過大字報的內容變了，不再是口誅筆伐“牛鬼蛇神”、“走資派”的東西，也不再是聲討劉鄧司令部的檄文，而是兩派之間的大論戰。

這種爭論和對抗越來越激烈，有時大家吃著飯就吵起來了。在我們系，G 派占絕對優勢，P 派經常遭到圍攻。最後，他們不得不搬出 208 樓，另覓他處居住。李慶厚、孫旭培住進了原校領導的高幹病房。那時，校長、書記都在牛棚裏住著。

不過，我與他們還保持著朋友關係。有時候，我到他們那裏去，和他們一起喝酒、聚餐。時不時地我們也有爭論，但爭論過了我們照樣喝酒、吃飯，或者一邊喝酒一邊爭論。

滑稽的是，這種爭論和對抗經常發生在一個家庭裏，夫妻、父子、兄弟持不同觀點，以至鬧得一家人不能坐在同一張桌子上吃飯、不能住在同一屋簷下。那時，爲了不同的“政治觀點”導致夫妻離婚、兄弟反目、甚至父子脫離關係的並不少見。

我的“革命”激情消退了。我覺得這種派性爭論沒意思，不願意參與派仗。於是，我和邢淩初、任予懷向造反派小頭頭 X“請戰”，要求到省圖書館挖“資產階級文藝黑線”，被慨然准許。於是，我和任予懷兩人住進了包河公園邊上的省圖書館，邢淩初住回了家。清早我們在包河公園裏跑步，傍晚躺在草地上聊天，白天有時到街上逛逛，瞭解“革命形勢”，或者到圖書館閱覽室看書。我抓住這個時間好好鍛煉身體，並天天到邢淩初家煎中藥吃，把身體好好養了養。

我們成了真正的逍遙派。

這已是我們的大四下學期。按照常規，這正是進行論文答辯或者畢業分配的時候。可是，現在一切服從於“文化大革命”，既沒有復課的消息，更沒有分配的音訊。

外邊的形勢越來越緊張，兩派的鬥爭越來越激烈。隨著對立情緒的發展，更隨著“好阿姨”江青“文攻武衛”的蠱惑，兩派由口水戰變成拳腳戰，再演變爲棍棒戰，最後終於進入了槍炮戰。

六月初的一天，我從圖書館回校，一輛大卡車呼嘯著從我身旁風馳電掣般地開過。我看見車身上寫著“工人革命造反派聯合委員會”，車上每人舉著一杆槍。車子開到安徽農學院門口的時候，車上的一個工人對天連放了幾槍。我有生以來還是第一次這麼近距離地聽到槍聲，身子不由得爲之一顫。他們顯然是向 P 派示威的。

回校的當天晚上，我和任予懷就被分配了任務：夜裏到北校門值班保衛安大，防止“老屁”襲擊。X 頭頭當面交給我和任予懷每人一支槍，一支上了子彈的真槍，向我們演示如何打開保險、如何射擊等。

我是平生第一次拿槍。不知爲什麼，手裏握著可以致別人於死命的武器，全身卻在瑟瑟發抖。我望望任予懷，看得出他和我一樣的緊張。

整個安徽大學、整個合肥市都籠罩在令人恐懼的寂靜裏，沒有了往日的喧囂，也沒有進出的人群，只偶爾可以聽見蜀山路上疾馳而過的汽車。我們意識到：一場血戰即將爆發。

“砰砰！”兩聲槍響劃破夜空，震得整個合肥市都在發抖。我們兩人的身子都隨之一顫，不由得握緊了手裏的槍。

那一夜特別漫長，我們戰戰兢兢，好不容易熬到了下班的時間。我們交了班，深深地鬆了一口氣。

第二天，我接到大哥的電報：“母親生病，速歸。”我知道大哥的意思，趕緊收拾了一下，奔向火車站。事後知道，任予懷等幾個朋友也很快離開了這個是非之地。

火車站根本不賣票。聽到火車進站的聲音，我從一個小巷溜進站裏。列車員嚴把著門：憑票上車。怎麼辦呢？我急中生智，從站臺上一個攤販那裏買了一斤桃子，手捧著大模大樣上了車。列車員以爲我是下車買東西的旅客，沒有攔阻，我輕易地混了上去。

列車開動了。我在決戰前夕作了“逃兵”。望著漸漸遠去的合肥，思想充滿了迷茫，內心有說不出的滋味。

全家人見了我都很高興。農村裏武鬥的消息很多，某某地方動了槍，某某地方打死了多少人……母親不知道外邊的事，總在說：“都是學生，打的是啥？唉，這一打，分配不就沒時候了？”

這是我上中學後在家呆的時間最長的一次。我在家當了幾個月的人民公社社員，天天隨隊裏出工。農村識字的少，隊長就叫我擔任記工員。不管幹什麼活，不管我幹的多少，晚上評分的時候，他們都給我評滿分十分。用他們的話說：“大學生跟俺們一起幹活不容易，憑這精神就該給最高分！”

那時生產隊實行工分制，根據每個人的勞力情況評定工分，最強的男勞力評十分，婦女和弱勞力只能評到五分到七分，我二哥只被評六分。工分值的高低以當年收成而定，好年成每一個工分能值七、八分錢，年終勞力多的人家還能分到一點錢。年成差的時候，工分值只有一兩分錢，用社員的話說，成年男勞力幹一天的活不夠買一個燒餅。辛苦勞作了一年，像我家這樣的勞力弱的家庭，年終分紅的時候，不僅分不到錢，還得倒拔錢。那年年底，我家破天荒地分了二十多塊錢——我給家裏掙了好幾百個工分。

我也得到了一次談戀愛的好時間。我與王彩霞經常見面，大部分時候在她的小學。那時，小學也停了課，輪到她護校的時候，我就去陪她。在我的戰友們置身腥風血雨進行浴血奮戰的時候，我卻在花前月下談情說愛。

我跟社員們一起幹活的時候，他們經常向我打聽外邊武鬥的情況，還問我：“都打死人了，毛主席咋不問？”

對這個問題，我也說不清，只好支吾搪塞。是啊，這位“爲人民謀幸福”的“大救星”看到他的紅小兵爲了捍衛他的“革命路線”在流血犧牲，咋不出來保護呢？

二〇〇七年二月三日一位署名金師爺發表在新浪博客裏的文章《文革武鬥中的毛澤東——爲展開全國全面內戰乾杯！》說：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文革熱潮中的毛澤東七十三歲生日。一貫不喜歡做壽的毛澤東令人意外地設了一次壽宴。受到邀請的人是中央文革小組的大部份成員。席間，興致勃勃的毛澤東站起來祝酒說，“爲展開全國全面內戰乾杯！”

一九六七年六月間，打人之風剛開始盛行，北京新市委第一書記李雪峰傳達了毛澤東的“關於發生打死人事件的指示”：“打就打嘛，好人打好人誤會，不打不相識；好人打壞人，活該；壞人打好人光榮。”後來，江青對此話又作了傳達。

江青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二號講話表示支援“文攻武衛”的口號。九月五號，江青在接見安徽造反派時又說：“誰要跟我武鬥，我一定要自衛，我一定還擊。”九月九號，中共中央辦公廳發出通知，號召學習江青九月五號的講話。

啊，原來如此！

不久，我看到了一份傳單：“合肥急電：合肥形勢萬分危急！安徽省六月以來，幾個城市相繼發生大規模流血武鬥……二十日至二十一日，市區打了一天一夜。”

又過了幾天，不知從什麼途徑傳來消息說：安徽工學院的 G 派遭到圍攻，雙方發生槍戰。六中的戰友前去支援，有六個同學被 P 派捉住，丟進石灰坑，活活燒死。……

武鬥的消息越來越多。武鬥變得越來越慘烈，他們甚至動用了機槍、大炮、坦克、高射炮、艦艇等現代化的武器，死亡人數也越來越多。後來從書籍、報紙、互聯網上陸續讀到許許多多回憶當年武鬥情況的文章。

在重慶市沙坪公園西南角，推開鏽跡斑斑的鐵門，一百一十四座墓碑赫然出現在人們面前。這就是沙坪公園內的“文革墓群”——中國僅存的一座基本保存完好的文革武鬥墓群，其中一百一十三座墓塋瘗埋著一九六七年至一九六八年重慶武鬥期間約四百餘名戰死的“8 · 15”派組織成員。在齊腰深的荒草間，一百一十四座墓碑形狀各異，高的有六七米，矮的兩三米。多數墓頂刻有火炬、五星等裝飾物，墓身四周刻有死者姓名、籍貫、死亡年齡等有關資料。碑上的文字大多剝落，依稀還能辨出“爲有犧牲多壯志，敢教日月換新天”等豪言壯語。墓群座西朝東，寄寓著墓主永遠心向紅太陽的拳拳之意。

《南方週末》記者余劉文、韓平藻參觀了這座文革墓地。他們的文章《青春墓地埋葬重慶文革武鬥》記錄了重慶武鬥的部分片斷。

一九六七年七月、八月、九月，山城重慶變成了血雨腥風的戰場。

一九六七年七月八日，兩派武鬥組織“打響重慶武鬥第一槍”，打死九人，傷近二百人。從此，重慶武鬥全面升級，從使用小口徑步槍、衝鋒槍、輕機槍、重機槍、手榴彈到動用坦克、高射炮、艦艇，

從巷戰到野戰，規模越來越大，死的人越來越多。一九六七年七月三十一日至八月六日，榮昌縣兩派共七百人左右參加武鬥，死亡七十八人。同年，八月八日，望江機器廠造反派用三艘炮船組成艦隊，沿長江炮擊東風造船廠、紅港大樓、長江電工廠及沿江船隻，打死二百四十人，傷一百二十九人，打沈船隻三艘；八月十八日，沙坪壩區潘家坪發生大規模武鬥，雙方死亡近百人；八月二十八日，歇馬場發生三千多人的大武鬥，雙方死亡一百人。一九六八年七月九日，兩派重燃戰火，雙方動用坦克、大炮、輕重機槍激戰，附近民宅被炮擊成千瘡百孔。也是當月上旬，雙方均出動水陸兩棲坦克、艦艇、三七炮、四聯高射機槍、野戰炮等重武器……”

記者在墓地裏發現了一塊最完整的碑文：血沃中原肥勁草，寒凝大地吐嘉華。毛主席最忠實的紅衛兵、我毛澤東主義戰鬥團最優秀的戰士張光耀、孫渝樓、歐家榮、餘志強、唐明渝、李元秀、崔佩芬、楊武惠八位烈士，在血火交熾的八月天，爲了捍衛毛主席的革命路線，流盡了最後一滴血，用生命的光輝照亮了後來人奮進的道路。／不周山下紅旗亂，碧血催開英雄花。披肝瀝膽何所求，喜愛環宇火樣紅。你們殷紅的鮮血，已浸透了八一五紅彤彤的造反大旗。啊！我們高高舉起你們殷紅的鮮血(？)。／頭可斷，血可流，毛澤東思想絕不丟，你們鏗鏘的誓言啊，已彙成千軍萬馬、萬馬千軍驚天動地的呼吼(？)。你們英雄的身軀，猶如那蒼松翠柏，巍然屹立紅岩嶺上，歌樂山巔。

立碑者是“重慶革命造反戰校(原二十九中) ”。

其中的唐明渝是著名的“校花”，熱情大方、漂亮，特別擅長跳舞，死的時候才十六歲。楊武惠死的時候還只有十四歲。”

江青說過四川“武打全國出名了”，“重慶打得稀爛，陣線就比較清楚了。好得很！”全國在單次武鬥中傷亡最大的，是四川瀘州。一仗打死兩千餘人，另有八千多人成殘廢。

中國當代歷史研究專家丁抒在《文革死亡人數的一家之言》一文中告訴我們：虐待俘虜是文革中武鬥一大特色。武鬥中死亡者相當大一部份是被虐殺的戰俘。如河北雄縣由軍隊三十八軍支援的那一派動用大炮攻克對方據點後，將俘虜都用鐵絲串起；男的穿肩胛骨，女的從肛門穿進、陰戶穿出，遊街之後，全部槍殺。

廣州作家秦牧曾這樣記述在廣州街頭所見："人們咬著匕首，擡屍遊行"。"在一些中學門口，看到因武鬥而死的學生的訃告，上面大書'享年十七歲'、'永垂不朽'等字眼。"一天早上，"當我走回報社的時候，一路都看到路樹吊屍的景象。那些屍體，大多是被打破了頭顱、鮮血迸流的。在從一德路到人民中路短短一段路程中，我竟見到八具這樣的屍體。"

…………

這一幕幕的景象像電影一樣在我腦子裏疊現。那一個個鮮活年輕的生命，那朵美麗漂亮的校花，在他們本該快樂成長的青春花季凋謝了，死得那樣慘烈！而且，相互殘殺的雙方竟然都是爲了同一個信仰：保衛毛主席，保衛毛澤東思想！

這是一部真的電影，是國內惟一公開發行的關於文革武鬥題材的電影，一九八〇年左右在全國公映，編劇是著名作家鄭義，電影的名字是《楓》。故事的大意是：一九六七年，一對曾經是戀人的青年學生盧丹楓和李紅鋼分別參加了兩個相互敵對的群眾組織。真槍實彈的武鬥裏，兩人在戰場上重遇，盧丹楓面對昔日的戀人、今日的"敵人"，"至死不做叛徒"，高喊著口號跳樓身亡，李紅鋼則被後來掌權的井岡山派誣判爲槍逼盧丹楓跳樓的兇手而處以死刑。電影是以李紅鋼被槍斃時一聲沈悶的槍聲結尾的。那聲沈悶的槍響使我的心爲之一顫，散場後半天不能從座位上站起。在將近三十年後的今天，回想起這個故事，那槍聲仍然令我顫慄。

武鬥期間究竟死了多少人？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等四個部門合編的《建國以來歷史政治運動事實》報告中說，“武鬥中死亡 23 萬 7 千餘人，703 萬餘人傷殘。”丁抒在《文革死亡人數的一家之言》一文中估計，文革武鬥的死亡人數大約在三十萬人到五十萬人之間。

這幾十萬人中，一部分是直接死於武鬥的，另一部分是在中央關於制止武鬥的“七三佈告”和“七二四佈告”後遭到鎮壓的。《毛澤東的中國及其後——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的 319 頁寫道，當時的廣西軍區政委韋國清“下令對激進的紅衛兵格殺勿論”。丁抒在他的上述文章中還說：“雲南的群眾組織滇西挺進縱隊被說是要叛國，軍隊進行圍剿，用機槍掃射，二十分鐘後將該組織數千人屠殺殆盡。”還有一部分像電影《楓》裏的李紅鋼一樣是被作爲“殺人兇手”而被當時行使政府機能的革命委員會槍斃的。

幾十萬人在這場曠日持久的血腥武鬥中粉碎了別人也粉碎了自己。生靈塗炭在混亂中開始，在混亂中結束。

悲劇，悲劇，還是悲劇！然而，誰是這一幕幕悲劇的導演呢？

“金師爺”在他的文章末尾說：在這場中國人奇怪的內戰當中，也許只有一個人始終清醒，始終保持著明確的目標，就是要在“從天下大亂走向天下大治”的過程中清除異己，鞏固統治。他，就是一手導演這場內戰的毛澤東。早在一九六六年六月中旬，毛澤東曾對李志綏醫生說過：“現在是天翻地覆了。我就是高興天下大亂。”

9 · 樂作逍遙派

一九六八年，我們大學的第五個年頭。我已超過畢業年限半年了，但是仍然沒有任何畢業分配的消息。早在一九六七年十月十四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就聯合發出複課鬧革命的通知，可我們“復”什麼“課”呢？我們都是“大五”的學生了！

在校的學生都在消磨時光。拿不到工資，助學金可是照發的。人們對無休止的派仗已經感到厭倦，雖然好事者還時而貼出像“十萬火急！”、“XX 告急！”、“中央首長接見 XXX”的大字報，我們都已司空見慣，一看了之，並不在意。

那時電影院裏經常放供批判的“毒草”電影，像《早春二月》、《舞臺姐妹》、《林家鋪子》、《逆風千里》、《抓壯丁》、《不夜城》、《兵臨城下》、《上海的早晨》等等，我趁機過了一把電影“癮”，甚至把《早春二月》、《舞臺姐妹》等幾部特別喜歡的片子看了四五遍。

我趁這個時候還辦了件人生的大事：結婚。王彩霞當年沒有“享受”到“大串聯”，我讓她到省城合肥來見見世面。邢淩初的母親（我一直稱爲“嬸嬸”）聽說我們已領了結婚證，執意讓我們在他家舉行婚禮。

“小李子，你經常到家裏來，跟淩初兩個像親兄弟一樣，你還信不過嬸嬸嗎？你們早打過結婚證了，已經是合法夫妻，咱們舉行個儀式歡樂歡樂罷了。這幾年天天打打鬧鬧，鬥這個批那個，沒有安生日子，咱們也趁這個機會熱鬧熱鬧。我明天就去跟你叔叔商量。”

邢淩初的父親原來是省文化局戲曲研究室主任，享受著高幹待遇，但文化大革命中被造反派“揭發”出“叛黨”的歷史問題，住在牛棚裏，接受審查，但可以在造反派的監督下與家人見面。嬸嬸把她的意圖給叔叔講了以後，叔叔興奮地說：“好事一樁！成人之

美嘛！你給他們操辦吧。”叔叔給了嬸嬸幾張高幹才能享受的“大前門”煙票，“買幾包好煙，買點好糖，請幾個朋友到家裏來熱鬧熱鬧。……只是，我不能參加……”叔叔停了一下，露出傷心的表情，但旋即改爲高興的語調說：“替我向他們表示祝賀吧！”

嬸嬸不由分說地張羅起來了：她請了隔壁董叔叔給我們佈置了一間新房，自己親自到街上買煙、買糖、買水果、瓜子，安排邢淩初的妹妹薇薇一個個邀請客人，忙得不亦樂乎。薇薇妹妹顯得特別高興，滿樓道裏跑，兩隻小辮子在腦後甩來甩去。

我當時身上連一件能見人的衣服都沒有。嬸嬸把邢淩初的藍色半舊的中山裝給我穿上，邢淩初送了我們一件貴重而時髦的禮物：一套精裝的英文版《毛澤東選集》。

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八日的晚上，我們的婚禮在邢淩初家舉行。到場的五、六位客人都是叔叔嬸嬸的鄰居、同事、朋友，多數是省黃梅劇團的，有幾位是電影《天仙配》的名演員和劇組人員。董叔叔爲我們主持婚禮，我們先向偉大領袖毛主席鞠躬，向嬸嬸和各位客人鞠躬，再互相鞠躬。而後，大家邊說笑，邊吃糖磕瓜子。大家都感到很開心，說好幾年沒這麼開心了，唯一的遺憾是叔叔不在場。

第二天早晨，薇薇妹妹去樓下廁所倒便桶，回來後告訴我們，聽院子裏的人說嚴鳳英吃安眠藥自殺了。嚴鳳英跟嬸嬸住在一個樓上，被批鬥了很長時間了，所以大家對這個消息沒表示太吃驚。那個年頭，自殺的事太常見了。早飯後我們上街的時候，見院子裏貼了很多標語：“嚴鳳英自絕於人民，死有餘辜！”“打倒嚴鳳英！誓死捍衛毛主席的文藝路線！”等等。作家巴金回憶道：“當時大家都像發了瘋一樣，看見一個熟人從高樓跳下，毫無同情，反而開

會批判，高呼口號，用惡毒的言辭攻擊死者。”說的就是那個年代的事情。

出了院子到了街上，馬路上到處是用大刷子蘸石灰水寫的鬥大的字：“打倒楊成武、余立金、傅崇碧！”“堅決保衛以毛主席、林副主席為首的無產階級司令部！”我們對此也沒表示過於驚訝。很多中央領導人昨天還跟毛主席在一起，第二天就被打倒，這種事我們已見怪不怪。再說，劉少奇、鄧小平都能打倒，還有什麼人不能打倒呢？

這時我們學校又出了件大事。

五月十六日，是《五一六通知》發表兩周年的日子。這天天氣悶熱，昔日的造反派們都早早地穿起了褲頭背心，趿拉著拖鞋在校園裏閒逛。下午五點鐘的樣子，廣播喇叭裏突然傳出播音員急促的聲音：“緊急通知！緊急通知！現在播送緊急通知：接省公安廳通知，我校外語系李東光、楊醒夫二人為蘇修特務。革命同志們，立即行動起來揪出這兩名蘇修特務！下面把緊急通知再播送一遍……”

人們哪裏還等聽第二遍，外語系的“革命同志”立刻行動起來“搶頭功”，兵分兩路，分別奔向李東光、楊醒夫的住地。為了顯示自己的一派與“蘇修特務”劃清了界限，抓李東光的是 P 派的戰士，抓楊醒夫的是 G 派戰士。李、楊二人很快被反剪雙手拖到籃球場，李東光赤著雙腳，楊醒夫一隻腳光著，另一隻腳穿著黑布鞋。籃球場很快被圍得水泄不通，我被夾在中間。他們兩人分別被按著跪倒在兩張小書桌上，每人後邊站著三個彪形大漢，兩個扯胳膊，一個揪頭髮。負責揪頭髮的戰士一會把他們的頭往下捺，叫他們向人民“低頭認罪”，一會兒又把他們的頭髮往後揪，使他們擡起頭來，讓人們看清他們的“反革命面目”。楊醒夫嚴重敗頂，一位凶

漢的大手緊緊揪住他稀疏的頭髮，當他的頭髮被揪起時，臉上的表情說明他在忍著劇痛。這時，我突然從人縫裏認出抓楊醒夫頭髮的那個凶漢：他不就是 T 同學嗎？我往前擠擠，眨眨眼，仔細看看：沒錯，就是 T 同學！T 同學與我是碭山老鄉，也是碭山中學的畢業生，比我低兩屆，經常來找我這位學兄“請教”。直到四十年後的今天，我仍然不理解 T 同學當時的行動。

一個美國作家對德國屠殺猶太人的罪行進行了深入分析，結論是“行刑者都是自願的”。另一位作家說：“那是一個荒唐的時代，但在這荒唐的時代裏也有清醒的人。雖然在這荒唐的時代裏就連清醒的人也被捲入荒唐之中，但清醒的人和糊塗的人還是有區別的：清醒的人在做荒唐事時清楚這是荒唐的，而糊塗人在做荒唐事時卻將它當正經事。”我不知道 T 同學的行動是“自願的”還是被迫的？也無從知道他是個糊塗人還是一個清醒的人？但從那義憤填膺的樣子看得出 T 同學當時是當“正經事”來做的。他現在早已過了“知天命”之年而進入“耳順”之年，不知他對當初的行爲有無反思？

當即李、楊二位主任被關進省公安廳拘留所。晚上又在球場對他們兩位開了批鬥會。巫寧坤老師在《一滴淚》裏記述了批鬥會的情況：“在全場高呼一連串少不了的口號之後，第一個跳上臺的是姓馬的俄語教師，他是李主任 1958 年從南京軍事學院帶來的親信之一。他還沒開口先左右開弓刷了他的老首長幾個嘴巴，然後大叫大喊控訴他多年來欺騙了他的部下。接著造反派小將紛紛上臺，鬥爭兩名‘蘇修特務’，拳腳交加，罵不絕口。革命群眾發洩了革命義憤之後，兩名‘特務’又被押回市內拘留所。”

我們原來知道李東光主任是“紅小鬼”出身，參加過抗日戰爭，身上還有一顆日本鬼子的子彈，抗日勝利後又參加了國共戰爭，

是一個老革命。我們也聽說楊主任是革命烈士的兒子，還當過海軍艦長，從南京一所軍事學院調來。他們怎麼竟是“蘇修特務”呢？

聽說兩位主任在省公安廳一關就是好幾年，既不審，也不判，最後宣佈“無罪釋放”。“罪”是沒有了，但鐵窗之苦肯定受了不少。不過他們算是命大的，多少老共產黨人、老革命幹部爲了“莫須有”的罪名，瘐死於自己的牢獄。每念及此，我就想到李慎之先生說過的一句話：“革命吃掉自己的兒女。”

10· 節外生枝

一九六八年的夏天，我在家裏一邊參加生產隊的勞動，一邊等著分配的消息。

一天下午，我正在村西邊的地裏幹活，遠遠地看見任予懷來了。直到現在我都感到奇怪，那時沒有電話聯繫，交通也不發達，僅憑著我閒聊中無意中給他說的地址，他怎麼就能摸到我家來了！

任予懷把我拉到沒有人的地頭坐下，“出事了，”他嚴肅地說，“黃 X 向軍宣隊、工宣隊反映了你的問題，說你和孫旭培、李慶厚在背後罵江青。”

我一下子想起來了：孫旭培、李慶厚住在高幹病房的時候，一次我與他們小聚。吃飯間，收音機裏正好播放著《白毛女》，於是李慶厚順口說了一句：“感謝江阿姨，給我們樹了八塊樣板戲。”接著，我們七嘴八舌地“攻擊”了這位“文化大革命的旗手”：“自己搞了八塊樣板戲，把別人的都批成封資修的，只准八億人看她的八塊樣板戲。”“江青算老幾？到處講話發指示！”……我也跟著說了些大不敬的話。但，這些話黃 X 怎麼知道的呢？

“軍宣隊、工宣隊正在當成一個嚴重的政治問題查，你得趕緊回學校去，想想應付的辦法，”任予懷打斷了我的思索，“弄不好

的話，你們三個都不能分配。你知道，物理系的王憲舉因爲說了對江青不滿的話已經被打成了現行反革命。”

我還在回憶。我一定在不經意間把我們幾個人小聚時說的話在宿舍裏跟某人流露過，別人又在不經意間說到了黃 X 的耳朵。在這分配的關鍵時刻，黃 X 想立功了，於是對我們，尤其要對 P 派的李慶厚、孫旭培兩個發難。

“我想好了，”我對任予懷說，“在我這裏把線掐斷。反正黃 X 也不是從我嘴裏聽到的，他沒有任何證據。我無論如何不能把孫旭培、李慶厚供出來。”

“對，就得這麼辦。”任予懷肯定了我的主意，“不然的話，牽扯的人越多越麻煩。”

第二天上午送走了任予懷，隨後我也趕到了學校。

到校後我先見了邢淩初，把我的想法跟他說了。

“你的主意好極了！”邢淩初說，“這幾天，軍宣隊到處在調查，一個一個地問，但是誰也記不得聽誰說的了，更記不清具體內容，你正好把它否定掉。”

做好了思想準備，我等待著軍宣隊的人來找我。令我們都沒想到的是，形勢在一夜間發生了變化，我們突然由被動轉爲主動。

黃 X 的家鄉革委會寄來了一份公函，說黃 X 隱瞞了家庭成分，他的出身應該是“工商業兼地主”，而他在檔案裏一直填寫的都是“城市貧民”。軍宣隊、工宣隊及時把這個情況告知了我們幾個班幹部。當時邢淩初是班長，任予懷是支部書記，我是組織委員兼宣傳委員，班裏的事我們三人可以說了算。經過商量，我們決定先開除他的團籍，再組織批判。黃 X 是我們新發展的團員。思想革命化以後，他主動靠攏組織，寫了多次申請，我們以他“城市貧民”的家庭出身背景，發展他爲團員。現在開除他團籍自然是順理成章的事。

第二天上午，我們召開了全班大會，一位軍代表列席了我們的會議。首先，任予懷代表團支部宣佈開除黃 X 的團籍，然後讓黃 X 作檢查，接著，全班同學一個接一個地發言，對黃 X 進行了批判。本來黃 X 在班裏就口碑不好，大家借此機會，從他的思想表現到他的爲人處世，進行了淋漓盡致的揭露，並上升到他的剝削階級的家庭出身的“思想根源”進行批判。發言中使用最多的是毛澤東的那句語錄：“每個人都在一定的階級地位中生活，各種思想無不打上階級的烙印。”我在發言的最後用了一句英語諺語規勸這位自作聰明的黃 X：“人生的路很長。奉勸黃 X 記住這句諺語：You can deceive some people for sometime，but you can never deceive all the people for all the time.（你可以騙人於一時，但你不能永遠騙住所有的人）”

軍代表最後作了總結，支援我們團支部開除黃 X 團籍的決定，肯定了同學們的批判，要黃 X 繼續深刻從思想深處鬥私批修，深刻反省自己的問題，準備以後繼續接受批判。

之後不久，我們就拿到了派遣證，紛紛到各自的單位報到。而這位黃 X 搬起石頭砸了自己的腳，他被“緩派”。他和許多有各種各樣政治問題的同學被留在學校，一邊勞動改造，一邊交待問題接受審查。

有的同學就沒有我們這麼幸運了。

程適凱同學是我們學校中文系與我同屆的同學。我常到老鄉孫光華宿舍去，慢慢地他們宿舍的同學我都認識了。程適凱是安慶人，中等身材，清秀的臉龐，長著一雙睿智的眼睛。他的生父是一個國民黨軍官，隨國民黨跑到臺灣去了，繼父是一個右派分子。後來他的繼父也死了，家裏只剩下孤兒寡母相依爲命。他本比我們高一屆，一九六二年參加高考，是安慶地區的文科高考狀元，但因爲複雜的家庭背景，當年未被錄取。不得已，他復習了一年，參加了一九六

三年的高考，又考了安慶的第一名。招生的老師仍然因爲他的家庭問題不敢錄取。系主任馬志嘉站出來說話了：“我們要了！我不相信我們不能把他培養成無產階級的知識份子。”於是，他被錄取了。程適凱博覽群書，讀過許多馬列著作如《國家與革命》、《反杜林論》等，這些書的經典段落常被他引用到文章裏去。在幾年的大學學習期間，程適凱始終是班裏的佼佼者。

文革的大聯合期間，他在家鄉安慶寫了一張文采飛揚的大字報，隱諱地說 6408 支左部隊沒有站在公正的立場上，偏袒了“踢派”。在他即將被分配離校的時候，省軍管會的一位負責人責問駐安徽大學軍宣隊：“安徽大學放著現成的反革命不抓，你們一天到晚幹的什麼？”於是，程適凱在安慶寫的那張大字報被印了幾百分，全系所有師生人手一份，軍宣隊主持召開全系大會批鬥。會上先讓程適凱檢查，繼之結合他的家庭出身對他上綱上線批判，會後安排學生看管。實際上，大字報內容並沒有惡毒的語言，只是流露了不滿情緒。系裏的師生也沒太把它當回事，以爲再批判幾場就會過關的。不料，程適凱不願意再接受批判，他選擇了死亡。

當晚他約自己的好朋友朱來常到校內人工湖邊散步，把自己身上僅存的幾十斤糧票和不多的錢送給了朱來常。

第二天早晨八點多鍾，已過了早飯時間，監管他的學生發現程適凱的蚊帳仍然關著，床前放著他的一雙拖鞋。他們以爲他還在酣睡，便打開蚊帳叫他。不料，帳子裏根本就沒有人。枕頭邊工工整整地擺放著一隻信封，裏面裝的是他寫給母親的遺書，其中的一句我至今不忘：“火車的一聲長鳴將是我二十四歲生命的最後一個音符。”

不久，他們從外邊找回了他粉身碎骨的屍體。

死亡是可怕的，但有時候生不如死，有的人不怕死亡，卻害怕活著。我理解程適凱。在他的心裏，他的家庭出身和他這頂“反革命”的帽子會讓他一生走不出陰影。

11. 風雪荒草圩

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八日淩晨，毛澤東在京西賓館召見聶元梓、蒯大富等五大紅衛兵頭頭時發出指示：“工人宣傳隊要在學校中長期留下去，……並且永遠領導學校。”不久又發表了最新指示：“從舊學校培養的學生，多數或大多數是能夠同工農結合的……由工農兵給他們以再教育，徹底改造舊思想。”這意味著我們這些當年叱吒風雲的紅衛兵的歷史使命已經完成，應該退出歷史舞臺了。

我們終於等來了分配的消息。可是，一看分配方案，我們都傻了：要人的單位除個別中小學外，就是軍墾農場。我的幾個好友中，只有孫旭培被分往淮北礦務局袁莊礦小學，其餘的幾位如邢淩初、任予懷、李慶厚等都報名去了軍墾農場。

一九六八年九月十八日，省、市革命委員會的領導和被組織起來的群眾敲鑼打鼓沿長江路歡送我們。安徽大學、合肥師範學院、安徽農學院的數千名被分配到軍墾農場接受再教育的67屆畢業生分乘幾十輛大卡車浩浩蕩蕩奔赴農場。不久，68 屆和文革前的最後一年一九六五年入學的 69 屆、70 屆的大學生被送往皖西的城西湖軍墾農場。一九六八年十二月，毛澤東又發出指示“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把廣大的中學紅衛兵也趕下了鄉。至此，紅衛兵完成了自己的歷史使命，被徹底地趕下了政治舞臺。

經過七、八個小時的顛簸，我們來到了目的地：荒草圩農場。荒草圩農場坐落在安徽省全椒縣，在楚霸王拔劍自刎的烏江邊上。

這個方圓幾千畝的大圩子過去是齊腰深的叢生荒草，是毒蛇和野兔的故鄉，由此得名。我們來之前，這裏是個勞改農場。勞改犯被趕到了白湖農場，這裏就成了我們“接受再教育”的地方。

我和幾個好朋友分開了。我在十五連，邢凌初、任予懷在十四連，李慶厚在十一連。但我們每個連的建制是一樣的：每個連隊有六個解放軍官兵：指導員、連長、三個排長和一個文書。他們是負責給我們以“再教育”的老師，我們是他們教育的對象，是接受他們“再教育”的“學生”。每個排分成三個班，班長從我們大學生裏任命。被任命爲班長、副班長的多數爲在大學期間入了黨的黨員。

“接受再教育”的方式也是一樣的：軍事化的生活，最艱苦的體力勞動，學習毛主席著作，接受解放軍的訓話。

我們的物質生活應該說還是不錯的，大米飯隨便吃，晚上還有麵條和饅頭。我們自己養豬、種菜，副食品也算豐富，比我們前幾年的大學生活好多了。我們最難以忍受的是嚴格的軍事化管理和那種令人窒息的政治氣氛。

那時正是“大樹特樹毛主席的絕對權威，大樹特樹毛澤東思想的絕對權威”的時候，我們到達農場的第一件事就是每人自做一個語錄牌。語錄牌用硬紙板和小竹棍做成，牌的正面貼上毛主席像（多數是油畫“毛主席去安源”），背面是一段毛澤東的語錄。每個人可以發揮自己的聰明才智和繪畫才能，把這個牌牌做得盡善盡美，如有的在毛澤東的像下畫一個盛開的向日葵，表示葵花向陽；有的畫上一排紅心，表示“紅心忠於毛主席”；還有的在語錄周圍畫上四射的金光，表示“毛澤東思想永放光芒”；等等。睡覺時我們把這個牌牌插在靠床頭的牆上，幹活時我們要帶著它插在地頭上。

當時，全國還有一個流行口號叫“三忠於、四無限”，具體內容是：“忠於毛主席，忠於毛澤東思想，忠於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對毛主席要無限熱愛、無限敬仰、無限崇拜、無限忠誠。”中心圍

繞一個“忠”字。有句很時髦的話說：“忠不忠，看行動。”從此，各地創造了各具地方特色的表忠心行動，最普遍的行動是：對著毛主席的像“早請示、晚彙報”。

早晨起來洗漱乾淨後的第一件事就是“早請示”：班長帶領全班“戰士”面對牆上的毛主席像，右手握住小紅書《毛主席語錄》放在胸前，高呼：“首先讓我們敬祝偉大領袖毛主席萬壽無疆，萬壽無疆！祝林副主席身體健康，永遠健康！”隨著喊聲把小紅書一遍遍地舉過頭頂，再集體背誦一段毛主席語錄。一天三頓每頓飯前都要排好隊高唱一支歌頌毛主席的歌曲，如“敬愛的毛主席，您是我們心中的紅太陽，……萬壽無疆，萬壽無疆，萬壽無——疆！”再把小紅書舉過頭頂，連呼：“祝偉大領袖毛主席萬壽無疆，萬壽無疆！祝林副主席身體健康，永遠健康！”晚上上床前還要“晚彙報”，內容和形式同“早請示”。如果因爲特殊的事沒有趕上集體的“早請示”、“晚彙報”，或者飯前錯過了那個集體祈禱儀式，那麼，一定要單獨一個人補上，否則，你就不能吃飯、上床。有人背後開玩笑地說：“你不祝他老人家萬壽無疆，他老人家就不給你飯吃、不讓你睡覺。”即使憋得很急，我們也不願意利用那個時間上廁所，因爲一個人單獨禱告是非常尷尬的事。

我們的草房建成後，牆上凡是有空的地方，包括廁所的外牆上，都畫上了毛澤東的畫像或寫一段毛澤東的語錄。後來我們週末進全椒縣城，發現大街小巷，到處都刷成了紅顏色，畫著毛主席的像，寫著毛澤東的語錄，儼然一片紅色的海洋。沿途每隔兩裏路左右就有一個新建的小亭子，亭子中間砌一面短壁，正面一律畫著毛澤東的像，背面寫著一段毛澤東的語錄。一位同學回來後對人說：“那一個個小亭子活像土地廟！”不知被誰反映了上去，連裏當做一件“政治事故”，開大會對這個同學大加批判。

來農場之前，駐校軍宣隊的領導就安排我們：只要帶一本《毛主席語錄》和一套《毛澤東選集》，其他的書都不要帶。我多帶了一本《魯迅語錄》，又偷偷地把店裏二叔送給我的那套《古文觀止》也帶上了，只是平時不敢拿出來。晚上的時間都是用來學習毛澤東的著作。指導員每天定好學習的篇目，要大家自學，第二天晚上以班爲單位座談心得體會。座談時大家輪著發言，班長作記錄，記錄還要上交到排裏、連裏，指導員親自審查，誰也不敢不發言。每個人的發言都要以祈禱開頭：“首先讓我們敬祝我們敬愛的偉大領袖毛主席萬壽無疆，萬壽無疆！祝林副主席身體健康，永遠健康！”班裏挑出心得體會講得好的參加排裏的“講用會”，排裏再挑出好的到連裏的“講用會”上講。所謂“講得好”的標準，主要是看是否結合了思想實際進行“鬥私批修”。當時流行的是林彪的那句名言：“靈魂深處爆發革命，狠鬥私字一閃念。”有的因爲講用會上的發言符合時代精神，狠鬥了頭腦中的“私”字，進行了深刻的“鬥私批修”，“火線”上入了黨，後來在分配時也粘了光，謀了好單位。早在那個時候，就有人很會作秀：他們打著手電筒“躲”在被窩裏學毛選，查鋪的排長“發現”了，第二天要在全連大會上被作爲“學習毛主席著作的典型”予以表揚，後來也有人因此“火線”上入了黨。

每天天不亮起床號把我們從床上喚起，我們必須在十分鐘裏完成穿衣、洗漱、疊被子整理床鋪等事情，然後進行“早請示”，接著站隊出操。上午和下午都是幹活，各種各樣的苦活、累活、髒活我們都幹過。開始的時候，我們和泥脫土坯造房子。秋收開始後，我們收稻子。對我這個在北方長大的同學來說，在泥地裏割稻子比收麥子苦得多：你沒法坐下來休息。令我更不堪忍受的是運稻子。我們要赤著腳深一腳淺一腳地踩著爛泥把一擔擔的稻子一氣挑到路

上，中間不能放到泥地裏喘口氣。半天過後，肩膀就腫得像饅頭一樣，第二天還得堅持……在我的記憶中，那一個秋天是我一生中最難熬的。

爲了充分利用農場自己的稻草，一九六八年的冬天，場部要建座造紙廠。除了技術工作由專業工人幹之外，其餘的所有工作，包括運轉頭、和洋灰、軋鋼筋、澆注水泥等等所有的活都包給我們“接受再教育”的大學生了。工程一天二十四小時不停工，我們分成三班連軸轉，一直持續了一個多月。我大部分時間是傳送水泥。十幾個同學排成一排，一直沿梯子排到要澆注的塔頂，把下邊和好的水泥用鐵簸箕傳上去。爲了保證工程質量，傳送速度要非常快，不能有任何間歇。我們都變成了機器，連續幾個小時機械地重複著同一個動作：接過前邊的同學傳來的十多斤的簸箕，再快速地傳給下一個，不能說話，甚至伸腰、長喘氣的時間都沒有。我們的臉、頭髮、衣服上都濺滿了水泥。下了班，兩個胳膊酸得擡不起來，兩條腿也變得麻木了。我們急忙扒口飯，趕緊鑽到被窩裏睡覺。睡到床上，頭暈暈地還在工地上轉，眼前仍然晃動著裝滿水泥的鐵簸箕……後來聽說，那個造紙廠因不符合生產要求，建好不久就被關閉了。

早上出操、常規的軍事訓練都能受得了，我們最怕的是緊急集合。軍隊的俗話說：新兵怕炮，老兵怕號。當你在一天的勞動後正在酣睡的時候，突然緊急集合號響，我們個個像觸了電似的立刻從床上跳起，在幾分鐘內穿好衣服，打緊背包，然後站到隊裏去。連長一聲“立正！”所有的人必須原地不動。凡是沒有入列的都要拉到前邊去受訓。集合完畢，全連跑步去“執行任務”：到圩地裏跑一圈。有時，什麼任務也沒有，把你從床上折騰起來，站好隊，訓過話，然後解散睡覺。用連長的話說，就是要培養我們“戰時能拉得出去”的“過硬作風”。他們選擇的緊急集合時間常常是在你剛

剛入睡或是半夜你睡得最香的時候。一開始，我們很緊張，晚上睡覺時連衣服也不敢脫。

有時，連領導想出一些怪招來整我們。一個嚴冬的下午，天上落著雪，地上結著薄冰。我們正坐在被窩裏學毛選，突然緊急集合號響，但這次通知不要打背包。我們從床上跳下來，登上鞋就往外跑。站好隊連長也不多說，只命令我們“向右轉，跑步走！”

我們被帶到圩裏的一個小水渠旁。炊事班的同學已經帶著臉盆、筐子等在那裏。張連長大致地分了地段，說了聲：“我們今天的任務就是捉魚。下！”說著他自己先脫了鞋跳進水裏——不，是冰裏，水面上結著一層冰。見連長如此，我們一個個跳進沒膝的水裏去。寒冷的冰水像是一根根針直刺到骨髓裏，我打了個寒噤，全身起了一層雞皮疙瘩。我心想幹起活來可能會暖和起來，於是把手插進水裏摸魚，豈知手比腳的神經更靈敏，寒冷之氣直灌頭頂，我的頭不由得晃起來，上下牙打得咯吱咯吱響。如果腳底下能踩著一把稻草，就感到舒服極了，至少沒有被針刺痛的感覺。儘管如此，誰也不敢上岸。那時最時髦的口號就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最忌諱的就是怕苦、怕累、怕髒。我們用泥打起壩來，把水刮乾直接從泥裏抓。那年，圩裏上了大水，水剛剛退去，小水渠的溝邊上、泥裏邊到處都是魚。我們很短的時間就抓了好幾筐。我們盼著連長上岸的命令，可是他偏偏故意拖著……

“嘟——”連長的哨子終於響了，我們迫不及待地跳上岸，踩到岸邊的草上。這時，我們在冰水裏已經泡了近兩個小時。我們的腿腳早已沒有了知覺，回去時東倒西歪路都不會走了。

晚飯我們吃的是紅燒魚。張連長大聲問我們：“今天的魚香不香？”“香！”大家齊聲回答。“爲什麼今天的魚特別香呢？誰能回答出來？”我們只顧吃飯暖和身子，沒有回答，連長只好自己解釋：“因爲這些魚是我們冒著寒冷親手逮的！所以，我們要多參加

這樣的艱苦勞動，知道我們今天的幸福生活來之不易，培養我們熱愛勞動人民的階級感情……”

後來，班裏安排我種菜。這算是我最感到開心的一段時間。雖然挑糞澆菜又臭又髒，但比較自由，不要老是舉著語錄牌，閑的時候我還可以偷偷跑回駐地讀《古文觀止》。不過，這時要非常警惕：倘被發現，說不定又要被當成“政治事故”處理。我校數學系的操利明與我是“同行”的種菜難友，他平時牢騷特別多，什麼都看不慣，上到國家領導，下到當兵的小排長、善於做秀的積極分子。我們一塊挑糞，一塊挖地，休息時坐在一起發牢騷。那時，我們的積憤太多，宣洩就是一種滿足。

不久，向“毛主席他老人家”表忠心的另一種方式流行開來了：跳“忠字舞”。早在一九六六年大串連時期，各校文藝骨幹就組織了毛澤東思想宣傳隊，跳些“造反有理”等歌曲配音的造反舞和“敬愛的毛主席，我們心中的紅太陽”等歌曲配音的表忠心舞。現在的“忠字舞”少了些“殺”氣、多了些“柔”氣，少了些拳頭、多了些雙手高舉的“頌揚式”。造反舞只流行於各紅衛兵組織的“宣傳隊”，而“忠字舞”則被普及到全民。

連裏先派人到外地學習，回來再教我們。到外地學習的人回來後，連裏便把學跳“忠字舞”當成頭等大事。農活、學毛選都停了下來，連天加夜地學。終於，我們學會了，但由於大眾水平問題，“忠字舞”動作被簡化了很多。我們成八字形在毛主席像兩邊站定，隨著“敬愛的毛主席，我們心中的紅太陽……”的歌曲節奏，右腳蹬地，掌心向上伸向毛主席像，一蹬一伸、一伸一蹬，雙臂一張一合，一合一張，如此而已。後來有人提議跳舞時雙手拿著紙做的葵花，表示“葵花朵朵向著紅太陽”，被採納，號召我們自製紙花。以後我們再跳的時候就多了個道具：紙做的葵花。

光我們自己跳還不夠，還要教給貧下中農，讓他們也學會以這種方式向毛主席他老人家獻忠心。連隊組織我們到生產隊去，兩三個人住在一個貧下中農家，與他們同吃、同住、同勞動，其中一項重要內容就是要教會他們向毛主席他老人家表忠心的兩種方式："早請示"、"晚彙報"和跳"忠字舞"。農民們被繁重的農活磨出來的的粗手大腳哪裏會跳舞？怎麼也教不會，我們感到尷尬至極。

那段時間裏毛澤東經常有"最新指示"發表。當時沒有電視，"最新指示"都是通過晚上七點鐘的廣播"新聞和報紙摘要"傳達出來的。這時，我們就要聞風而動，"宣傳毛主席指示不過夜"，連夜把這一指示傳達到周圍千家萬戶的老百姓。我們通常以排爲單位，分好任務，然後排著隊，領頭的高舉用大紅紙寫的"最新指示"，敲著鑼打著鼓，走向劃定的社員家。首先歡迎我們的是村裏的狗，它們不知何爲"最高指示"，深更半夜聽到鑼鼓聲，便叫成一片，有的沖到我們隊伍跟前狂吠。我們敲半天門才能喚醒勞累了一天正在熟睡的農民，等他們開了門就大聲跟他們說："毛主席又發表最新指示了，我們來向您報喜！"睡眼惺忪的農民一邊扣扣子，一邊應和著："報喜，報喜！"然後把"最新指示"給他們讀一遍。有的老頭老太太聽不懂我們的普通話，還有的耳聾，向他們喊了半天，他們還是聽不明白："報死？報啥死？誰死了？"在當地的土話裏，"喜"、"死"是同音的。這時，我們宣傳起來就格外困難。

連指導員有時利用晚上的時間給我們作形勢報告。珍寶島自衛反擊戰後，我們的韓指導員就對我們進行戰備教育。他首先給我們分析了形勢，說："蘇修一直對我們虎視沈沈（眈眈）。爲什麼呢？他仗著地勢有利。你們都是大學生，都學過物理（地理），看過地圖，知道蘇修的位置在在哪裏嗎？我告訴你吧，在西北高原上，而我們的北京在窪地裏，在低處，他進攻我們方便——順坡呀！"我

們爆發出一陣哄笑聲。聽到有人笑，指導員以爲他的講話精彩，講得更帶勁了，也加大了嗓門：“所以，我們必須加強戰備，練好本領，如果蘇修膽敢侵犯，我們一定把他打得交頭接耳（焦頭爛額）、雪花流水（落花流水）……”又是一陣笑聲。指導員很得意，一直講了將近兩個小時。我們散了會對這位韓指導員說：“你講得太好了，以後多給我們講講。”韓指導員聽了美滋滋的。大家給他起了個外號：韓牛 X。

在經歷著這一切的時候，內心感到極大的痛苦——我們在承受著殘酷的精神折磨，而且這種精神折磨所帶來的心理痛苦遠勝過繁重的體力勞動所帶來的肉體痛苦。托爾斯泰在《苦難的歷程》裏說：“在清水裏泡三次，在血水裏浴三次，在堿水裏煮三次，我們就會純淨得不能再純淨了。”那些給我們“再教育”的“老師”們、政策的制定者可能是爲了讓我們變得“革命得不能再革命”，才要我們接受這種煉獄的煎熬？

一九六九年四月一日，中國共產黨第九次代表大會召開，會議最後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章程》把“毛澤東同志的親密戰友”林彪作爲“接班人”寫入總綱。從此，全國上下一片“萬歲，萬歲，萬萬歲！”和“身體健康，永遠健康！”，我們更加感到壓抑，壓抑得令人窒息。一天，孫旭培從淮北專程來看我們在軍墾農場的幾位朋友。有一個星期天的上午，我們兩人默默地坐在田埂上，他雙手捧著頭，我眼睛望著天，陷入對國家、民族的深切憂慮，整整半天沒有任何人說一句話。

我們每週只有星期六晚上是自由安排的，可以離開連部到場部去，而且不用請假，只要跟班長打個招呼即可。場部兩間屋的小店被壓抑了一個星期的大學生們擠得滿滿的。那時，物資供應仍十分緊張，很多東西憑票供應，小店裏也只有肥皂、牙膏、毛巾之類的

生活用品。大家到這裏來，不是要買什麼東西，而是要鬆弛鬆弛繃緊了一星期的神經，放放風。我們充分享受著這點自由，店門前的場地上洋溢著歡樂的氣氛，來自不同連隊的同學像久別的朋友似的在這裏打鬧著，嬉笑著。

場部旁邊還有一個小飯店，店面很小，只能容下兩三桌人。店裏的飯菜花樣也不多。這是我們幾個朋友週末聚會的地方。我們到這裏來也並非爲了改改口味或塡塡肚皮。那個年代，我們積壓在心裏的鬱悶太多太多，我們需要排遣宣洩。邢淩初、李慶厚、任予懷和我是每次必到的。我們只要一隻燒雞和一塑料桶生啤酒，然後一邊慢慢啃著雞翅、雞爪，一邊發牢騷，從連隊的某個連長、指導員的顢頇無知到國家的興衰大事，想到什麼罵什麼。“江青是什麼貨色，還以國母自居，‘紅衛兵小將們哪，你們好！……’”李慶厚拖著長音學著江青接見紅衛兵代表時的腔調，“噁心！真叫人頭皮發麻！”也有的罵林彪：“尖嘴猴腮一副奸臣相，弄得國無寧日！毛主席怎麼會相信他？”……當時罵得很痛快，事後我們都感到很後怕：當時全國正在開展清理階級隊伍的運動，倘若我們之中有一個人掀出當初的說的話來，輕則坐牢，重則殺頭。中央的《公安六條》說：“攻擊污蔑偉大領袖毛主席和他的親密戰友林副主席的，都是現行反革命行爲，應當依法懲辦。”在實際執行中，這一條又被擴展到適用於江青、陳伯達、康生等“無產階級司令部”的人。那位因反對“林副統帥”而被槍斃了的解放軍戰士石仁祥就是烏江對岸的和縣人。

在那令人“革命”得發瘋的年代，我們的友誼經受住了考驗。

俗話說：秀才遇到兵，有理說不清。有的小排長真的以“老師”自居，無故訓人引發的頂撞常常發生。軍人以服從命令爲天職，頂撞領導要算是“政治事故”，結果常常招來上一級的更嚴厲的訓斥。

昔日叱詫風雲的紅衛兵淪落到今天這個份上，他們看不到國家的希望，看不到個人的前途，大家都自輕自賤，許多人剃成禿頭，上衣的左右兩片大襟一壓，用草繩子一紮，腳下踢拉著前露腳指頭後露腳後跟的破解放鞋，再用稻草攀幾道……

一九七Ο年元月，我們“再教育”期滿，接受了再分配。我們在荒草圩整整呆了十六個月，也就是一年零四個月。

那時正是知識份子最臭的時候，姚文元的文章說：“知識份子受了十七年修正主義教育”，“學農的不會種田，學工的不會開機器，學文的不會寫文章。”分配方案上列的一串串的全是中小學，既然如此，不求“治國平天下”，但求“齊家”，我就撿了一個離家較近的懷遠縣，以便將來照顧家庭。懷遠縣和我家所在的碭山縣同屬宿縣地區，懷遠縣是最南邊的一個縣，碭山縣是最北邊的一個縣，宿縣坐落在二者中間。

11．　風雨又起

一九六九年三月二十四日，我的大兒子出生了。那時我還在農場裏。

我們家十幾年沒有添丁加口的喜悅了。小雪一九五五年出生的時候，全家人都高高興興的，但一九五九年那個沒有名字的小侄女的出生卻成了家庭大災難的誘因。

從妻子懷孕時起，全家人就開始沈浸在歡樂中，嘴上沒有人說，但全家人都從心裏認識到這是家庭復蘇的象徵。大侄女小紅好像也明白了這一點，在妻子妊娠反映的時候，天天到處給她蟠蟠找青棗、梅杏、瓜妞之類帶酸味的東西。但妻子生育時卻遭了大災。

幾千年來，農村裏生兒育女都是請產婆接生。家裏也按慣例請來了高明的產婆。不料生產時妻子突然大出血，而且血流如注，頃刻間把整間房子的地面都漫遍了。產婆沒見過這種情況，急得直搓手。母親趕緊把店裏大嬸請來。店裏大嬸是妻子的舅奶奶，算是妻子娘家的一個見證人，萬一出了什麼不測，也好交待。嫂子、大侄女忙著用糞箕挎沙土墊地面。店裏大嬸到時，沙土已被鮮血浸透，大嬸先掉了淚，失聲說：“我的霞呀……”

母親好像有了主意，她很快退出屋子，對著屋門，面北以頭觸地磕起響頭來：“老天爺，我給您磕頭了，您千萬保佑我的大人孩子，我求求您……”冥冥之中，自有天意。也許老天爺可憐見我們家，流血嘎然而止，妻子的性命保住了，兒子也生了出來。但妻子昏迷了一兩天，一星期後還不能站立……

因爲母親年近七十，已無能力照顧孫子，應妻子要求公社教育辦公室把她調到了離娘家很近的光明小學。這樣，上班時她把孩子放在娘家，由岳母代爲照顧。母親牽掛著這個孫子，雞生的蛋再也不捨得吃，每隔幾天，就用家織手巾包著積攢的十來個雞蛋走八、九裏路去看孫子。由於妻子生產時大出血，兒子生下來就沒奶吃。那時奶粉之類的東西買不著，妻子的兩個弟弟到處給他找羊奶喝。一個鄰居家也剛生了孩子，孩子的媽媽奶水足，他們就經常抱著兒子向這位鄰居討奶吃，只要見她餵奶，就趕緊把兒子抱過去，央求說：“給俺留兩口吧。”這家鄰居也很好，馬上放下自己的孩子，把我兒子接過去餵奶。隨著兒子漸漸長大，討來的奶已不能滿足需要。家裏就開始喂給他“哺雛子”：用小麥麵放在勺子頭裏在火上煮成的麵糊，再撒上點白糖。

當我領了再分配的派遣證穿著一件黃色軍裝上衣回到家的時候，兒子被我這個不倫不類的“怪物”爸爸嚇得哭個不停。此時，兒子已經有八、九個月，會叫“媽媽”、“奶奶”了。知道我回來，

母親的兩個朋友店裏大嬸和三嬸也來看我。她們逗著兒子喊“奶奶”，母親拖著長音答應著“噯——”，臉上綻放著幸福的笑容。在我的記憶裏，母親有十幾年沒有這麼幸福地笑過了。這時，店裏大嬸和三嬸就不無羨慕地對母親說：“嫂子，你可算熬出來了！”

我拿到工資的第一個月，就給妻子寄了五塊錢，叫妻子給母親做件新棉襖。鄰居們見母親穿上了新棉襖，都問：“你的棉襖穿著正好，誰給你做的？”母親就自豪地說：“俺三兒媳婦。”

儘管這時物質生活很不豐富，僅能吃飽肚子而已，然而卻是母親最感幸福的一段時間。只是這段時間太短。

當我拿著派遣證來到懷遠縣教育局的時候，教育局的領導告訴我們：縣城裏的幾所中學都下遷了，縣城一個不准留，要到最艱苦的地方去。我和安徽農學院的一個老鄉李長秋被發配到懷遠縣最西南角的徐圩公社尚廟中學。縣裏的口號是：每個公社建一所中學，徐圩公社沒有中學，暫時在尚廟中學上課，積極籌建徐圩中學。

不僅縣城中學要下遷，鎮中學也要下遷。當我們隨著河溜鎮中學下遷的老師來到尚廟時，大家都愣了：這哪裏有什麼中學？顧名思義，這裏原來是座和尚廟，“文革”使它斷了香火，便改成中學，大殿作辦公室，周圍幾間茅草房便算是教室了。學校裏也沒有正式的教材，老師們無課可上，天天領著學生“學農”、打籃球。學校裏只留了幾個老年老師應付著，我和李長秋等年輕老師都被抽去籌建徐圩中學。一九七〇年上半年整整一個學期我沒上一天課，跟著總務主任泡在淮河邊上，採購石頭等建築材料。放暑假的時候，徐圩已經建起了兩排校舍，我們也從尚廟搬到了公社所在地徐圩。

但是，有的同學這時候偏又出了事。

劉法強是我高中的同班同學。他高個頭，大眼睛，性格活潑開朗，是班裏成績好的同學之一。高二時，他與我們班的一个漂亮女孩偷偷地談著戀愛，惹得很多同學眼紅。問他，他只笑，並不否認。高中畢業後他考入安徽農學院，与我所在的安徽大学是近鄰，我們常在星期天互訪。大學畢業後我們一起去荒草圩軍墾農場“接受再教育”，然後又一起離開荒草圩走上工作崗位。他算是運氣較好的，分到了省城合肥市第五中學。

可是，不久，“劉法強臥軌自殺”的消息在我們同學中迅速傳開。我們怎麼也不敢把“臥軌自殺”這一殘酷的字眼與活潑開朗的劉法強聯繫起來，於是分頭打聽這一消息的可靠性，我們高三時的班主任張士魁老師甚至專程去了合肥。我們最後得知這一消息是確鑿的。

一九七〇年三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陰謀集團的通知》。通知說：“反革命秘密組織決不是只有一個‘五一六’”，因此清查“五一六”集團的鬥爭被嚴重擴大化，演變成爲全國性的對立兩派群眾組織之間乃至家庭成員之間的大混戰。

劉法強的所在單位接到了劉法強正在讀中學的妹妹的一封檢舉信，說與劉法強北京的某“五一六分子”同學有密切聯繫，信中又列舉了劉法強的一些“反革命活動”。於是，單位革委會領導成立了專案組立案調查。他們首先與劉法強談話，告知劉法強他妹妹檢舉揭發了他，要劉法強坦白交代，爭取寬大處理。

這對劉法強是莫大的壓力。自己與北京的一個同學確有聯繫，但只是一般的朋友之間的往來，從未言及國事。現在，那位同學已被打成“五一六分子”，而且又是自己的同胞妹妹檢舉揭發他，那麼他的“反革命罪行”就成了百口莫辯的“事實”，他的案子也幾乎成了“鐵案”。

這跳進黃河也說不清的“問題”已壓得他喘不過氣來，自己親妹妹絕情的無中生有尤使他感到莫名的悲哀。於是，他拋棄了父母兄弟，拋棄了妻子和妻子腹中的兒子而選擇了死亡。

暑假裏我回到家的時候，大哥和妻子、妻叔都已去參加縣裏的“一打三反”學習班。此前，縣裏已按行業舉行了五期學習班。因此，這一期全縣中小學教師“一打三反”學習班又叫做第六期學習班。

碭山縣的政治形勢這幾年也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原碭山縣委、縣政府已被“支左”部隊控制的革命委員會所代替，現任的革命委員會主任是朝鮮戰場上的戰鬥英雄胡修道和一個叫李容穩的團副政委。在實行“三結合”的時候，由於各種說不清的政治因素，陰差陽錯，當年“四清”時整過人、後來又執行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那一批人，又當了政，掌了權。所以，縣革命委員會喊出的響亮口號是：“保衛四清運動偉大成果”。

學習班設在遠離縣城的東關外的碭山師範，一排排的教室成了各公社學員們的住地。學習班由縣革委會派的工宣隊總負責，每一個公社的學習班領導人由工宣隊員和公社的帶隊領導組成。唐寨公社帶隊的領導姓臧，恰恰是魯敬中的親信，當年衝破資反路線時受到過群眾的批判，心裏記恨著廣大老師。所以，一進學習班，老師們精神就緊張了起來。聽說前五期學習班每一期都有不少人被抓起來，還有自殺的，因此每一個與會者都是帶著戰戰兢兢的心情走進學習班大院的。平時，大門緊鎖，門衛有嚴格的出入制度，無異於一座監獄、集中營。

當時兒子才只有一週三個月，不能放在家裏，上面又不准請假，妻子只好帶著孩子參加“一打三反”。爲了不影響學習，妻子七十

多歲的奶奶也隨行幫助照顧孩子，另外還帶著尿布、奶瓶和鍋碗瓢勺一應東西。

我擔心著妻子和兒子，回家小住幾天之後，就向母親說明情況到縣城學習班去了。實際上，母親的擔心比我還多——還有大哥也在學習班裏呢。前幾年大哥蒙冤沒少叫她操心，她擔心再節外生枝。

履行了嚴格的登記之後，我找到了妻子的住地。水泥地上一張葦席子和一個用折疊的替換衣服做成的小枕頭就是一個人的鋪位。妻子和奶奶的席子緊挨著，晚上睡覺的時候，兩人把兒子夾在中間，奶瓶、尿布之類就放在枕頭旁。門口牆腳下支著幾塊磚，旁邊堆著一些幹樹枝。這是她們給兒子煮飯用的。

我想找個地方安個臨時的家。在校園裏轉了一圈，我發現東南角有一間被棄置的工具房，裏邊堆滿了殘磚亂瓦，地面上還有幾灘幹了的大便，顯然被人當廁所用過，屋子裏彌漫著尿騷味。我找了一把鍬，剷除那些大便，搬出爛磚碎瓦和其他亂七八糟的東西，又去掉了表面的一層土，這樣便聞不到臊氣了。

F 君大學畢業後被分回碭山縣，當時尚無單位，在學習班裏當廣播員。見了我，她很高興——我們好幾年沒見面了。她幫我找了一張破書桌和一條草毯子，舊書桌放在中間，把小屋子分成裏外兩間。奶奶住在裏邊，給她的席子下墊上那條草毯子，我和妻子帶著孩子睡在外邊的席子上。門口有棵大楊樹，我在樹下支了幾塊磚，當成兒子的“鍋竈”。

我剛把一切收拾好，一個幹部模樣的人來了。

“你是哪個公社的？”他問道。

“唐寨公社，”我不卑不亢地回答。

“你是來參加學習的嗎？”他口氣變得嚴肅起來。

“不是。我是來看老人和孩子的。”

“你的進門證呢？”

我把門衛給我開具的證明出示給他。他仔細地看了一遍，沒有發現問題。

“誰叫你到這裏來住的？”他換了個話題。

“我自己找來的。我怕孩子夜裏哭叫影響別人睡覺。”

“……”他一時不知道該怎麼說。頓了一下，他突然口氣緩和下來，說：“你們帶著老人孩子來參加學習，很不容易，我們應該給安排好。但是，咱們沒有條件。現在你們自己克服了，就這樣住下去吧。”

“謝謝領導關心，”我說。

“關心不夠，還要請你們原諒，”他臉上露出笑容，“只是不要影響學習。”

“領導放心，不會的。”

領導走了，我們在這座破工具房裏安了家。

學習班實行的是軍事化管理，早晨要出操。聽到起床號，妻子就悄悄地在兒子酣睡的時候去跑步、做操。有時候學習班還進行拉練。半夜三更，只要緊急集合號響，不管男女老幼都要在幾分鐘內打好背包站到隊裏，然後隨隊伍跑步到野外，進行如跑步、匍匐前進等軍事訓練。一天夜裏，突然響起緊急集合號，妻子趕忙起床、打背包，不料把兒子從睡夢裏驚醒，摟著妻子大哭不止，我和奶奶怎麼也哄不好他。妻子不忍心，斷然決定把兒子帶上。她把小兒子抱在懷裏，雙肩背著背包，參加跑步拉練。兒子不懂得“軍事紀律”，啼哭不止。帶隊的大聲呵斥：“夜裏拉練不准有聲音，暴露目標要追查責任！”妻子趕緊把兒子的小嘴捂上。就這樣，妻子背著兒子，膽戰心驚地跟著大隊拉練。將近兩個小時後，妻子帶著兒子回來了，大汗淋漓，一半是疲勞，一半是緊張。

在妻子正常的學習時間，我負責帶孩子，奶奶四處撿乾樹葉、枯樹枝，操辦著兒子的吃飯。學習班是絕對不准出去買菜的，來參加學習班前，妻子、大哥、妻叔分工從家裏帶了些麥麵、雞蛋。奶奶就用一隻小鍋架在幾塊磚頭上，仍舊煮“哺雛子”喂兒子，只是在小勺裏多了雞蛋花。這就是兒子一天三頓的伙食。我想著兒子不吃一點菜不行，瞅兒子睡著的時候到院牆邊上轉悠，竟然發現不少可吃的野菜：野莧菜、掃帚苗、灰灰菜、馬齒莧等等。我挖回來一小桶，奶奶把它們洗乾淨了，有的吃鮮的，用鹽拌一拌，直接放到“哺雛子”裏；另一些奶奶搓一搓，去掉汁水晾晾，曬成乾菜，準備以後吃。有了這點野菜，兒子的飯食裏增加了些維生素，改善了味道，他吃得更香了。

上午、下午和晚上都集中學習、討論、揭發問題，只有晚飯後與晚上學習的間歇時間學員們才可以走出學習室，放鬆放鬆他們繃緊了的神經。這時候，妻子把她從食堂領來的飯連同給我和奶奶買的飯一起端來，妻子一邊給兒子餵奶一邊吃飯，大哥、妻叔吃過飯後很快過來，我們的大小六口人的小家庭就在我們居住的工具室門口團聚了。大家一起逗兒子玩，爭著給兒子餵飯。我們在夏日的餘暉裏，在緊張不安的氣氛中享受著片刻的天倫之樂。

學習班的氣氛越來越緊張。“要鬥私批修！”“坦白從寬，抗拒從嚴！”之類的口號聲不時傳到這個校園角落的工具房裏，奶奶聽見了，就會問道：“不知道又在鬥誰？”爲了寬她老人家的心，我就說：“不是咱們唐寨的。”再往後，常有人被押著遊“街”示眾的路過我們門口，隨行的隊伍在後邊呼著“堅決打倒 XXX！”、“XXX 不投降就叫他滅亡！”等口號。最慘不忍睹的就是一位披頭散髮的婦女，被人推著搡著，從我們門口遊“街”經過，她身上掛著一串破鞋，牌子上寫著“現行反革命分子、老破鞋 XXX”。也許

是見多了，見慣了，奶奶沒有再問，只是自言自語："這算咋著？唉……"

不久我們聽到消息，別的公社的一位老師在夜裏用剃鬚刀割腕自殺了。他的血漫了半間屋的地面，別人早上起來發現時，他早已斷了氣。第二天晚飯後，大哥和妻叔到我們這裏來的時候就沒有了往日的歡樂，一臉嚴肅。臨走時，避開奶奶，妻子和大哥、妻叔三個人蹲到一叢矮樹的後面低聲嘀咕了什麼。我有一種不祥的預感。果然，第三天晚飯後，大哥就沒有和妻叔一起到我們這裏來。妻子告訴我：大哥已經被隔離了。

妻子還告訴我，那個姓臧的公社帶隊領導以"保衛四清運動偉大成果"的名義，重新提出了小學教師"姦污幼女"的問題，而且他們把那些當年"被姦污的幼女"請到學習班來，要她們再寫材料，重新整理衝破"資反路線"時被燒掉的材料。這使得那六十來個當年被誣爲"姦污幼女"的老師誠惶誠恐。不過，這些女孩子又長大了幾歲，誘供的人也可能沒有王守萍"得法"，只有個別人寫了"檢舉"，大哥不幸在三個被"檢舉"者之中。妻子和妻叔知道後，擔心大哥膽子小，經不住恐嚇，安排他"一定咬死口"，不要屈打成招。

唐寨的學習班也已進入高潮：鬥爭三個"姦污幼女"的老師李世隆（我大哥）、唐世堅和唐世儀。在會上，帶隊的聲稱他們已經搞到了檢舉材料，然後發動群眾哄鬥，要他們招供。大家也明知道女孩寫的材料是假的，也沒有人相信他們所說的"事實"，但鬥爭會上誰也不敢明說，仍然要爭先恐後地發言鬥爭他們。妻子和妻叔已不能與大哥接觸，只好在大會上舉手發言明話暗說。妻叔說："李世隆，你要老實點！要實事求是，決不准許你欺騙群眾欺騙黨。你要記住：欺騙群眾欺騙黨要罪加一等！"妻子也在會上發言："李世隆，你要好好學學偉大領袖毛主席的教導：'我們要相信群眾，

我們要相信黨，這是兩條基本的原理。’你過去犯過很多錯誤，都是因爲你沒學好毛主席著作，不相信群眾，不相信黨。”每一個時代都會造就出新的積極分子，個別的人以咄咄逼人的口氣責問：“你不承認，人家女孩子怎麼不檢舉別人？你知道黨的一貫政策嗎？坦白從寬，抗拒從嚴！”接著就會有人領著高呼口號：“打倒李世隆！”“頑固到底死路一條！”“……！”

學習班裏的氣氛還能讓人忍受，隔離室裏的日子則令人欲生不得、欲死不能。自從發生了割腕自殺的事件之後，凡是被懷疑有問題的都被隔離開來，專人看管。隔離室設在校園最南面的一座二層樓上，裏面的專案組成員全部是工宣隊的。他們有他們的特殊本領，不怕你不招。他們分成三班，二十四小時輪番熬你，只給你飯吃，不讓你睡覺。連續三天三夜下來，即使你是個鐵人、鋼人，也被他們磨軟了。大哥後來回憶說：“那個時候，你身心都不由己，叫承認什麼承認什麼，叫怎麼寫怎麼寫，哪怕第二天拉出去槍斃也不願意再受那個罪了。”唐世儀出身地主，不敢反抗，首先招了，大哥接著也寫了“交待”。唐世堅自恃年輕剛強，決心“頑抗”到底，但最後還是走了“坦白從寬”的路。

學習班結束了，其他老師都回去上課了，大哥和唐世堅、唐世儀被留了下來，轉送到縣東關黨校“一打三反總指揮部”。

二〇〇七年十月七日我把《碭山縣誌》中關於這段歷史的記載讀給唐世堅聽：1970 年 7 月，縣革委會舉辦第六期毛澤東思想學習班，集中全縣中小學教師於碭（山）中（學），開展“一打三反”運動，有 2 人自殺，被打成叛徒、自首變節分子、歷史反革命和現行反革命分子的有 200 多人。

“有二人自殺？”唐世堅反問道，“有十人都不止！縣誌記載不實。”接著，唐世堅追敘了當時的情景：“他們也想引導我自殺，特意帶我去看了一個人的自殺現場。那個人是割腕自殺的，鮮血流

了一地，把鋪地的磚都殷紅了。工宣隊的一個人啓發我說：‘像他這樣一死，啥罪都不用受了，啥事也都沒有了，多乾脆。’我說：‘我不死，堅決不死。我自殺了就沒有人能把我的問題說清。我要活著把我自己洗清。’”

回到家裏，母親問我大哥咋沒回來，我只好支吾其詞說：“晚幾天就會回來的。”當時開學在即，我必須返回懷遠縣徐圩中學。臨行時，我對母親和嫂子說：“大哥的工資照發，上邊叫他再說明一些問題就把他放回來了。你們別著急，好好過日子。”

我雖然經過了幾年文化大革命的洗禮，成熟了不少，但仍然很幼稚。我當時確實相信，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我認爲當時的碭山領導人是在爲“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翻案，這是爲毛主席的革命路線所不容的。這是個路線問題，是大是大非問題，所以，回到學校後，我就以當年捍衛毛主席革命路線的熱情向毛主席、周總理、省革委會主任李德生、新提拔的省公檢法負責人吳從樹等各級領導寫信反映這一問題。但，碭山縣“一打三反總指揮部”對他們不審也不放，一直壓著。一拖就是幾個月，轉眼寒假到了。回家的途中，我先去了宿縣。

邢淩初的父親被審查後，否定了“叛徒”問題，被同級下調至宿縣，任宿縣地區文教局副局長。病急亂投醫，我找到了邢叔叔。叔叔對碭山的做法很憤慨，立刻帶我找了地區中級法院錢院長。錢院長是邢叔叔的好朋友，文革中也受到衝擊，問題澄清後，與邢叔叔一起從省委黨校下調來到宿縣地區。錢院長一聽我講到我大哥李世隆的名字，不等我往下講就說：“這個事情我知道，你寫到上邊的信很多轉到我這裏來了。但我現在沒辦法，因爲案卷沒轉到中級法院來。碭山有兩條路：要麼放人，要麼報捕。放了人咱們什麼都

不說，如果報捕，我這邊就可以把住。咱們再等等吧。”聽了錢院長的話，我心裏踏實了。

到了家裏，母親的雙眼明顯凹下去了，半年裏好像老了很多。嫂子也比先前瘦了。母親見了我，沒有說話先掉了淚：“您哥啥時候能回來啊？”我把錢院長的話變成淺顯的意思告訴她，安慰她說：“有上邊把住關，不會有啥事的。”

“從那時候不就說沒啥事嗎？咋的到如今不放人呢？你不在家，沒有您哥，我……我……”母親說不下去了。

“我明天就到縣裏去看俺哥，”我趕緊說。

“去吧，給人家說說看，能叫您哥回來過個年不，”母親止住了眼淚。

第二天，我和妻子一起到縣裏看望大哥。“一打三反總指揮部”姓于的負責人對我們態度蠻好，他向我們表示了一種無奈：“學習班整的材料能叫人相信嗎？但上面一直沒有人來審查過問。我們也覺得應該把人放掉，整齊材料再逮，但縣裏不同意。聽說你們唐寨公社的領導一直有人在盯這個案子。”他讓人叫大哥出來跟我們見了面。

大哥這時倒是比在學習班時鎮定了許多。我們說了些“官話”，告訴他母親身體很好，嫂子和孩子也很好，叫他放心。我們又安排他注意身體。臨了又叮囑他：千萬相信群眾，相信黨，黨不會冤枉一個好人的，等等。大哥囑咐我們叫母親不要掛心他，全家人好好過年，要不了多久就會回來的。我們的會見持續了二十多分鐘，謝過了于主任，就告辭了。想不到此次一別竟是六年。

母親見大哥沒有和我們一起回來，少不了又是一陣傷心。我們告訴他我們見到了大哥，大哥身體很好，她才止住了淚。我們趕緊把大哥安排的話給她說了，她用肩上的家織毛巾擦擦臉，說：“啥

時候您哥來家了，我就不掛心了。”哪知道，她老人家到死也沒見到她的大兒子。

爲了讓全家歡歡樂樂過個年，年前我儘量多操辦了些年貨，大年初一，我們和嫂子兩家合到一起吃了一頓餃子。我們有十年沒在一起吃飯了。

年後回到我任教的學校裏，心卻在家裏。家裏上有老，下有小，大哥被關著，還有神經不正常的二哥，我如何安得下心？好在那時候教學很不正規，老師領著學生瞎混，給了我寫信上訪的時間。

聽說，唐世堅在“一打三反總指揮部”裏很不“老實”，四處寫信指名道姓地告胡修道、李容穩和唐寨公社學習班姓臧的負責人，控訴他們爲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翻案，說碭山縣革委會負責人胡修道和李容穩在執行新的資反路線，理直氣壯地捍衛毛主席的革命路線。這些信件很多最後落到了胡修道和李容穩本人手裏，惹得他們惱羞成怒，引出了更大的悲劇。

轉眼又是幾個月，仍然不見大哥放出來。暑假到了，我又去了宿縣，見了錢院長。錢院長說：“現在碭山情緒很大，就是頂住不放，地區也拿他沒辦法。”頓了一頓，錢院長接著說：“不過，上面有精神，最近要撤銷各地的一打三反機構，我看他還有什麼辦法？”

我頭腦還是太簡單，總把事情往好的方面想，我從錢院長的話裏只聽出了令我高興的話：一打三反機構要撤銷，大哥自然要被放出來。回到家裏，我把這個意思說給母親和全家人聽，全家人都很高興，期盼著大哥的歸來。

我還進一步地計畫了大哥回家後的未來。當時很多碭山籍的老師在懷遠工作，他們的家屬都是農村戶口，沒有工作，很想調回家鄉，但教育局的政策是“一換一”，就是說，如果從碭山調來懷遠一個老師，懷遠才可放回一個碭山籍的老師。一位在懷遠縣工作了

多年的碭山老鄉聽說我妻子也是老師，就主動與我聯繫對調。我慨然應允，因爲一則我想叫妻子離開碭山這個是非之地，也想著讓母親跟著我出來享幾年福。我們通過懷遠、碭山雙方的教育局很快辦好了對調手續，開學後妻子就可來懷遠上班。回到家裏，我把我的決定跟家裏人講了，並跟嫂子商量，叫母親跟我到懷遠帶孩子，讓二哥跟著他們過。嫂子也同意了我的安排。全家人只等著大哥的歸來。

暑假裏，妻子和我都積極地作著調動搬家的準備。妻子給母親買了幾塊布，打算給母親做幾件新衣服，畢竟要出門了。

店裏大嬸和三嬸聽說了我的計畫，都高興地對母親說：“去吧，跟你三兒子享幾年福去。受了一輩子苦，該你享福了。”她們還告訴我：“您娘現在過日子心盛得很，今年分了不少麥，都存著，自己捨不得吃，說要留給孫子吃。”

12. 禍從天降

家裏都安排好了後，我去了縣城。我要把錢院長的意思和我對未來的計畫告訴大哥。進了“一打三反總指揮部”沒見到于主任，另一個滿臉嚴肅的負責人接見了我。

我對這位負責人說：“我大哥已經在這裏關了一年了，如果他有問題，你們應該報上級批准逮捕他，如果沒有問題就應該放人……”

“這兩天你就會知道處理結果。”這位負責人用果斷的口氣打斷了我的話。我當時的理解是：兩天後就可以放出來。

但當我提出見大哥的要求時，卻遭到拒絕。我只好寫了張紙條讓他們給傳進去。這位負責人接過我寫的紙條，仔細看了，吩咐另一個人傳進去。我在紙條上寫的還是那幾句“官話”：要實事求是；

要相信群眾相信黨；家裏一切都好，請他放心；多保重身體；等等。大哥也寫了一張紙條帶出來。那位負責人仔細把紙條看一遍，遞給我。大哥寫的也是"官話"：我一定配合組織把我的問題查清楚，爭取早日回到教育戰線。叫母親千萬保重身體，不要擔心我……

八月二十日，村裏的大喇叭廣播通知社員去公社參加公審大會。我沒把這事放在心上，根本沒想到這事與我有什麼關係。那年頭經常把一些犯人拉到各個公社公審、批判、遊鬥，無非是殺一儆百的意思。不料，半上午去參加會議的大侄女高聲哭著從街上回來："大大，我的大大……"

母親正在摘南瓜花，聽見侄女的哭聲，馬上明白了發生的事。"兒啊，我屈死的兒啊……"母親一邊哭，一邊歪歪扭扭往公社方向走。我拉住母親，想攔住她，但母親卻從我手裏掙開："你別拉我，我要去看看我的兒——我屈死的兒啊……"

這時，嫂子和三個孩子哭作一團。我完全慌了神，不知該怎麼辦。妻子放下懷裏的孩子，趕緊過來幫我拉住母親。"早散會了，人家的汽車早開走了，你找誰去？"這樣母親才停住了腳步，坐到地上，反復哽咽著："我屈死的兒啊……"

鄰居們告訴我，那天的公審會上，我大哥和唐世堅、唐世儀三個人和其他幾個犯人被五花大綁著跪在臺子上，胸前掛著"姦污幼女犯 XXX"的大牌子，宣佈以"姦污幼女"罪逮捕。

那天中午，兩家人都沒吃飯。妻子用給兒子留的白麵煮了點稀飯，又放了點糖，端給母親，母親已經說不出話，無力地搖搖頭。下午，母親就躺倒了，晚飯仍然滴水未進。我極力安慰她："娘，你別難過。在東關指揮部裏他們可以隨便關人，進了拘留所六十天查不出問題來就得放人。"但母親聽了我的話，只是搖頭，淚水順著她刀削一般的臉頰往下流。

店裏大嬸和三嬸都過來了，她們說不出別的話，只說：“嫂子，你得吃飯。咱的孩子咱知道，世隆不是那樣的人，大不了受點罪，早晚就會出來的。”母親聽了，也不說話，還是流淚、搖頭——事情發展到今天這一步，什麼樣的話也騙不了她了。

那一夜母親是怎樣熬過來的我不知道，我徹夜未眠。我做夢沒有想像到事情會變成今天這個樣子。大哥被關進大牢，工資會立即被停掉，這一家老小，今後的日子怎麼過？母親已是七十一歲的人，她能不能挺過這一關？還有嫂子和幾個不懂事的孩子……

第二天早上，母親又晃晃悠悠地起來了。我趕緊上前去，見母親眼皮耷拉著，雙眼徹底癟下去了——母親一定流了一夜的淚，眼睛已經枯了。我問母親想吃點啥，母親輕輕地搖搖頭，指著喉嚨，用極其微弱的聲音說：“我……嗓……嗓子腫了，唾沫都……都咽不下去……”頓了一頓，她又說：“給……給毛毛（我的兒子）熬……熬點糊塗，打……打個雞蛋……”她還在操辦著孫子的事。母親一邊說著，便往鍋門口抱柴火。妻子見狀趕緊往鍋裏兌水，母親坐到鍋門口點火燒起來。剛燒了一會，母親說：“我……我難受得很……”我急忙把母親攙扶到床上。母親過了一輩子苦日子，從來沒有叫過苦說過累，更沒有躺到床上休息過，咬著牙忍，咬著牙挨。母親像是一盞燈，現在是到了油將盡燈將滅的時候了。

我叫大侄女請來村裏的赤腳醫生。醫生看了看母親的喉嚨，說是扁桃體發炎，給了十來片長效磺胺（SMZ）。母親口水都下不去，那裏吃得下那麼大的藥片？無奈，我們把藥片放在碗裏研碎，用水和了，叫母親喝下。母親一輩子沒看過醫生，沒吃過藥，生了病就拖，再加上長效磺胺有一種怪味，藥一到嘴裏就被吐了出來。青黴素當然是最有效的藥，但那時鄉下那裏買得著？我忽然想到了我高中時的學兄胡炳義，他大學畢業後分在南關醫院，他一定能買到青

黴素。我把我的打算給妻子說了後，借了輛自行車奔縣城去了。臨行時，我對母親說：“我到城裏看看俺大哥去，下午就回來。”

母親心裏已經不存任何希望，無力地搖搖頭，又微微地點點頭。

找到了胡炳義，我把家裏發生的事對他一一說了，他很快托人給我買到一盒青黴素。安排我：“老大的事慢慢再說，給大娘看病當緊。”

我還是想著大哥的事。我要去看守所，即使見不上，我也想讓大哥知道我來了縣城，來到了他身邊，我在為他的事奔走。

看守所還在老地方，帶電網的灰色高牆，崗樓上持槍的兵，厚重的大鐵門，這一切我都很熟悉。十一年前二哥被關在這裏時，我曾多次來這裏探監；現在，大哥又被關了進來，而且為了莫須有的罪名！家裏老母親奄奄一息，嫂子和幾個孩子生活無著……想到這裏，我萬箭穿心。

到了看守所，我提出見大哥的要求，被嚴詞拒絕，並被告知：“犯人在判刑以前不允許會見任何人。”我請求遞個紙條，他們答應了。我就著接見室的桌子，寫了一封短信。除了那些套話外，我特意告訴大哥：母親想得開，精神很好。嫂子和孩子們也都好，請他放心。要他配合政府，實事求是，早日把自己的問題查清。

我把紙條遞給門崗，門崗又把它交給接見室的負責人。那位負責人把紙條審查一遍，叫人傳了進去。停了一會兒，那人又傳回來大哥的一張紙條，大意是說：請家裏人放心，我會配合政府實事求是地把問題說清。千萬叫母親保重身體……

我正要折身返回，突然雷聲大作，瓢潑大雨頃刻而至，我的一身單衣瞬間被淋透，渾身往下淌水。我這樣回到家肯定會被凍病，而這個時候是不允許我生病的。我扭轉車頭又找到胡炳義。胡炳義見我濕漉漉全身發抖，就說：“下雨了，走不成了，明天早晨再回

去吧。”我牙齒打著磕說：“不……不行，俺娘等著我的藥呢。你……你給我找件褂子穿吧。”

胡炳義給我翻出來一件粗布褂子。胡炳義塊頭比我大得多，褂子穿在我身上又肥又長，很不合身，但它可以禦寒。我顧不了許多，蹬開自行車上了路。

我迎著風頂著雨一路飛騎，半下午到了家。到了院門口，先看見了店裏大嬸和三嬸。沒等我說話，大嬸就說：“世華，您娘的病不輕。吃一口吐一口，我怕……該操辦的操辦吧，別到時候……”說著說著，大嬸先掉了淚，“我叫您嫂和彩霞先把衣服操辦好，你進去看看吧。”

我進了屋，嫂子和妻子正在母親的床前給母親做著壽衣。我蹲到母親床前，一隻手扒著床沿，對母親說：“娘，我回來了。我見著俺哥了，他的問題馬上就可以弄清楚，頂多兩個月就能回來了。他那裏吃得很好，叫你不要擔心他。”母親聽我說著，只是流淚，微微地搖頭，什麼也不說。我掏出青黴素，又接著說：“這藥是特效藥，我找醫生給你打下去，你的喉嚨馬上就好了。”我出門找大侄女請醫生來打針，迎面碰上王作軍。王作軍把我拉到嫂子的院子裏，店裏大叔已經在那裏等我了。

“世華，我問你句話：你有錢嗎？”大叔劈頭問我。

“沒有，”我說，“現在已經到月底，俺兩個人的工資都花得差不多了。昨天又買了藥，就剩下十來塊錢了。”

大叔望著我的臉，一字一板地說：“世華，給你說實話，您娘七十多歲的人了，兩三天不進滴水，咱得操辦後事了。”

一聽這話，我“哇”的一聲哭了起來。

“別哭，孩子，現在不是哭的時候。咱先得把事情商量好。”大叔接著說，“您大哥出了事，你二哥迂迂磨磨，啥事得靠你拿主意了。實話告訴你，辦後事十來塊錢是不夠的，光一副棺材就得百

十塊，還有孝衣、孝帽，不請別人，咱自家的親戚也有七、八桌，還得百十塊。我替你算過了，沒有三百塊錢咱家的事辦不過去——你能借到三百塊錢嗎？”

我一時傻了：我那裏借三百塊錢去？那個年頭誰家有錢？借十塊錢都難。我相信了以前聽到過的賣身葬父的故事。窮人活不好，死也死不起。

見我犯難，王作軍插話了：“咱們兩家就隔一個坑，您家有多少家底我也知道，你家的事也是我家的事。我替你拿個主意：院子裏這棵大泡桐樹，刨下來夠棺材了，這就解決了大問題。您嫂家喂的那隻母羊，到這個時候，咱也不指望它生小羊賺錢了，殺了它七、八桌的主菜就有了。這兩樣就省了大頭。你跟大嫂商量商量，看他捨得捨不得。”

我把嫂子喊來，作軍又把他的想法說了一遍。到這個時候了，還有什麼捨不得的？嫂子同意了。

作軍接著說：“我要的就是你們的這個准話。不過，孝衣、煙酒、素菜還得小百十塊錢，你還得趕緊想辦法。你們答應了刨樹、殺羊，該幹什麼我們就安排幹什麼，你抓緊時間另外操辦錢去。”

我突然想起放暑假的時候，校長給了李長秋二百塊錢，要他返校經過蚌埠時買架手風琴，配給校毛澤東思想宣傳隊。也許這二百塊錢他還沒用呢。不管怎麼樣，我得跑一趟。我跟妻子說明了情況，安排好打針的事，跨上車子就往李長秋家騎去。

我和李長秋是老鄉，又一起分到徐圩中學，關係自然近些。當時學校沒有校舍，我們兩個住在公社院裏一間小屋裏。他告訴過我他家住在關帝廟公社（當年改作紅旗公社）的徐莊村。但，從我家往徐莊該怎麼走？我不知道，只知道關帝廟在我家西南四十來裏的地方。出了大南門我就上西南，一路走一路問，進了關帝廟的地盤我再問徐莊，天黑的時候，我居然找到了李長秋。

李長秋見了我大爲詫異。我見面第一句話就問：“手風琴你買了嗎？”

他滿臉狐疑：“你問這幹啥？”

我說明了來意。

“沒有。我打算回校時經過蚌埠再買，錢還在我這裏。”

我心上的石頭落了地。我把最近家裏發生的事給他說了一遍，然後說：“我覺著打幾針青黴素後，俺娘的病能好。那樣，這個錢我就用不著，手風琴我負責買；要是真用掉了這個錢，我也設法儘早還上，決不讓你中間爲難。”

當晚，長秋留我過了夜。長秋的父親、母親熱情地招待了我，烙烙饃炒雞蛋，還拿出了一瓶酒。吃飯的時候，我一邊哽咽著訴說最近發生的一連串的不幸，一邊吞咽著食物，長秋和兩位老人都爲我的不幸難過。看到他們家平平安安地過日子，我非常羨慕。平安是福，我那時對這句話體會最深刻。我真的不理解，爲什麼我家，如梵高所說，苦難沒有終結？

第二天天濛濛亮，叔叔嬸嬸兩位老人早早地起來做飯。吃飯的時候，兩位老人寬慰我說：“打了幾針青黴素，您娘的病該能好了。事情該咋辦咋辦，要想開，不要難過。”我拿著那二百塊錢揮淚與他們告別。

回到家的時候，我們家的那棵大泡桐樹已經放倒了，老木匠李守文的兒子李保君大哥正帶著幾個人放線破板。那棵大泡桐樹還是我父親栽的，它是十多年風風雨雨家道興衰的見證。它矗立在院子中間，撐起了半邊天，爲我們遮風擋雨。如今，沒有了這棵樹，就像塌了半個天。

我把借來的錢一把交給作軍和店裏大叔，請他們安排。大叔說：“我年紀大了，頭腦不清楚，錢交給作軍，大事我拿主意。”

妻子告訴我，打了青黴素仍然不見效，母親又是一天沒吃東西，心裏渴，要喝水，可是喝了水就吐。喉嚨裏有痰，吐又吐不出來。

我走到母親床邊，一條腿跪著，拉住母親乾癟的手。我再也想不出什麼話安慰她，又不敢當著他老人家的面難過，看著母親暗淡無神的雙眼，忍住眼淚往肚子裏咽。屋子裏好幾位左鄰右舍的嬸子大娘，她們都是來看母親的，有的手裏提著一手巾雞蛋，有的端著一瓢麥麵，有的拎著一包紅糖。放下東西，她們就幫著嫂子和妻子縫衣服。妻子前幾天爲母親買的幾件衣料派上了用場。母親心裏一定明白這些人在忙什麼，也知道可能將要發生的事。她忽然欠起身子，我忙扶住，問她想吃什麼。“毛……毛毛……”母親從喉嚨眼裏擠出一絲聲音。妻子知道她要看孫子，忙把兒子抱過來。母親久久抓住孫子的小手不放，眼裏滲出一滴滴露珠般的淚水。

打針的醫生來了，我們扶著母親側身，掀起衣服，露出的淨是皮和骨頭。醫生感到發愁：她半天找不到下針的地方。

等醫生走了，王念昌抓住我的手把我從屋里拉出來。“青黴素打了兩天了，也不見效。大娘這麼大年紀拖不起，我看咱們送公社醫院吧。”

一句話提醒了我。正巧妻舅來看母親，我就讓他把兒子抱到岳母家，以便我們一心一意伺候母親看病。作軍招呼了幾個人，把母親睡的小軟床四個角拴上繩子，穿上扁擔，擡著就往公社醫院去。我和妻子、大侄女、侄兒拿著水瓶、臉盆、小鍋跟在後邊。到了醫院，醫生給母親聽了聽心音，看了嗓子，然後收進病房。住院部的醫生另外給開了藥，又把我沒有用完的青黴素接著打了。那一夜，母親仍然不吃也不喝，也沒有任何動靜，我們就著微弱的燈光看到，母親的眼角時而滲出點點滴滴細小的淚珠。我想，母親的思想一定在經歷著最痛苦的煎熬。苦熬了這麼多年，好容易盼出了頭，看到

了生活的希望，然而她卻沒有享受的福分，眼見得就要與這一切撒手而別，還有關在大牢裏的兒子……

天亮了，母親卻沒有任何好轉的跡象，還是不吃也不喝，雙眼緊閉，喉嚨裏發出微弱的“齁齁”聲。我一直緊抓住著母親的手，怕她頃刻間離我們而去。我能感到母親的脈在輕微搏動，我默默地盼望著奇跡的出現。

查房的醫生來了，他看了母親的喉嚨，用聽診器聽了聽，摸了摸脈，問了情況，然後嚴肅地對我們說：“老人家情況不太好，我建議您們轉到縣醫院吧，那裏各方面條件都好些。”

醫生的話就是聖旨，是我們的救命稻草。對侄兒、侄女稍作安排後，我和妻子趕緊回家找人，做轉院的準備。那時沒有汽車，末班火車也開過了，將近五十里的路程完全要步行。作軍找了八個人，分成兩班，打算連夜用小床擡著母親送到縣城。我和妻子又做了些生活方面的準備，就和那八個年輕人一起往醫院去。走到醫院院牆後面，傳來一片哭聲，我心頭一陣緊張，不由得加快腳步。進了醫院，一眼看見侄兒、侄女跪在母親床前大哭：“奶奶，奶奶，我苦命的奶奶……”。我的頭腦“嗡”的一聲，腿立刻軟了，一下子癱倒在母親床前……

幾個年輕人見狀也落了淚。他們把母親移到小床上，作軍把我從地上攙起，雙手架著我，侄女抱著妻子的胳膊，全家人呼天喊地哭著往回走。萬萬沒有想到，我們把母親活著擡來，卻……

母親去世的消息迅速傳遍全村。如同接到了無形的命令，家家戶戶男男女女都撂下手裏的活從四面八方往我家跑，我家偌大的院子霎時擠滿了人。母親的床剛一擡進門，歐家的二嬸李瑞蓮就七手八腳把嫂子和妻子前幾天做好的壽衣給母親換上。二嬸常幫村裏人料理喪事，她明白，停的時間長了死者的身子就會變硬，衣服就難

換了。店裏大叔搬了條板凳往院子中間一坐，把作軍叫到身邊當副手，王念昌也自覺地搬了張方凳子坐到旁邊。這樣，一個自發組成的“治喪委員會”就成立了，並開始“主事”。王念昌是個有文化的人，主持這樣的喪事，少不了他這樣的秀才。我們家鄉的規矩：家裏死了人，“事主”只管把錢交給主事，裏裏外外的事都由主事人去辦，“事主”的責任就是磕頭謝客守靈。我們全家的人在院子裏轉著給眾人磕頭，無論長輩的、同輩的還是晚輩的，也無論年齡比我們大的，還是年齡比我們小的，凡是來幫忙的，我們都要一律給磕頭。

在幾位主事的吩咐下，滿院子的人很快各忙各的去了，殺羊的殺羊，安客（通知親戚）的安客，支鍋的支鍋，挑水的挑水，買菜的買菜……很快，白布買來了。歐二嬸最是頭腦清楚、手腳麻利的人，需要多少孝衣、孝帽、孝手巾，布怎麼裁，衣怎麼縫，她心裏明明白白。嬸子大娘姐姐嫂嫂們在她的指揮下各司其職。不大會，我們都穿上了孝衣，披麻戴孝跪在母親床邊燒紙痛哭……

母親靜靜地躺著，我感到母親的手漸漸涼了。我知道，母親已經走了，越走越遠了，永遠地離我們而去了。母親辛苦用一雙小腳走過了坎坎坷坷的七十一年，終於，這盞燈油盡了，燈滅了。母親把我養到了二十八歲，她帶著我跑過日本鬼子的反，護著我在地窖裏躲國民黨飛機的轟炸，在父親、祖父、叔叔、嬸母相繼辭世後的最困難的歲月裏，母親是我活下來的精神支柱，我們娘兒倆相依為命，度過了一個又一個劫難，沒想到她沒有躲過文化大革命這場風浪……我無數次地擘畫著讓母親過一個幸福的晚年，然而，就在我剛剛有能力回報她的哺育之恩的時候，她卻走了。晚了，“子欲養而親不待”，一切都來不及了。我越想越難過，跪在母親身邊號啕大哭……

姨媽家的大表姐第一時間趕來奔喪。“姨呀，我苦命的姨呀……”她跪在母親床前大放悲聲。燒完了紙錢，她掀開母親臉上的黃表紙，母親的雙眼睜著。“姨呀，我可憐的姨，你到死都沒合眼呀……”她一邊哭，一邊用手輕輕地從上而下撫了一下，母親的眼還是不閉。“姨呀，我的姨呀，你閉上眼吧，你小兒子也長大了，也有了孫子了……”

是啊，母親怎麼能閉眼呢？她至死沒見到她的大兒子，她是要等著見她的大兒子！

親戚們紛紛地來到了。我頭腦亂得很，究竟來了誰，我也說不清，只知道每來一位客人，在他們燒紙磕頭的時候我要陪著磕頭痛哭。

入夜，幫忙的人們都陸續回家休息了，院子裏稍微安靜了下來。三位主事坐在院子裏商量著明天的事，李保君帶著他的徒弟還在加班。他們承擔著最重要的工作，三四天來，一直在沒日沒夜地幹著，而且必須在明天入殮儀式前把棺材做好。我和嫂子、二哥和侄兒、侄女——我們在家所有的人——穿者孝衣孝袍躺在母親身邊鋪滿麥草的地上上守靈。

那一夜，我想得很多。母親走了，給我留下了終生的遺憾。現在，大哥被關著，工資被停了，我在外地工作，妻子也將隨我調走，留下嫂子他們孤兒寡母怎麼生活呢？誰能替我們照顧兒子？我借的這二百塊錢靠什麼來還？以後我要怎麼去告狀？……我頃刻間感到了肩上的千斤重擔：我必須責無旁貸地接過大哥肩上的擔子，帶領全家熬過難關，儘管我並不知道何時是個頭。娘啊，我的親娘，你怎麼能在這個時候離開我們呢？

第二天，鄰居們成群結隊地來燒紙，沖屋門用幾根棍子和箔搭起來的靈堂前不時地升騰起陣陣哭聲。“我的嫂啊，我苦命的嫂……”我們擡起頭，見是遠路的二姑來了，“眼見得……三兒長

大能掙錢了，你該享福了，你……你走了，你怎麼這麼沒福呢？你怎麼這……這麼命苦呢？我的嫂啊……”她哭得特別傷心。一直孝順著她的娘家侄兒被關起來，娘家嫂子死去，她怎麼也不能想像爲什麼災禍會接二連三向我們家襲來。

快要入殮的時候，亮亮的太陽，一片雲彩飄過，竟然“嘩嘩”地下起大雨。表姐說：“好雨，好雨！老天爺有眼，知道俺姨一輩子行好，知道世隆兄弟有冤，老天爺都哭了。”

入殮的時刻到了。這是我們向母親最後告別的時刻，我們全家起立看著眾人把母親放入棺材，當保君哥把棺材板最後蓋上時，我不顧別人的攔阻，哭著往棺材上撞頭，妻子和嫂子或捶胸頓足或以頭撞地，侄兒侄女哭作一團……

正在喪事有條不紊地進行的時候，有人傳來治安委員吳中新的話：李世隆剛剛被法辦，李世華又在家大辦喪事，不突出政治，搞封建迷信。那幾個主事的沒有一個乾淨的，要是再出了政治問題，他李世華就吃不了啦……

一聽這話，很多人怕了：那個時候，說有事就有事，沒有事也能生出事來。店裏二叔和王念昌一九六〇年都因多吃多占被勞教過，王作軍也因把“打倒毛傳明”的大字報錯寫成“打倒毛主席”的被關過。一時，他們都沒了主意。店裏大叔先打了退堂鼓：“我年紀大了，腦子本來不清楚，熬了幾個夜，受不了了，你們兩個操辦著把事辦完吧。”王作軍和王念昌見勢一齊說：“你老人家不在這裏拿主意，我們啥事也辦不成。你不幹我們也不能幹。”滿院子的人散去了一半。

王福林叔是村裏有名的天不怕地不怕的人物，他是王福雨叔的同胞親兄弟。聽說了這個情況，他挺身而出：“當幹部的有沒有爹娘？他家出不出殯？我們一不請喇叭，二不大辦，自家的客來了還

能不管飯吃？我們搞啥迷信了？總不能連個紙錢也不讓燒吧？大叔，還有作軍、念昌，你們一個都不能走，該咋辦咋辦，有事算我的。家裏死了人總不能不讓埋，要講理我跟他講理去！再說，不爲死的爲活的，世華是個剛畢業的學生，鄉裏的啥規矩都不懂，咱不能讓人家死了娘都埋不掉吧？”

有了福林叔一番話，三位主事穩住了，一切才得以繼續下去。我抽空從靈堂裏出來給幾位主事又一一磕了頭，說：“謝謝兩位叔叔兩位哥哥。既然有這話，咱就一切從簡吧，能省掉的就省掉，免得生事。”

福林叔果斷地說：“你放心，世華，明天照常出殯。”

第二天，照常出殯了。福林叔走在最前面，手扶著棺材，後退著指揮送葬的隊伍。二哥、我和嫂子、妻子領著一個侄兒兩個侄女緊跟在棺材後邊，後邊是各位親戚。沒有送葬的樂隊，沒有鞭炮，只有福林叔的吆喝聲和我們全家人及親戚的哭聲。姨母家的二表哥拉著我，嫂子和妻子也分別由親戚攙扶著，我三步一跪倒，兩步一跪倒，頻頻地下跪磕頭。我給我的母親磕頭，爲感謝她的養育深恩，爲我沒來得及盡孝的心理缺失，更爲她沒見到大哥死不瞑目的遺憾；我給眾多鄉親磕頭，感謝他們在困難中幫助我渡過難關。如果牢獄中的大哥知道母親爲他而死，知道我們此刻正在我母親送葬，他該是多麼痛苦！想到此，我放聲地哭……昨天剛下過雨，路上滿是泥濘，每次下跪我的孝衣都會帶起一片泥水，每次磕頭都在我的額頭上留下一片爛泥。儘管表哥緊緊地拽住我，不讓我過於傷悲，但我還是三步一跪，兩步一跪，好像唯如此我才能對得起母親，對得起大哥，對得起鄉親。我每下跪一次，跟在後面的侄兒侄女也隨著下跪。十一年前，也在這條路上，我跟著大哥把父親送走；今天，

我得領著全家把最後一位長輩送走……我越想越哭得傷心，越更加拼命地頻繁掙脫表哥的手下跪。

我們隨著棺材來到了高頭上。那片荒坡上並排躺著一九六〇年春天二十八天裏死去的四位親人：我的爺爺、我的父親、我的叔叔和我的嬸母。現在，我們要把唯一倖存的老人也送到這裏來。在父親的墳頭旁邊，已經挖好了一個墓穴。我們幾個孝子和親戚們面北跪倒，以頭觸地，放聲痛哭，耳邊響著福林叔指揮把棺材放進墓坑的吆喝，聽著土塊落在棺材板上發出的“啪噠啪嗒”聲……

當所有的客人和鄰居都散盡的時候，剩下兩個空落落的大院子，二哥袖著兩手，滿臉無助——他現在徹底地無依無靠了。因爲母親的死，更因爲大哥不知歸期，因爲以後的生活無著，嫂子睡在草地上不停地哭，侄兒侄女三個孩子偎依在她身旁。“哈哈哈哈……”突然一陣嚇人的笑聲傳來。我一愣，聽出是嫂子，她嗚嗚哭一陣，哈哈笑一陣。我意識到嫂子犯病了：她一個農村婦女承受不住這接二連三的打擊。開學日期在即，我和妻子走了，這個家日子怎麼過呢？我怎麼把大哥救出來呢？我欠的債靠什麼來還呢？倘若嫂子再有個三好兩歹……我不敢往下想。那年，我二十八歲，在我毫無思想準備的情況下，這全家老小病殘的擔子一下子全部落在了我的肩上。

妻弟把兒子送來了，我把兒子抱到我們的小房間裏痛哭了一場。我的兒子啊，你再也看不見想你、盼你、愛你的奶奶了。你的奶奶不捨得吃，還給你省了這麼多的麥子呢。她現在再也不能疼你了。以後到了懷遠誰來帶你呢？我可憐的兒子……

那一夜，我和妻子對著煤油燈，她看著我，我看著她，相對無言。嫂子的哭聲和笑聲時不時地從那邊院子傳過來。我突發奇想：“把兒子留在家裏，暫時不帶走，使嫂子思想有個寄託，或許她的

精神病能好。我明天跟嫂子商量一下，讓二哥跟著她吃飯，掙的工分也給她，兩家合成一家。現在沒有別的辦法了，只有這樣。”妻子哭了：她怎麼能捨得自己差點用生命換來的兒子離開她呢？但最後，她還是忍痛說：“事情到了這樣，你說咋辦就咋辦吧。”

第二天，我把我的想法跟嫂子說了，嫂子很高興我們把孩子留在家裏。嫂子年輕時對自己的孩子不好，時常打罵，母親爲此不知跟她吵過多少次架，但對於我的兒子，她卻十分喜歡，常把好吃的東西藏著給兒子留著。說到讓二哥跟她吃飯時，她也答應了，但話有點勉強：“也只有這樣了。”

喪事辦完後，王念昌把親戚給的禮錢和那二百塊錢所剩的錢一把交給了我，一共六十塊錢。爲了還學校的帳，妻子把她妹婿準備蓋房子的一百塊錢借了來，湊夠了一百六十塊錢。

諸事安排好後，八月三十一日的下午，我們離家到懷遠上班去了。出門的時候，兒子正在睡午覺。妻子在兒子的小臉上親了又親，然後一擡頭含著淚回身離開了。王作軍拉著一個平板車送我們上車站，我和妻子默默地跟在後邊。車上拉著妻子陪嫁的裝著我們兩人衣物的小衣櫃、我們繼承的母親的小方桌——那還是嬸母死後留下的，還有王作軍送給我們的他新刮制的一條桑木扁擔。

我們走到大南門口的時候，我扭頭望瞭望那一排墳頭。撫養我長大的幾位長輩都靜靜地躺在這裏。他們是在目送著我？還是期盼著我再回來？我的淚水唰唰地流下來，我頻頻回頭，直到那三座墳塋消失在我的淚眼裏。妻子一直低著頭跟在車子後邊，一句話也不說，一直抹著不斷湧出的淚水。我知道她在惦念著自己的兒子：兒子醒了沒有？兒子醒了會哭著找媽媽嗎？……

14・漫漫伸冤路

我們在徐圩中學的一間茅草屋裏臨時安了家。我把手裏的一百六十塊錢交給校長，向他說明了情況，答應每月從我們的工資中扣除十元，分四個月還清下餘的四十塊錢。校長滿臉的不高興，沒有買到手風琴會影響毛澤東思想宣傳隊的工作；但，人人都有爹娘，這種特殊情況不是經常有的，他也沒有苛責我。

那時，我的工資是四十三元五角，妻子的工資是三十四元五角，總共七十八元。除掉還學校的欠款外，我還要每月扣出十元錢還妻子妹婿的錢——人家等著蓋房子用呢。妻子家裏上有奶奶、父母，下有弟弟妹妹，每個月要給他們十元；大哥的工資沒有了，嫂子帶著自己的幾個孩子和我的兒子，生活沒有依靠，我每月也給他們十元；大哥在大牢裏，雖然有人管吃，零用錢總是需要的，每月寄去五元。這樣一來，留給我們的生活費用只有三十元，買過米麵之後，所剩無幾。那幾個月裏，我們每日一天三頓饃饃就鹹菜、鹹菜就饃饃，連青菜也不敢買。我們的學生不理解我們何以過著這種清貧的生活，時不時地有同學從家裏給我們帶點紅芋、紅芋片、玉米麵、胡蘿蔔、白菜等送給我們。半年之後，我們還清了所有的欠賬。爲了生活上方便，教育局應我們要求把我們調到龍亢初中。

學校雖然換了，教的書是一樣的。英語第一課是“Long live Chairman Mao! A long，long life to him！”（毛主席萬歲，萬萬歲！）課堂上不講語法，不教辭彙，只教毛主席語錄，如：“Serve the people”（爲人民服務）、“Learn fromComrade Lei Feng”（向雷鋒同志學習），等等。另外，學校還讓我兼任了政治課。那時距林彪事件不久，政治教材全是批判林彪“五七一工程紀要”的東西。

一九七三年七月十日河南省唐河縣發生了馬振扶中學事件。中學生張玉勤在英語考試白卷上寫道：“我是中國人，何必學外文，不學 ABCD，也能當接班人，接好革命班，埋葬帝修反。”我的英語課被叫停了，讓我改教體育。於是乎，身高只有一米六、體質孱弱、

中學時體育從來沒及格的我當上了體育教師。龍亢人喜歡籃球，上課時我把兩個籃球交給學生，我看著他們玩就行了。

那一年是教育領域的多事之秋，有的是風聲雨聲，沒有了讀書聲；倒是家事國事天下事，我事事關心。不久，又爆出了勇於交白卷的“反潮流英雄”張鐵生和黃帥日記，中央連發文件，組織學校師生揭露修正主義教育路線“復辟回潮”。那些調皮搗蛋受過老師批評的學生貼出大字報，紛紛“揭發”我們的“問題”。一時間，我感到又回到了文革初期，接受著學生們的“炮轟”。教學不能認真了，教育質量可以不要了，學生犯了錯誤也不要批評了，只要學生高興就行，我們昧著良心領著學生混日子。但這正好給了我寫信上訪伸冤的時間。

大哥是個老實人，我擔心他精神上受不了那種鐵窗生活的折磨，經常寫信安慰他。爲了掩護自己，那些信都是以我侄女的口氣模仿著童體字寫成的，在信裏編織著各種美麗的圖畫“騙”他。

“父親大人：

你好嗎？身體健康嗎？精神愉快嗎？爲了照顧奶奶，嬸嬸暫時沒有調動工作。毛毛弟弟長得很可愛，我們全家人都很喜歡他。有他在家裏，奶奶精神很愉快，身體很健康，天天帶著弟弟玩。

“我們都漸漸長大了，能幫助母親幹活了，所以秋天分的糧食比往年多。對家裏，你完全不用操心。

“上次叔叔給你寄的五元錢收到了嗎？叔叔說，他每月都給你寄，該花的你就花，不要不捨得。你在那裏生活好了，身體好了，我們全家就都放心了。天冷了，您要注意及時增加衣服。

“對自己的問題，一定要配合政府實事求是講清楚，千萬不要欺騙上級。我們都盼著你早日回來。

女兒 瑞萍”

瑞萍是小紅的學名。不久，小紅就把大哥寫的回信轉給我。

“瑞萍女兒：

“來信收到。知道你奶奶身體健康，我很高興。她年紀大了，你叔叔又不在家，你們要多多關心她。

“我在這裏吃得很好，能吃飽飯，菜也很豐富。白天我可以看看報紙，也可以在房間裏散步，鍛煉身體。中間我們都出來曬太陽。生活很有規律。

“你叔叔寄的錢收到了，上個月寄的錢還沒花完，叫他下個月不要再寄了。

“你們安排我的話我會記住的。我一定牢記毛主席他老人家的教導，相信群眾，相信黨，積極主動配合政府，把我的事情說清楚。

“祝全家好！

父字”

這樣的信件往來一直持續到六年半後大哥被釋放出獄，信裏一直重複著諸如此類美麗的謊言。後來大哥告訴我們說，他能看得出我寫的每一封信，但卻一直不敢想像家裏發生的悲劇。

不知聽哪一位公安人員說過，拘留不能超過兩個月。兩個月內查不到證據，就必須放人。我對這點深信不疑。公檢法關係著人民的生死，肯定是最講政策的。我還是過於幼稚，學生氣十足。直到四十年後的今天，被無辜羈押長達數年乃至十多年的時而見於報端。兩個月過去了，三個月過去了，半年過去了，一直不見大哥被放出來。我有點著急了。這時，嫂子的娘家侄子來到徐圩中學找我，說他的弟弟丁道民在合肥市公安局當科長，准能幫上忙。我信了他

的話，給了他來回路費和十來斤全國通用糧票，又給他買了兩瓶小磨麻油，讓他去打點有關人員。幾個月過去了，不見任何消息。

我自己開始踏上漫漫的伸冤之路。放寒假的時候，我親自去合肥找了丁道民。丁道民告訴我，他與省公安廳說不上話，只跟信訪科的徐科長熟悉。他寫了個條子讓我自己去找徐科長。

省公安廳兩間信訪接待室外邊排著長長的隊伍，裏面擠滿了各地前來告狀的人。有的邊排隊邊啃著涼饃，有的坐在自帶的鋪蓋上，隊伍中還有抱著孩子的婦女。一個工作人員按先後順序給每個人發了個號頭，叫大家在外邊等待，聽候呼叫，兩個接待員在裏邊的房間裏負責接談。我打聽清楚了哪位是徐科長，與我後面的一位交換了號碼，確保能見到徐科長。

等了整整一上午，才喊到我的號。見了徐科長，我先遞上丁道民的條子，然後呈上我的材料。徐科長看了丁道民寫的條子，點燃一支煙，眼睛盯著我看了半天，不看材料也不說話。我也不說話，也把眼睛盯著他。當那只煙差不多被抽完的時候，他慢慢地開口了："你們家屬往上邊寫了很多信，我都看見了。現在，省裏對李世隆的問題很重視，但碭山縣阻力很大。你看這樣好不好，我們繼續向上邊領導反映，再給宿縣地區聯繫聯繫，催催他們，爭取讓地區出面解決。我給你寫封信，你拿著去找找地區。"

我謝過徐科長，握著他給我寫的條子，直接去了宿縣。錢院長見了我憤憤地說："碭山真是個針也插不進、水也潑不進的鬼地方，地區出面催了幾次放人，人家就是不理。你有什麼辦法？你又不能親自跑到看守所去把人拉出來！"說到義憤處，錢院長把桌子拍得"啪啪"響。錢院長緩了口氣，又說："再等等吧，我們再繼續做工作。"

一九七四年夏天，三十歲的唐世堅在被關了三年之後，患了重病，被保外就醫。出獄的時候，他是被用小軟床擡出來的。我一個月後見到他時，他胸腔嚴重積水，呼吸十分困難，一句話要喘幾口氣才能說完。不久，我聽說唐世儀死在監獄裏。

我心裏頓時緊張起來。我更加擔心大哥。大哥萬一有個三長兩短，患病的嫂子……未成年的侄兒侄女……我不敢往下想。既然上邊做不好工作，我得設法儘早把大哥從監獄裏救出來，無論以什麼名義，監外執行也好，保外就醫也行，總之要讓大哥從監獄裏出來，不能讓他們無休止地關下去。我開始改變策略：要求保外就醫。我寫了申請，說大哥患有胃病、心臟病、神經官能症等多種疾病，入獄已三年多，病情逐漸加重。因此，要求保外就醫。然後一式三份，分別寄到省公安廳、地區公安處和縣公安局。

不久，我親自到縣公安局，找到了一位姓武的負責人。他鄭重其事地告訴我："你寫給上級的信都轉回來了，領導也有批示。最近，我們給李世隆進行了身體檢查，他沒有大的疾病，不符合保外就醫條件。我們已經給上級寫了答復。"我的努力失敗了。但我並不死心。我又找到了邢叔叔的戰友李阿姨，想通過她擔任縣武裝部長的丈夫跟公安局通融通融。但後來李阿姨回話說，公安局的工作做不通。至此，我的計畫徹底破產。

既然此路不通，我還得走伸冤告狀的路。後來，我打聽到，尙廟有一個人在省公安廳當處長。我買了點麻油、花生米、大青豆之類的土產品去合肥看了尙處長。尙處長對家鄉來人很客氣，請我到家裏吃了飯。吃飯的時候，我跟他講了大哥的事，並給他講了上北京告狀的計畫。尙處長很知心地勸我："上北京？北京告狀的有成千上萬，你能排上隊、掛上號嗎？他們就算接待了你，還不是給你寫個條條，讓你回當地解決？我給你出個主意：上北京不如寫信。

上一趟北京要多少路費？寄一封信才八分錢。給公安部、最高法院寫信，不停地寫，隔幾天給他們寫一封信。雖然公安部、最高法院的領導不能親自看見你的信，但你的每一封信都在他們那裏留一個記錄，時間長了，就會引起領導重視。他們把信轉到省裏來，對省裏就是一個壓力，迫使公安廳出面。我再給信訪科的老徐講講，爭取讓他們親自下去查。”

得了尚處長的話，我開始了長期的韌性的信訪。晚上，趁學校沒人的時候，我用學校裏刻講義的鋼板蠟紙把上訪信刻出來，空出稱呼部分，然後用油印機推出來，一次印上百十份。我又以班裏出壁報的名義領了幾大張道林紙，自製信封。晚上，關上門，我和妻子坐在小飯桌旁開始工作。我先把一大張紙裁成二十四塊，抽出其中的一半，磕齊之後，一次性刷漿糊，一次性剪齊，一下子就可做出十幾個信封來。我們兩個互相配合，一個裁紙一個刷漿糊，流水作業，一兩百個信封一會就做出來了。爲了給收信者增加壓力，在正文的開頭一律寫上“X 月 X 日寫給您的第 N 封信收到了吧？”寄信前，我只需把稱呼和開頭部分的 X 和 N 填起來，最後再署上日期。我一次寄好幾封，從公安部、最高法院、省公安廳、省高級法院到地區公安處、地區中級法院，另外，我還從上至下給周總理、李德生、吳從樹等各寄上一份。

此法果然奏效。四五個月後，尚處長就通過別人捎過話來：省公安廳已經派人到碭山復查此案。我大喜過望，第一時間裏寫信告訴大哥：“咱們南方的客人到碭山來走親戚了。”最後還再三再四安排他：“千萬實事求是，老老實實地對客人說明自己的問題。”大哥對我信裏的暗語心領神會，他在不久的回信裏告訴我：“南方的客人好不容易來了，咱們都要好好接待。”

一晃又是幾個月，仍沒有放人的消息。我又去了省公安廳。到合肥時，天色已晚，早過了下班時間。我心裏急，不願意等到第二

天，便直接去了徐科長家。打了這麼多年交道，老徐跟我很熟了，他沒有因爲我的唐突造訪而表現出任何不高興，反而很客氣地把我引到住室。我知道老徐肯抽煙，把事先買好的兩包“團結”牌香煙放到桌子上。老徐也不見外，自己拆封取出香煙抽了起來。他自己坐到床邊上，示意讓我坐到他旁邊，然後慢慢跟我敍說。老徐沒有任何官腔，直言告訴我：他參加省公安廳和地區公安處組成的聯合調查組去了碭山，認真地找了當事人，重新進行了調查核實，徹底否定了所謂的“姦污幼女”問題。他們要求縣公安局儘早放人，縣公安局答應請示縣委後就放。他斷定碭山不敢再拖了，估計春節前能放出人來。

沒有比這更令我興奮的了。我把這一消息寫信告訴了家裏，囑咐他們大哥一到家馬上給我拍電報。

但是，我又高興得太早了。大哥春節前並未被放出來。我的信訪還得繼續進行。不過，上訪信的內容變了，強調“問題已查清，要求放人”。我又油印了上百封信，一批一批地外寄。

一九七三年夏天，我的第二哥兒子出生了。我仍然奔波在充滿心酸、甚至恐懼不安的上訪路上，在合肥、宿縣、碭山之間來回地穿梭，我們每月的工資要拿出一大塊花在路費和郵資上，家庭生活維持在最低的水平，每天一大早我去一個學生家長開的豆腐房裏打免費的豆漿，中午能吃上豆芽麵條就算是奢侈，魚和肉是不敢想的。即使如此，我們仍入不敷出，常常寅吃卯糧，每月月底，就得從會計那裏借三至五元，讓會計下月發工資時扣除。我們不敢多借，否則下個月會更難過。

我終於病了，被查出肝炎，不久，妻子也被我傳染上了。我們趕緊把大兒子送回老家，免得受感染。那時，岳父家生活極其拮据，岳母因殘疾不能幹活，奶奶年齡大了，一大家子人吃飯，岳父不得

不艱難地維持著生計。現在，兒子寄養到他們這裏，無疑增加了他們的負擔。

一九七四年，大妻弟高中畢業了。他學習成績好，天天做著大學夢，燒鍋做飯時，他一邊拉著風箱一邊看書，岳父看見了，便會憤憤地“哼”一聲。在岳父看來，書中不僅沒有“黃金屋”，連填飽肚皮的饃饃稀飯也沒有，有時還會招惹麻煩，簡直就是“是非窩”。那時，大學招收工農兵學員，不管成績如何，只要地方推薦、上級批准就行。一次又一次，妻弟被大隊推薦上去，一次又一次因爲家庭問題而被打下來。無奈，妻子出面找了大隊幹部，讓妻弟在光明小學當了個代課教師，白天在學校上課，晚上在家裏就著微弱的燈光跟著岳父打蘆葦席子、用蘆葦纓子（乾枯的蘆花）編毛窩子。大妻弟到學校上班的時候，肩上挎個糞箕子，手裏提個尿罐子，一邊走一邊拾糞。到了學校，把尿罐子放到廁所裏，接學生的小便。放學時，把糞箕子和尿罐子帶回來，大糞攢起來賣給隊裏，尿可以直接送到生產隊裏換工分。妻弟站到講臺上給學生講課時，擡頭挺胸，感到很莊嚴神聖；但一天來回四趟挎著糞箕子、提著尿罐子卻感到很掉價，走路時不得不低頭躲著學生。

星期天一大早，岳父帶著妻弟步行十幾裏趕集賣一個星期製作出來的席子、毛窩子。一雙毛窩子能賣五毛錢，一條席子能賣塊把錢。趕到冬天，走了十幾裏又凍了一早晨，妻弟好想要五分錢買個燒餅，或是五毛錢喝碗羊肉湯，但他不敢提，因爲他知道說了也白搭。有一次，大概是被凍透了，他大著膽子說：“大大，我……我想喝……喝碗羊肉湯……”岳父白了他一眼，說：“五毛錢買的羊油夠全家人喝頓湯了。”從此他不敢再提。夏天趕集的時候，他想要一分錢喝碗茶，老爺子也不給——岳父要攢著每一分錢買糧食，養活這一大家人。

二妻弟那時才只有十來歲，逢星期天拿著抓勾、口袋和籮篩到十多裏外的文莊車站檢煤渣。他用抓勾扒開亂石堆，把地上一層黑土掃攏，再用籮篩把火車頭煙囪裏噴出來的煤渣過濾出來。晚上回來的時候，一口袋煤渣把他壓得頭幾乎貼住了地面，臉上蓋滿了黑灰，只露出兩隻白色的眼珠。

那是一個風雨如磐的年代，各種政治人物“鬧哄哄，你方唱罷我登場”。林彪折戟沈沙之後，鄧小平幾上幾下，今天反擊“右傾翻案風”，明天又批水滸批宋江、“批林批孔批周公”，鬧得國無寧日，民不聊生。那些人都在忙著爭權奪利，誰把老百姓的吃喝生死放在心上？

又是一年過去了，大哥仍然被關著，我還在進行著韌性的告狀。

一九七六年的元月九日的早晨，天氣陰冷，我站在合肥火車站外面空曠的廣場上迎著寒風等返程的火車。六點三十分，廣場上的大喇叭裏響起哀樂，接著廣播員以緩慢低沈的語調宣佈：“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傑出的共產主義戰士周恩來於 1976 年 1 月 8 日 9 時 57 分逝世，……”這對於我，對於絕大多數中國人來說猶如晴天霹靂、五雷轟頂。這麼多年來，人們都把周總理當作支撐這個國家大廈的棟樑。如今，他走了，我沈痛地預感到呼喇喇大廈將傾，還有誰管老百姓的事呢？

四月六日的一個漆黑的晚上，憂國憂民憂家的我突然從半導體收音機裏聽到了“天安門反革命事件”的報導，我頓時熱血沸騰，一骨碌從床上坐起，我恨不得一步跨到天安門廣場，融入“反革命”的洪流……

七月二十八日的唐山大地震奪去了幾十萬人的生命。此前河南駐馬店地區的洪水已經使數十萬人葬身魚腹。我讀過介紹董仲舒“天人感應論”的文章，知道歷史上許多朝代的暴政都曾引起過大

天災。商代的碑文說：“人怨上聞，天災下降。”我深信無論唐山大地震還是駐馬店洪水都是天怒人怨的結果。一夜之間，全中國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搭滿了防震棚。一天晚上，風雨大作，電閃雷鳴。狂風把我們住的防震棚上的蘆席掀得嘩嘩作響，風裹著雨直往棚子裏灌。我們全家蜷縮在棚子裏，兩個孩子又冷又怕，全身在瑟瑟發抖，我們用一條破毯子把他們緊緊地裹在懷裏。那一夜，我感到我們的共和國像一隻小船，在這風雨交加之夜飄搖在波濤洶湧的大海上，隨時可能傾覆……

十月上旬傳來了打倒“四人幫”的消息，身在窮鄉僻壤的我和全國人民一樣歡欣鼓舞，心花怒放。當我帶領學生參加“粉碎‘四人幫’慶祝大會”的時候，鞭炮把我珍貴的的確良襯衣燒了一個大洞，我竟然渾然不知……

一九七六年放寒假的時候，我路過宿縣見了錢院長。雖然大地震已經過去了半年，中級法院的辦公室仍然設在地委大院的防震棚裏。錢院長一邊撥拉著煤球爐上的烤紅芋，一邊慢悠悠地對我說：“到時候了，‘四人幫’都倒臺了，碭山也不敢再頂了。只是，關人容易放人難。把人關了這麼長時間，他們能願意承認自己的錯誤嗎？稍等等，讓他們搬個梯子下樓吧。”

一九七七年三月，在被關押了六年半之後，大哥終於被釋放了。釋放結論帶了一個長長的尾巴和一個牢牢的緊箍咒，像是一份雙方的協議：“李世隆因姦汙幼女問題被依法拘留。由於李世隆在關押期間態度較好，予以教育釋放，由教育局安排工作。出獄後，李世隆不得無理取鬧，不得上訪告狀。”這大概就是錢院長所說的他們搬的下樓“梯子”。但不管怎麼說，人是活著出來了。

家裏於第一時間電報告知了我，隨後不幾天，大哥就到懷遠來與我見面。

雖然我已於幾天前得知消息，有了思想準備，但見了大哥仍仿佛置身夢境。六年半的監獄生活使大哥變了模樣，雖然他才四十八歲，已現出老態。他發黃的臉顯出虛胖，動作遲緩，連說話都顯得較過去木吶。吃飯的時候，他端碗的雙手微微發抖，把饃饃握在手心裏。爲了不刺激大哥的受傷的神經，我沒有多說傷心的事，儘量說些高興的話。

不久，我送大哥回家。清明節前，一個細雨紛紛的日子，我們帶領全家一起掃墓。給爺爺和叔父、嬸嬸燒過紙後，我們最後來到父母親的墓前。這一次我們倆個都不能自已，不顧孩子們在身邊，在母親墳前長跪不起，放聲痛哭。大哥哭訴著說："娘，娘啊，……六年來，我天天掛心著您，無時無刻不想著您，沒想到回來連您的面都沒見上……娘，娘啊，您……您不該走這麼早啊……都……都是我害得你……您養了我一輩子，臨了，您不孝的兒子都沒能給你送終……現在，您的兒子回來了，娘，娘啊……"侄兒、侄女也哭成一片："奶奶，俺大大回來了，您睜開眼看看吧……"

唐世堅出獄後，身體稍事恢復，不顧緊箍咒的約束，繼續上訴，決心割掉這個"尾巴"，去掉那個緊箍咒。聽說，他後來求見了一位《人民日報》記者，這位記者把他的上訴材料轉交到中央負責同志手裏。一九八〇年，乘平反冤假錯案的有利時機，有關碭山縣製造唐世堅等人冤假錯案的報導見諸《人民日報》。碭山縣這才正式給唐世堅、我大哥等人徹底平了反。

後來，我多次反思這一段經歷。這六年是不堪回首的一場夢魘，它奪去了母親的生命，奪去了大哥的青春和健康，使他後來死於不當死的年齡。它改變了我們幾家人的生活，給我留下了永遠抹不去的辛酸回憶。我曾經感到後悔，後悔自己當初不該跟著"八二七"

造反隊去碭山。如果這樣，也許大哥不至於遭此橫禍，也許母親得以善終。但是，在我去碭山之前，他們不是已經把大哥打成“黑幫”了嗎？唐世堅、唐世儀不是沒有招誰惹誰嗎？那死於這場浩劫的千千萬萬的人民，他們都招誰惹誰了？如果……如果……如果沒有這場文化大革命呢？

廣東名作家秦牧寫道文革時說：“這真是空前的一場浩劫，多少百萬人顛連困頓，多少百萬人含恨以終，多少家庭分崩離析，……多少罪惡假革命之名以進行！”

我的家庭遭遇不過是社會大悲劇的一個縮影而已。

文革中究竟死了多少人？說法不一，無從確定。一九八〇年鄧小平對義大利女記者法拉奇說：“永遠也統計不了。因爲死的原因各種各樣，中國又是那樣廣闊。總之，人死了很多。”R. J. Rummel教授的著作《一百年血淋淋的中國》說，文革中喪生者的數目大約爲七百七十三萬人。

尾 聲

1.秋葉飄落

母親去世後，二哥徹底變成了一個孤苦伶仃的人，一個人守著從母親那裏繼承來的三間破草房。因爲他自己沒有生活能力，大哥又在監獄裏，嫂子只好收留他。說是收留，一天給他三頓飯吃而已，其他的事由我統統負責。他們並不跟二哥圍坐在在一個桌子上吃飯。見飯做好了，二哥自己拿著一個茶缸和一個碗來打飯，像吃食堂似的。嫂子或侄女給他的茶缸裏盛上稀飯，往他的碗裏扒一點菜，再給他兩塊剩饃。他自己端著這些回到自己的院子裏，把茶缸和飯碗放在地上，脫下一隻鞋墊在屁股下，然後坐在鞋上細嚼慢嚥。二哥吃飯慢，又最肯喝稀的，把飯端回去後，他先把稀飯喝了，再過來盛一茶缸。不然，要是等他吃了饃菜再來盛第二碗稀飯，鍋早已刷過了，剩的稀飯也已經倒給豬狗吃了。

此時，我成了他精神上的依靠，我按月寄給他零用錢，而且隨著我的工資增加，給他的零用錢也跟著增加，由兩元、三元、五元、十元，一直增加到十五元。每個月領工資後的的第一件事就是給二哥寄錢。鄉郵員唐成良又爲我擔負了我的新任務：送匯款單。他對別人說我的匯款“比發工資還准”。爺爺、父親、母親都沒有享受到我應該盡的義務，我不願意怠慢我這個無依無靠的哥哥。這些零用錢供他買藥、走親戚時買“禮物”和生活貼補。雖然幾十年各種藥都沒治好他的病，他還是到處打聽偏方。我明知道那些偏方也是騙錢的東西，但也願意給他這個錢，讓他對生活有點期望。

每年暑假回到家，我的第一件事就是給他拆洗衣服。他沒有衣櫃，暫時不穿的衣服都搭在橫跨牆角扯的一根繩子上，繩子上搭不下的就壓在席子底下。我把他床底下、繩上蓋滿了灰塵的的被褥和髒衣服統統扒拉出來，放在一個大洗衣盆裏，我必須赤著腳光著背幹上整整一天，累得腰酸胳膊疼。寒假回到家我把他所有的棉衣、被褥給他曬一遍。

一九八五年秋天，二哥來信說他得了前列腺炎，尿急尿頻，向我要錢買藥治病，還說要開刀。此時，我已經是懷遠一中的教導主任。我寫信讓他到懷遠來，準備帶他到蚌埠市的正式醫院看看。一星期後的一天下午，鄰居常大娘到學校裏找我，告訴我二哥來了。我回到家裏，見他正靠著樹袖著雙手蹲在院子裏，旁邊放著我在軍墾農場用的那隻小黃包。見了我，他的嘴唇動了幾下，卻沒說出話來。我趕緊把他讓進屋，他好像很累了，就勢靠門蹲下。我指著沙發對他說：“坐在沙發上不好嗎？”

“管，蹲著就管了。”他突然擡起頭來望望我，囁嚅著說：“家……家裏有剩饃嗎？”

我真渾，竟忘記了問他吃沒吃過飯！我跑到食堂，給他買了兩個饅頭、一碗菜，放在飯桌上。他卻慢慢起身把飯菜端到地上，依舊蹲在地上，一邊狼吞虎嚥地吃，一邊說：“有……有剩的就……就行了，還……還買新的幹啥……”

兩個孩子放學回來了。“二大爺來了！”他們招呼他。他從褂子口袋裏掏出一把糖果，端在手心裏遞給他們說：“吃……吃糖吧。”

吃過飯後，我問他的病情，他告訴我：每夜都要起來十幾次解小便，可到了廁所又解不下來。更奇怪的是：在自家的廁所解不下來，換個地方又能解下來了。

我打聽到省裏的泌尿科專家來蚌埠巡診，便帶他去看了這位專家。專家用手摸了摸二哥的肛門說：“輕度肥大，稍微吃點藥就好了，根本用不著手術。”我把他的症狀又向大夫描述了一番，當我說到“換個地方又能解下來”時，這位專家笑了：“精神作用，典型的精神作用！”

取了藥，我帶他到市里轉轉，想叫他見見世面，畢竟他出來的機會不多。面對眼前的高樓大廈，寬闊的馬路，往來的汽車，打扮入時的女人，他臉上現出的是漠然的表情——這一切都不屬於他。

我想多留他住幾天，又帶他回到懷遠。吃飯的時候，他偏要單獨蹲在一邊吃，無論如何不願與我們同桌。晚上看電視的時候，他也不肯坐椅子，執拗地蹲在地上。白天我們上班，讓他自己在家看電視，或出去轉轉。我發現他哪怕一個人在家看電視，他也袖手蹲在地上，累了便脫下一隻鞋墊在屁股下坐，並不坐椅子，更不坐沙發。我拉他坐到椅子上，他執意不從，嘴裏還是那句話：“管，蹲著管。”這時我明白了：他這一輩子就沒站立起來過，就是這麼袖著手蹲著過來的，不習慣被人平等對待。袖手、蹲地已經成了他的標誌性的肢體動作。

一天中午，我們下班回來，不見他蹤影。我們都很著急：莫不是他又犯了老毛病、一個人出走了？半下午，他挎著那隻小黃包回來了，步子跨得很大。走近了，我看見他臉上有些紅暈，現出得意的樣子。沒等我問，他自己開口了：“我……我上徐鋒老師家去了。”

“你吃飯了嗎？”我問他。

“吃了，徐老師硬留我吃飯，給我做了好幾個菜，殺了雞，燒了魚，魏區長還跟我喝的酒！”他話說得很連貫，愈加高興起來。

“你怎麼想起來到他們家去的？”我又問他。

“我上小學時，徐老師跟咱哥是同事，待我很好。那天，徐老師碰見我，叫我到他家去玩，我就去了。一說起來，魏區長也認識

我。——你不記得，打地主的時候，魏區長挎著盒子，威風得很！”他趁著酒勁越說越興奮，還做著挎槍的手勢。

“你空著手去的？”我再問道。

“我給他們買了一大把油條，可……可他們怎麼也不要，又包著讓我帶回來了。這不，你看！”說著，他從黃包裏取出毛巾裹著的一把油條遞給我。

看見他得意的樣子，我不願意掃了他的興致，只淡淡地說了句：“以後別去了，人家都很忙。”

“魏區長退休了在家沒事，叫我經常過去跟他說話，”二哥非常認真地說。

在我的記憶中，他一生從未這麼得意過，也從未有人對他這樣賓客相待。

有一天，我跟他單獨在一起的時候，他問我：“你不是當了這個大學校的主任了嗎？能……能給我找個活幹嗎？”

“你能幹什麼活呢？”我反問他。

“打鈴，看大門，掃院子，看圖書館，我都能幹。我還會修桌子板凳呢……”他很快地回答。

我說：“學校裏正式的校工還用不完呢，哪裏還能另外請人呢？”

他不語，沈思許久又吞吞吐吐地說：“咱鄉下有……有的人花錢買四川跑來的蠻子當……當媳婦，要是能……能花點錢買個……也……也行……”

“買賣人口是犯法的，”我說，“公安局知道了，就把女的送回家，錢白花不說，說不定還要抓你坐牢。”

這句話真地對他有點震懾力——他已經飽嘗了牢獄之苦，以後再沒提過這話。

這時，二哥已是近五十歲的人了，他腦子裏的理想在一天天泯滅，身上的精力已經差不多耗盡，他才開始真正安下心來。他感到自己被小套子緊緊地套住，母親不在了，再沒有人疼他，連數落他的人都沒有了，生活無望，人生沒有了樂趣，他不想活了。

有一天，全家人都出去幹活了，他在家喝了老鼠藥。被人發現後，全生產隊的人一起從地裏往家跑，把他送到公社醫院。他喝的藥量不夠，打了兩瓶吊水，他又活過來了。他開始琢磨另外的死法。觸高壓電是一個好的選擇，瞬間可以死去，沒有任何痛苦。於是，他準備了一根鐵絲，走到事先選好的屋後的變壓器跟前，憋足了氣閉著眼把鐵絲往變壓器上一扔。“啪”地一聲一道電光把他擊倒。他昏過去了。醒來時發現胳膊被燒掉一層皮，手腕處露出骨頭。但他又沒有死掉，只不過手上落下了殘疾。

一九九二年的冬天特別寒冷。一股接著一股的寒流帶來了一場又一場雪，氣溫驟降到零下十六度。我像當年擔心母親那樣擔心他：他一個人守著三間空房子能睡著嗎？那漫長的寒夜他是怎麼熬的？我趕緊給他買了一套新棉衣帶回去。後來聽說，他常常冷得受不了，夜裏起來點一把麥草烤火，或是燒碗開水喝暖暖身子。如果嫂子知道了，第二天就會吵他：“你深更半夜點火，要是失了火，不要把全家的房子都燒了？”我想給他買一條電熱毯，可是嫂子他們一起反對：“要是露了電，把他電死了我們都不知道。”

一九九三年的夏天，他可能預感到自己壽限已到，跟家裏人說了好幾次要去徐州，賣他收集了很長時間的牙膏皮，順便看看我——唯一真正疼他的親人，多年來一直像關心父母一樣關心他的人。聞訊，我帶著妻子和二兒子回家了。見了我們，他顯出高興的樣子，第二天一大早，他特地趕集爲我們買了一大把油條，用毛巾包著遞給我們。我問了他的生活情況，把他的住屋裏外看了一遍，打算再

把他的衣服清洗一遍。第二天我進縣城有事，先給了他十五元錢，臨行時問他要不要我給他買什麼藥和東西，還對他說我後天就回來了，回來後給他洗衣服，再給他點錢。

第三天早晨，妻弟趕到縣城的旅社找到我們。告訴我們二哥已經去世了。我感到愕然：我從家來的時候，他不還高高興興的嗎？怎麼才過了兩天就……回到家才知道他又喝了老鼠藥。我掀開蓋在他臉上的被單，見他很安詳，像走完了很長很長的旅程，疲勞了，甜甜地睡去了，只是嘴角上有一點沒擦乾淨的血跡。他已經見到了我，自覺得沒有什麼遺憾了。

那天是陽曆八月八日，立秋。他是立秋那天來的，走過了五十七年的人生旅程，又在立秋這天走了。他走得很靜，就像秋天蕭蕭下的無邊落木中的一片凋葉，天上的星星也還是那麼多，連一顆小星也沒有隕落，就像這世界上原本就沒有過這個人。他沒有留下一張照片，在我腦子裏定格的形象是：黝黑而佈滿皺紋的臉，永遠萎縮的肢體：弓背、袖手、蹲地。

我的心情是複雜的。我很痛苦，爲他在那個特殊的年代度過的多災多難而又落寞荒蕪的一生；我也爲他慶倖，爲他與苦難的徹底決絕。那天天氣晴朗，老天爺也並不爲這顆生命的消失感到淒婉。

我負擔了他所有的喪葬費用，把一個可憐的親人送至他的歸宿。

2．長兄如父

爲了讓孩子接班，大哥提前於一九八三年辦了離休手續。大哥是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前參加工作的，所以按政策應享受離休待遇。離休幹部在退休金、醫療費和其他福利方面都比退休幹部高。在讓誰接班的問題上，大哥曾和我商量。我的意見是讓小侄女小雪接班，以便大哥能在離休後享受晚年的幸福。但大哥仔細斟酌後還

是讓侄子接了班：子承父業是幾千年的風俗，閨女遲早是人家的人。侄子接班後，家裏一應農活便落在了大哥身上，由一位校長變成了一個全職的農民。

大哥當農民也很投入。那幾年，農村的糧食很便宜，農民辛辛苦苦幹了一年，去掉農藥化肥的成本，幾乎不掙錢，年成不好甚至要賠本。有的農民還很窮，糧食不夠吃，到了春天就鬧饑荒。一個鄰居家的兩個孩子夜裏去地裏偷吃別人剛種下的花生種，因爲花生種下種前拌了農藥，結果一個男孩子給藥死了，另一個搶救及時才撿了一條命。爲了甩掉窮困，村裏人都在想著改栽果樹。他們算過一筆賬：按照一般的果樹產量，即使一斤水果賣一毛錢，也比種糧食划算。而當時，無論梨還是蘋果的單價都在七毛錢左右。所以，大哥便跟著村裏的年輕人一起到山東棗莊一帶買樹苗，騎著自行車到唐寨西邊一些果樹種植時間較長的地方轉悠，找熟人打聽栽培技術，自己又買了一些《果樹栽培》之類的書籍，作了大量摘抄……但栽植果樹要比種糧食費事得多，春天要人工授粉，夏天要一遍接一遍地打藥，秋天要剪枝、施肥。那時改栽果樹的還不多，冬天有人偷樹苗，梨子成熟了有人偷梨，所以一年四季梨園裏不能離人。大哥便在梨園裏搭個庵棚，一天到晚呆在梨園裏，三頓飯都由家人送到庵棚裏吃。有時，也和臨邊的互相照應，自己先回家，吃過飯再替換別人回家吃飯。

有一年冬天，天氣奇寒。當我得知大哥還住在梨園裏時，我給大哥寫了一封措詞強硬的信，堅決要求他到我這裏來過冬，哪怕梨樹被人偷光了也不要管。大哥來了，我和妻子都說他：“天這麼冷，住在庵棚裏凍得能睡著嗎？這麼大年紀了，到底是要梨樹還是要命？離休了還這麼苦自己，你能活幾輩子？看看人家那些退休的，提籠架鳥，遊山玩水，哪裏舒服往哪裏去。”大哥卻說：“咱農村

的不能跟人家城裏人比。”結果，在我這裏住了幾天，天稍微轉暖，我們苦留不住，他又回家了。

漸漸地侄孫們都長大了。一九九七年春天，大哥便操辦著給孫子蓋房子娶媳婦。對這一點，我們反對得更加激烈：“孫子娶媳婦該兒子操辦，無論什麼事都該你操辦？再說，咱們的房子也不算舊，可以當新房。”蓋房子是莊稼人的大工程，有的人勒緊褲腰帶攢十幾年也蓋不起房子，而且那幾年磚瓦水泥都難買。但大哥不顧我們的反對，已經四處備料了，只提出向我借三千塊錢。我們知道大哥不會聽我們的，只好由他。我正準備給他寄錢，大哥又打電話來說，用不了三千塊錢了，只要一千五百塊錢就夠了。我遵命給他寄了一千五百塊錢。現在回憶起來，大哥是怕我作難——當時我的二兒子正在大學裏讀書呢。

一九九七年的暑假，我們去北京的石油部療養院度假。就象小孩出門要給大人告知一聲一樣，動身前我給大哥通了電話。大哥說：“去吧，家裏沒有事。房子已經蓋好了。從北京回來，天涼快的時候，回家來過幾天。家裏蓋房子時借你的一千五百塊錢，等回來就還給你。”想不到，大哥竟然沒有等到我回來，這也成了大哥最後的遺言。

當時，二兒子正在北京大學讀第二學位，假期裏留校參加了一個培訓班，課程不多，大部分時間與我們住在一起。一天中午，天氣酷熱，我們正在食堂裏就餐，二兒子的 BP 機響了。他回到房間裏回電話，但很快急匆匆下樓，說：“守成大爺叫你接電話。”我愣了一下，預感到一種不祥：我來京後並未給守成哥聯繫，他也不知道兒子的 BP 機號碼。

我拿起話筒，電話裏傳來守成哥的低沈而急促的聲音：“家裏打來電話，世隆哥不在了，你抓緊時間回去。叫……叫你兒子……”

我頓時淚如泉湧，沒有聽完他下面的話就跑回食堂。“你……你大爺去世了，”我泣不成聲，“我……我們……這就得回去……”

我們沒有心思再吃飯，留下兒子處理善後的事宜，我和妻子匆匆收拾行李趕往火車站，晚上八點鐘坐上了開往徐州的火車。一路上，我的眼淚如同斷了線的珍珠，唰唰地往下掉。我一直在想，大哥到底出了什麼事，短短幾天的時間裏就離開了人世？上午，我剛在宿舍裏讀到《文匯報》的一篇文章，上面有句話讓我深思良久：凡是已然的，都是必然的。大哥“已然的”死難道也是“必然”的嗎？

列車在暗夜裏隆隆地前行，周圍的人都在酣睡。我一分鐘也睡不著。一幕幕的往事像電影一樣在我腦子裏閃現，每一段往事都讓我的雙眼湧出串串淚水。

大哥長我十四歲，我記事的時候，大哥就已經成人並開始了他的教師生涯。到大哥去世的一九九七年，他六十八歲，我五十四歲，大哥伴我走過了半個多世紀。大哥是我真正的入門老師，他把我領進了學校，給我起了名字。在與我有血緣關係的親人裏，他拉著我的手長大，伴我走過的道路最長。雖然他自己文化程度不高，他卻很捨得對我進行智力投資，我讀小學的時候，就得以讀上別的孩子看不上的少兒報刊《兒童時代》、《新少年報》、《中國少年報》，並開始接觸長篇讀物如《勇敢的戰士》、《鋼鐵是怎樣煉成的》、《萬水千山》等。我進了中學，大哥一本接一本地給我買文學啓蒙讀物，使我與文學結下了不解之緣。就是我集郵的愛好，大哥也一直細心地支援著，他把收到的信件上的紀念郵票和特種郵票都給我剪下來，夾在信件裏寄給我。

那時，大哥是我的驕傲。

一九六〇年，爺爺、父親、叔父、嬸嬸相繼去世的時候，大哥三十一歲。此時，他上有六十歲的老母，下有神經病的二哥、我這

個未成年的弟弟和三個孩子。他堅強地挑起了兩個家庭的生活負擔，一口一口地、一分錢一分錢地省，硬是把全家從死神手里拉了回來。在我因母親重病考慮輟學的時候，大哥把母親的事攬下來，把我“趕”回學校。一九六一年的大年初三，王作軍讓我陪他到毛堂的姐姐家走親戚。中午，王作軍的姐姐請我們吃的是豬肉燒豆芽。當時，大哥正在毛堂小學任校長，那天輪到他當班護校。我和王作軍在吃過飯後去看大哥的時候，他正孤獨一個人在煤爐子上烤著像石頭一樣硬的紅芋面鍋餅……

我讀大學的時候，儘管我用一塊五毛錢的生活津貼維持著我日常開銷，大哥仍然堅持定期給我寄錢。當我不得不向大哥提出要錢的時候，我要三塊，大哥至少給我寄五塊；我要五塊，大哥會給我寄十塊……

在那些年代裏，大哥是我的依靠。

沒有大哥就沒有這個家，沒有大哥就沒有我的今天。沒有大哥，我就會要像王作軍一樣，像千千萬萬農民兄弟一樣，一生過著臉朝黃土背朝天的生活。

待我結了婚、生了孩子，像是有牽腸掛肚的父母，每年兩個假期我仍然一定帶著孩子們回家的。大哥在我們回家之前，總把被褥拆洗好，把屋子給我們收拾得乾乾淨淨，毛巾、肥皂、蚊帳、蚊香等一一都給我們準備好。那時沒有電視，大哥知道我喜歡聽收音機，把收音機也修理好裝上電池。我們一回到家，就感受到家的溫暖。

那時，大哥就是我的老家。

在我的一生裏，大哥給我的愛如巍巍大山，如滔滔長江。對“長兄如父”這個古語沒有人比我體會得更加深刻了。在我與大哥最後的對話裏，大哥竟然還在惦念著還我的“借款”！大哥，你對我的恩情我怎麼還呢？

…………

回到家裏，幫我們料理喪事的鄰居擠滿了院子，我卻感到空蕩蕩的。我像一個孩子，一個房間一個房間地找，卻找不到我想見的大哥。我要跪在大哥的床前大哭一場，然而，他們告訴我，大哥停放在縣殯儀館裏。這時我才感到，這個家裏再也沒有我的大哥了。

家人告訴我，十來天前，大哥晚上要去梨園看梨，匆匆吃了晚飯，臨走時沖了一袋豆奶粉喝。第二天便腹瀉不止，先請了村裏的醫生，後轉到鎮上的醫院，最後轉到縣醫院，竟始終沒有能止住，最後因腎衰竭去世。我後來得知，有一種豆奶粉，人人喝了拉肚子。在中國這個充斥假冒僞劣產品無食不毒的大市場上，這樣的事是不稀奇的。但，爲什麼受害的該是我的大哥？我要找回我的大哥！我想到過要去告廠家，但無法找到證據；我也想到告醫院，爲什麼連最常見的腹瀉都治不好？一個當醫生的朋友看過病例說，醫院沒有錯。那麼是誰的錯呢？爲什麼大哥死在不當死的年齡呢？我冷靜地思索後悟出，是父親去世後過度的操勞，是六年半的牢獄生活毀了大哥的青春和健康並奪取了他的生命！我更應該去告的是……

望著牆上大哥的遺像，我像個孩子一樣"嗚嗚"地哭起來。

第二天，我們去縣殯儀館舉行火化儀式。我代表家屬在追悼會上講了話，我痛哭流涕，泣不成聲。由家屬、親戚、近鄰和大哥的生前好友同事組成的悼念隊伍裏也是哭聲一片。

追悼會後，我們向大哥作最後的告別。鄰人攙扶我走過大哥安睡的小床面前，我撲向大哥，雙手掀開蒙在大哥臉上的被單，我淚眼模糊地端詳著大哥的臉，大哥臉色蠟黃，像睡著一樣。想到這是我與大哥最後的一面，我號啕大哭，喊著"大哥，我的大哥……"，我要喚醒大哥並把他從死神那里拉回來。王作軍用力把我拖開，讓告別的隊伍依次前行。待我出了靈堂門口，我忽然想起來，我應該

給大哥磕個頭，以感謝他的深恩，便急忙回到靈堂，但他們已經把大哥推走了……我好悔啊，大哥攙扶我走了半個多世紀，我竟連一個頭也沒給他磕！這成了我終生的遺憾。

大哥的骨灰下葬那天，晴朗朗的天，突然下起大雨來。幫忙的鄉鄰和親戚都很著急。雨淅淅瀝瀝一直下了一個多小時，路上汪了很多積水。待雨細了一點之後，鄉鄰們便艱難地冒著雨踏著泥水把他送到他用汗水澆出的果園。

大哥的辭世使我失去了最後一位撫育我的長者。雖然那時我已是五十開外的人了，但我感到的是變成了一個無依無靠的孤兒般的悲哀。



後 記

这本书是我的回忆录。

一般只有大人物才寫回憶錄，或記載他們治國興邦經天緯地的壯舉，或記載他們發家致富兼濟天下的偉業。

我是一個農民的兒子，一生從事的是平凡的中學教師的工作。但是，我經歷了一個大時代，一個古今中外絕無僅有的荒唐時代。在這個荒唐的大時代裏，撫育我長大的幾位長輩統統死於非命。人的經歷是一份財富。從這個意義上講，我擁有一筆財富，一筆巨大無比的財富。我是一位富豪。我有很多值得大書特書的東西。

當我想把這段傷心往事告訴我的下一代時，他們就像聽《天方夜譚》的故事一樣，感到匪夷所思，他們無論如何不敢相信歷史上曾發生過這樣的事情。這時，我感到我們，這個時代的親歷者，有責任把這段經歷寫出來。當我動員我的同時代的同命運者拿起筆來的時候，他們都以“往事不堪回首”爲由，不願意生生地揭開自己心靈的創口，寧可讓這段歷史淡出於我們的記憶。

但這是怎樣的一段歷史啊？它是一場空前的大劫難，數千萬人或成爲冤魂，或成爲餓殍，或死於刀槍棍棒，或被逼自盡……。我的家史不過是那個時代的一個縮影而已，我相繼逝去的七位親人不過是滄海中之一粟，我的家庭也不過是千千萬萬個家庭的代表。層層的痛苦在我的內心與日俱增地疊壓著，積澱著，吞噬著我的心，歷史的沈重感使我感到痛苦，有時甚至使我感到窒息。

中國人不是喜歡自卑自虐的民族。歷史上，很多國家和政府犯了很多的罪，如德國法西斯的大屠殺，美國的種族歧視等，但這些民主國家都在爲過去犯下的罪行承認歷史，反思，道歉並祈求原諒。當我們要求日本對自己的歷史進行審查的同時，也應該對一九四九

年後的所有中國歷史進行審查，因爲我們掩蓋了太多的歷史真相，總把光輝的一面呈現給大眾，而對醜陋卻真實的一面遮遮掩掩。

從一九五七年的反右到一九七六年“文化大革命”結束，二十年的時間裏，在完全沒有外族入侵的情況下，半億左右的中國人死於非命。毫無疑問，當時政策的制定者應爲這些亡靈負責。但這裏面另有一些深層次的東西值得思考。一位學者認爲，當被統治者順從並習慣於統治者的頭腦思考，兩者在客觀上就成爲了“同謀”。那麼，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們這個社會出現過的許多悲劇，在很大程度上都是這種“同謀”的產物。在這裏，我要引用美國波士頓猶太人大屠殺紀念碑文上的銘文：

起初他們追殺共產主義者，我不是共產主義者，我不說話；

接著他們追殺猶太人，我不是猶太人，我不說話；

後來他們追殺工會成員，我不是工會成員，我繼續不說話；

此後他們追殺天主教徒，我不是天主教徒，我還是不說話；

最後他們奔向我來，再也沒有人站起來爲我說話了。

沒有勇氣面對歷史的民族是沒有希望的。誠如一位學者在題爲《禁言文革浩劫是另一場浩劫》的文章中所說：“對於重大公共災難的參與者而言，當絕大多數個人不願面對歷史真相之時，沈默或說謊的代價將被轉嫁給整個社會，這種負面代價的持續積累就是在積累社會危機，並把這種危機一代一代地轉嫁下去：一代代繼續說謊，直到謊言徹底腐蝕了一切，中國人再不知道何爲個人誠實和何爲歷史真相，從而一次次或濫用或錯過或放棄歷史的機遇。……歷史真相無法還原，教訓無從總結；現實改革無法走上健康之路，沈重的歷史欠債讓中國的未來不堪重負。”

《餓鬼》的作者賈斯柏.貝克（Jasper Becker）說：“在中國要爲大饑荒的受難者樹立一座紀念碑”，巴金曾提議爲文化大革命建一座博物館。我們何嘗不應該爲每一次政治運動如反右派鬥爭、大躍

進、反右傾等等，……都建一座博物館並爲其中的受難者樹立一座紀念碑？

二〇〇三年的七月，我退了休。農曆十月一日，我在祖父、父母和叔父母的墓前立了一塊碑，我在碑文中寫道：“家悲國哀，凝成此碑，以祭先祖並昭示後人。”

二〇〇七年八月，我又提起筆來。我明知道這是一種身心俱損的勞動，但我總有一種使命感：我要搶救這一段歷史，我要讓我們的後代，未來的國家領導人，還有世界上所有的人知道：在二十世紀的六十年代，在西方國家生活普遍開始進入現代化的時候，在中國卻在發生著這樣觸目驚心的事情。

滿紙荒唐事，一把辛酸淚。這一段歷史是我蘸著血和淚寫出來的。在寫作的過程中，我經常是帶著滿臉的淚水，有時苦痛使我無法繼續，不得不俯在電腦前失聲痛哭……傷心的往事在我頭腦中疊現，我一夜又一夜地失眠。但我終於給這本書畫上了句號，我終於可以告慰我的死於非命的親人及數以千萬計的同胞了，終於可以告慰我們多災多難的民族了。

《真相》系列(49)

書　　名：共用的墓碑——一個中國人的家庭纪事
作　　者：李世華
發 行 人：何　頻
責任編輯：費　彰
封面設計：一　劃
出　　版：明鏡出版社
網　　址：www.mirrorbooks.com
電子郵件：mirrorpublishing@yahoo.com
通訊地址：P. O. Box 366, Carle Place, NY11514-0366, U. S. A.
電話：(516)338-6976
國際統一書號：ISBN 1-932138-77-3
定　價：HK 98
版　次：2008 年 12 月第一版

